沈从文全集

14

沈从文全集

第14卷 ● 杂文

SHENCONGWEN QUANJI

甲辰杂谈

怎样从抗战中训练自己

见微斋杂文

雾清轩杂记

北平通信

跑龙套

艺文题识录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全集 .1～17 卷/沈从文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

ISBN 7-5378-2463-0

Ⅰ.沈… Ⅱ.沈… Ⅲ.①沈从文(1902～1988)-全集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Ⅳ.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9777 号

责任编辑:谢中一
陈 洋
美术编辑:任丽凤
印装监制:李建华

沈从文全集(1—17 卷)

沈从文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244 字数:5400 千字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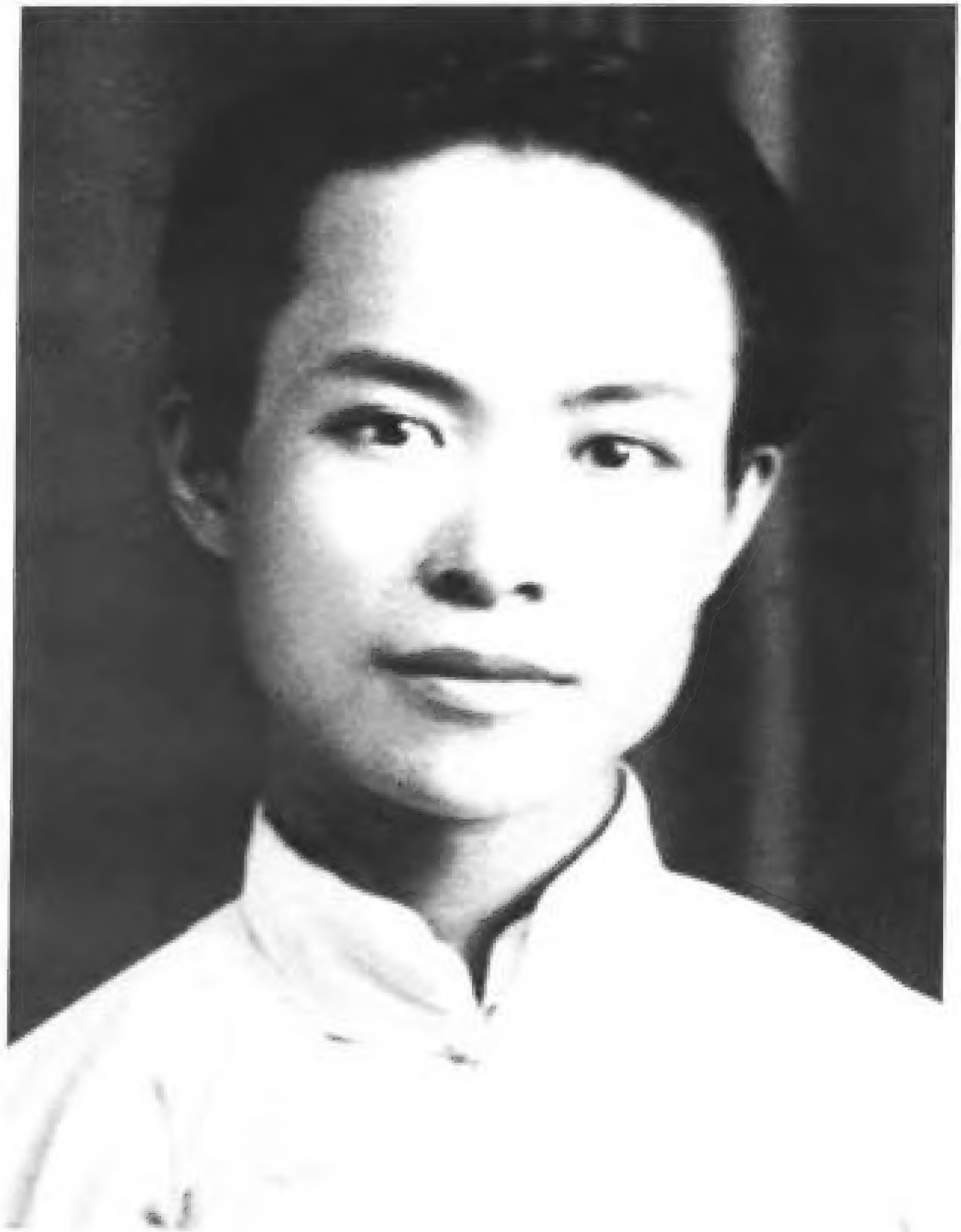
ISBN 7-5378-2463-0
I·2352 定价:560.00 元

本书所收沈从文作品,北岳文艺出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未经许可,不得将其全部或部分作品转载、改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编辑出版。

《沈从文全集》编辑委员会

顾　　问：汪曾祺　王　予
主　　编：张兆和
编辑委员：（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凌　宇　刘　北汀
沈虎雏　王继志
王亚蓉　向成国
谢中　　张兆和

特约编辑：王继志　吴福东



1929年初摄于上海

1948年夏在北京大学宿舍

1982年6月下旬与朱光潜在全国文联第四届二次会议中　　王汗　摄

1929年秋沈从文开始任教于中国公学
自题："初至吴淞中公时得的，现在这房子早毁去了，悲哉"

目录

□ 甲辰杂谈 1

“我恨他的是……” 3
“你要知道” 5
“我心里”也“常常想” 8
扪虱 一 13
扪虱 二 15
艺术杂谈 17
杂谈 21
杂谈 六 24
“紫禁城骑马”归来 28
看了司徒乔的画 32
十年以后 34
感想 44
甲辰闲话 一 48

甲辰闲话　二 …… 51
甲辰闲话　三 …… 54
劝人读经 …… 55
驴子故事 …… 57
知识阶级与进步 …… 60
打头文学 …… 65
从“小学读经”到“大众语问题”的感想 …… 68
论读经 …… 74
尽责 …… 79
北平的市民 …… 84
中国人的病 …… 86
一个读报者对报纸的希望 …… 91
大家快来救济水灾 …… 93
悲观与乐观 …… 95
烦闷 …… 97
时间 …… 99
青年运动 …… 102
沉默 …… 104
文学作家中的胖子 …… 109

□怎样从抗战中训练自己 115

怎样从抗战中训练自己
——给沅州一个失学的青年 …… 117
给青年朋友 …… 120
一种态度 …… 126

谈人 …… 129
“五四”二十一年 …… 133
读英雄崇拜 …… 136
谈家庭 …… 148
男女平等 …… 155
变变作风 …… 158
找出路
——新烛虚二 …… 162
欢迎林语堂先生 …… 168
田汉到昆明 …… 173
谈沉默 …… 177

□ 见微斋杂文 181

见微斋笔谈
——小说上吃人肉记载 …… 183
宋人演剧的讽刺性 …… 190
吃大饼 …… 203
应声虫 …… 209
宋人谐趣 …… 214

□ 霁清轩杂记 237

怎样办一份好报纸
——从昆明的报纸谈起 …… 239
从开发头脑说起 …… 245
政治与文学 …… 251

性与政治 …… 259
五四 …… 268
欢迎魏德迈 …… 271
一种新希望 …… 276
新党中一个湖南乡下人和一个湖南人的朋友 …… 282
纪念五四 …… 297
五四和五四人 …… 302
霁清轩杂记 …… 305
“中国往何处去” …… 320

□ 北平通信 325

通讯 …… 327
沈从文启事 …… 328
征集启事 …… 329
给一个女人 …… 330
一封公开信 …… 334
复衡阳黄君 …… 336
致子平 …… 337
致昌期先生 …… 340
“否定”基于“认识” …… 342
关于学习 …… 345
启事 …… 350
北平通信
——第一 …… 352

怀塔塔木林
——北平通信二 …… 361
故都新样
——北平通信三 …… 368
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 …… 370
试谈艺术与文化
——北平通讯之四 …… 382
迎接秋天
——北平通信 …… 390

□ 跑龙套 399

参加北京市文代会筹备会以后
我的感想——我的检讨 …… 401
沈从文的发言 …… 404
从龙谈起 …… 408
跑龙套 …… 410
人民时代人民艺术的成就
——庆贺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大会 …… 416
一点回忆、一点感想 …… 420
一个长会的发言稿 …… 429

□ 艺文题识录 433

题自己的著作
题《雨后及其他》 …… 435
《边城》题识五种 …… 438

题《一个天才的通信》 …… 444
题《长河》校注本后 …… 445
题《都市一妇人》 …… 446
题《烛虚》留样本 …… 448
题《断虹引言》旁 …… 449
题《小砦》篇头 …… 450
题《新烛虚》校样 …… 451
题《虎雏》自存本 …… 452
题《人伍后》扉页 …… 453
题《阿丽思中国游记》存底本 …… 454
题《绿魘》文旁 …… 456
题《沈从文子集》书内 …… 457
题《老实人》卷首 …… 459
题《阿黑小史》单行本 …… 460
题《八骏图》自存本 …… 462
题《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校样 …… 466
题《月下小景》 …… 468
题《从文小说习作选》扉页 …… 470
题《黑魘》校样 …… 471
题《从文自传》扉页 …… 473
【附录】曹禺题《从文自传》封面 …… 474
题他人的著作
题《爱眉小札》 …… 475
题《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论文集》 …… 476
从文用书题识选 …… 478
《战争与和平》阅读札记 …… 481

题某传抄件 …… 489
写在《红都女皇》摘录文字下 …… 492
《沈从文研究资料汇编》草目旁注 …… 494

题书法、绘画、摄影及其他

题《出师颂》条幅 …… 498
题中国公学女子篮球队合影 …… 499
写于赔书单上 …… 501
告示选 …… 504
评沈红绘画习作 …… 506
题旧书元稹《赠双文》诗 …… 509
题工作室留影 …… 513
书赠张香还条幅跋 …… 515
重摹义卖条幅跋 …… 517
书赠蹇先艾条幅跋 …… 519
题刘焕章《鱼鹰图》 …… 520

甲辰杂谈

甲戌杂谈

JIACHEN ZATAN

本集为新编，集名为编者所拟。收作者1924年12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发表的杂文32篇。

“我恨他的是……”

口学者自来京“重理营业”后，许多人就疑心他干吗不做那管领锄头队的什么长：好把他所号召的事情实现？干吗不做那“聚天下英才而育之”的什么长：好发挥他的锄头化的政策？——单单做那执达吏而上溯的什么长真不可解！

于是有人就拿这惑疑去问他最近信的X。

“他是为报仇而来的！——你明知道他前年子被仇家污辱他的贞操。”X这样说。

“‘报仇’，不错，如今仇是报了！但同是那时有一大群无抵抗女人被人强奸，口学者如今不但不可怜他们，为甚还把这一群被奸者饭碗，筷子，营业执照取掉？”又问。

“这话我也曾问过他——口学者——他说过：‘我如今举动，不是不知道他们的可怜，我恨他们的是：左手放在眼边擦那为受委曲而流的眼泪，右手就又反过去从背后接口口的遮羞钱’。话虽是这样说，我总觉得‘一网打尽’：可恨的虽然去了，可怜者也就不知有许许多；——老兄，是不是？”

（附注：——到这“莫道国事”贴满茶楼酒馆的北京，用口字的地方也就自然而然多了起来，因为我胆子很小，深怕“法警用法绳，把我绑到法堂，说我违法”。好在各人翻开“经验字典”，这几个口字大约还认得下；即或实在无法认识，不久我的继开明先生而作的“口字考”也将出版！）

十二月二十西城之西绿稻庄

本篇发表于 1924 年 12 月 28 日《晨报副刊》第 302 号（此期号印错，实应为第 311 号），署名休芸芸。

“你要知道”

——因我“不愿奋勇的新进作家被一班吹毛的批评家欺负”[①]，所以来说几句话。——

大概做文章的人，“尤其是诗”，“谁都免不了有这种习惯：逢到自己觉得极满意而且和自己极表同情的字句时，每每把他记在心里，久而久之，就渐渐的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东西，于是就于不知不觉之间把他们用了出去，于是就于不知不觉之间和别人的字句雷同了！”既然变了自己东西，而况又用之于不知不觉间；姓陈的！“这算得抄袭？”

“吹毛求疵”，你实在是多事！你“看见人家的出头，自己就不舒服；看见人家成功，自己就在破坏”：你不羞？你纵不羞，我却为你面痒！

一篇诗已有了好多字句不同，“这也还算得抄袭？”“假若这也算得是抄袭”，“那末，中国的诗坛恐怕早已破产了！”你的心即或不是“见别人成功不服气”，但“你要知道”，中国的文艺界，像这样东西，“真是举不胜举”呵！

"文学是整块的东西，批评文学是要从整块方面着想。"你但拿个作家不期然两相暗合了些许句子的诗来说人是"抄袭"，"批评一篇东西，难道是这样容易吗？"

你们真是无聊！（连那个说"什么归的剧本是偷的"底人在内。）若不是得琴心女士为录出原诗对比，使大家看出两诗的"不同"处来，真不知有许多"手头无创造季刊的人"被你谎骗！"陈先生呵！你未免太利害了，太取巧了！"太不知道诗之所以为诗，而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的原故了！

夫"抄袭"，必一字不易，其罪乃能成立。（就是我抄了一篇东西，被你发见后，对于这罪的惩罚，在最近现行法令中，又没有什么规定；——而且我脸皮又是这般韧，你又其奈我何？）今两诗既有些须字句不同，"有什么抄袭之可言呢？"

可怜的陈先生！请你不必再做"吹毛求疵"的文章来丢脸吧！你连"抄袭"的意义也不懂，连两诗是否"相同"也看不清，还做什么文章？虽说"欧阳君对于这事，很是泰然"，而且也知道"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但我因要"为一切无罪被毁的新作品及新作家护卫"，（护卫的原故我懒同你说）所以除佩服欧阳先生的大量外，不得不"秉着良心"，教你捡个乖。

至于我的话也许"不知不觉"间触犯了文艺界作家的尊严，但我是"秉着良心"说的，所以"明知是得罪人的话"，也不怕人来骂我；更不怕你反转来骂我。

附言：姓陈的，你的"细心"的确是"误用了"！纵或你发见了别人的整段抄录，（除非傻子肯整段抄）但古

人“也有什么集句的老例”了。既然是“自古有之”，那末，抄袭者的罪过，最多也不过像我写这文时忘了把“借用”的话用引号标出罢了！以后还是少揽事，莫专同“奋勇的新进作家”捣乱吧。

四月十五日于窄而霉小斋

本篇发表于1925年4月18日《京报副刊》第122号，署名茂林。

① 1925年1月，在北京女师大新年同乐会上曾演出北大学生欧阳兰所作独幕剧《父亲的归来》。1925年1月21日《京报副刊》第43号即发表署名“许子”的文章，指出欧剧几乎完全抄袭日本菊池宽的剧本《父之回家》。对此，除欧本人作文答辩外，还出现了署名“琴心”的辩护文章。不久，陈永森在《抄袭的能手》（载1925年4月10日《京报副刊》第114号）一文中又指出，欧阳兰赠S妹的诗《有翅的情爱》（载《妇女周刊》第9期）跟郭沫若译雪莱诗中的句子有三分之二相同。随后欧阳兰又化名“琴心”和“雪纹女士”撰写《又一个不平鸣》和《“细心”误用了》两文（均载1925年4月14日《京报副刊》第118号）为自己辩护。

本文此处及下文所引文字大多引自《又一个不平鸣》和《“细心”误用了》。文中“姓陈的”即指陈永森，“什么归的剧本”即指欧剧《父亲的归来》。

“我心里”也“常常想”

想到抄袭者之可怜。（这里没有欧阳先生在内，请莫误会。）

我心里也常常想，怎么中国这种可怜的文艺园里，也竟然有热心以监督自任的人起来做清乡运动。我何尝不知道欲求达……乡之不可不清呢，但是——

但是你不清乡，小偷还是小偷。捉到几回贼，也许倒把贼名捉到人人的头脑中去——让贼来自己得意。

做小偷的人，本来也可怜啊！他是为求表现自己，或想吸引他同栖两脚兽的原故，自己又实在穷，才冒点不大用劲的险，临时活动一点别人炒熟了的菜，略略搀点酱油，下点青椒油，再摆出来，——欺骗一下自己，哄哄别人。你若是于不知不觉间，（自己不能露出巡警的神气，）说到“文字虽然是公物，你能用我也能用，但必把它先融化到自己脑中，遇到情感燃烧时，再用笔请那足以代表那时情感的几个字到

纸上来，才算数。因为文学的价值就正在这里。至于取别人东西装璜一下，染染色，果真单是迷引爱的对象一种手段，别人当然不必说。但又偏要举出去说是自己的，那多少总有点自己不忠实自己的内愧吧！……”一类话时，我敢包定说他脸会要红一阵，除非……

至于你使出那种笨头法子，他心一撇，嘴一扁，倒会索性油起脸来同你谈谈什么“你手巾也是麻纱的，我手巾还是麻纱的，谁能分析谁是仿谁”的话；或是“请你拿出一条手帕来，我也会认出某一根麻纤维是与北京城某一个人相同的长短”的话来了。

真正是，“谁个不是抄袭呢?”我拿了一本字典同你来说话。

想到从前抄袭者的胆小怯羞样子之好笑。

“抄袭”，在现在我们这种奋勇新进大胆作家如雨后春笋一般多的国度里，两个字所给人以难堪的味道，本来早就消失干净了。这两字原本加到某一个人头上时，也就只能给人以一点心的罚惩；从前人的心是与脸相连，因此还可以引到脸上来红一阵儿。但是——

但是如今人人心里已有了把握，（在外国高鼻子也有这事发现过；不仅是可沿本店老例集句，）脸上又何必多此一红呢？本来心已不会内愧。

所以我敢说“抄袭”这两字，已没有什么用处，——至

少到如今失了使心内愧的效力——落到人脑壳时，并不能比一根灯草为上劲了。

想到欧阳先生与陈先生这两个我都无缘识荆，而看出两人之不同处来。（这时要偷用“个性”两个字来形容不同，大概无人反对。）

欧阳先生为人的好处，从今天文章中可看出来；他说“细心要用到适宜的地方，不然，就是误用”；态度既那么怪和气可亲，末了还反而感佩那诬害他的人：我不敢昧到各位，若是我被人那样，无论如何要反告他一纸于各读者公论前；请处治他一点罪罚，以儆效尤。

真的噢！陈先生心还细，能看出相似与相同的地方来，我也佩服。但是——

但是你拿不能成立的罪案要想加到一个“对艺术则忠实而大胆对人则谦虚而有容”的好人身上；且惩罚又好像不止脸红就算完事，陈先生，我说真话“不佩服你”了。

我又可怜你，因为你直到如今，又未必就能懂得自己是怎么说错了人，愿意“陪个小心”。

想到蚂蚁。（它曾把我一包白糖弄坏过。）

真的，“打死一只蚂蚁，并不算得是本领高”；何况蚂蚁那种活泼，又岂是那斯斯文文做兰花手捉得到捏得死的东西。但是——

但是可恶的东西也只有蚂蚁。(我但说弄脏白糖；无他。)

想到我的人生观前后之不同。

我从不佩服过人，因为好像人人足佩服反而没有一个人足佩服了。但是——

但是我却另自要把人生观变一下，见了如今的一切。我佩服许多姐姐们(像我这样质料还好，只无命去学文学的人，称人做姐，大概不致辱蔑了那个。)知道"在这无情的社会里，在这互相嫉妒，互相毁谤的社会里"，能鼓勇气"和一切吹毛批评家宣战"，做"奋勇大胆作家的护卫"。我又佩服欧阳先生之宽宏大量，一再被人诬赖，竟略不露出谩骂口吻，还是斯斯文文的用学者态度来讨论。

想到未来。

我祝福一切大胆作家，各在他自己园地里，放一朵美丽奇葩。但是——

但是自己实在莫有树枝呢？那你不妨踏到别个园里去，折一朵已开的花带回；(譬如原花粉红，你可加上点紫，使成大红，)讲恕道的仙人，也不会对着那朵花就烂起脸说是你贡献的没有血泪培植过，一翅膀飞向别处去！

声明："骂人是爱人"，这条我暂且拿来当定则。因此：假使我这文章骂了那一个，可以说我真的是爱重他；

万一别人又要用这种“怪哩怪奇”的话来骂我几句时，那我先请他原谅，我也将以为他是真的在爱我！

——自己以为值得被骂的一个人——

本篇发表于1925年4月26日《京报副刊》第130号，署名懋琳。

本篇和本集所收《“你要知道”》都是围绕1925年1月至4月关于欧阳兰的剧作《父亲的归来》和诗作《有翅的情爱》是否抄袭他人作品的那场争论而写的。文中的“欧阳先生”和“陈先生”分别指欧阳兰和陈永森。有关那场争论的大略情况参见《“你要知道”》注释①。

打虱 一

前两天，看见文坛上擂鼓的鼓手，在一条狗身上捉下几个虱子，今天又拜读了他的“恍惚地——。”

“恍惚地——”是一首诗，落脚处押有极和叶妥贴的韵脚，想来读者都时常读过这类白话诗，也不用我来多说。

“鼓手”是我的朋友，(但不知他能承认不能。)当其到报纸上做白话诗与小说尽人赏鉴时，我那时还在每早五点钟前，随到队伍于操坪内跑圈子，口上只会一二三，……一二三，跟着排长喊口号。从程度上看来，已可知我对鼓手是如何钦佩了。

大致鼓手每日事情是很多吧，早上起来就要洗脸，洗完脸接着就刷牙齿，打钟时就上课堂，下课时接着又有朋友挨拢来谈恋爱；或是论文谭艺，……穿衣，吃饭，以至于卷起衣袖来为文坛上志士们擂鼓，用两个指头做成兰花手去捉狗身上的虱：事情一多，弄晕头了，于自己文章上便不大措意。因公而忘私，这是常有的事，所以我们也不应当奇怪。

我看我的鼓手朋友，恍惚地身上也有几只小虱可扪，譬如：“……海洋里一座绿洲……碧沈的磐岫，”磐字不消说又

是手民先生把峦字误检，但绿洲照我乡下人解释，是河中生草的沙堆子，峦与岫是用到山冈绵亘的地方。似乎这里是个虱，——不过假使这之间若有一个什么“思想界权威”来证明，那我也当我眼睛起花，为的是尊重权威起见。

第二：“……海滩边……掬几合清水”。海滩边清水大致是不少，不过据说（所谓据说者，我不喝过但据喝过之人而言也。）海水虽清，喝之甚咸，以之当粥，必不适宜。似乎这里也是个虱。

我恐怕别的生人见到这虱，将捉出来说是：哪哪，大众看鼓手自己身上原也是生虱的呢！……故我先为捉出，到底熟人还是熟人，不在乎。

倘若鼓手或与鼓手相好的不认账，偏说是我跪到海滩上去掬几合清水，回来用化学方法把卤质去掉，再搀合一点观音粉麦精之类，不就可以当粥了吗？只要当真鼓手记得到身边确带有去卤的药物，我也承认我是近视眼，用一句旧话收束：我道是虱，原来不是！

写到此时，我又把鼓手大作一看，知道自己说错了。因为他开始已标明恍惚地，既是恍恍惚惚，想来洲上是有峦岫，海水也可喝！我知道，若非押韵，用“粥”字的地方，鼓手必改用“白干”一类相近的字。

二十四日北京“旅部”

本篇发表于 1925 年 10 月 24 日《晨报副刊》第 1295 号，署名小兵。题后序号为编者所加。

扪虱　二

因应酬门市而来写一篇小说，我看是顶好光写个题目下署某某某三字即得了，因为如此既算应了门市照顾者之请，送去后又不致作难编辑：写是写了，登不登可由你！凡是作编辑总无有不知趣的，见你这样，当然另外设法，不敢劳动阁下了。我们挂牌营业的作家，总另有高见，许是怕缺货倒闭之讥吧，在先，创作欲旺盛时，固然是不停的写；写到自己无可写时，也还是写：前者写为填补生命的空虚，后者则全为借令名讲交际而为之。我的作家呵，我会的是举手礼，我就为你立个正行一个举手礼吧，你要是这样办，倘足下当真有点儿小名的话，令名恐怕倒反而冲薄了！无感情而来写文章，这也值得佩服，我佩服你的是浮浮泛泛居然能写得出那么多字。他方面，我又佩服一般编辑先生，不将那回到期的出版物停止一次，必下蛮[1]哑声子唱完这曲戏。

上面的话，是我看了王统照的《水夫阿三》因而想起北京城的一些定期刊物而要说的话。我希望所谓作家——凡是自己曾挂了个儿作家营业牌子的“斯文人”，从新生一点儿勇

气（也可说是一种觉悟，因为顾令名的一个办法却是少做"多骂人"。），在自己没有对某件事得一种深刻的印象而爬不著边际时，就莫慌到[2]动手。（实在要应付别人，则照我办法，写那个题目与大名送去。）编辑先生呢，脊梁骨也要来得硬一点，角色不齐全时，绝对不找人充数，尽他缺。没有一篇比较上像样的东西时，这一期就莫出。实在说来，某一次印行时，后面空它一半，也不是什么顶糟糕的事。譬如把副刊后面剩下那页是白纸，我们还可以做许多用途。再譬如《小说月报》的编辑，能每期少登载点文章，多送几张白纸，别的销路我不敢说，但我敢包我自己要订两份，因为那上面是白纸，我还可以做记事簿用。

十一月八号

本篇发表于1925年11月23日《晨报副刊》第1402号，署名小兵。这是作者以《扪虱》为题发表的第二篇作品，题后序号为编者所加。

① 下蛮　下劲，使劲；又写作"霸蛮"。

② 慌到　慌着，急着。

艺术杂谈

在一些小小事上，永远感生那极深的趣味的，这人怪。

譬如一枝树，各处各地可以见，各处各地谁也不去注意，这里有人能于这平常东西本体上感到那在常人感不到的美，不说这人是具有特别一种心情，就应说这人是一个呆子了。在这世界上，许多呆子的名声，不就是如此的为人论定么？

有些人，在穿衣吃饭睡觉以外，很泰然。遇到高兴时，也会笑，也会叫。稍有不遂意就怒，随便摔一点傢伙出出气。其他如像字典上那类特为人类生活制定的名词，妒嫉同轻嫚，骄同谄，夸大同扯谎，自私同憎嫌，一件又并不缺少。这种人算人。所谓算人者，是这种人不叫作呆子，很通俗，社会上颇多，足以代表这世界人类的一切活动。

天生的人难道就是这样的肤浅？纵不是肤浅，这类人真不足道！

所要的，要呆子。厨川白村在他一部未完功的东西上面似乎曾提论到过。他说的话不算错。但就有人说他便是一个

不爱国的呆子了。我在另一时曾听到一个人说日本人就多不满意这呆子。

我们中国则天然聪颖不凡而又不脱于古不疏于今的人真太多。他们全不呆。作政治方面工作的是，作文学方面工作的则更令人称赞之不遑。政治的，我们可以放到一边去，暂时还莫谈，请大家来看看我们的新兴文学。

新文化——或者说是新文学，这运动，算是俨然运动过一次，有人呐过喊，擂过鼓，且挺奋而前，竟说新旧肉搏过，革命了。这是奇事。因为中国人也能如此！

然而到如今就算是“复兴”或者说就成功了么？谁都能说这还差得远。大家也全知道这虽靠一时气力，比一时气力更需要的却是时代。所谓时代便是至少要提起气力于一百年。人不能到一百年，我们看成绩，是在前一代人作下来以后为后人看。说成功，真还差得远！

中国人总太聪明，新旧全都是。一共文字方面改变过来还不到十年（在这十年中又还得除去几年不算），统共还不到十年，可怜又可配的中国人！居然就出了那么多伟人！这伟人竟比从三枪两枪打上去的将军还多，且一上来就永远成一种权威，不易跌，可幸哉！

在诗在文在小说戏剧方面，据说全可以媲美于欧美大作者，即在批评方面亦有安诺德与勃兰兑思相类似之人出现，可幸哉！别人国中全体在文学方面至少努力一世纪，在本人身上至少又作了五十年文学生活，所得乃仅仅比于我中国人十年，中国真可夸矣！又不是自己不知而又大言不惭者，可以谓之为不要脸。在友好中互相阿其所好原不足深怪，拿美

国式之广告方法欺人，且时稍久则在自己亦莫名其妙自己为如何人，对中国新兴文学抱消极者不从这方面着想，但以为作品太多为患。中国此时节，果真在量方面有太多之患？

若中国人真能在量上去努力，再过十年从量上再选择作一新估价，那是再好没有的事了。

言之无所惭于齿颊此时之中国的文学名人太多，且既成名人，则不前进，不后退，但据营盘尽书店之发行人为多方面之吹，自己扛同仁堂的老招牌，说是文化运动老牌子的人，即靠这老牌子吃饭住漂亮房子，望之俨然，乐似神仙，文学革命固亦有大功大益，不见乎此类人之生活？

运动为一事，成绩为一事，当分开。作文学革新运动其人者，享点小福于这社会上，应该的。感谢这先知先觉，为我们后人，打一条血路，这人在社会上地位是值得人永久信仰。可是我们中国人，则把文学当成一种专利：如机械发明一样，且得大保障。最先采用语体文的不单是在因为元勋沾社会的光，且东西也永是元勋的好。

奇怪乎？不尽可凭乎？有例在。何必再列举例证？问问中国安诺德，以及中国箭伯讷，彼即当以老牌子可靠以及纵非老牌但为所熟铺子的出品为良的原理相告。

有人说："哟！无聊啊！寂寞啊！中国近几年来不比往几年发愤努力，可叹啊！"他不知中国已有若干赶得上外国的大脚色的作家，这算这人的浅薄。

"中国人是有许多许多走捷径想达到一种诗人的目的去做诗。"这为一朋友所说。这话并不尽然，当别论。

不过在中国要成功至少比大学毕业总容易点。

容易成，倒毁了。这也是。这把话说回，若果人以为这作诗成名比大学毕业还快，人人都去做，那过几年不是就有不少好诗么？且因为多数人作，因争从各方面去试验，则体与语韵的问题，不更可以从试验上得到一种极佳结果么？因为人多去作成名也较难，这一面，又可以得到人人努力的情形。如果“作”，总不坏！

中国此时有谁认真去作想成名？纵说有，也很少，也不是现下几个牌子很好的男女才子！

诗以外的小说也是的。在努力的全不是那知名之士。

因为老牌子的存在作喽啰的却永是个喽啰。若有人说中国文学可抱消极观，这便是一种顶可悲的事！

我们这时要“安诺德”？不要。

要左拉？也不要。

要顶漂亮的邓南遮？更不要！

所要的，就是一大群小呆子。要作，要一世在实际上去作，在下一时代我们的儿孙才能把我们所给他们的遗产，可以经营扩张到这一种事业上面。

这些老牌子，权威与名士，是爵位，这爵位且正如为自己所定一样，全不值！文学并不是政治，门阀已经用不着，更何况这门阀是怎样滑稽！

本篇发表于 1927 年 12 月 12 日《晨报副刊》第 2149 号，署名自宽。据《晨报副刊》。

杂　　谈

中国人，不善于“幽默”，有吾家博士说过，还有其他人也说过。

倘若是人人真的莽撞直率，也不算顶无趣吧。

可惜者是倒并不如此。

中国人长于什么？是很多礼貌。“凡事不负责”，“走小路”，种种形成其他为君子。中国的君子，真不少！在新的时代下生存的又有新的君子，不很有人注意过。但这类君子，无往而不宜，“和气”，“亲密”，“忠厚”，颇为世所喜。

有人研究新的道德者，可师法这新君子。

在友中，我曾在心上深深佩服有着几个人。

面上若北京城铺子中人物，常是笑容可掬，似乎到处全可以同人拜把，心则很不易于观察。

到人面前说着各样颇易于动听的话，回头又恨之若不难于生食其人之肉者，是这类新君子伎俩。此不过伎俩之一种

而已，其余还很多。

欲骂一个人，又不敢，则在另一件事向另一人说，这又是一种颇好本事。毁人于有意而无形中，自己不失为君子，聪明哉。从这事上可以见我们民族的礼貌是怎样的可贵可爱(?)!

这礼貌也可以说是幽默吧。

在文学的界域里，也有这类同样的情形。

卑卑不足道者多数是于自己无关。到自己——假说一个小小比喻吧——要人帮忙，礼貌出来了。

我是那么常常想：中国人，若果是人人都带一种大憨子脾气，大家真能在他兴味上说出那衷心欲说的话语，看看我们的文艺批评情形将成什么现象！可以说者，因“礼貌”而默默，不必说的又因“礼貌”而也得吹吹：结果成了今日的样子。讲礼貌，凡事明利害，在一种全为礼貌支配下的社会情形中，一些人就自然而然成了一种中心人物了。

在另一种事业上可以证明这礼貌之不可缺者是作画的人怎么就能成名。此时中国的人欲作艺术家或文学家么？你去先把生活的艺术学成，再来动手作作你的事业吧。你能活动于某一种阶级间，这所靠的武艺并不是真的某种艺术。这年头谁要真纯艺术干吗？所谓有礼貌的世界者，乃把一切维持到一种不很忠实的“面子”下头之谓：懂怎样去使人顾全到你的“面子”，不拘欲作什么都很容易了。

看看我们近来的画家，有那个专心一意去作颜色生涯忽略了待人接物而能悠然活着下来的么？活且不让，还可以给社会同情么？

因习惯，大家似乎都学得聪明伶俐可爱，发见憨人就互相告语。憨人不太多，又似乎常常使这类君子感到寂寞了。

憎着这人这事这时代，不敢明于评论，因此便以为忘了利害去说的人是憨子，君子本色固如是矣。爱人不算是丑事，但倘若有人说到某某人可爱，这情形若为新君子所知者，更有嘲笑！这仿佛是本人如何有识而笑着的人是如何卑鄙浅陋的样子，故笑之若不足，犹可以于茶余饭后作谈助。这世界，实应在各人身上讲求趋吉避凶法子的世界，勇于自表者便是呆子，多么可笑呵！

君子的“笑”“骂”，是我在许多地方就领略过了。为这事只有痛心。然而我一面为我中国聪明人的举目皆是以为可贺。

外国人这时不正有许多在说俄国人是疯子而夸奖黄色人讲礼貌么？

本篇发表于 1928 年 1 月 9 日《晨报副刊》第 2172 号，署名自宽。

杂谈　六

似乎是没有已时，零碎的感想太多。

自己是从不敢同人说文学怎样怎样的，因为不读书，文学是全然外行，且不曾从一本书上引这个那个高鼻子的先生老师来作证。说到师，那是连平鼻子也没有一个。不过一个外行有时说的话在全外行时，则多与内行两样，看过了许多的博学名人的见解，又看看这个平凡浅薄思想，未始非帮助人神气清爽的事情，所以我来把我的杂谈继续下去。

听到朋友也乎君[①]说，似乎我们两人都被人把名字记录下来，列人××××，假使是方便，就也该列人割头示众之类的。我不明这是那一方面有这个希望。但不拘那一方面都总有这个，只因为我作小说故。

听到这话使我想哭，不快活一天。我是料不到我们这样的人也为人常常罣到心上的。正如西行法师所说：一方面，是早已忘掉，而那方面却又如此不忘，倒是非常抱歉。我也觉得抱歉的。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有类人有这样的精力，单用在这些上面。

说是杀，也许恐吓恐吓，也许有一点儿别的气，怄不过，就借此说说把气一泄，到我这时说及或已又泰然了多久的了。我但愿如此。当真我值得人费许大记忆，好好把这切齿心留在肚里，又来找机会实行他计划，在我是只有说抱歉的话，不以为恨的。当真我在一个人心上有非杀不可的情形，那我倒对我生活满意。其实，我那里值得一些人这样注意？

若是在我说明我一生过去到现在是全无所党，就因为这个该杀，那我准备着，只好这样办，我等死。若说我因了作文章原故，有附谁嫌疑，这个我以为这个说我的是瞎子。我清白，说要杀我的，决不会出了作文章几个俨若可说的同伴以外。

把这个事看成儿戏当然是好，认真看，我是觉得人这东西生活到世界上太可怜了。细究究这话来源，也不外以我们这里那里作文章就不愉快吧。

因为穷，作了文章送到要这个东西的地方发表，我是在通常时间就为人称为文丐的。单是这称呼，其实另一时喊来也倒有趣，很平常。可是因此把我人却认错了。认错得可笑，在朋友中也有过，半相熟的则全以为我就是那么一个地道的无赖。在我明知是辩也无用，就不曾在朋友面前洗刷过一次的。就此一来自然更给了他们的得意。不值价，是的，从我自己口中出，别人却因此把我估定了，在一些半相熟的人中我得来的误解与轻视，总分量可以压死我而有余。

说文学。在人人为一种新旧思想冲突中，有那感着政治的嗜好普遍形势时代，谈艺术也得附属于政治下面，（这艺术假若我们又认为不是应当受什么小小拘束的东西，）这结果，纵有好东西，也不过是艺术的宣传品罢了，那里能说？然而大家在此时却如此的大喊，要合社会，要合时代思想，还要

什么什么。不合则不算。于是刀呀枪呀爱呀打成一片，算是时髦东西，作这个的不论他作得是怎样坏，也认为伟大。也没有所谓深一点的意思在东西里面，只是血或什么的字样倒并不少；正因为这个就算是艺术与人生联成一片了。还有些，则只是口喊，也以为是自己在左边走，而其他不喊的则全是坏东西了。把文学观念看到这样惊人的浅薄，是正有着不少的人的。然而在他们心中，则以为只要是在某一种保守一点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而这文章又不合他们那种格式的，这人就算在一个不足道的上面，这些事实难于举例，几乎普遍是。这类人见解高一等点儿的，也免不了以为不写苦恼惨酷便算不好文章。文学真是这样狭？若果是这样的狭，我想上千年来中外无数的作者大致全是为这范围逼死的。

文学的结果，若是真在走到真与美的一条路上去的，则我们也应相信文学的思想至少应当把它放在与政治行为上平列。强说归纳到最平常的社会行为里去，作一种工具，这文学很难使人有那伟大信心。这也决不会伟大的。

只是听人常常说，我近来的文章里搀入了些过于偏激了的成分，是危险。待到朋友又告我说是有人说你腐化了，我才知道我这种人还值得有双重危险。这真真是料不到的事。我实在是愿意对我不高兴的把我从他的印象上开释，我是一个自始至终就不记到别人怎么该杀该剐的。

我自己作我的小说，我并未梦到过我有一次卖给谁。我是我自己所有，我的思想也只是经验给我的。也不会为任何人用一点钱就可以买到。那所谓艺术家其人，则自然应当夸张其词好使通国皆知，至于我则平凡不过，我的工作别人不注意也成。我只为我活到这世界上才来作这个。作得好，是应当的。作不

好，则只有更努力作去。放下了这世界金钱女人的权利，我不要这个了！我没有分，也不强求。我的工作只是我想把自己思想感情凭了文字来给异地异时人与人心的沟通的一个机会。我只想我这工作可以给我走到美的一条路上去，我从我这工作上面认识普遍的人生，人也可以从我这工作上面认识一切，则我同人类的关系算很深了。故意把文学牵混到顶现实的纠纷里，真是可怕得很，你们要是这样作，就去努力吧，我的希望只是希望人任我好好活下来，我自己作我的事。一面我希望人把我看得平淡一点，我绝不会挡了什么人艺术前进的方向。

我初不反对人利用这文学目标去达到某一目的，只请他记着不要把艺术的真因为功利观念就忘掉到后脑。政治的目的，是救济社会制度的腐化与崩溃，文学却是一个民族的心灵活动，以及代表一个民族心灵真理的找寻。我们可以说佩服拿破仑，佩服成吉思汗，佩服……但最可爱的，却是如像托尔斯泰一类人。

本篇发表于1928年3月22日《晨报副刊》第2239号，署名自宽。

标题中序号“六”为发表时原有。

① 朋友也乎君　指胡也频。这一时期沈从文因发表一系列批判社会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而受到某些人的痛恨。在《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二卷的序》中，沈从文曾说：《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一卷陆续在《新月》登载以后，书中一些像讥讽又仿佛实在话，曾有人列举出来，以为我是存心与谁作难，又以为背后有红色或绿色（并不是尖角旗子），使我说话俨然如某类人——某类人，明白来说，则即所谓革命文学家是也。在外国，有了革命家以外，是不是还有革命文学家，……但我知道在中国，把革命文学家而再加上无产字样，则更其惊心动魄耸人听闻。”可见胡也频对作者所说的话是有根据的。

“紫禁城骑马”归来

有与紫禁城骑马一样荣幸，是今天。

真不是容易得到的遇会，我同我的朋友，居然能旁若无人的走到京西海淀燕京大学女校宿舍中去参观她们的绣房。绣房中一切，居然看到了。且看到男女学生，面有喜色，精神焕发。然而出意表之外者是不如旁人之意气洋洋而归。

有悲哀。为自己之不适于到这类地方，又俨若别人则非常合式而悲哀了。不过这仍是另外的话。当跟朋友身后，到接待室中，见一穿浅灰哔叽单衫学士公模样的人物，神态十足，躬身鼓嘴在吹纸板上之奖号时，我为这样子笑过三次。且此后不拘何时想起这样子，就都得发笑。感谢这学士公，所给我的好处真不少！

除了燕京大学，（注意这是说除了顶聪明的美国式基督教徒所办的学校，）其他什么学校是不会把这开放的事作得如此容易的。一年能开放一次，尽男学生参观，亦大恩惠哉。——圣恩无往而不及，且有从城中花来去一元车钱来看

看女生宿舍者，噫。

看女生宿舍者，多意气洋洋而归，或吹奖，或抽奖，花一块两块三毛五毛，得失所不计。乐则乐矣。

凡被看者寝室一切先收拾一天，打扫捡妆，费神不少。人则装扮如新娘子，芳香四溢，着新衣，新鞋，新——走路且多新式步法，为欢喜。今天一切不比往日。来看者，亦装扮得如新姑爷，凡只唯一一套洋服者，必先嫉洗衣人熨平，凡成衣人托故说新衣本日不能成就者，必骂，催，最后则以不给钱吓成衣人。想想吧，为这样一次大热闹，真引起不少暗潮与纠纷！还有在这一群人中所得的无量数的快乐！

这种开放是国内稀有的。凡是稀有的当然都好。至少我想有许多人愿意，如本校及他校之大部分男生，他们饿。

感谢这些聪明美国人，在平时，懂到为中国保守旧有道德，于男女学生之过从，则防范极佳，虽鸡鸣狗吠相闻，而门禁森然，绝无笑话。每一年，则公开一回，赐男学生以紫禁城骑马之恩荣，受之者亦五心铭感，知尽此一日乐，笑语喧阗，如获大赦。

当局聪明，知所以宣传圣教，普及恩荣；学生聪明，则知及时行乐，不辜圣意：

你聪明的青年男女啊！

到一个上帝的儿女们学校中去玩一回，则心中总多一种重压。物质之设备把这些乖乖宝宝作成另一种灵魂——常言上帝造人，随意捏，此言也，不深使人相信，然一看此等小姐少爷，则当低首认可矣。

为保留国粹与吸收西洋文化两事上着想，美国式学校给

中国人帮助真不少了。我们感谢这些人，既能为中国人帮同保存国粹，又能贡献中国人以西方文明——

所谓保存者，是既能为将男女学生在意识上划成两世界中人，所谓贡献者，是使这些宝贝能作极人时之服装与说极精彩流利之英语。

本来每一年花一百万两百万块钱，所希望至少亦必是"同情"；如今可为美国长老牧师告者，是到中国来所用之钱并不虚，对美国式教育与思想行为同情者岂止三数教会大学，即非教会中人所办之学校，倾心于美国式生活者，亦多矣！

中国需要这类宝贝么？

为救救这不康健民族的灭亡，是不是有了全民四分之一的教会学校学士，与一百万得美国认可之哲学经济……等等博士，便能成功？

实则多一个美国式的人，便少一个足使中国不灭亡的人。有人说，教会学生中，固不乏有用人，这话是。又说教会学生者，半数为公子小姐，半数为穷汉，若无外人来国内办大学，则此辈人中一则不愿读书，一则不能读书，是知识更少更无用。然而此种知识阶级即他时之治理阶级，想来是多可怕的一件事！

把身体打扮得很美，究竟比落魄肮脏为好，香究竟比臭是不同，是以这次的感想无论如何应说是很好。

看了不少的笑脸，这不是入一个别的学校所能轻容易碰到的事。见了许多虽不美观却很善于对大红大绿衣裳以及异样鞋袜表示爱恋的女人，这也不是在目下提倡朴素的教育当局下所敢希望的眼福。若我们不能承认拿花比女人是为妓女所能专有，则不妨说："上苑名花，由圣徒培植，究竟与凡品

不同。”

全是未来的很好的太太！

美国人不愿意拿一千万一百万到日本去办学校，（即或办，日本人也不许。）却特别同中国人要好，这事是很有趣味的。我们有些人，是知道日本英国军队横蛮如野兽，镇天在中国各处地方虐杀中国人，而感到气愤的。可是美国牧师运用美国的钱，来把中国人变成美国式，仇恨当然不会有，连感激也像很少。多么不明好歹的教会学校以外的中国人！

我记得一个很滑稽的脸儿，是一个学士公模样的人物，幸亏这脸儿代表了说“他是懂美国人好处的”。

只要懂就好。不然你们的书就读不成了！

五月五日夜在江南塞北楼

本篇发表于 1928 年 5 月 18 日《晨报副刊》第 2296 号，署名自宽。

看了司徒乔的画

我所知于司徒乔君，在艺术成绩方面似乎比其人方面为少，故看了看他的画多数觉得“好”以外无可说。

所谓艺术的派别与新的方向，司徒君有着怎样大贡献，让于艺术有深的认识的人去批评。至于其为人，对于艺术的努力精神，小孩子样感着大兴趣，则我以为司徒君伟大处比任何学艺术的朋友还可佩。

在穷境中守着自己一点希望，去发现人类的美真，所曝露的光明虽如何渺茫，然在中国的今日，文学与绘画，除了不惜这样大的固持的精力去求完全，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达到开一朵花的文艺全盛时期了。

此时的中国最多的，充满了的，是假志士与假艺术家：人则势利，无耻，罔诞，虚伪。这类人各据了相当地盘，互相呼应，互相叫好，热情装饰在嘴上，俨然作着大的了不得的文化运动。女婿，妹夫，干儿子与门生，包占了政治以外，还将其联盟势力侵入到艺术领域中来。世家，贵戚，谄佞，宠幸，各种封建形态于政治与艺术有同样活动事实。艺术的

堕落恐怕已经到此为止了。

在全是凭小聪明与好运气的小鬼社会中，司徒君，独自走自己的那条寂寞的路。某一种世界把他忘掉，他也忘掉了那种世界。他忘了社会对他的压迫，却看到比自己更被不公平待遇的群众；他不用笔写自己的苦闷，他的同情的心却向着被经济变动时代蹂躏着的无产者。

司徒君的精神与人格，纵不必一定有被人认识方便，然比之于多数身作皇家御前供奉，腼然无耻，因私见而借此行其迫害艺术家的，实在高明多了。

于上海

本篇发表于1928年12月15日香港《伴侣》第7期，署名甲辰。

十年以后

事情是一九三九年二月，比如今多十年了。

所有在上海地方善于做自己广告的文学家，所有看看杂志便动手写世界文学批评的大人物，所有革命文学家，所有否认革命文学的文学家，所有各自心照在那里互吹互赞的巧言令色逗人怜忧的白脸文豪，所有从好酒好肉豢养出来的批评家，所有钱多而作品少便为第一流的第一流作家，都如所希望，成为历史上人物了。这些人，全已功名成就，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了。照他们一般意思，中国似乎已得了救，救中国的就是这些人。文学运动是比政治更见其费了不少的力，虽说成功了的文学家，大约因为吃酒席的原故，倒每人都是团头胖脸，能睡能喝，不害杂病，然而统计起在报章杂志上苦心孤诣计划互相夸奖，以及在谈话中想法中伤到不人伙的作者种种事情时，所耗费的气力，在数量上算来是大可惊人的。

中国自然不像一九二九年情形一般了。政治则建设得完完全全，不消说。文学则有了正宗，有了系统，后学者再不

至于误入歧途。学做文章的有成功指南一类书可买。不必努力。要信仰。有了信仰就成。假若说，还有呆子想在这事上找到生活的依据，那非信仰不行。因为时代并不是一九二九年时代了，何况一九二九年趋势就已很明白，稍悉当时情形的就看得清楚这潮流。

有人说，时代只把人带到呆路上去。这话就是呆话！因为时代的转换，从西方，从东方，平空来了无数名词，人不聪明是连名词也无从弄清楚吧。艺术的主观性是不能□其独立了，“集体”的意义，用在中国农民身上还无从成立，先在文学作者方面把这名词坚固的证实了。在集体争斗的努力上，属于正宗的，全有了别庄，有了花园，有了大客厅，如今日的欧洲大作家一样。因为他们聪明，明白在中国是适于用正宗为自己护身，用力打倒旁门的，他们花小小的力得到大大的成功，于是乎他们自己推举平时极善做广告的人写中国新兴文学史，如前朝人作史一样，异己者则写之为贼，又恐仍然也有欢喜外道提倡贼的作品的，或者索性就不写。名字既不列入正史，列入也只在第三流，著作也不妨收买来烧尽，或把版权买得不为其再版，因此中国“文艺复兴”了。

几个文艺复兴的功臣成天作些什么？抄抄杂志自然是一种工作，见面时互相道好，分手时仍然各自回家，写一点捧场文字，也是要紧的事。他们的工作是重要得多，已慢慢的从国内转到国际了。他们无事时就喝一点外国酒，唱唱外国歌，再不然就同女作家……女作家是自从一九二八年底以来凭空就有了三十余，且不是第二三流的。女作家自然会跳舞以及流泪。

这时唱戏的已无旦角了，但文学作者中有了这种风气。

风气之开始大约是一九二八年。把文章写成，用女人名字发表，或情人代笔，或戏弄友朋，读者读女人名字文章时，莫不神气爽然，如饮佳酿。文学作者中的旦角，能引人注意，较之一九二八年旧戏中旦角有过无不及。在此类旦角行业中找不出羞愧理由，因为文艺复兴几个功臣虽不是人人提倡这串演文学，但赞成则大有其人，久而久之已成为极高雅又极切实际的事了。凡属于两性的作家，则生活更舒适，更丰富，不是一般人所可想象。

如像法国的沙龙客厅也有了，（并不是新雅也不是上海咖啡！）成天就是这一群上海作家来往，这些作家每天从主人方面挹注一点灵感，一年做一篇小说，或写一句诗，其作品全可以发誓说并非压榨而来，照抄则间或有之，然而也不缺灵感！

帝国主义依然是帝国主义，但帝国主义已与喊打倒帝国主义的人讲了和，所以仿佛比从前更无从见到帝国主义罪恶了。资本家则有了知识，慢慢把凡是爱嚷爱喊争斗文字的人如处置文学正宗诸子一样，也提升他为准资本家。他们承认了喂养知识阶级的义务。他们把政策维持到“出钱”“讲和”两事上。他们尽这些有野心的人得到满足。他们与有权力的人合伙，拜把子，认亲家，联宗。每一个书铺都有一个批评家，职位与编辑一样。本来就并真正没有为高等人同情过，认识过，帮助过的某阶级人，如今是仍然让命运来支配，他们生活，或者挖矿，或者拉车，或者卖淫当娼，是照旧的生活下来！资本家在另一种言语态度上，说到这些人是除了资本家就无从活，话是渐渐的有社会运动者承认了。不承认那怎么行。若尽自己的厨子，门房，车夫，娘姨，奶妈等等要

挟罢工，那将感到大不方便了。一个在平时熟习透了领导工人与资本家对抗的首领，投了资本的降以后是更能把经验用到管束工人一事上来的。生成一个狗命的下等人，他不要人怜恤，不要人抚慰，也不必要人注意，自己是仍然得好好活下来的！一切经验应当使这种下等人更其安分了，在一九三八年以后。他们知道了希望是只能放在幻想上。他们知道要把希望在人事上证实，是做不到的一件事。他们明白了他们是合当左肩扛上劳顿右肩担上侮辱，正如在这世界上另一种人生来为享□[1]而生一样。他们看清楚了自己，应当沉默，好像艺术家明白这时代应当牺牲个性，所以他们沉默了，规矩了。

因为不规矩的就被排斥在生活以外，所以多数人是规矩了。还有那少数，那只是人中的呆子，有死罪，纵不至于死也不应当尽他在时代中得到生活。这类人才真是落伍者！（若不落伍，应阔了吧。）

大的时代在进展。时代的进展，把一切物质发明供给了上等人，在为人意义上更见其为上等了。异己民族的经济侵蚀，中国苦人变成了更苦了。虽在习惯下，稍有知识的知道如何把生活提起，仅有一双手的知道如何安其生的方法，但在所谓时代进展中，落伍的仍然有人了！这里落伍的，是指到一九三八这个时候还具有反抗心的汉子婆娘。

“落伍的人啊，你该死！”这是一九二八年，中国革命家或革命文学家的口号之一，谁知仍然适用到十年以后。

思想落伍者之一，名字是丙。他在一九二八时无所信仰，直到十年以后的如今，还是一样。同他在一种事业上努力的

人，全已成为历史上光铓万丈的人物了，他却仍然像十年前的那个他。他又不能雇一个批评家在家中。又不能上茶馆应酬，又不拜第一流的门，又不同人谈革命。尤其坏的是他对自己工作总以为弄不好，无法满足也就无从夸张。他望到许多人在广告上成就了盛名大业，在广告上又赚了钱，把生活弄好，他就只看。看是被别人雇定的批评家用大量生产的责备打倒，爬不起来了。看到别人的事情不至于眼红，也就如看到杀人一样，因为所杀的是别人，终不至于心痛。

人与人，一同生到世界上，人与人之间，凡是眼睛所见到的，莫不有使自己趋吉避凶的教训在。所谓聪明人者，也便是指这类有趋吉避凶的天才本能，无往而不利，能因自己的改善的力，跃进别一阶级的人物。这个丙，却因为所见的日多，自己反而堕落了，下沉了。他见到一切，一切只抓他向深渊里去。落伍的眼睛自然应与他人两样。他所见到的只把他变成更忧郁了。他的名字，是本应当被几个文艺复兴的编史者把它列人旁门一类的，似乎是因了忧郁，连旁门的名字也被取销了。

名字既已被勾，他当然不能再写文章卖给书铺了。因为每一个书铺都有一个文艺复兴大人物，每一个读者都非常相信这些批评家的指点，命题执笔的人既多，如嘱买书的人则全体是，所以这个丙，只有毅然改业了。

他以为被人遗忘了的人，是再不必担心别人对于他的生活加以鄙视了，他作了为人缝衣的裁缝师傅。他一面每日作工，一面慢慢观察同行中人，有对于生活诅咒的没有，对于政府阔人，对于穿绸缎的女人，有生气的没有。他自己也看自己，是不是在工作中有反抗的情绪。在他人，在自己，完

全没有，他过了一阵是明白了。做了裁缝除愿意不断的有工可作以外，只有偷衣料是他在梦中也不忘记划算的一件事。此外没有什么了。

做了裁缝不久使他发起愁来，因为他不能偷布。一个不善于剪裁衣料的成衣人，比起一个不能与人作文艺复兴运动的文学作者来吃亏是并不两样的，所以他觉得应再改业才行。他就把这个意见去同那当家人说。

他说，“这个事情我不能做下去了，我要改业。”

老师傅说，“年青人，这怎么行？你应当有信仰。你应当照习惯行事。一个不与习气违反的人，他是处处能找到契合无间的事业的。一个对制度存心破坏有意为难的人，他去担粪也做不长久。”

老师傅仿佛在讽刺他不雇批评家的理由，又怪他不上茶室。老师傅的话虽然极其动听，但这个无信仰的丙仍然改业了。

他做了印刷工人，管理印书机的某一部分。一个用油墨污染了脸嘴，用铁的声音疲倦了身心的印刷工人，是完全与成衣人生活两样的。不过在裁缝身上找不到的惑疑，在这里却仍然也不有。他们安心的作工，细心的安排一切，在一种严厉管束下，把他们造成比其他工人还能忍耐劳苦的一种东西了。他们过手的就是无数可以列人世界名作的新书，新书中说到印刷工情形的也有，说到别的人生活的也有，但认得字的工人，望到这些书时就只发笑，因为全然莫名其妙。一面自然是佩服着这些作者，以为成天坐到咖啡馆喝咖啡与侍女调情，或者从大学讲座回到公馆的生活中，亏他想得到这些，亏他们写得出那样多，又亏他们模仿得居然仿佛有一点

儿像当真事情。写得一点不对，一切的肤浅错误，仍然成了名作，则更容易使这些工人发笑了。

同时也有机会见到这些名作的丙，他把那些书，来问一个工人，说，“这些同情你们的伟人，写来的文章看懂了没有?”那工人说，“不容易，不容易，我们说的话赶不上这些人的文字优雅。因为写这个书的人是预备做中学教本的，所以流丽典雅。”

“他这本书说，”丙指的是一本一九三二年出版到一九三八年已经有过廿版的小说而言，小说名字是《铁》。丙继续说，“这是权威的书！看销路好丑就可以明白了。这种好歹论断是一般人承认的。他说到你们印刷工殴打厂长的情形，写得有声有色，人人说是好东西!”

那工人，翻了翻久不曾好好睁过的眼睛，望到丙露出白牙齿笑。笑而已。笑得使丙不能不有下面的解释。

“你的脸，为油墨所污，书上曾说过了。你疲倦时全身骨头发疼，书上也说过了。还有你希望加薪，书上是不单说过，而且已告给你们胜利，终于老板的小姐也同你们工人中最美貌多才情的工人首领恋爱了。事情是正像真事那么动人!”

工人打哈哈笑了。他说：“真写得好！不过，写了这些与写了别的，我们还得每天在此做工。能同老板小姐恋爱的，或者还是那极其有才情又长得好看的文豪。我不有分，你也不有分，是谁说出的就只是谁的希望。他们闲着无事，一件工作不做，才想起顶好的消遣，要恋爱。他们要，就得了。得不到的也仍然可以得到失恋，好来做送某某女郎的诗。我们做工的是没有诗也没有别的心，能在疲倦中兴起欲望。我们除了睡同吃，以外间或憎恨一切闲人，没有更大希望能在

心上生长了。过度的劳顿把我们变成蠢猪，一个蠢猪样东西，在悲愤中他能作什么？若说必定也应当起来，与那些苦了他的骗了他的人算账，他除了杀死这些人，找不出更能表示他愤怒的心情了。他若是真能发狂杀人，最先应死的恐怕就是这些××。”

丙问他，这是指谁。工人不作声，过排字间去找新镌的聚珍体文豪的名字去了。

于是不久丙又离了印刷所。印刷工人是连裁缝的机智也缺少的。与铁接近的一切人，只是更无希望而已。

他作了杂货店伙计，觉得不行，就改。他又做了一个伟人的私人书记，又不行，又改。……他一直试验了十一种职业，还似乎有向陌生的事业中找寻的必要，到后他作了贼。因为直到一九三八年，中国还是有人把作贼作兵为职业的。

作了贼的丙，悄悄的偷来的东西又悄悄送给旁人，他又小心的不让人知道自己所做的事，过了一些日子，初初似乎很好，久了也渐无味了。他又变了兵。变了兵的他，当然是为阔人打一点仗，上车站去迎接一下伟人，为司令站站岗。在这些时候中，几个文艺复兴的功臣，是正排次的在祝寿坐席琐事中消磨日子，他们这时才听到丙是自己作工去了，就互相举起高脚玻盅来碰杯，一个人就说：

“列位，喝这一杯！喝下了以后听我讲一个笑话。我说的是那个落伍者过去的事。一九二八年，十年以前，那时节，我是与那落伍者在一处的。我已有了信仰，照到正义做我的文化运动，无会不到场，那呆子，就放浪到不成形，常常讥笑我们的工作。他要我们走那死路。我告过他，说，朋友——我当时因为与他常常见面不得不称他作朋友——你是错

了。一切事情都是假的。不要固持了，还是来为我写一点批评文字，把我说起，一直到阿猫阿狗。我知道你是不再嘱咐也能够说得我们很好的。到了明天我也来为你写一点。到后来我两人就都成名了。谁知他摇头，还呸了我一次。好吧，看！今天是听到这呆子到工厂做工去了。落伍的朋友，使我回忆起当年情形，不由得不打哈哈。应当到谈主义时候他不谈，应当到忘了民众时候他反而搀身进去，这呆子！”

大家觉得这呆子好笑，就笑了。

第二个又举起杯来，与大家碰杯，先喝酒，再说话。

他说：“文学家是领导时代的，所以如今的时代就被我们领导进展了。呆子在当日无信仰，不与咱们弟兄合伙儿，是落伍者，到如今还得做工找饭吃，自然是更落伍了。我们不要说他，还是讨论我们向政府索讨年金的议案吧。”

一众全抚掌。一众是在“贤弟万岁”“仁兄万岁”的互相颂祝中，把吃下肚的好酒好肉消化了。

他们似乎把丙是当真忘记了。

一面当兵，一面还是找不到信仰的丙，因为方便的原故，他仍然又写文章了。他写他所见到的工人，写被虐待者的无助无望，写血在一个简单头脑中时是怎样的流。谁知几个文艺复兴功臣，仍然放不下这呆子。他们在皇家供奉的作家同盟议席上，在催讨津贴公函上，就添上了一条，不许某丙出版书籍的表决案。这时文学革命已成了功，讲究正宗是必然的事，说不准谁家书店收受，就真无销售处。

他们断定了某丙，因为没有信仰，终于应当饿死的。果然不久这个人就死了。丙饿死以后天下太平，第一流作家除

灵感来时做点诗文以外，就成天到各客厅里与批评家说点过去的笑话。

本篇发表于1929年2月20日《人间》第2期。署名沈从文。

① 此处原为“沉”，疑为错印。

感　　想

许多朋友因为同我熟了的原故，总常常要问及我自己最欢喜的是那一本书。我很生气，说我没有一篇我欢喜的文章，更没有一本我觉得满意的书。我真不愿意有一个同我熟了的人还花钱来买我的书看。不熟的人要我介绍我自己的书，我实在就没有兴味去代他选择。这不是因为我所有的作品，都印得太坏，错字太多，我实在就觉得我文章都不成，都不完全，都不能达到我自己所悬的标准。你们问我的意见，若是你们愿意相信，我说，我离成功比你们都还远，因为我要走远一点！但是相信的很少。为了这类原因，我最怕的就是生人和熟人对于我的文章的好评。有些朋友用了最可感谢的好意，预备批评我的文章，我总以为那是用不着的一件空事。写点文章，印几本书，不过是我在方便中所得到的一种方便罢了，若是这点点事也值得使自己得意，那我早已发胖多日了。

但最近，有一个人却在一篇杂感上胡乱骂了我一顿，

说是据诸传闻我顶得意我自己的作品以及作品上的文体[1]。这种以得之私人传闻而为根据的论调，正同有些小报式的刊物造谣一样，比这个再无赖的话也说得出。比这个再无根据的消息也做得出，同这种东西生气，那我上海就蹲不下去了。我已经装作老实人不中用样子，仿佛没有见到，尽他得意一下。（朋友替我不平我倒觉得无聊。）我很明白的是，“许多脸儿稍稍漂亮的人，文章却常常无法漂亮”，我若有空闲去指摘某个人家的短处，那我早学乖用这空闲去夸奖他的长处，则让将来到鲁迅的年纪我做寿时节，还可多一个人上门拜寿。如今我还无意做寿，可是却希望这些灰色的水陆两栖分子，自己明白自己一点，不要太糊涂得意了。我听到许多批评别人的都懂得用“不合时代”绊那作品一下，又听到许多夸张自己的，都援引“时代的作品”寻求主顾。文学侍从所服侍的虽由“主子君王”转为“时代趣味”，奴性则并不稍减。其实他们自己心里，实在又都很清楚，作家批评家，书店老板与坛上文豪，看看报纸上登出了一个广告，年青学生络绎不绝的走进铺子里来买书时，挤挤眼睛，互相望到交换一个会心的微笑，在某一种协作下他们已经默契协妥了。你们作家日常见面十分亲爱的朋友，就是在另一时作品上描写到的敌人。你们都想用谎话筑成你们的生活基础，为了一张帆要兜取四面八方的风，无耻一点的他便明明白白的常常在那里变，胆小腼腆一点的，便悄悄的在那里变。你们的目的是使你们如何可以入时，为了人时都成为善忘而没有自己的人。自己的过去已忘掉了，却常常找寻另外一个什么人的一点过去说话方便处，

抓他一把，捏他一下，自己仿佛若有所得，并且图证明自己就服从了正义，把握了时代，这种神气，还有什么值得来说？

站在年青一点朋友的面前我想告他们说，信你自己，比信别人较好。你即或是一个跛子，你走到的地方，比那些据说能带你白日飞升的人所带到的地方，一定还远许多。即或你只一条腿，凡是你要走去的，就没有什么达不到的！你若是在写创作，觉得那是好事情，同你性情相合，觉得那是一件可以举起你自己，扩大你自己的事，同时又相信那么努力把自己生命同自己的趣味嵌到作品里去，结果还能在另一地方另一时代揪着一些人的感情，能够这样便是你一点快乐，你谁也不必顾及，谁也不必注意，自己就做去好了。你若有你的毅力同信心，失败并不是永久的事。谣言的力量虽能流传各处，从这一张吃肉吃饭的口转到那一张吃肉吃饭的口里去，却并不能够挡着你向前的路。你沉默一点，沉默一点，你要做的事，是靠到沉默却不是靠到招摇的！站到大河岸边，眼望满江汤汤浊水，日夜无声的流去，我想象到一年来许多年青一点的朋友们，那么流去也终于流到一个不可知的境遇里的事，便觉得自己还是不行，为朋友说下的话，留着自己倒还是非常有用了。

用水作喻，有决堤陷城的气力，具向浩渺海洋里流去的雄心，对生活态度，对文学的态度，这种一致的单纯，于文学与生活解释，或者是一种迂见，然而从这方向中，我相信至少可以得到一种机会与诚实站在一块儿，经得起时代不变的风浪的颠播，始终还有一个他自己。现在的日子，却正有

许多人是不需要自己的。

四月二十日上海

本篇发表于1931年6月1日《创作月刊》第1卷第2期，署名甲辰。

① 这是指侍桁发表于1931年3月1日《文学生活》第1卷第1期上的评论《一个空虚的作者——评沈从文先生及其作品》。文中说：沈从文是“一个享受着较大的声誉，在某一部分领有着多数的读者，其实是轻轻地以轻飘的文体遮蔽了好多人的鉴赏的眼”的作者；“根据从私人方面听来的消息，当他一得到了少许的成功，便有他的朋友给他献来了颂辞，……于是这位青年作家，……便被那些周围的人们的话语所眩昏了，渐渐对于自己的作品生了一种确信，这时，为适合着人们的颂辞，大量地写作，尽力地向着外表上发展，……”

甲辰闲话 一

我预备在我活着的日子里，写下几个小说，从三十岁起始到五十岁止，这二十年内当把它继续。成，我将用下述各样名字，作为我每个作品的题名。

一、黄河，写黄河两岸北方民族与这一条肮脏肥沃河流所影响到的一切。

二、长江，写长江中部以及上下游的革命纠纷。

三、长城，写边地。

四、上海，写工人与市侩对立的生活。

五、北京，以北京为背景的历史的社会的综集。

六、父亲，纪念我伟大的爸爸。

七、母亲，纪念我饱经忧患的妈妈。

八、我，记述我从小到大的一切。

九、她，写一切在我生活中对我有过影响的女人。

十、故乡，故乡的民族性与风俗及特殊组织。

十一、朋友，我的债主和我的朋友，如何使我生活。（这是我最不应该忘却的一本书。）

但是，看看这一篇生活的账目，使我有点忧郁起来了。我已经写了许多文章，还要写那么些文章，我到后是不是在死时还得请朋友去赊一具棺材？同时我在什么时候死去，是不是将因为饥饿或同饥饿差不多的原因？我曾答应过一个在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学医的朋友，在我死后把尸身赠给他，许可意随他处置，我是不是到那时还能好好的躺在北京一个公寓里或协和的地下室咽那最后的一口气？想到这些，我又觉得我最相宜的去处，倒是另外一个事业了。

我最欢喜两件事情，一种是属于“文”的，就是令我坐在北京琉璃厂的一个刻字铺里，手指头笼上一个皮套儿，用刀按在硬木上刻宋体字，因为我的手法较敏捷活泼，常常受掌柜的奖励，同时我又眼见到另一个同伴，脸上肮脏，把舌子常常掉在嘴角上，也在那里刻字。我常常被奖励，这小子却常常得到掌柜大而多毛的巴掌。还有我们做手艺是在有白白的太阳的窗下做的。我仿佛觉得那些地方是我最相宜的地方，同时是我最适当的事业。另外我还想到一种属于“武”的生活，上海民国路有些小弄子里，有些旧式的铜匠铺，常常有几个全个身上脸上黑黢黢的小子，嘴唇皮极厚，眼睛极小，抿着嘴巴，翻动白眼，伸出瘦瘦的胳膊，蹲身在鹤嘴口旁捶打铜片，或者拿着铜杆儿，站立在镀镍的转轮边，一条长长的污浊的皮带，从屋梁上搭下来，带着钢轮飞动，各处是混杂的声音，各处是火花。这些地方也一定能作我灵魂的住宅。

如今这两种生活都只能增加我的羡慕，他们的从容，在我印象中，正如许多美丽女子的影子在许多年青多情的男子的头脑中，保留着不能消失，同时这印象，却苦恼到灵魂的。

我的文章，是羡慕这些平凡，为人生百事所动摇，为小到这类职业也非常的倾心，才写出的。记得在上海时，有一个不认识的人，给了我一个信，说是十分欢喜我也同情我作品的人，要约我见一次面。我自然得答应，把回信寄去，不久这个朋友就来了，来时出我意外的，还带了他一个风致楚楚的太太同来，我的住处楼下是一个馆子，自然在方便中我就请他们喝汤吃菜。（这太太的美貌年青，想起来很有点使我生气。）两夫妇即刻同我那么熟习，我还不大明白这个理由，便是我文章作成了这友谊。到后他们要我带他们到一个最有趣的地方去玩，我记起了爱多亚路萨坡赛路口一个铜作铺的皮带同转轮同那一群脏人了，就带着这年轻夫妇到那里去，站到门外看了半天。第二天，这朋友夫妇以为我“古怪有趣”，又来我住处。这一次我可被他们拉到另外一个好地方吃喝去了。回家时，我红着脸说，我不习惯那个派头，我不习惯在许多体面男人女人面前散步或吃喝。他们更以为我“古怪有趣”。我们的友谊，到现在还保持得很好，上面那些话，这朋友见到，他是不会生气的。不过我的兴味同最高的人就距离得那么远，我的忧郁，什么人会知道？

六月十日　新窄而霉斋

本篇发表于1931年7月1日《创作月刊》第1卷第3期，署名沈从文。序号“一”为编者所加。

甲辰闲话　二

我的疑心病到近来真已无药可以医治了。让我作一个比喻，一只被人打过一次的狐狸，平生仅只被人打过一次，从此对于人自然就不大放心了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仿佛很有一点不同气概的人，它总愿意同他远一点。我许多地方都好像一只狐。过去生活并不止打过我一次，所以我把享受别人的友谊同尊敬的权利完全失去了。不要笑我，这事已够悲惨了的。

有一个听人说了差不多十年的“聪明体面”人，我因别的一个机会见了，那时心里想，这可太幸福了，因为许多拜佛的人，是以见到一次他所信仰的佛为荣幸的。往年活佛到北京时，许多蒙古人倾家来见一次活佛，到回去时连路费也没有，但他们还很快乐。宗教的倾心其中原包含一种奴隶的人格，我对于好些女人差不多也是如此。可是人家一开口就说我的文章，我在卑微里放光的灵魂，即刻为这出于意外的事感到不幸了。我疑心人家特意来制造一套精致的废话，娱乐到我这寂寞寡欢的人。我能比任何人还善于体会别人的友

谊，但我照例还要疑心到别人对我所说的是一种废话。（凡是说到我文章的我都认为是废话。）这小丑人格，原同我外表不十分相合，所以别人照例也决不知道我如何怀着无用可怜的心情，希望人家不用这样太虐待我的。别人坦白的言语，窘我到只想躲避生人，同时也就使我同一些熟人永远不能相熟，这狐狸兽类性格的形成，容我去分析，结果我便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十分觉得可哀。习惯于穴居独处的理由，除了我自己能明白，以外是没有可希望了的。

又如最近我到过一个人家去，这人是我六年前便同他一个弟兄非常熟识的。机会自然仍得谈到文章，我一面勉强吃喝，一面就只想逃走，总觉得这不过一种圈套，有意抛过来便落在头上。若不同我说到这些事，我还一切自由，毫无拘束，一开口，即由于这“友谊”成为“灾难”，当前的景况，全不觉得容易支持了。

这些人，正如其他许多人一样，料不到我是那么一个无福气享受别人友谊同尊敬，性格的病态到这样子的。

还有某女作家，一见我，就问我上海的土匪同什么名女人的暧昧事情。我说这个我可不大注意，因为凡属于这些，一定得订许多小报，才够资格的，我平时看报，很疏忽这一项。我虽然申明我对于这一类知识并不渊博，但这女作家大有除此便无话可说的神气。回来时，我便同我的朋友说，“我今天非常难受，因为被人当做土匪，许多话不谈，就只同我谈这一类无聊的话。这显然是她以为我只可以谈这类问题的。”

朋友听到我的牢骚，只能干笑，他告我许多人就只能谈这一类话，同时仿佛锦心绣口的人，更对于这件事感到趣味。

这女作家的性格经过许多人都证明过了，我还是很不快乐。别人天生的兴味，也能带给我一些苦恼，这也是我愿意同人离远一点的理由。

不过倘若我并不常常把自己看得太小，同时又不把别人看得太大，我不是就随时随地都可以从另一方面得到神清气爽的机会了吗？

一只鸡，小时候常被盘旋空中的鹰所恐吓，到长大后，看到凡在空中飞的鸟，总以为那是鹰了，就非常的吓怕。其实在天空里飞老鹞最多，身重不过六两，所吃的只是小虫，所梦的只是小虫，这老鹞，即或知道鸡怕它，也仍然只能吃小虫梦小虫的。这寓言，似乎在什么书上见过一次。若不是在书上，那就一定是在一个人的客厅里依稀读过了。

本篇发表于1931年8月1日《创作月刊》第1卷第4期，署名沈从文。序号“二”为编者所加。

甲辰闲话　三

大多数的女人，都只像一只蚱蜢，一粒甲虫，生来小小的，伶便的，无思无虑的。她们把气派较大，生活较宽，性格较强，打算较远，都看成一种罪恶。她们到了春天或秋天，都能按照时季换上她们颜色不同的衣服，快乐而自足的在阳光下过着她们的日子，都知道选择有利于己有媚于己的雄性交尾：它们不是极平庸就是极下贱，不是极狡猾就是极愚蠢。它们没有什么灵魂，也没有什么个性。在天地间蚱蜢同甲虫完全绝种以前，女人永远也是同这些东西差不多的。可是男子呢？很多男子还不如一只蚱蜢或一粒甲虫。

本篇发表于1932年12月15日《小说月刊》第1卷第3期，署名从文。序号“三”为编者所加。

劝人读经

《百喻经》说：

往日有夫妇两人，烘了三个大饼，作为晚餐。大饼烘就，夫妇二人各自吃尽名分下的一个饼后，还剩大饼一个，不便给谁独吃，于是互相约定，不许说话，谁若先想说话，就莫吃饼！两人既然互相约好，故各坐在家中，沉默不语。到了半夜，来了一个贼徒，到家偷窃东西，掠尽家中所有宝物，两人皆因有约在先，关怀大饼，不愿出声。到后贼人眼见这家中人痴呆如此，胡来乱为，皆不妨事，且觉得主妇靓婉可人，便傍近妇人，作了些小小轻薄行为。那丈夫虽亲眼见到贼人胡闹，却仍因为不忘那个大饼，故不作声。到后妇人忍无可忍了，就叫唤她的丈夫："大伍，大伍，你真是个傻子，为一个饼，尽人把我如此侮辱调戏！"那丈夫快乐得拍手大笑，他说："咄，咄，愚蠢丫头，你已说话，你输定了！饼应归我，你已无分！"

这是两夫妇的问题，谁最愚蠢，别人似乎不能置喙，轻易加以判断。百喻经故事所注重的是人类的性格。千年前世

界上既俨然曾经有个这种丈夫，这性格也似乎就有流传到如今的可能。我们如今已不容易遇到这种丈夫了，但却可从别种人物治国政策生活态度得知一二。譬如说：一片土地忽然丢了，或家中老婆跟人跑了，有些人不正是因为守着一点同大饼相类似的偏见或信仰，不发一言，不作一事，沉默支持下去？若有人说了一句话，想提醒他，这些人不正是顷刻之间就会用着顶天真快乐的神气，向人喝着："咄，咄，蠢东西，大饼又归我了"那种话语吗？

读到这本充满了愚人故事的小书时，我总疑心作这本书的人，书虽在一千年以前作成，他的讽刺却预备留给一千年以后。不过如今争大饼的聪明人，大都忙忙碌碌，虽作了不少无折无扣的蠢事，却好像从不曾注意到这样一本小书上来，因此这讽刺，也等于无用了。若希望他有用，又似乎还必需从现在起始，再过一千余年，才能为作主人的明白的。

不过我总想介绍这本书给那些应读这本书的人。

本篇发表于1933年10月5日《申报·自由谈》，署名沈从文。

驴子故事

记得一个佛经故事，忘了它的详细出处。那故事说：

从前有个商人，用一口袋豆子，掉换得一匹驴子，等待双方交易弄妥后，商人觉得占了便宜，极其得意，就告给那个原先驴主，上了大当，因为他豆子原来是一袋坚硬如石的豆子。但那驴主听了这种坦白的陈述后，却十分从容，满不在乎，也老老实实告给那个商人：豆子虽是不中吃的豆子，自己还不蚀本，因为那匹驴子，是世界上最劣最坏的驴子。（两人说时皆用的是五言韵语。）商人听说换来的毛驴，任何方法皆不能调伏驯善，就用种种语言试来恐吓毛驴。他用的仍然是五言韵语。他提到“钻脚钻股”，“皮鞭抽背”，“重压泥土”，“太阳晾晒”，以及一大堆荒谬绝伦的话语，恐吓那粗毛畜生。那畜生平时既极倔强，自然毫不在意。并且它还居然也用人类的语言，说出种种抵抗折磨的方法，表示它也自有主张，且对于强权压迫，极有把握，决不妥协。

遇到这种畜牲，照例作主人的便无办法。除非把它杀掉，但杀掉又似乎并不能算作顶好的办法。但故事上却说商人在

无办法之中，忽然记起了两句格言来了，就一变先前一时主人对畜生那种态度，只软声柔气的，向小毛驴说着下面意思的话语：

> 好朋友，你脸真白，雪也没有你那么白！你耳朵大，照相书上说是有福气的耳朵。你皮袄子青得很，太漂亮了。你为什么声音那么洪亮，你学唱歌包准出名！你那么体面，我正想为你讨个好太太；你放心，我替你选的太太一定是最标致的！

那毛驴先前不是极强硬吗？一分钟前还说“我一步不走，谁也无法把我哄走”，但主人柔软的言语，已弄软了它的心，想起未来的幸福，便快乐了。毛驴乃说：“我本来能够身驮八百斤，日行三百里，现在我就可以试试。”它说时显得又爽快又诚实，为了证明它说的话有凭有据，它当真即刻就驮了它新主人上了回家的大路。它的态度的改变，照人类平常的说明，则当名为“转变”。据故事说，这毛驴后来当真就如此转变了的。

故事到了这里，自然也就完事。

这毛驴转变以后做了多少有益于主人的事，故事不提及人自然不知道的。

我并不因为这个故事离奇，方想起这个故事。只是因为这个故事上面所说的驴子，总觉得它像某种人。故事虽说的只是一匹驴子，似乎在人类中也常常可以发现。现在的人并无“身驮八百斤日行三百里”的能力，然而也一定有那种平时好像极其倔强具备乖劣毛驴神气，在“任什么皆不作”的

精神下打发日子，到了后来终于就被人用未来幸福与眼前利益哄去服务的。因此想起那匹驴子软化以前的“神情”，总使我觉得有点惆怅。人类的事大不必言，只单说那匹驴子假若能倔强到底，人类的历史也许就不至于那么很平凡的写下去了。

本篇发表于 1933 年 10 月 14 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 7 期，署名沈从文。

知识阶级与进步

若从一般物质上着眼，人类的进步便很显然的陈列于吾人面前。但从理性方面说来，则所谓人类，现在活着的比一千年前活着的人究竟有何不同处，是不是也一般的有了多少进步？说及时实在令人觉得极可怀疑。

假若我们承认了理性也有进步的可能，想取例来说明它，一个写故事的人，自然还是引用个故事较为方便。一千四百年前，中国就有那么一个故事：

有个小小村落，距离国王的都城约三十里。既已聚集成村，自然就住了些顺民，所有男女老幼，皆在四季中各尽手足之力，耕田织布为活。也按时缴纳捐款，照习惯"唱戏""求雨""杀猪""敬神"。照本性"哭""笑""相骂"或"赌咒"。那村中有一井水，味道极美，无意中被一个专向国王讨好的人发现后，就把那井水舀上一桶，献给国王。世界上作国王的，大都相差不远，他的天下若从马上得来，则莫不粗暴如同一个屠户，他的天下若从爸爸传来，则又莫不

糊涂得同傻瓜一样。这国王应属于第二种人。第一次觉得井水极好，于是就下了一个上谕，指定那村中百姓，每天轮流派出一人，尽力所及，把水挑到京城里去。国王为了一点点水还那么认真，照例还算是那个村中百姓的光荣。但为了这样一担井水，村子里每天便应当有一个人来回走六十里路，这人别的事自然皆不能作了。国王命令既无法反对，遵照命令又实在太折磨了那村子里的送水人，因此大家就常有怨言，且暗地里商量，讨论出一个最好的方法，来逃避这差事。方法只是各人离开了这个小小村落，各到别地方去谋生。

消息为本地村长知道后，赶忙稳住了乡下人，要他们莫即搬家，等他到国王处去看看，是不是能够为他们想得出一个更好办法。村长见过国王禀明来意时，那国王就说，嫌路太远我明白了，如今我下一个命令，把三十里改为十五里，路程减半，不应当再说什么了？（照例世界上最颟顸的国王，对于小民这样玩把戏说谎总是极在行的。）村长便把国王的话转述给乡下人，乡下人头脑简单，以为因此一来，三十里的路程当真已缩短一半，故全体皆十分欢喜，就再不作迁移打算了。他们并且对于国王所给的恩惠，十分感谢，为了表示这点感谢，各人便皆在额角刻了“永作顺民”四个字。

这故事说明一千四百年前，已有人感觉这些缺少理性的乡下人，愚蠢得如何可笑可怜，故特别记下来，为后世启蒙发愚之用，当时的人虽能说出这样故事，且明白了一个国王并不能够把原本三十里的路程缩作十五里，但在当时便依然有许多事尽

那时的国王欺骗，同时对于国王这个名称，也毫无一人对于它的存在有所怀疑的。现在就事论事，则一切已大不相同：第一件事，国王的名称已为一些人用文字，嘴舌，力和血，把它除掉，同时附属于那个名分下的许多坏处也没有了。第二件事，即或有国王的地方，住在离国都三十里的乡下人，已不必为国王轮流挑水了。第三件事，国王或代替国王而来的执政者，在募捐借公债以及其他遣派国民有所担负应向国民说话时，也再不能用命令缩短里数一类简单方法取信于民了。这三种事似乎皆可证明属于人类理性的进步，是一种确定的事实。

过去的人把命运同权力全交给天，国王既称天，就有权柄任意处置一切。故作帝王的若本领好了，能负责，肯作事，一切又处置得极其公平，大家就有福同享，国王若是个脓包，不能作事，或是个艺术家，不会作事，这一国秩序为军人与政客弄坏，于是就有了党争同战事：党争结果常是把若干正派的人加以放逐与杀戮，战争则战事一延长，人民担当了那个生灵涂炭的命运，无数的生命，以及由于无数代生命思索与劳作积聚而成的一点点文化，便一古脑为革命毁了。现在的人民呢，虽仍然把权力交给执政者，却因为知识进步了些，对于一国未来的命运，似乎常常见得十分关切。尤其是号称知识阶级的读书人，多知道了些事情，总特别盼望自己所在的国家好些，国家局面乱糟糟到不成个样子，他们心里是不舒服的。若我们想找寻一种理性发达的人作为代表，把这类人拿来备数，自然太合式了。

不过也正因为有了这类仿佛理性充分发达的人，成为社会的中坚分子，人类理性真的是否进步，进步了对于一个民族又还有些什么益处，倒又成为可商量的问题了。

罗马的灭亡不是一天一月的事，就正因为它的成立也决不是一天一月的事。坏的坏下来若已几十年，要它好就自然也得这个数目。但一般人的感情或理性，却常常不许他们对“时间”这种东西有何认识。譬如在中国，提到“国家政治制度的不良”，“民族牺牲的消灭”，以及类乎此等问题时，一般人对于这些问题所引起的忧虑，忧虑中便从无时间的概念在内。故一切改良的企图，也常常不把必需的时间安排进去。若这种对于“时间”的疏忽处可以称为天真，那么，中国读书人的天真，实在比任何种人皆多一些！正好像人人皆太天真了点，譬如国家积弱数十年，努力图自强，应当二十年才有小小希望的，一个执政者若老老实实把这个数目告给一般人，且在这个必需的时间中计划一切，则这领袖除准备下野以外别无其他办法。这人下野了，代替而来的，必是个善于说话，在谈话中能把二十年的时间减至最小期间的人。本来需要十年的，执政者若说：“这件事至多需要三年，一切便可弄好。”只需要执政者把话说得极其得体，语气又漂亮从容，对国运怀了过分关切的读书人，就会很快乐那么自作安慰：“这好了，我们有了个好领袖，国家命运有了转机，知识阶级的出路全有保障了。”事实上，则这些人所注重的或不是“民族出路”的保障，而是“知识阶级”出路的保障。所谓读书人，学上古史，西洋文学，中国文学，政治，艺术，哲学，……这一类少数的人，照例是欢喜发表意见同时也欢喜发点牢骚的。这一类社会上的中坚人物，既从自己职业上得到了生儿育女生活的凭藉，又从一国领袖处得到了一份说谎的安慰后，便会各自去作应作的事情：或收集点古物，或到处托人去打听会做饭菜的厨子，或年近半百尚怀了童心去学习跳舞，或终日无事便各处去转述点谣言，再也不过问这个置身所在的国家一

切命运了。这些人虽头上不能发现什么刻好的记号，也从不为国王挑水，但这种人的天真与理性是无从并存于同一头脑中的。

也有人说：使多数读书人，能够各自在职业上与嗜好上得到了生存的兴味，安分自守，不乱说话，泰然坦然的吃肉喝汤打发每个日子下去，是一种国家希望进步需要秩序时必不可少的基础。故几年来知识阶级的沉静处与颓废处，据他们的自辩，与乐观主义者或胡涂蛋代为说明，莫不皆以为这是国家一切事业渐上轨道的象征，其实假若这类人最低的理性，还可以许他们明白“统治者假若永远是一群大小军人，日以抽收烟捐添购枪械为事，一群油滑政客，只会因循苟且支持现状，一遇应当向国民说谎时就胡涂乱说一阵，本身只是个军阀的清客，国家由这种人来处置，国家既无法持久，秩序进步也永远得不到”，那么，这类书生的生活与观念，或者也许就稍稍不同一点了。

事实上是古今作平民的，生活态度与观念皆由于为一个天生懒于思索容易被骗的弱点所控制，照例只注意到自己今天能不能活，不大注意明天，且同时只把善于解释政策的首领，当成最可靠的首领，并不追究政策的得失，故所谓理性的进步，从某一点说来，我们不过指的是现在的无冕国王，已无方法派遣知识阶级挑水，同时在任何人的额角上，看不出刻过什么显明记号而已。

十月二十五　北平

本篇发表于 1933 年 10 月 28 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 11 期，署名沈从文。

打头文学

中国自从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对于俄国小说，可以说始终皆怀了最好的友谊去接近它。作者间所受俄国小说的影响很大，读者间所受俄国小说的影响也很大。但各人似乎皆忘记了一件事情，就是十九世纪俄国小说在俄国所散布的空气，是一种什么空气。这件事，连近来的文学论者像也不大提及了！

应当承认别一个国家历史上的场面，由于文学所发挥过的能力，某一时作了某些事情。我们即或因环境不同，一切无法照样作去，但至少那些由文学而展布的场面，当可以作为我们文学作者一种参考，以及文学论者一种引证。

俄国文学有一种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作品上老少新旧的冲突。冲突的问题不外乎政治观念与生活态度的不同，解决它的方法也很多，惟"打头"的方法却为很通俗的一种。所谓打头，就是年青人明白了什么人说谎，且明白这谎话不利于较年青时代的一切发展后，来……，是的，我就说的是应当来……

我想在这里又来说一个故事，也是关于打头的故事。

有个愚人，头上光滑无毛，另外一人见到这光滑的头，觉得很有趣味，就用手中硬梨，向那个古怪的头抛去。一再三四，打了又打，梨子完事以后，那被打的人还不作声，默然忍受，既不说话，也不还手。有人见着这种情形，就询问他："先生，你那头不是已打破了吗？挨打时怎不避开些？被打后怎么不追问情由？"那愚人答得极其玄妙，他说："你瞧，那人依仗势力，又无知识，胡来乱为，任性而行，用生梨打破了我的头颅，我头被打破了，他还弄不明白，他的损失，也不明白！"

用梨打人的人在中国任何地方现在皆似乎很少很少了，然在别一方面，如会议席上，大会场中，以及……仿佛被人打了那么一下两下，俨然作着秃头人被打以后的神气，向群众说明意见的，却实在又大有其人。譬如中国在东北三省失去后，在某一类人谈话上，或宣言上，或理论文章上，我们不是常常可见到如下面的意见发表吗？

中国被人欺侮固吃了亏，但将来吃亏的决不是中国人。中国失去了一片土地不是中国的损失，失地一时夺不回来也不是中国的致命伤，这事只是日本人的蠢处，因为它吞的不是东三省，其实只是一个炸弹。这炸弹有一天会破裂的。

炸弹什么时候会破？怎么样破？并不说明。虽不必说明，炸弹破裂所指自然是战争；战争一来，或日本陆军在西伯利亚为苏俄击溃，或日本海军在太平洋被美国消灭。不过日本

纵然败了，是不是就可以成为中国的胜利？这些人可不提及的。是忘了提及，还是并不多加思索，很难说了。

这种装作俨然被人打头神气向平民说谎麻醉国民以遮掩自己无能的头号人物，以及用一部分知识帮助这些人说谎犯罪的人物，事实上除了用俄国某一时期文学所描写的真的打头方法来加给他们以一种教训外，并无更好方法使他们明白他们自己对于这个民族加了如何损害，故适宜于得到何等待遇的。

中国有中国自己的环境，以及发自中国人心中的意识，即如打头也不一定适宜于仿照俄国人的方法。故文学作者为青年人提倡什么时，自然得注意一下："这是为中国年青人用作新旧老少相互冲突作战的东西"，不能疏忽它的利弊。但打头的方法不一，这一时代的文学，是应当指示出若干人必需被打，以及这些人当如何去打的文学，则极显然的事！

我们正需要打头文学！因为文学的基础若位于"去伪存真"方面。我们的愚蠢方能有消灭的希望，也方能把这个民族目前的危机与未来的恐惧，揭发出来，多让人明白些，多作一番准备。不然，居××的，固然在任何情形下，还依然可以装作头上被梨子打过的愚人神气，呆头呆脑，不管外人笑话，向平民有所说明，实则这民族什么皆完事了。

本篇发表于1933年11月1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2期，署名从文。

从“小学读经”到“大众语问题”的感想

近几个月来，有一件事情在“读书人”中引起了相当的注意，就是从小学读经到大众语讨论。广东湖南诸省主席，既有勒迫小学生读经的盛意[①]，南京的教育部部长，却又通令全国小学教科书一律得用语体文。从这件事起始，在南京方面，不久就引起了汪懋祖、吴研因两先生对于教科书文言白话得失的争辩。在上海方面，又因此来了一大群作家，提出国语运动失败之决定与大众语提倡的讨论[②]。这一串问题一直到现在还不结束，而且也似乎与许多“问题”相同，虽争辩过了，讨论过了，事实还搁在那儿。有些同政治现象一样，永远对立。有些讨论到终结等于不讨论。又有些一接触事实，譬如“大众语”，什么该弃去，什么虽该弃去也排除不了，什么该获得，但获得的方法还是在其他方面的变革。作者与编者在忌讳与厌倦情形下，便不结束而结束了。

就北方言，虽在几种流行不广的报纸上，登载过些讨论文章，却不曾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对于这件事，除了关于教科书文白问题，《独立评论》曾载过任叔永、胡适之两先生一

点文章外，最近一期的《国闻周报》，也载了一篇杨振声先生的论文，北方对于革命策源地的读经运动，消息不详，故难议论。对于文言白话的得失，文字普遍化，简字，俗字，注音字，方言，通用语的研究，能说话的还应当有些人。但这些人在这一串问题上皆有发言的机会，却无发言的兴味，这“热闹”不能不说得让南方独占了。这问题在北方沉默的理由，似乎是各人所涉猎的“多”一点，从事实方面认识得稍“深”一点，空泛激扬的议论自然也就“少”了一点。各人正在“注意”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故反而不能来随便“谈”这个问题了。据我所知道的，譬如改编平民读物的顾颉刚先生，编纂国语辞典的黎锦熙先生，新近死去的刘复先生，以及清华北大研究所，定县平教会，个人或团体皆莫不各在从事研究与实验。他们不是觉得这问题不值得讨论，只不过认为这问题很大，很严肃，更不能说说了事，故不乱说空话罢了。（但也可以说这些人是因为怕……，放下了他们的说话权利的。）

北方的专家学者不敢说话，北方非专家的年轻人，却也有关心它，成天从南方报纸上来考察这个问题的发展，且对于它的“症结所在”与“解决方法”虽不十分注意，而又想要说话的。我曾经接到过好几次不相识者的来信，提及这一件事，且以为北方对于这个问题的漠视很不应当。这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实在为全国的问题，假若各人皆漠不关心，在一种绅士风度下打发每个日子，即真是所谓不可救药的“京派”了。……写这种信的人，自然是不知道北方有多少固定机关有若干人在研究这个问题的。这一期本刊上“在南方的大众语的论战”作者杜凿先生，就是致函给我的一人。来信

还带着天真的神气质问我：你是一个教科书的编辑助手，又是一个文艺刊物的发稿人③，对于军人勒迫学生“读经”没有话说吗？对于教育部的“文言妨碍教学”没有话说吗？对于……？对于……？他想激我说出一点意见和感想，给同他差不多的人听听。

我既非专家，又觉得还不配称为作家，故并无多少意见与感想可言。

我只有些疑问，或者同许多年青人皆差不多一个样子。

一、现役军人既知道为民族国家着想，实在是件很好的事情，假若他们对于当前最值得注意的，用特税培养万千无事可作的军队，能为想出个办法，对于鸦片烟的勒种，包运，变相公卖，感觉到危险，认真来禁止一下，再就国防与剿匪需要上，把兵力缩减到最小限度，把其余财力与人力好好计划来用到生产方面去，岂不很好很好？如今应作的事不好好的作，都关心到小学生，勒迫小学生读经。他们是不知道民族国家最大的害处在毒物普遍的流行，还是极其相信经书，了解经书。真以为烟鬼的儿孙，只须熟读经书，就可以民富国强？

二、目前的中国是个每年有六万万洋钱流出的国家，是个近于靠特税与苛捐杂税维持现状的国家，是个全人口二分之一类乎灾民无业无食的国家。所谓教育家者，若注意到小学生，他的理性至少比军人应当发达一点。他们若讨论到小学教育问题时，一定明白小学教科书的编制，最先决定的当是使用不拘文白但能合用的文字作工具，输入一个新人的观念，培养一种新人的趣味，使小孩子活泼，强健，结实，他们方可在这种充满烟鬼，与一百五十万大兵的割据，二万万

以上灾民的分布各地的国家内，得到一点求生的勇气，让他们长大人世时来应付他们多灾多难的命运。如今所讨论的不是这件事，却只摭取一二通常字句，来扶持自己观点的合理，互相教训，俨然国家兴亡皆只维系在文字上，却并不在乎文字所包含的观念和思想上。这讨论态度纵备臻庄严，然而这种庄严的讨论，有何结论可言？两方面既皆知道文字不过是个符号，新旧皆有它的用处，为什么这讨论还能继续下去？

三、近年来语体文的奢侈化、欧化、与乖僻化，实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使语体文从平易明白转入艰深晦涩，与原来目的相反，与习惯用语远离，这种现象实在说来却为中国接受西洋文学初期当然的现象。一时节在恶化趋势下产生的作品，在短短时间中自然也就会为历史所遗弃。假若认为它目前的恶化应当找寻个负责者，有权威的译书者与有出路的译书者，皆各自应当负一分儿责任。我们如能够希望译书人在着手译书时，先把原来文字看清楚一点，译成中文时，又能把本国文字弄通顺一点，这分明就是防止语体文恶化一个大功德！又假如出版者能有那么权力与财力，把许多极流行的旧译书籍文字不通处重改一下，新译的书籍严格选择一下，难译的书籍便不妨多花些钱找寻称职的译者很谨慎小心的来译它，也就是对于文字语言恶化的制止一种好方法。如认为它的恶化与海上洋场趣味相呼应，日向诡怪、尖刻、艰深，以至于毫无用处的一方滑去，有不可思议的危险，非建设一个新的目标不可，这新的目标必紧贴着大众的理解与大众利益，（是的，应当这么打算打算！）但这个建设，是大家勇气悍然各来写写随笔，加上各种富于诅咒意义的字眼，对遗产对历史痛骂一场所能弄好，还是得许多人博收兼取埋头研究，

沉默奋斗方能弄出点点成绩？语言标准化与京语化，皆含了封建势力与毒菌，应就上叙目的创造一种新的语言，这创造，诚如《圣经》上所说的“世界没有光，上帝说要光明，就有了光明，”还是需要许多作家与研究者把一分长长日子加在工作上来努力与实验？

我们是不是还可希望军人来抛开经书读读历史，使他们明白数年前山东督军张宗昌，也提倡过读经，且重刻过经书，（这大本头书籍到现在济南市上还随处可以见到，）经书既不能帮助他地位的稳固，也不能使人心更好一点，到后终于坍了台，且作点自己本分上应做的事，把管教小学生的事，却让教育部来作？

我们是不是还可希望教育家放下了文白的讨论，使他们知道讨论这个问题的不必需且毫无结果，却来做点更“当行”的事？

我们是不是还可希望对于大众语慷慨陈词的作家，使他们明白放言空论毫无实效，能在此后本人译作上，产生几个标准作品问世，或对于本问题有三年到三个月的研究与注意，再来破坏与建设，以便于讨论到切要处时，不至于停滞不前，讨论到有所决定时，不至于还是一句空话，一切又还得“把这问题交给社会革命与有实行勇气的作家来解决”？

希望这个民族进步，且希望这个民族摆脱当前堕落崩溃灭亡的厄运，虽可以说是国内一切负责者说话者共通的意识，然而地位不同，观点也就常常大有区别。但欲摆脱厄运而力求进步，先决条件就在认清“事实”，必自己不迷信新旧符咒，同时也不把新旧符咒搬出使人迷信，方可以有些希望。若负责的说话的不是有点愚蠢就是有点油滑，则历史推衍，

愚蠢者灭亡，自不待言，而油滑者幸而天假其便，亦不过如一似远实近的前例，困难当前，到头不知所措，所有作为，与下民遇天干时则念经抬狗求雨无异。国家与民族恶运，也不过在这些人统治交替中，多读一次经书，加深一层僵梦而已。

本篇发表于1934年8月1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89期，署名从文。

① 1933年间，广东军阀陈济棠和湖南军阀何键曾先后通令两省的学校恢复读经。后来广东省还成立了经书编审委员会，编成中小学《经训读本》。

② 1934年5月，汪懋祖在南京《时代公论》周刊第110号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鼓吹文言，提倡读经，嗣后吴研因则在南京和上海的报纸上同时发表《驳小学参教文言中学读孟子》一文，予以反驳，从而引起了关于文言与白话的论战。同年6月18日、19日《申报·自由谈》分别刊出了陈子展的《文言——白话——大众语》和陈望道的《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两文，提出并展开了有关大众语问题的讨论。

③ 写此文时，沈从文正一面参加以杨振声为首的为华北中小学生编撰教材和基本读物的工作，一面主持编辑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

论 读 经

上年来各方面常常可以听到“恢复固有道德”这句话。说及恢复固有道德时，就使人联想起“读经问题”。两样东西原来是混在一块分不开的。广东湖南的军事领袖，据说对于这件事就特别热心。且闻从今年起，两个省分凡属学校，不问学生大小，皆一律实行读经。人若不是个傻子同疯子，皆会明白徒然提倡读经，对于中国当前或以后几个严重问题毫无补益。如今居然有人提倡，有地方实行，可算得是很希奇事情。把提倡读经的原因追究一下，我们便可以知道读经空气越来越浓厚，不外乎一二在军人幕中的高等师爷，稍稍读了点旧书，各在那里做梦，梦想用“儒术”来治国平天下。他们有了说话机会时，因此就怂恿当局或谄媚当局，旧事重提，试用试用儒术。领袖们呢，自己或者是个秀才出身，也读过几本旧书，自然容易迷信儒术。或者本人一字不识，正因为一字不识，便相信这些军师的愚妄意见，以为目前的天下国家即或不能由读经弄好，至少社会秩序还可望从这条妙计上恢复安定。于是读经事件由提倡进于实行，“读经”真成

为一个“问题”了。

这问题用恶意来解释，可以说是这些迷信儒术的文人武人，妄想巩固个人的地盘、饭碗与权力，所作的一种极胡涂打算。就善意来解释，这些军师这些大帅实在也希望中国比目前稍好一点。但他们的知识，只许可他们知道中国有几部经书，中国有这种政府，因此拿来应用，方法并不高明，动机却可以说是“为国为民”的。

读经既牵连所谓恢复固有的道德，道德是什么？不过是人与人共同活下来时，谋和平安全，减少一点纠纷，使人与人更容易相处的一种东西罢了。道德就个人言代表理性，重在节制与牺牲。（然而它对个人虽为牺牲，对社会人类则为利益。）它同法律性质稍稍不同，但用处却与法律相似。法律注重在使人不敢作恶，道德却能使人乐于向善。道德既由于人与人的关系而产生，因此多数的道德无固定性，常随人类需要立一标准，它的价值也就在那并无绝对固定性上面。它能控制人类行为，却仍然由人类行为支持它。人类自然不能缺少道德，但道德也同法律政治一样，有些本质不变，形式则常常得变动。有些此时存在，稍过一时又毫无存在的价值。积极提倡道德的有两种人：一为政体统治者的帝王，一为思想统治者的宗教家。对道德取抗议态度的有三种人：一为有见识的思想家，二为诗人，三为革命者。前两种人照例拥护固有道德，后三种人却常常否认道德，修正道德，或创造一种新道德。

想要运用道德来治国平天下，并不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但至少得先明白它的变动性。一个有头脑明战术的现代军人，他训练士兵时，决不会要士兵抛下机关枪，来学习拉弓射箭。

一个有头脑懂“政术”的政治家，他真会为民族打算，也就决不至于再迷信两千年前几本书籍所提到的作人作事方法可以救国！道德本身只是一堆名词，抽象而不具体，用到人事上时，还得把它很艺术的混合在一种形式里。要提倡“礼”，与其教人读一点钟的经书，不如要他们好好的列一次队，把学校规矩弄好，秩序弄好，礼就来了。要提倡“义”，若能把读经一点钟时间，换作爬山浮水去救一个人，也似乎比较实在一些。其余所有经书上的道德字眼儿，无一不必需艺术的转到另一件事情上去，方能发生效果。若不明白这一点，却只抬出经书来，想从读经上作天下一统的梦，那与张宗昌当年翻刻经书①，不过是五十步百步之比。纵将来经书流遍天下，每人皆熟读成诵，对国家本身的上下贫穷与遍地毒物，能救济不能救济？对国外的飞机，大炮，洋货，牧师，能抵抗不能抵抗？

目前一些提倡读经拥护读经的人，除了军人还有不少名人大官。这些人是不是好好的当真把经书读过一遍？说起来就不免使人疑惑。若果每一个人真能平心静气，来把所谓《诗》，《书》，《易》，《礼》，《春秋》，精读一遍，再想想目前中国是什么样一种可怕情形，就会了然上古典籍不能应付当前事实，或许再也不忍心随声附和，让烟鬼的子孙还来用经书毒害一次了。

退一步说，当政者倘若有人读过经书，而且得到经书的益处，作人有大儒风度，作事具儒家精神，个人的确相信经书是一种宝贝，一副良药，且相信令人读经真算得是一种“救国政策”。那么，当前应该读经的，实为下面几种人：

一，国民政府大小官吏

二，国民党各级党员

三，国内各种军人

因为这些人正是当前社会国家的直接负责者，政治不良这些人必需负责。希望国家转好些，也就得先把这些人弄好。广东湖南政府有提倡读经的决心同勇气，最先就不妨用它来甄别官吏，奖惩党员，升降军人。如今上述三种人不闻有读经消息，却把它派给小学生，对子弟辈如此关切，对当前事如此马虎，这是什么意思？使人觉得不易理解。

若说小学生即将来的民族中坚分子，也即是将来在这块土地上应付多灾多难命运的公民，要他们读经，为的是替他们将来设想。我们明白如今年龄八岁到十二岁的小国民，当他们二十来岁时，必然遭遇下面几种严重问题待他们解决：

一，中国经济破产以后的穷困

二，中国因国际大战所受的蹂躏以及战事结果中国所受的宰割

三，中国因二十年来毒物流行所产生的结果

若欲训练他们的身心，使他们将来长大时能应付这种困难局面，担负下这种沉重责任，目前最切要的工作，岂是读两本经书所能收效？目前湘粤负责者假如真肯为他们青年人设想，与其勒迫他们读经，不如在最近的将来，呈请中央，把全国学龄儿童来一个五年计划，施以强迫教育，输人几个最基本的道德观念：

一，吃大烟的极不道德，爱国家用国货的极道德。

二，强健勇敢的极道德，懦弱懒惰的极不道德。

三，作人正直，坚忍，结实的极道德，遇事悲观不振作的极不道德。

四，迷信鬼神的极不道德，对科学有兴味的极道德。一面用全部社会生活来培养这些道德观念，一面还用严重法律来辅助教育所不及，务必使每个青年人具有一种新国民的性格，即当大难来临时，各自还有活下去的勇气与能力。且使他们在无论何等境遇下，皆不至于如现在负责者那么徒然迷恋“过去”。使他们在无论何种情形下，又总不放弃公民的权利同义务；换言之，便是他们还想活，还预备好好的来活！五年计划完成了，再来一个五年计划看看。要这样子，方算得真为他们设想！

中国自从与国联合作以来，所有各种专家差不多全来过了。事实上目前最需要来中国帮忙的，还是一个或十个很明白“政治的艺术”的专家。因为这种政治设计者，在目前的中国实在太少了。不管是民主政治，不管是独裁政治，总得要个通权达变有脑子的人，方能把政策安排得合理一些。要恢复固有道德，使每个官吏或人民明白所谓礼义廉耻，要关心青年的将来，使每个人具有所谓民族常识，皆得赶快抛掉经书，好好的来跟那个活人专家学学！

提倡读经救不了中国。至于虐待小孩子，强迫他们读经，想把历史倒回去，玩这一套老把戏，更不是救中国的方法。——这是我对于本题所作的结论。

二十四年一月七日

本篇发表于 1935 年 1 月 21 日《国闻周报》第 12 卷第 4 期，署名沈从文。

① 1925 年，北洋奉系军阀张宗昌任山东督军时，提倡尊孔读经，曾下令重刻了《十三经》。

尽　责

八年前国民党左右两派分裂时，湖南省发生了一个清党运动[1]。各地方皆有许多许多青年，从县或区党部与学校课堂里，被人簇拥去割下头颅示众，或在什么会场上与请愿地方，当场用火器扫射而死。这类流血事情虽小乡小镇也受了传染，损失简直无从统计。这些流血的青年，有的年龄不过十四五岁，（其中女的不少，浏阳地方还杀过十三岁的女孩子！）当时那么大规模流血，或有他必需如此处置的理由，算不得如何残忍。然而当时若有人注意用“儒道治国”，能把这些小孩子找来，各打三五十下手心，再聚集在一个规律严格的学校里，加以训练，勒迫他们读经习礼，也不是很困难的事。真这样做去，到如今，这群二十到三十岁的青年，或许皆成为国家最有用的青年了。不过那时节不只青年人发了疯，年纪大读书多的似乎也有点神经错乱，皆把作胡涂事放在肩膀上，以为杀人是在那里尽最高的责任。这一来，活人的记忆里，便只能保留了一个痛苦印象了。若用它来与目前读经运动相对照，更显得我们原来是活在中古时代，而且历史还

正在倒退，使人对于中国明日的一切，有点茫然了。历史如果像一个环，那么，再过十年，倒回来的是个什么世界，是礼乐复古，王道治世，戴花翎的长驱入关，还是……？

历史照例不会如一个环。虽然有些人怀了这种迷信，迷信背后且有种种促成的原因，使少数读书人亦不免一时蔽于迷雾中，以为历史可以逆转，循古是一条出路。然而不成。一切水皆得向海洋流去。最聪明的政治家，虽知道有个“昨天”，必更注意那个“明日”，而且是个想得出办法去如何安排一切使合于明日环境的人。他不会为过去发迷，且绝不误解历史，以为用“过去”可以安顿“将来”的。他明白“今古不相法”。他相信在人事上顺逆之间，就寓有个人权势与民族生命存亡之兆。聪明治国者若具有一分聪明九分勇敢的精神，凭这一分聪明应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那九分勇敢必可造成一页新的历史。若具有九分世故一分傻干的精神呢，这九分世故使他趋于保守，那一分傻干也仍然会否认历史向前直闯。若除了十分迷信他无所有，除了迷信旧的方式，用它来对付当前与未来一切，不作别种新的打算，国家不会上轨道，有秩序，即想维持现状，事势也不许可的。

如今南北有四省皆已提倡读经，这原因当由于各省负责者明白国家样样不如人，一切干不过人，攘外必先安内，总得想一条出路。我们不妨相信，这找出路的动机是值得尊敬的，但这些为国家想出路的人，大多数是久历戎行，尽瘁国事，余暇极少的军人。从戏剧或什么书上知道历史上有个伍子胥，有个岳飞，被后世称为忠臣（国家这时节是需要忠臣的时节），时势既然还不许他们作伍子胥，又无机会可作岳

飞。几个划策设计的幕僚，则尚未忘却革命军北伐时代所受青年人的轻视与忽视，一面看着时代风气，影响到家中儿女和夫人的行动也真不小，因此“儒道治国”，用经书困辱青年人的政策，先在“文治派”心中成为一个公私两便的有力观念，一有机会时，把它贡献给主席，主席大约也想想：“老的给他一碗饭吃就行了，平时捣乱的全是年轻人，这倒是一着棋。”因此读经救国的空气，由南而北，很自然的慢慢的“来”了。据他们的意见，这自然是中国一条出路。他们想出这条“路”的原因，除如上述及以外，不容易寻觅更好的解释了。

经书不拘某种，尽青年人熟读成诵，实在无从使他们应付明日中国的种种困难，那是显而易见的。就因为中国目前并不是为符咒弄坏的，符咒当然也不能使它即刻转好。负责者倘若真关心国家的将来，能为国家打算盘，又要来尽一种最高的责任了，或想训练青年，得到青年，皆绝不宜用枯燥经书的诵读来折磨他们的神经，却正需要无数活泼新鲜玩意儿，排泄他们的感情，爬梳他们的郁积，发扬他们的志气。与其要他们注意两千年前的断烂朝报，简易人生观，琐碎而不切于时代的丧葬礼制，就不如用国家力量，集合国内专家，把国民所必需的几种基本道德，加以讨论，用一个新的方法，编成些简明合理与现代精神不相违悖的出版物，活动电影，以及一切游戏玩具，广播流传，有力而易于收效。如只会单纯提倡读经，经书不发生影响，则糟蹋国民精力，毫无代价。若发生影响，更挫折国民应付当前与未来环境的勇气。总而言之，从大处看，这时代实行读经即近于民族自杀，凡已经实行读经的省分，皆是已经起始在那里自杀。这些官家如此

热心，实因为这些官家历史知识不如军事知识充分，把复杂社会看得同简单兵士一样，因此方法误用。他们在“尽责”，可并不知道是在害人，更不知道如此尽责且摇动了自己的墙脚。

如今援引历史提倡读经的人，既不明经，也不习史，读经又好像已渐渐见诸实行，国内研究经史的专家，到说话的时候了，应当各自老老实实发表一些大胆而公正的意见，纠正这个行将普遍传染的风气，方是道理。“儒道治国”不是个可笑的名称，过去某一时代曾有人把它统一安定过中国。然而如今来运用这个政策的人，至少得先弄明白经书的坏处与好处，看清时代，看清环境，方能行使这个政策。清党时杀人的得失，是件过去的事不能提了，至于行将要来的事，凡不愿民族自杀的人，皆会明白用沉默表示赞同与否认两不相宜。并且我们还有个教育部，各省单纯勒迫大小学生读经，与教育部法令是不是发生抵触？教育部当局似乎也得尽点责任，向国民说明教育部对于这件事的态度。（我知道许多人皆希望教育部能在读经一件事情上表示一点态度。）若不承认读经是大中小学课业内的事，那么，有些省分业已施行的办法，值得注意。若承认读经是必需的事，那么，所有课程标准得根本改变，决不宜那么含含混混下去，使作教员作学生的徘徊歧途，不知所从。

我希望尽责任的感觉，在教育部同专家方面，也不下于各省主席。大家皆爱国，皆希望中国有出路，且皆承认中国得找寻一条比较方便的出路。既然有人在提倡读经了，这是不是条出路？路走不走得通？公平的讨论决不犯什么罪。若因为提倡的是另一种人，其余各方面就避嫌不便说话，那是

逃避责任，此后读经所发生的恶果，算起账来诸公皆应记上一笔。

本篇发表于1935年4月29日《国闻周报》第12卷第16期，署名沈从文。

① 清党运动　1927年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公开叛变革命，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同时，公布了所谓“清党”决议案，开始大肆杀戮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内真正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左派分子。国民党反动派称此为“清党运动”。湖南省的“清党运动”即指“马日事变”。1927年5月21日，受蒋介石的指使，国民党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军长何键的策动下于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他们袭击湖南省工会、农会及其它革命组织，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

北平的市民

住居北平稍久的外省人，大致皆看得出北平市大街上人，多数皆显得很闲暇很从容，若拿它与上海马路上人比较，上海人匆忙得简直是充军。北平大街上两个自行车碰了一下，可以裹起一大堆闲人看热闹。送冰块的小驴被汽车轧了，也同样有一堆人围着。推而至于竖电线杆，翻造街道，以及车轮瘪了用打气筒送气，无一事不足引起行路人注意，无一事不能使他们停步停车看个半天。一件街头小小纠纷，若果应当过区里解决时，不管路途远近，还一定有许多闲人跟随前去！这种市民性值得注意。分析一下，不外两点，第一，北平市民富于研究性，凡事皆能引起研究的兴味。第二，这种好管闲事的兴味，由于市民生活中剩余时间太多而起。从好处看，这种人能欣赏艺术，具有领略一切艺术的本质，与艺术接近时能“忘我”。从坏处看，这种人多数不大宜于担负重要职务，不大爱惜时间，不知道有“我”。

似乎是鲁迅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就北平羊肉铺杀羊时许多人围看情形，说北平市民极残忍，这批评不公平。就我经验

说来，事实上不受教育的人看杀人时，同读书人看一本书情绪受刺激相差不多。假如有许多人每天无事可作，有许多事作来，又用不着太忙，他们既同大学校无缘，又不能坐在公园一面喝茶一面与友人闲谈天，街头自然成了他们的学校，成了他们的公园。他们缺少机会在书本上搜索知识同趣味，便只好到街头发现那个。消灭这种现象是社会变动。若到了大家不匆匆忙忙作工，就得饿死的情形，街上看热闹寻开心的人当然就少了。目前社会状况还许可北平市民优游闲适，便是改正它也似乎不必需，不可能。"但北平这个地方，市民的命运，岂能长此从容暇裕？"这事还不曾为官方注意，已渐渐为办报的所关心。市民有的是闲暇，有的是从闲暇而生的对世事发生兴味的情形，他们又大多数认识字，能看报纸，还将一部分闲暇时间用报纸来消磨。假若办小型报纸的，认清这一点，能够想办法，来把报纸当作一个教育机关，在给他们趣味以外还同时输入一点有用知识，实在是一件好事情！就北平市民环境看来，他们不止需要近代国家的公民常识，还充分需要国难中国民意识，而且也相当能够承受一点学术知识。如何注意输入这些东西，当作别论。宜于注意他们，那是无可怀疑的！

我理想中的北平小型报纸，是能够按日有各种专家，就政治，外交，法律，医药，历史，文学，写出通俗而切要的文章，占据报纸一角，成为市民恩物同药剂的。我希望一切小型报纸皆注意到这一点，且希望多数专家，皆乐于在小型报纸上写文章。

（二十四年六月二日）

本篇发表于1935年6月2日北平《实报》，署名沈从文。《实报》是面向普通市民的一份通俗性小报，每日出四开一张，分为四版。

中国人的病

国际上流行一句对中国很不好的批评："中国人极自私"。凡属中国人民一分子，皆分担了这句话的侮辱与损害。办外交，做生意，为这句话也增加了不少麻烦，吃了许多亏！否认这句话需要勇气。因为你个人即或是个不折不扣的君子，且试看看这个国家做官的，办事的，拿笔的，开铺子作生意的，就会明白自私的现象，的确处处皆可以见到。它的存在原是事实。它是多数中国人一种共通的毛病。

一个自私的人注意权利时容易忘却义务，凡事对于他个人有点小小利益，为了攫取这点利益，就把人与人之间应有的那种谦退，牺牲，为团体谋幸福，力持正义的精神完全疏忽了。

一个自私的人照例是不会爱国的。国家弄得那么糟，同它当然大有关系。

国民自私心的扩张，有种种原因，其中极可注意的一点，恐怕还是过去的道德哲学不健全。时代变化了，支持新社会得用一个新思想。若所用的依然是那个旧东西，便得修正它，

改造它。

支配中国两千年来的儒家人生哲学，它的理论可以说是完全建立于“不自私”上面。话皆说得美丽而典雅。主要意思却注重在人民“尊帝王”“信天命”，故历来为君临天下人主的法宝。末世帝王常利用它，新起帝王也利用它。然而这种哲学实在同“人性”容易发生冲突。精神上它很高尚，实用上它有问题。它指明作人的许多“义务”，却不大提及他们的“权利”。一切义务仿佛皆是必需的，权利则完全出于帝王以及天上神佛的恩惠。中国人读书，就在承认这个法则，接受这种观念。读书人虽很多，谁也就不敢那么想：“我如今作了多少事，应当得多少钱。”若当真有人那么想，这人纵不算叛逆，同疯子也只相差一间。再不然，他就是“市侩”了。在一种“帝王神仙”“臣仆信士”对立的社会组织下，国民虽容易统治，同时就失去了它的创造性与独立性。平时看不出它的坏处，一到内忧外患逼来，国家政治组织不健全，空洞教训束缚不住人心时，国民道德便自然会堕落起来，亡国以前各人分途努力促成亡国的趋势，亡国以后又老老实实同作新朝的顺民。历史上作国民的既只有义务，以尽义务引起帝王鬼神注意，藉此获取天禄与人爵。迨到那个能够荣辱人类的偶像权威倒下，鬼神迷信又渐归消灭的今日，自我意识初次得到抬头的机会，“不知国家，只顾自己”，岂不是当然的结果？

目前注意这个现象的很有些人。或悲观消极，念佛诵经了此残生。或奋笔挥毫，痛骂国民不知爱国。念佛诵经的工作不用提，奋笔挥毫的行为，其实又何补于世？不让作国民的感觉“国”是他们自己的，不让他们明白一个“人”活下

来有多少权利，——不让他们了解爱国也是权利！思想家与统治者，只责备年轻人，困辱年轻人，俨然还希望无饭吃的因为怕雷打就不偷人东西，还以为一本孝经就可以治理天下，在上者那么糊涂，国家从那里可望好起？

事实上国民毛病在旧观念不能应付新世界，因此一团糟。目前最需要的，还是应当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各方面共同努力，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使人人乐于为国家尽义务，且使每人皆可以有机会得到一个"人"的各种权利。合于"人权"的自私心扩张，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它实在是一切现代文明的种子。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能"自由思索，自由研究，自由创造"，自然比一个国家多数国民皆"蠢如鹿豕，愚妄迷信，毫无知识"靠君王恩赏神佛保佑过日子有用多了。

自私原有许多种。有贪赃纳贿不能忠于职务的，有爱小便宜的，有懒惰的，有作汉奸因缘为利，贩卖仇货企图发财的。这皆显而易见。如今还有种"读书人"，保有一个邻于愚昧与偏执的感情，徒然迷信过去，美其名为"爱国"。扇扬迷信，美其名为"复古"。国事之不可为，虽明明白白为近四十年来社会变动的当然结果，这种人却胡胡涂涂，徒卸责于白话文，以为学校中一读古书即可安内攘外，或委罪于年轻人的头发帽子，以为能干涉他们这些细小事情就可望天下太平。这种人在情绪思想方面，与三十年前的义和拳文武相对照，可以见出它的共通点所在。因种种关系，他们却皆很容易使地方当权执政者，误认为捧场行为，与爱国行为。利用这种老年人的种种计策来困辱青年人。这种读书人俨然害神经错乱病，比起一切自私者还危险。这种人主张若当真发生影响，

他们的影响比义和拳一定还更坏。这种少数人的病比多数人的病更值得注意。

真的爱国救国不是“盲目复古”，而是“善于学新”。目前所需要的国民，已不是搬大砖筑长城那种国民，却是知独立自尊，宜拼命学好也会拼命学好的国民。有这种国民，国家方能存在，缺少这种国民，国家决不能微倖存在。俗话说：“要得好须学好。”在工业技术方面我们皆明白学祖宗不如学邻舍，其实政治何尝不是一种技术？

倘若我们是个还想活五十年的年青人，而且希望比我们更年轻的国民也仍然还有机会在这块土地上活下去，我以为——

第一，我们应肯定帝王神佛与臣仆信士对立的人生观，是使国家衰弱民族堕落的直接负责者。（这是病因。）

第二，我们应认识清楚凡用老办法开倒车，想使历史回头的，这些人皆有意无意在那里作胡涂事，所作的事皆只能增加国民的愚昧与堕落，没有一样好处。（走方郎中的医方不对。）

第三，我们应明白凡迷恋过去，不知注意将来，或对国事消极悲观，领导国民从事念佛敬神的，皆是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这些人同巫师一样，不同处只是巫师是因为要弄饭吃装病装狂，这些人是因为有饭吃故变成病人狂人。）

第四，我们应明白一个“人”的权利，向社会争取这种权利，且拥护那些有勇气努力争取正当权利的国民行为。应明白一个“人”的义务是什么，对做人的义务发生热烈的兴味，勇于去担当义务。（要把依赖性看作十分可羞，把懒惰同

身心衰弱看成极不道德。要有自信心，忍劳耐苦不在乎，对一切事皆有从死里求生的精神，对病人狂人永远取不合作态度。这才是救国家同时救自己的简要药方。）

本篇发表于1935年6月10日《水星》第2卷第3期，署名沈从文。

一个读报者对报纸的希望

最近从一本上海出版的杂志里，我看见一篇文章，说到中国报纸行销的数目。其中几个统计且告给我们中国每天大约有多少人看报，这些人又看些什么报，看报人的意义。与某一种报纸对于他们发生什么影响。

一种报纸行销数目的多少，并不代表那个报纸在社会上的真正价值。然而一个报纸能够办的有精神，在社会上站得住脚，却一定是主持人知道从报纸本身上不断改良，力求进步的结果。不论办报人或想拥有较多读者，或想领导多数读者，办报的必需肯认真去干。（有时甚至于还须拼命傻干。）报纸办到使读者感觉得“这报纸是为我们办的，是替我们说话的”，也就差不多了。

我以为目前的报纸，达到上述的成功，还不够称理想报纸，尚必须使多数人感觉，“这报纸是能给我们勇气同希望的，是能增加我们生存信仰和忍耐的。”知道注意读者，同时也有方法来用报纸教育读者，方是好报纸。

人类最不可缺少的是“爱”。应当爱自己，爱旁人，爱正

义，爱真理，爱事业，爱社会，爱国家。正因为爱才能使人类进步，由愚蠢黑暗到智慧光明。因为爱，相伴的常是牺牲，明白爱的到应当牺牲时，自然不会吝惜牺牲。即如目前如何来教育北京市民认识一个“爱”字，就是值得办报人努力的工作。

且从小处说。我们希望北平市民知道爱艺术，要他们对于所生存的国家代表历史光荣的种种艺术品，发生爱心，就总得给他们一点明白什么是艺术的机会。如像最近福开森先生捐还中国许多东西，既捐给中国了，东西就是中国人所共有的。然而北平一百五十万市民，如今有多少人能够花一块钱进紫禁城？我问你。福开森先生在北平住了很久，必知道一块钱门票，多数人皆出不起，大学生至多花三毛，市民至多花一毛，已够费踌躇了。办报的比福开森先生更知道市民经济，明白所谓“公开展览”是什么意义。如今办事人似乎尚不曾注意到这一点。（这从开幕日不知道公开给百五十万市民，表示对艺术教育的注意，对福氏的感谢，却只知欢迎那两千官绅就可以知道。）为市民和学生设想，每礼拜天花一毛钱入文华殿的资格，是需要办报的人来为他们努力挣得的。

办报的对于教育国民，假若只能在道德上担负一点义务，并无如何法定责任。国家到这样子，如何来尽那点道德责任：消极方面想法使多数人不堕落，不消沉，积极方面如何唤起直接负责者的尽责，实在很重要，极需要。

本篇发表于1935年7月7日北平《实报》，署名沈从文。

大家快来救济水灾

从一本上海流行杂志上，我看过一篇文章，那文章是用北平素描为题材而写的。文章说："北平是中国一个特别区，是一个住下了百万人口，不问国事，不知天日，只把生活全部耗费到游乐，饮食，逛公园，听京戏，上澡堂，吃女招待，等等那么一个特别区。"看过那文章后我很生气。因为就事实说，北平学校比国内许多学校办得认真、做学问的求学的大都还诚实努力，警察，邮政，在中国皆算成绩不坏，至于公务人员差役服务的尽职，一般市民的勤苦与和平，那更不用提了。北平地方纵不值得赞美，市面纵不值得乐观，公民可不应该那么受贬责的。

不过前些日子到北海去看看，却使我保留一种印象，发生一点疑问。

久雨初晴，一伏中的闷热已消失净尽，气候犹如新秋样子。在这种情形下，礼拜六的下午，北海公园的游人，自然会多起来的。仿膳，五龙亭，漪澜堂，各处茶座上全是主顾。路上各处凳子皆有人占据。六七条渡船也一船一船装满了人。

小游船全租尽了，租船处玻璃窗上照例写着赵先生，钱二爷，孙科长，李小姐，等一串姓名，预先放下定钱，排次等候上船。小船在湖中飘荡，坐船人若为新派风雅之士，还一面弹四弦琴一面唱洋歌。雨后荷花盛开，微风挟着香掠水吹去。游人到此真可以说是很写意很写意了。我当时就想想这些人是不是每天还看报纸？若看报纸，游兴是不是还那么浓？

我们人在北平住下，不至于为一百度的闷热打倒，还能够从从容容到从前皇帝糟蹋了无数民膏民脂，耗费了无数民力造成的一个湖中划船，且有亭台楼阁可坐下喝茶谈天，幸福真是太幸福了，不过我们若日里还看看报纸，稍稍注意一下专电、要闻与地方通讯，就会明白北平的好处，是如何孤立，整个中国却在如何灾难中挣扎的。单说水，长江一度水灾刚过去，黄河水灾接着又来了。身住北平的人，倘若承认自己还是中国人，倘若明白自己与其他许多地方要活而不能活的老百姓皆为不可分离的关系，如今游园坐一回船至少得花八毛，吃一顿至少得花两元三元，要掏腰包时，也许会想到："这个钱，如何花它更有意义一些？"

如今平津许多报纸，皆开始来为南北灾民呼吁筹款了，我们将等着看看北平市民，如何当仁不让尽他们的国民义务。这事很简单，有钱花的人要花钱时，只需想一想：这个钱，如何花有意义一些？募捐的成绩必不坏。

我还希望有信用的团体，能够在公园戏院等等地方，设立些自由捐输的钱柜，让那些有人性的公民，乐于捐输时得到方便。

本篇发表于1935年北平《实报》，发表日期不详。署名沈从文。

悲观与乐观

住在北平大城里，若同什么人一提到国家大事，不管他是银行办事的，学校教书的，编报的，作律师的，以及一切从事自由职业他那工作同国家荣辱分不开的，他总会觉得前途悲观。这人负责越重，知道国家情形越详细，仿佛便更容易悲观。这悲观我们不能隐讳，不应隐讳。

不过我们若从什么饭馆戏院过身，必可看到许多人进进出出。学校到开学上课时，仍然有人缴费上课。新办的北平市公共汽车，第五路车每次开出城时，眼见到坐的人满满的。（北平市各大街的牌楼，不是也全在那儿重新油漆涂金抹红吗？）……从这些方面看来，我们又会觉得乐观的人似乎太多了。

悲观的人说的好是“忧心国事”，说的不好是“神经不大健全”。

乐观的人其所以能乐观，我以为也有两方面，一是认为徒然悲观无益，二是认为国家前途大可乐观。譬如水灾吧，它既然来了，大家就想办法，各就各人地位尽一点力，办报

的为灾民请命，大声急呼，唱戏的唱义务戏，看戏的也看义务戏，多多少少总能帮助那些站在水里爬在屋脊上的同胞一点忙，当然比徒然悲观强多了。至于匪徒捣乱分子呢，不给他机会，就无法活动。努力消除他，就会消灭。政府能合作，有办法，自然使人对未来乐观，未来事纵不可知，可以放下不提。目前一切至少能维持，目前也就有乐观理由了。

不过我们也应当明白，某种人的不悲观，也许是他毫无知识；某种人的乐观，也许是他愚妄不可救药。

我以为不论悲观乐观，最要紧的还是人人皆应当多明白一点过去。现在，未来的国家事情，凡是负责的不独自己应当知道，并且还必须让不负责的也知道。知道事情太多，结果不一定使人聪明，或者反而令人糊涂，因为糊涂，容易迷信，不错，我意思就要人迷信。

迷信就是宗教情绪的统一，它使人“简单”，比“世故”对于人类似乎还有用些。我们过去迷信鬼神，鬼神对我们便发生极大作用。如今对于鬼神之力的迷信时代已过去了，如果能够把新的迷信，集中在一种新的人事方面，信政府，信科学，信知识与技术，信组织与秩序，并不是无意义的努力。我们对于“人的能力”如发生信仰，受其催眠，为之兴奋，从小处说社会就可以支持现状，不会恶化；从大处说社会就可以产生变革，得到进步。

无迷信就少热情。一个民族缺少热情，悲观与乐观完全浮在表面上，活下去，也就是鬼混下去罢了。知识阶级能觉悟，不鬼混，中国有办法的。

本篇发表于 1935 年 9 月 15 日北平《实报》，署名沈从文。

烦　闷

烦闷来源有两方面：一是外面压力，二是个人生活。国家内忧外患逼迫，明白国势危险，不易支持，属于前者；个人生活无办法，恋爱失败，求学困难，作生意开铺子赔了本，属于后者。极端烦闷使人容易对当前社会绝望，对生存灰心，结果便是革命，绑票，卖国，发疯，堕落，自杀。

身当其冲，活在这个国家里，有血性有骨气的青年人，对当前各事难乐观，烦闷是极其自然的。或者想活不能活，或者想安分作一个人却无机会那么来作个人，于是革命，绑票，卖国，发疯，堕落，自杀，当然就多起来了。

应当怎么办？就是为烦闷找一条出路。

目前个人为烦闷找出路的方法，据我看来，读书人不外乎三五朋友说说气话，骂骂政府，或看看戏，打打牌。（再个人主义一点，也有关上房门灌两斤黄酒的。）其余官场中人商业中人呢，仍然是那一套，再加上打打台球，下盘棋，八大胡同走走，正阳楼吃两只螃蟹，大吼一阵五魁八马，也就完事了。试公公平平的想想，有多少人不是那么打发他的日子

的？试想想，大家这么挨下去，拖下去，混下去，能支持多久？我问你。

个人为烦闷找出路，活得很有意思的，另外自然也还有人，值得我们注意。譬如有些教书的，明白要国家翻个身，个人不白生一世，必需苦于一场。就善用其所长，忘我毋私的来工作。有些读书的，住小公寓，冬无火炉，夏无蚊帐，时时刻刻感到宿食两问题难解决，但他们却不怕穷，不怕饿和冷，还依然拼命低头去学，去干。还有商人，事业家，他们那种沉默的奋斗，更不待说了。

我们要提起的是在社会上各方面“负责的人”，看看他们是不是注意到这个“烦闷”病。若已注意到了，应当想什么方法来防止这个病的传染，且找出什么方法来治疗这种病。

看报载行政院褚民谊先生救水灾难民，上台唱《霸王别姬》，十分热闹。给南京多数市民娱乐的有人，给北京多数市民一点教训，为他们打打气的可没有人，想起来有点儿惨。

若说大学校长，只是校长，地方官只是官，名流只作名流，古董只玩古董，多数市民同学生，就那么挨下去，拖下去，混下去，说真话，这不成。

本篇发表于 1935 年 10 月 20 日北平《实报》，署名沈从文。

时　　间

一切存在严格的说都需要“时间”。时间证实一切，因为它改变一切。气候寒暑，草木荣枯，人从生到死，都不能缺少时间，都从时间上发生作用。

常说到“生命的意义”或“生命的价值”。其实一个人活下来真正的意义同价值，不过是占有几十个年头的时间罢了。生前世界没有他，他是无意义无价值可言的。活到不能再活死掉了，他没有生命，他自然更无意义无价值可言。

正仿佛多数人的愚昧同少数人的聪明，对生命下的结论差不多都以为是“生命的意义同价值是活个几十年”，因此都肯定生活，那么吃，喝，睡觉，吵架，恋爱，……活下来等待死，死后让棺木来装殓他，黄土来掩埋他，蛆虫来收拾他。

生命的意义解释得既如此单纯：“活下来，活着，倒下，死了”，未免太可怕了。因此次一等的聪明人，同次一等的愚人，对生命意义同价值找出第二种结论，就是“怎么样来耗费这几十个年头”。虽更肯定生活，那么吃，喝，睡觉，吵架，恋爱，……然而生活得失取舍之间，到底也就有了分歧。

这分歧是一看即明白的。大别言之，聪明人要理想生活，愚蠢人要习惯生活。聪明人以为目前并不完全好，一切应比目前更好，且竭力追求那个理想。愚蠢人对习惯完全满意，安于习惯，保护习惯。（在世俗观察上，这两种人称呼常常相反，安于习惯的被呼为聪明人，怀抱理想的人却成愚蠢家伙。）

两种人既同样有个“怎么样来耗费这几十个年头”的打算，要从人与人之间找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即或择业相同，成就却不相同。同样想征服颜色线条作画家，同样想征服乐器声音作音乐家，同样想征服木石铜牙及其他材料作雕刻家，甚至于同样想征服人身行为作帝王，同样想征服人心信仰作思想家：一切结果都不会相同。因此世界上有大诗人，同时也就有蹩脚诗人，有伟大革命家，同时也有虚伪革命家。至于两种人目的不同，择业不同，那就更容易一目了然了。

看出生命的意义同价值，原来如此如此，却想在生前死后使生命发生一点特殊意义同价值，心性绝顶聪明，为人却好像傻头傻脑，历史上的释迦，孔子，耶稣，就是这种人。这种人或出世，或入世，或革命，或复古，活下来都显得很愚蠢，死过后却显得很伟大。屈原算得这种人另外一格，历史上这种人并不多，可是间或有一个两个，就很像样子了。这种人自然也只能活个几十年，可是他的观念，他的意见，他的风度，他的文章，却可以活在人类记忆中几千年。一切人生命都有个时间限制，这种人的生命又似乎不大受这种限制。

话说回来，事事物物要时间证明，可是时间本身却是个极其抽象的东西。从无一个人说得明白时间是个什么样子。

“时间”并不单独存在。时间无形，无声，无色，无臭。要说明时间的存在，还得回头从事事物物去取证。从日月来去，从草木荣枯，从生命存亡找证据。正因为事事物物都可为时间作注解，时间本身反而被人疏忽了。所以多数人提问到生命的意义同价值时，没有一个人敢说“生命意义同价值，只是一堆时间。”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是一个真正明白生命意义同价值的人所说的话。老先生说这话时心中很寂寞！能说这话的是个伟人，能理解这话的也不是个凡人。目前的活人，大家都记着这两句话，却只有那些从日光下牵入牢狱，或从牢狱中牵上刑场的倾心理想的人，最了解这两句话的意义。因为说这话的人生命的耗费，同懂这话的人生命的耗费，异途同归，完全是为事实皱眉，却胆敢对理想倾心。

他们的方法不同，他们的时代不同，他们的环境不同，他们的遭遇也不同，相同的他们的心，同样为人类而跳跃。

本篇发表于 1935 年 10 月 28 日《大公报·文艺》第 33 期，署名炯之。

青年运动

一般人对于自然界的能力和变动，容易发生“迷信”，对于历史上的哲人英雄言行，容易发生“信仰”。迷信或信仰，在人类文化史上都大有用处。如统治一个国家和民族，如因宗教而产生的人生观，以及种种伟大艺术品，就全得迷信和信仰。然而迷信与信仰同时也极妨碍人类进步和社会的改良，它们固然产生某种文化与文明，却常常妨碍另外一个更新的文化与文明出现。从科学研究看，从社会组织看，差不多全是这个样子。

思想解放的问题，就是个人对于旧迷信旧信仰的束缚，想法解除，对过去当前未来一切，能重新思索，重新估价，否认或承认的问题。对一切加以惑疑，思维追究，不受任何拘束，惟以理性批判是非，选择取舍。换言之，就是思想自由。

这种思想解放运动的要求，青年人和老年人照例观点不同，即在青年人中，多数人和少数人照例也不相同。譬如晚清时代，多数老年人作八股文，写白摺大卷，考秀才，廪生，拔贡，举人……。多数青年人也只倾心于成名士，偶佳人，

理想中的模范人物是白脸长身弱不禁风《西厢记》中的张君瑞，《今古奇观》中的唐伯虎。少数人却以为那不成，青年人想自救必先自觉，因此有“新学”，也就有“革命”伴着种种改革与一切牺牲，产生了一个民国。过了将近十年，军阀与军阀混战，官僚与政客胡闹，多数老年人全视为命运注定，消极的只知念佛吃斋，积极的就参加胡闹。多数青年人呢，无书可读，无事可作，便只是唉声叹气过日子，少数人却又以为那不成，还得想办法，因此有“新青年”运动，接着来了“五四”，那个文学革命运动，思想解放运动，相继而起，且推动了中国革命，终于北伐成功，重造一个崭新的中国。

现在去“新学”运动已有了三十多年，去“新青年”运动已有了十六年，国家的情形如此如此，多数人也如此如此，少数有知识的青年人，觉得不能如此如此，且以为将来自然会有个不同当前的如此如此。于是青年运动，又抬了头。

欧洲人常说中华民族是个富于“迷信”的民族，真个如此，倒值得吾人乐观，因为旧的迷信若能使一个民族堕落，新的迷信也就可以使一个民族振兴。中国太需要“迷信”了，太需要一种新的迷信了。当前的青年运动，我们不妨把它看作一种“新的迷信”建设运动，一种求民族和个人的健康的运动。它目前也许没有什么好处，甚至于在某时某地反可以增加一点纠纷，引起一点麻烦。但我们应当明白它本身却实在无什么“罪过”。若把它当成罪过，一味加以摧残，这是另外一种因袭迷信作祟。若不把它当成罪过，好好的运用它，便成为一种国家新生的原动力。

本篇发表于1935年12月29日北平《实报》，署名沈从文。

沉　默

读完一堆从各处寄来的新刊物后，仿佛看完了一场戏，留下种热闹和寂寞混和的感觉。

我沉默了两年。这沉默显得近于有点自弃，有点衰老。是的。古人说："玩物丧志"，两年来我似乎就在用某种癖好系住自己。我的癖好近于压制性灵的碇石，铰残理想的剪子。需要它，我才能够贴近地面，不至于转人虚无。我们平时见什么作家搁笔略久时，必以为"这人笔下枯窘，因为心头业已一无所有。"我这枝笔一搁下就是两年。我并不枯窘。泉水潜伏在地底流动，炉火闷在灰里燃烧，我不过不曾继续用它到那个固有工作上罢了。一个人想证明他的存在，有两个方法：其一从事功上由另一人承认而证明；其一从内省上由自己感觉而证明。我用的是第二种方法。我走了一条近于一般中年人生活内敛以后所走的僻路。寂寞一点，冷落一点，然而同别人一样是"生存"。或者这种生存从别人看来叫作"落后"，那无关系。两千年前的庄周，仿佛比当时多少人都落后一点。那些人早死尽了，到如今，你和我读《秋水》《马蹄》

时，仿佛面前还站有那个落后的人。

我不写作，却在思索写作对于我们生命的意义。我想起三千年来许多人，想起这些人如何使用他那一只手。有些人经过一千年三千年那只手还俨然有力量能揪住多数人的神经或感情，屈抑它，松弛它，绷紧它，完全是一只魔手。每个人都是同样的一只手，五个指头，尖端缀一枚覆棋形的淡红色指甲，关节处有一些微涡和小皱，背面还萦绕着一点隐伏在皮肤下的青色筋络。然而有些人的手却似乎特有魔力。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手变成一只魔手？是不是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把自己一只手成为光荣的手？

我知道我们的手，不过是人类一颗心走向另一颗心的一道桥梁。作成这桥梁取材不一，也可以用金玉木石（建筑或雕刻），也可以用颜色（绘画），也可以用文字，用各种不同的文字。也可以单纯进取，譬如说，当你同一个青年女子在一处，相互用沉默和微笑代替语言犹有所不足时，它的小小活动就能够使一颗心更靠近一颗心。既然是一道桥梁，借此通过的自然就贵贱不一。将军凯旋由此通过，小贩贸易也由此通过。既有人用它雕凿大同的石窟，和阗的碧玉，也就有人用它编织芦席，削刮小挖耳子。故宫所藏宋人的《雪山图》、《洞天山堂》等等伟大画幅，是用手作成的，上海四马路小弄堂转角处叫卖的小画儿，也是用手作成的。《史记》是一个人写的，《肉蒲团》[①]也是一个人写的。既然是一道桥梁，通过的当然有各种各色的人性，道德可以通过，罪恶也无从拒绝。

提起道德和罪恶，使我感到一点迷惑。我不注意我这只手是否能够拒绝罪恶，倒是对于罪恶或道德两个名词想仔细

把它弄清楚些。平时对于这两个名词显得异常关心的人，照例却是不甚追究这两个名词意义的人。我们想认识它；如制造糕饼人认识糕饼，到具体认识它的无固定性时，这两个名词在我们个人生活上，实已等于消灭无多意义了。人人都说艺术应当有一个道德的要求，这观念假定容许它存在，创作最低的效果是给自己与他人以人性交流的满足，由满足而感觉愉快，这效果的获得，可以说是道德的。造一点小小谣言，诗张为幻，通常认为不道德，然而倘若它也能给某种人以满足，也间或被一些人当作“战略”，看来又好像是道德的了。道德既随人随事而有变，它即或与罪恶是两个名词，事实上就无时不可以对调或混淆。一个牧师对于道德有特殊敏感，为道德的理由，终日手持一本《圣经》，到同夫人豁勃，这豁勃且起源于两人生理上某种缺陷时，对于他最道德的书，倒是一本讨论关于两性心理如何调整的书。一个律师对于道德有它一定的看法，当家中孩子被沸水烫伤时，对于他最道德的书，倒是一本新旧合刊的丹方大全。若说道德邻于人类向上的需要，有人需要一本《圣经》，有人需要一本《太上感应篇》，他，我的一个密友，却需要我写一封甜蜜蜜充满了温情与一点轻微忧郁的来信。因为他等待着这个信，我知道！如说多数需要是道德的，事实上多数需要的却照例是一个作家所不能给的。大多数伟大作品，是因为它“存在”，成为多数需要。并不是因为多数需要，它因之“产生”。我的手是来写一本《圣经》，一本《太上感应篇》，还是好好的回我那个朋友一封信？很明显的是我可以在三者之间随意选择。我在选择。但当我能够下笔时，我一定已经忘掉了道德和罪恶，也同时忘了那个多数。

我始终不了解一个作者把“作品”与为“多数”连缀起来，努力使作品庸陋，雷同，无个性，无特性，却又希望它长久存在，以为它能够长久存在，这一个观念如何能够成立。溪面群飞的蜻蜓够多了，倘若有那么一匹小生物，倦于骚扰，独自休息在一个岩石上或一片芦叶上，这休息，且是准备着一种更有意义的振翅，这休息不十分坏。我想，沉默两年不是一段长久的时间，若果事情能照我愿意作的作去，我还必需把这分沉默延长。

这也许近于逃遁，一种对于多数骚扰的逃遁。人到底比蜻蜓不同，生活复杂得多，神经发达得多。也必然有反应，被刺激过后的反应。也必然有直觉，基于动物求生的直觉。但自然既使人脑子进化得特别大，好像就是要人凡事多想一想，许可人向深处走，向远处走，向高处走。思索是人的权利，也是人其所能生存能进步的工具。什么人自愿抛弃这种权利，那是个人的自由，正如一个酒徒用剧烈酒精燃烧自己的血液，是酒徒的自由。可是如果他放下了那个生存进步的工具，以为用另外一种简单方式可以生存，尤其是一个作者，一个企图用手作成桥梁，通过一个理想，希望作品存在，与肉体脱离而独立存在，与事实似乎不合。自杀不是求生的方式，谐俗也不是求生的方式。作品能存在，仰赖读者，然对读者在乎启发，不在乎媚悦。通俗作品够在读者间存在的事实正多，然通俗与庸俗却又稍稍不同。无思索的一唱百和，内容与外形的一致摹仿，不可避免必陷于庸俗。庸俗既不能增人气力，也不能益人智慧。在行为上一个人若带着教训神气向旁人说：人应当用手足同时走路，因为它合乎大多数的动物本性或习惯。说这种话的人，很少不被人当作疯子。然

而在文学创作上，类似的教训对作家却居然大有影响。原因单纯，就是大多数人知道要出路，不知道要脑子。随波逐流容易见好，独立逆风需要气力。

我觉得我应当努力来写一本《圣经》了，这经典的完成，不在增加多数人对于天国的迷信，却在说明人力的可信。使一些有志从事写作者，对于作品之生长，多有一分知识。希望个人作品成为推进历史的工具，这工具必需如何造作，方能结实牢靠，像一个理想的工具。我预备那么写下去，第一件事每个作家先得有一个能客观看世界的脑子。可是当我想起是不是这世界每个人都自愿有一个脑子，都觉得必需有个脑子时，我依然把笔搁下了。人间广泛，万汇难齐。沮洳是水作成的，江河也是水作成的；橘柚宜于南国，枣梨生长北方，万物各适其性，各有其宜，应沉默处得沉默，古人名为顺天体道。

十月八日北平

本篇发表于1936年11月1日《文季月刊》第1卷第6期，署名沈从文。

①《肉蒲团》　又名《觉后禅》，共六卷二十回，旧刻本题“情痴反正道人编次”，别题“情隐先生编次”，卷首有西陵如如居士序。刘廷玑《在园杂志》谓系李渔所撰。

文学作家中的胖子

记得几年前，曾有人作过一篇文章，提起一个很有趣味的问题，法国作家有很多胖子。那文章虽不曾说出作家其所以发胖的原因，可是我们若明白法国是出产好酒的国家，大多数法国人每天用饭时都得喝一杯葡萄酒，便是侍候上帝的牧师，料理家务的主妇，以及十岁左右的小孩子，也有用酒当作饮料的习惯，啃糟啜醨的结果，当然血脉宽舒，脂肪积累，因此随意走到什么作家团体里去，或翻开插图本的文学史，到处发现胖子，也就不怎么希奇了。

可是古怪，当前中国的作家，竟也有好一群这种人物。按照中国情形，这些可敬可爱的作家，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起居生活，都不应当那么很早就发福的。能够这样一定各有它的原因。我这篇小文，注重在向读者说一说我所知道作家中那种各有个性的胖处，个人交游极少，所知不多，所以不全不备，势不可免。至于那个内在的原因，还想暂时保留，且待另外一时再谈。

一个发福的人在你面前站定或走过身时，那相貌富富态

态，走路四平八稳，不由得你不联想起三十年前的“候补道”，二十年前的“国会议员”，以及当前的“洋行买办”。所不同的是：你若知道他是一个作家时，照例会给你一点轻微的压迫，同时也带来一点轻快的幽默。他即或不大欢喜你，你可无理由不欢喜他。我这小文也就在这种情绪中写成的。措词间或有些地方不很庄重得罪朋友处，倒希望这小文另外一部分给它的愉快处能够抵补。

“中国作家和法国作家相同——同样的胖。”

写到上面的徘句，我们就方便不妨先来试数一数研究法国文学的人物，有那几位是胖子。赵少侯、李青崖两教授，体魄健壮是许多大学生所习知的。我们都知道李青崖先生翻译了法国作家莫泊桑的全集，可不知欢喜法朗士作品的赵少侯先生，却翻译了莫泊桑或大仲马的相貌。李健吾先生是研究法国福楼拜的专家，本是个白面书生，在北平初期话剧运动中，还上台乔装过新派女人。自从出国又回国后，对于法国文字的嗜好不足为奇，对于法国作家的身体也似乎存心摹仿，一面准备译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一面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此外还有个马宗融先生，目前的成就，似乎“物质”多于“精神”，将来的成就，大约也是将在文学上和品貌上平分其收获的。还有个叶麐先生，如果他愿意放下了那个“吟成一个字，拈断数茎髭”的苦吟工作，不耗损体力于填词作赋，一定的，两年内就会“转变”成为一个规模可观的人物。穆木天先生也是胖子，不过那派头却近于日本款式。正相反，高滔先生治的虽是英文，头发却是法国派。

有人在某种刊物上说：北大教授梁实秋先生像个“老板”；以为教书神气像，划拳神气更像。穿的衣服本来和别人

用的材料差不多，到他身上好像就光亮不同，说的话本来和别人是同一问题，到他口上好像就意义不同。这种描写当然不大确实。梁先生原籍虽是浙江，其实北京人的成分倒比较重。饮酒食肉的洪量不必说，只看看他译莎氏比亚可以知道。北方人照例是爽直而坦白的，梁先生译莎氏比亚戏剧用的就是这种可爱态度。因为剧本是韵文，不易译，译来又不易懂，梁先生就爽直坦白的用普通语体文译它。此外论诗也仿佛是一个北京人，“明白易懂”是他认为理想的好诗。

新月社有两位胖子作家，其一是梁实秋先生，另一位是潘光旦先生。我们为认识方便起见，如把胖子略加分类，不以为亵渎，潘光旦先生似乎宜与《天问》作者陈铨先生放在一处。两人一眼看去都有流线型意味，所谓“拉飞尔画派”的人物，好像上帝有意用圆规打样作成的。一个有眼睛的雕塑家对之必特别关心，因为这种类似雕塑品，毫无可疑，是近代化的主妇小宝宝卧房中最理想的恩物，幼稚园健身室最美丽的装饰品。陈先生治德国文学极认真，写小说极天真；因此小说也特别宜于天真一点的人读。

过去一时好像有一个青年女子，曾把赵景深先生认作李青崖先生的亲属，小小误会留下一段佳话。因为两人本有一个共通点，都胖。两人年龄一眼看去又约略相差二十来岁，在一个很多情的青年女子眼中，小误会也极其自然！其实赵先生和那一位声明“文坛下野”的作家曾今可先生，某一时倒像一对孪生兄弟。身材风度都差不多，书纵读得再多，书卷气是隐伏的，不外露的。作人诚实而温和，面貌向人保证“有话很好商量”的神气。据相书说这种人是主衣禄，有酒食，而且能得贤“内助”的。不幸近代人已失去了相书的信

仰，择业各凭兴趣和机会，因此赵先生不能成为金融界巨子，却作了北新书局的总编辑。

我们通常觉得富于感情的文人，必然是身个儿瘦瘦的，脸子白白的。这种不正确的想象被我现在所引的例子全毁了。凡读过《青的花》的女孩子，会以为章靳以先生既是个温存而善怀的人，必然脆弱衰老，一天默默的低头坐在书桌边，一切人生趣味都淡淡的。事实上这人却是个挺漂亮的小胖子。皮肤红，眼睛光，肩背圆，最容易给人好感的。

在鲁迅先生的笔锋下，有个作家被形容得很深刻，留在一般人印象中，他那一只皮包和身体全是胖胖的。这是张资平先生。这种日本款式的胖子，其实另外还有两个人：其一是自己写的小说并不怎么多，却写过一本《小说作法》，自己并不常写诗，却写过一本《新诗作法》的孙俍工先生。其一是教新闻学，编日本文学史的谢六逸先生。

《中学生》的编辑叶绍钧先生，年来也渐渐的发了福，大约再过两三年就可以和他的亲家夏丏尊先生对照了。两人身体壮健程度日益相近，两人共同编辑的书籍，意见或者也更容易接近了。作编辑的事业若不过忙，原本就容易变成胖子。不过也有例外。良友文学丛书的编辑赵家璧先生，虽然事务极忙，并且每礼拜还得坐火车来回向松江跑，似乎只因为办事处，太邻近酒馆茶室，居然也渐渐成了小胖子。

有个作家照身分说仿佛应当是挺拔清癯而雅洁的，我说的是唱曲，作曲，教曲的卢冀野先生。卢先生的事功和体气有点显得矛盾，显得不相称。在去真茹大西路等等公共汽车上，我们若见到一个脸红红的二号胖子，挟着一个收房租人的公事包，见他忽然从那皮包里掏出一个文件，低头轻轻的

哼起来时，尽管大胆冒昧叫他一声“卢先生”，准没有错。卢先生的珍本书藏在皮包里，专门知识潜伏在皮肤里。

朋友某君自以为善于猜谜射覆，能从各方面知道一个不曾见过面的人性情相貌，到我住处谈天，说起许多作家的故事。我身边恰有一本《苦果》，我就要他估想这书作者是个什么样子的人物。他看了看那本书面《苦果》两个字，皱了眉儿不说话。到后却说，“这容易看，一定和《赵子曰》作者老舍面貌不同!”我说，“这倒被你说中了，只是太笼统了一点。你且先说一说老舍是个什么样子。”这朋友就为我开了一张老舍的相貌表：“中等胖子，嘴儿不大不小。穿一身半新不旧的洋服，戴一幅黑胶边近视眼镜。料理家务极精明，各事弄得有条有理。作事很负责，欢喜看点艺术杂志。向人说话时循循儒雅，异常厚道，并不怎么幽默；但嘴角眼梢，却依稀流露出一点幽默味儿。能喝一杯，却不常划拳。”我又要他描写一下《苦果》作者罗皑岚先生的样子，于是他又为我画了一张罗先生的速写相。末了教我好笑，因为所说的真是恰到好处，但必需两人把姓名书名对调。原来朋友理想中的老舍，恰是事实上的罗皑岚。

剧戏家似乎和许多事业家差不多，领袖群伦大多数是个胖子。久住北方的熊佛西先生，公开讲演比他的演剧次数多，每次讲演时，相貌神气，给人的印象，又比所讲的问题深刻。那理由，就是他胖得古怪。洪深先生是高面大的胖子，精力绝伦，所以几年来各处教书，上海，青岛，广东全跑到了。编制或导演电影，一年可成六部。这成绩在中国似乎不足为奇，若比之于美国的卓别麟辈，三年五年方完成一部作品，就显得令人可惊了。欧阳予倩先生，串演平剧时代，风标隽

美，夙有南方梅兰芳之名。年来梅兰芳已发胖，欧阳先生依然可称为南方梅兰芳，不过不常演戏罢了。余上沅先生，自从一到南京作戏剧专门学校校长后，宴会（不得已的应酬）时间或较多于编戏演戏时间，平时身体既好，酒量也好，如此一来，“理论”上已经是一个胖子。在中旅剧团担任一时导演的陈绵先生，据说为这种导演事，自己很花了些钱，其为艺术尽力处，虽瘦了荷包，我们知道许多瘦了荷包的事，精神上某部分是应当胖了一些的。

我们都知道“伟大”在文学家可作两种解释，前者邻于肥壮，后者指其文学成就之不可及。李长之先生在昔曾称杨丙辰先生为“伟大”，人无间言；不过李先生意思当然是用第二种解释，一般人留下的印象，大约却是第一种伟大！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异途同归，伟大则一也。

有个作家在许多人心目中都认为应当是个胖子，这作家就是老舍先生。老舍是不相识者理想中的胖子，丁玲却是女作家中事实上的胖子。

十二月四日

本篇发表于1937年1月1日《宇宙风》第32期新年特刊。署名上官碧。

怎样从抗战中训练自己

怎样从抗战中训练自己

ZENYANG CONG KANGZHANZHONG XUNLIAN ZIJI

本集为新编，集名系用本集一作品名，收作者1938年2月～1945年5月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杂文13篇。

怎样从抗战中训练自己

——给沅州一个失学的青年

子厚先生：

得见来信，十分感谢。沅州是我十年前住过的地方，街道和房屋，桥和塔，树和水，给我印象都很好。尤其是几个前辈先生，一分温厚的友谊，值得记忆。我有很多日子，携带小篾篮，篮中放个长方形的木戳记，大清早就各处走去，我那时的职务是查验城里城外屠户当天宰杀的猪羊数目。我很满意这份职务。因为它使我注意社会一部门生活，认识得相当透彻，（现在若轮派到我时，一定还依然很高兴的去服务。）每到黄昏左右，我按时到监狱署狱中去收封，查点寄押在牢的无辜乡下人。土匪来围城时，便随同团总龙胖老爷半夜里到各处去查街。大饥荒年程①，还亲眼见过万千逃难来城的穷人，随处倒毙在大街小巷间！……这就是我所受的教育。很好的一种教育！若照你所说，目前我是有了成就的，这点点成就，与我在沅州的生活，实在不可分开。我很希望你有机会再来沅州看看。

因战事延长，扩大，沅州地方近来似乎热闹重要起来了。

地方上有心人一面感于国难严重，一面感于地方蔽塞，自然都想从好处作点事。对于推行兵役，增加抗敌力量问题，皆抱有同一感想，认为后方民气，还待发扬，兵役制度无疵，办法则有待改良。对有些事情，常不满意，想多作点事，又感觉棘手。其中比较认识深刻的，自以为这是教育不良的结果，比较看法操切的，自以为这是社会组织不健全的结果。其用意求好相同，看法或不尽相同。看法不同，内容或因之产生意见和党派，一地方如此，全国何尝不是如此？政治有如此现象，文学运动何尝不有如此现象？虽不能影响到统一，至少在抗敌上就不能将全民力量全都发出。这事从坏处看，很容易令人悲观，从好处看，却值得乐观。国家的将来，是要交给青年人来支持的，青年人只要肯作事，作事时又能吃苦，耐劳，负责，永不灰心，国家和个人，都有个好前途可望。人事上有坏处，只要我们明白，想要他好，总可以设法弄好。我试举个小小例子。我最近和一个朋友到沅陵县参观过一所女乡师附设的幼稚园，听办事人说，每月经费只二十七元几角，还常常有欠薪。以这么一笔费子，他们却能把学校办得很有条理，招收百来个小朋友读书。学校因为太穷，开学时无法用工人粉刷墙壁，一个图画教员，就亲自动手去作壁上装饰画。有学兵想借他们一部分校舍住，他们就搬出桌子在天井中上课。参观过后实在令人感动。这现象就证明中国大有希望，纵战败也不会屈服，纵再穷苦也还能进行拟定进行的种种计划，纵社会十分黑暗，也会慢慢转人光明。这光明种子，若说驻防沅陵的一二八师抗敌负伤归来的将士，伤未痊愈即再赴前线的情形说来，益发增加吾人信仰。

所以我觉得目前的我们，按原则说不宜悲观，照事实看

还必需乐观。我们应当相信，中国青年是能够重造中国的。我们若诚心想把国家弄好，敌人任何猛烈炮火，都压制不住这点民族前进的意志。若我们单看坏处，一味悲观，且以为国家业已如此如此，毫无办法，自己就那么拖拖混混的活下去。作事时则虚张声势，有利益则拚命争夺，每人都挂上十来个名义，究其实一事不干，那就像锅中煮粥，同归糜烂罢了。青年失学的多，这我知道，如今正值政府将教育与战事，学与军，合而为一的时节，失学的若不能再像先前那么读书，我以为应当考入各种军事学校去准备杀敌。如体力性能不适宜入军校，且应当自己教育自己，不拘在什么团体服务，都得要一股热忱，把自己训练得强悍、结实、沉着、而勇于求知服务，更紧要的是忍受打击，不失望，不因之转而堕落。社会要进步，一切进步都包含在这种努力条件中！

专此复颂大安。

二月十五日

本篇发表于 1938 年 2 月 23 日《抗战日报》，署名沈从文。

① 年程　疑为“年成”之误。

给青年朋友

本省[1]今年的集中军训，旧历中秋就告结束。这次集训留给多数人一个不良印象，实在无可讳言。失败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对负责方面言，不如过去平沪集训之有计划，有办法，一起始就看得出。对受训学生言，把集训当成照例的故事也有关系。我是个吃过军营饭的人，深受人伍训练严格的益处，明白它意义的重大，所以想把失败责任的一部分，放在青年朋友对于军训态度上。大家由于过去对军训的态度，只把它当成一种“大学生受委屈的义务”，从不把它当成“作国民的义务”，这种轻军训的态度，就可以使集训陷于无可避免的失败。大家都以为战争是粗人的职业，有团长、营长、班长、兵士去负责，在大社会分工合作意义上，大学生另有大学生的职务。因此在受这种特殊教育时，不仅仅是没精打采，十分勉强，并且许多还在有形无形之间加以反抗。这只要各人想想，平时对于校中军训的规避与嫌恶，就可明白。这种态度的形成，和过去中国政治状况自然极有关系。中国是个雇佣兵制度的国家，吃粮是某一种人的求生方法，并不

是全体国民求生的方法。吴大帅[2]有他自己的部队，张大帅也有他自己的部队，或以人为单位，或以省为单位，他们闹意见时，就发生战争。若就过去二十年种种内战来考察，打仗的确不是大学生所应作的事。亏得大学生不参加，少作无谓的牺牲，间接为国家保存了些元气。（大学生本来的用处，是能够从学校中学得若干普通知识，弄明白某种专门知识的路径，到毕业后，看机会和能力，或升学，或教书，或转入相当机关服务。国家若有组织，政治上了轨道，大学生的出路必然如此。）中国近数年来在建设方面，经济方面，以及各部门学问，如考古和地质，……有点成绩拿得出手，都可说是大学生能在分内尽职的结果。可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对于国家应负的责任，是视需要随时变迁的。即如说“战争”，过去军阀时代的争夺内哄，我们处于一个旁观者情形下，不合作，不过问，事办得到。现在如果有什么人，还想凭借武力来推翻当前政府，我们就不会坐视国家统一的破裂，甘心重新陷入割据混乱的局面，为维持安定和统一，对于内战我们必会极力想法避免。到无可避免时，也要想方设法直接间接来制止它，消灭它。至于战争若系完全对外，对方又是一个凶狠横蛮的民族，五十年来处心积虑，用尽各种鬼蜮伎俩，豪夺巧取，侵略我领土，削弱我民族生存能力，想慢慢毁灭我整个中国整个中华民族，我们因图自卫自存而战，这战争，当然人人有分！

现在这种战争已继续了一年，在为中华民族自卫自存目的下作勇敢光荣牺牲的，伤亡已将近百万人，参加战争的，动员不下三百万人，因战争影响，死亡流离的，不止两千万人。在战场的后方，每天必有一百架两百架敌人飞机，载了

上百吨炸弹，到处随意轰炸，大学校被毁去的约三十校。在我阵地上，还每日有数百吨极猛烈的和有毒气的炸弹炸裂，多少人在这种光景下挣扎拼命！试想想看，这是一幅如何凄惨、壮烈的图画！凡稍有血性，不愿自外于中国国民的青年，都必然会明白这战争的意义如何严重，如何与过去内战不同，如何需要把自己力量加到上面去，方能抵抗强敌，免于战败后作亡国奴！大学生知识比一般国民都高得多，对于这次战争的意义也应当认识得更深刻。近代战争重要在“技术运用”，新兵器和新战术，两点都离不了“人”，必需人在一单位上能尽职，在一群中又能协作，方可望产生良好效果。使人人能在极有条理秩序情形中尽职守分，唯一的方法就是训练，一种极端严格的训练。大学生在平时固然是个“特殊阶级”，在战时却只是一个“国民”。军训的目的，即或不是这时要大学生参加战争，至少也是希望国民在这种教育上，明白战争是怎么回事，有所准备，到需要时，还得照学生所习熟的一句话“迎上前去”卫国守土。

本期集训之初，即发生“训练不合法，待遇太差”的纠纷，所谓不合法，是大学生不宜再受人伍士兵教育，所谓待遇太差，不过是住得稍坏吃得稍坏罢了。青年朋友以为人伍训练便近于受侮辱，待遇差更近于受虐待，纠纷的起因如此，理由如此。到后负责者方法变更，纪律一马虎，青年朋友装病告假人数之多，用说谎取得自由，以及滥用自由，得自由时俨然一个流浪汉的所作所为，说来就不免令人痛心。天真烂漫固然是难得的可爱处，但许多人若到了年龄就应当思索个人与国家，生存方法与生存意义时节，还俨然天真烂漫，无所事事，不知自爱，不知自重，不以说谎为羞，不以懒惰

为耻，不以糊糊涂涂拖拖混混为可怕，把读书也当成家庭和学校派定的义务，不认为是自己的权利，这种人的生存，实在可怜。不肯受初级训练还可说是反抗心和自尊心的表现，到无人麻烦时，自己还是不会振作自己，这就难言了。在集训期间，正义路上随时都可以遇着一些神气萎萎琐琐，走路懒懒散散，或者有时且同一只松鼠一样，一面走路一面从容不迫咀嚼瓜子松仁的学生。一见到这种青年朋友迎面走来，总给人留下一个痛苦印象。再到什么宿舍去走走，卧房中的杂乱无章，以及三三五五同学兴趣集中所在，吵吵闹闹，和必需知识，相去多远。令人感到时间之浪费，如何骇人！大学生对于将来的建国责任特别重大，这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学生吗？这是受军训的学生吗？这些人究竟是为什么活到地面上？不特他人难于理解，他自己也像不大明白。

这些事看来很小，其实却异常重大。因为从种种现象中，我们可以明白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一部分大学生，活下来实在不知为什么活。对生存竟像是毫无目的可言。行为是呆呆的，脑子是木木的。既少严肃，也不活泼。任何好书都不能扩大他的想象，淘深他的感情。任何严重事实也不能刺激他的神经，兴奋他的正义感。归究说来，这些人活下来传世诀，竟仅有一个混字，考学校时混及格，入学校后混毕业，出了学校到社会上讨生活，还是混。自发进取心毫无，对国家改造的雄心与大愿更极端缺乏。唯一见出他还像一个活人，还在活还想活，不是求生技巧的进步，倒只是环境有点混不下去时，如何觳觫惶恐怕死逃生！然而这种怕死的情形，却正反映出这种人如何愚蠢与无知！我们都知道关心前线的阵地转移，可疏忽了后方的萎靡堕落。这不成！如果军

训人伍教育受得好，或另外能从书本上稍稍输入一点作人教育，就不至于有当前这个现象了。

不过话说回来，这种可悲现象虽存在，也可说是“少数人”的事，是“过去”的事。另外多数大学生过去埋头苦干的精神，以及希望将来把知识和能力献给国家的精神，仍然是到处可见。如本市昆华师范学校被炸时，许多学生和某某教授对于救助伤者的种种勇敢精神和行为，实在使人敬佩。如今战事还在继续延长扩大，国家遭遇的困难越来越多，个人所处的环境也越来越紧张，前方和后方对战争意义虽不同，态度却需要相同，最低限度是不气馁，各尽其责来坚忍支持，死亡不幸分派到头上时，沉默死去，死亡还不近身时，有一口气，就得打起精神好好的来作一个活人！联大学生大多数是由陷落过的平津京沪各地来的优秀分子，几个地方的学生，平时以领导全国青年运动著闻，活动是常态，消沉反是变态。这时节青年朋友可做的事情正多，即或不能向社会有何主张，至少在同学中造成一种崭新风气。纵不能上前方向敌人作战，还可在学校中向“懦怯”、“颓废”、“萎靡不振”以及种种充满于一部分学生心目中的不良态度消极观念而战。青年朋友不是都觉得人伍训练早已完成，训练的反复近于侮辱？入营后住的坏吃的坏是受虐待？我们若能够把受过人伍训练以后，还缺少军人勇敢沉毅的风度，视为更大侮辱，把住的好，吃的饱，活下来无所为无所谓视为更难忍受的虐待，若人人都能律已自重，都具有“天下为己任”的仁爱雄强作人精神，都肯改造自己，在某种生活态度上简朴单纯，爱秩序，守纪律，完全如一个大兵，明日的一切情形会与现状不同许多。我盼望有这种青年朋友，且相信有这种青年朋友，从本身起

始来努力，作一个人，作一个中国当前所需要的国民。先在生活态度上，建立一个标准，一种模范，由此出发，再说爱国，救国，建国。

本篇发表于1938年11月15日《新动向》第1卷第10期，署名沈从文。

① 本省　指云南省。

② 吴大帅　指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下文的“张大帅”，指北洋奉系军阀张作霖。

一种态度

近十多年在各种刊物上最常见的是“民族精神”字样。今年又为“精神动员”。就常理说，所要准备动员的“精神”，应当就是先前一时谈及的那个“民族精神”。可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时间上有连续性，在历史上起大作用，在当前抗战明日建国两件事上且具有种种可能发挥的伟大力量，是些什么？说到它的却似乎并不多。因此民族精神这个名词，转成坚实勤俭行为，表现上好像极具体，实在很空泛。固有“精神”有些什么东西，值得发扬，恢复，光大，倒不曾提及。谈什么东西文化的，也照例抛下这个名词，不作诠注。仿佛大家都已常常提起，大家就应当早知道了。凡知道了的自然不用再说，可是看看各方面论客的持论，便可知这名词意义十分暧昧。解释民族精神伟大处较好的，还让冯友兰先生最近在《新动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那文章题名《赞中华》[①]。就中说起中国伟大，实建筑在儒墨道诸家思想熏陶启迪上。中国人有儒家的严肃，墨家的朴实，道家的潇洒，表现人生态度或“有所为”，或“满不在乎”，所以民族永远不会灭亡。

并以为两年来的抗战，军事上虽败北崩溃，政治上反而越打越进步，处处见出新机，就显明表现这伟大民族精神，如何值得重视，且因它的存在，值得乐观。冯先生话说得很好。从全面看，中华民族在儒墨道诸家思想涵育中有个光辉灿烂的明日，自不待言！惟部分观察，似乎就有点不同。我意思是我们倘若肯具体一点，试从二十五岁到五十岁左右某一部分留在后方的知识分子来观察，看看这些人于中国古代伟大思想，究竟受有多少影响？所得的结论，我们会在好感方面不免失望。我们会发现原来儒家的“刚勇有为”态度，墨家的“朴实热忱”态度，道家的“超脱潇洒”态度虽涵育于一般人中，影响于“读书人”却不怎么多。“读书人”是个通泛名词，我这里想借用它专指现在教书读书的一部分人。这些读书人知识虽异常丰富，常因近代教育制度或社会组织，知识仅仅变成一种“求食”的工具，并不能作为“做人”的张本。“严肃”用于门户之见，与信心坚固无关。“潇洒”近似对事马虎，与思想解放无关。真影响他们支配他们爱憎取予的，差不多总是一个小小团体，一群数目不多的朋友，三五同事，七八同学，十来本书。（团结他们的有时还是一桌麻雀牌！）若说前人受家族制度拘束，现在可说受生活团体拘束。因为生活范围小，所以个人兴趣窄，公众精神和服务情感即不大发达。儒家最美丽的认真为公精神，在读书人中且有日趋萎缩之势。好些名分上应属于“公”的，这些人作起来更容易假公济“私”。这类事大致随处都可耳闻目睹，也用不着多提了。至于因老庄思想而来的满不在乎好处，读书人不免受日常吃喝起居习惯限制，看不出什么超脱飞扬意趣，易发现的，倒反是容易把生活观念粘滞在人我小小琐碎得失上，

施展不开。不特行为矜持拘泥，装模作样，即想象表现于文字语言时，亦无不显得非常贫薄无味。凡此种种，多属眼前事实。社会组织与生活方式，形成这部分知识分子普遍的弱点。蕴藏于内表现于外则毫无生气，则乌烟瘴气。所以我们若承认儒墨道哲学思想，刚勇、朴实、超脱，与这个民族光辉不可分，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当前读书人中正如何缺少这种优美德性。因缺这种优美德性，所产生的病态，实在相当严重。大家应当就见得到想得起的事情从小处努力，尽可能来谋改善。假若拿笔的朋友还相信文学艺术在社会上有一点力量，新的文学艺术便可从这方面下手，表现出一个综合的新的理想，新的生存态度。这种文学艺术，即或无关于当前抗战，然而大有助于明日“建国”。有心人应当承认用这种态度来写作，似迂腐，实健康。虽易触恼当前男的女的村的俏的少数读书人，对于另外多数将来读书人，或者还有点好处。

本篇发表于1939年6月25日《今日评论》第2卷第1期，署名沈从文。

① 系指冯友兰发表于1939年5月10日《新动向》第2卷第8期上的《赞中华（新事论之十二）》一文。

谈　人

凝眸人间，我们看到人的活动比较深广时，总不知不觉会发生悲悯心。百物万汇，如此不同，朱紫驳杂，光色交错，论复杂，真是不可思议。然而人各有所蔽，又各易为物诱，因之各有是非爱憎。虽贤愚巧钝，智力悟性相去甚远，思想感情，归纳出来，还不外某几种方式。

人与人似乎不可分。“同情关心”与“敌视对立”，实二而一，同为生命对于外物的两种反应。恰好如春天和冬天，寒暖交替，两不可缺。苦乐乘除，方能够把人格扩大，情感淘深。生命中若仅有嘻嘻哈哈，这人一定变傻，若仅有蹙眉忧愁，这人一定会迂而疯。

俨若上帝派定，人都极自然的对于某事发生同情，某人感到敌对。人最怕淡漠，怕不理会，怕当他或她在你面有所表现时，不问好意或恶意，你总视若无睹，听若无闻，行动若无所谓。不反对，不赞同。尤其是某一种人，正存心盼望你注意，而你伪不注意，或所作所为，他人已俨然看得十分重要，你却表示毫不关心。你这种对人对事极端淡漠的态度，

实在很容易伤他们的心。在某种情形下，譬如说，同在写文章的情形下吧，对人淡漠将引起多少不必有的怨恨和误会，就个人十年来的经验，说起来真是不胜举例，感慨系之，只看看和淡漠相反的“关心”，对人对事“同情”或“敌对”产生什么现象，就可明白过半了。

如鲁迅，可说是个对人充满同情也充满敌对心的人，不特得过他的好处益处或可以利用利用他的作家，书店经理，对于他的死亡，感到极大的损失。便是玩政治的，帮闲跑龙头套的漠不相干的，甚至于被骂过的，如《二丑艺术》所提到的几种人，不是也俨然对于他的死亡，说是感到极大的损失吗？他逝世二周年时，四川某处地方，曾举行一个纪念会，开会行礼如仪后，有个商会执行委员，洋货店老板，上台去作了一点钟的演讲。语气激昂中肯，博得台下许多次鼓掌。凡熟习纪念会的，自然都明白话应当怎么说，方能有效果。属于丧吊总不外“这人是我先觉，是为我们民族而死，我们一定要照他所作的作去，完成未竟之功。”措词尽管十分笼统，还是无妨。因为这商会委员话说得极有道理，下台后于是就有几个年青朋友去向他请教，问他“如何学习鲁迅。鲁迅写了些什么书，那一本书写得最好，最值得取法？”那大老板这一来可给愣住了。完全出他意料以外。他结结巴巴的说：“这个这个慢慢的讨论吧。这位鲁先生我实在不认识，他会写小说？我以为他是个革命家。”真料想不到的是鲁迅生前常常骂过这种人，这种人却来演讲，当他姓鲁，一口气说了一点钟！博得旁人许多次数鼓掌。他自己也异常开心。这个笑话说起来并不可笑，实在使人痛苦。因为这种事不仅四川发生过，上海或香港另外一个地方，也可能发生。不仅鲁迅纪念

会有这种情形，别的什么会也必然常常有相似情形。记得数月前朋友□□□女士追悼会，有个人讲到艺术家，就把梅兰芳、李惠堂、张恨水和“在场各位”拉在一处。事实上“在场各位”都是另外一种人。大家都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们这个社会，本来即充满痛苦的现象，许多人间喜剧若从深处看，也都令人油然生悲悯心。好像心中会发生一个疑问：“难道这就是人生吗?”同时心上还将回答：“是的，这就叫作人生，真正原样的人生。但并不是全部，是一部分。”

因为人最怕淡漠，对淡漠不能忍受，所以易“轻信”与“疑心”。有些人你平时对他不大熟，或有意无意逃避过他，使他感到你不会同他相熟时，你若写点什么文章发表，说的虽是人类极普遍的弱点或优点，一种共通的现象，他总容易附会到自己头上去。话说得好，他终生受用，说得不好，他以为你骂了他，钉在心子上永拔不去。你倘若说真话：“这并非骂你，正因为我不论何时都并无机会想起你!”这只有使他更不高兴，就为的是你对他“淡漠”。你不过淡漠而已，他以为是“敌对”。

数月前我曾写过一篇小文章[1]，将社会上到处可以碰头的“假时髦”女子，称为“新式傻大姐”。这种人特点极显明，一眼看来好像很解放，很有知识，很活动，甚至于很时髦，可是你若明白她多一点时，就知道傻为些什么，像个什么了。你领教多时，不会觉得如何可笑，正如你不会如别的人觉得她有何可爱。你只感到人生现象的悲悯，或者对高等教育怀疑。也许还有点儿同情，因为或者不是她对不起高等教育，倒是高等教育委屈了她。文章立论的根据，自然是从千百同一型范女人印象抽出的一个结论。尼采或斯特林堡，

莫泊桑或契诃夫，笔下无不有这种女子的素描，供我们欣赏。不过说法各有不同罢了。但都具有同一情形，即悲悯。总好像要说："上帝，你这是什么意思？""轻信"与"疑心"既占有许多女人情绪大部分，尤其是轻信，她因之在年青时照例能听到许多莫名其妙的谄谀，忘了自己，但自己虽忘了，却希望别人谈着她。

我们不能否认，身前左右假时髦实在很多。我们对于肯朴素读书做人的女子，十分尊敬，对于"假时髦"，慢慢的都会敬而远之。可是古语说："察渊鱼者不祥"，你懂她，可别说她。为的是假时髦不会因之变好，凡好表面时髦的她将生疑心。说不定且会因之变坏。

本篇发表于1940年1月1日香港《大公报·文艺》第763期，署名沈从文。

① 系指收入全集第17卷中的《真俗人和假道学》一文。

“五四”二十一年

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领导的“思想解放”与“社会改造”运动。当时要求的方面多，就中对教育最有关系一项，是“工具”的运用，即文学革命。把明白易懂的语体文来代替旧有的文体，广泛应用到各方面去，二十年来的发展，不特影响了年青人的生活观念，且成为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民十六的北伐成功，民二十以后的统一建设，民二十六的对日抗战，使这个民族从散漫萎靡情形中，产生自力更生的幻想和信心。且因这点幻想和信心，粘合了这个民族各方面向上的力量，成为一个观念，“不怕如何牺牲，还是要向建国目标前进！”三年来从被日人优势兵力逼迫离开了沿海各省分，还依然不解体，不屈服，能集合全中国优秀分子，在一个组织，一种目的下，一面抗战，一面建国。这种民族精神的建立与发扬，分析说来，就无不得力于工具的能得其用。

对语体文的价值与意义，作过伟大预言的，是胡适之先生。二十年前他就很大胆的说：“语体文在社会新陈代谢工作

上，将有巨大的作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语体文必占重要的努力。”这种意见于二十年前说出，当时人都以为痴人说梦，到如今，却早已成为事实了。但二十年前胡适之先生能够自由大胆表示他的意见，实得力于主持北京大学的蔡孑民老先生，在学校中标榜“学术自由”。因学术自由，语体文方能抬头，使中国文学从因袭、陈腐、虚饰、俗套、模仿中，得到面目一新的机会，酝酿培养思想解放社会改造的种子。

蔡老先生不特明白学校中学术自由的重要，且对语体文也有过良好意见。他以为古文自有它的伟大过去，至于流行末世半通不通的死文字，实在是社会“愚昧与顽固”“虚伪与陈腐”的混合物。社会的进步不可免要受这种有腔调无生命的死文字掣肘，有时且引起社会退化现象。正因为它不仅徒存形式，还包含许多保守堕落观念。国家求发展，想改革，这些观念便常常成为障碍物，绊脚石。

可是文学革命运动，从建设方面看，固然影响大，成就多，从破坏方面看，也不可免有许多痛心现象。新工具既能广泛普遍的运用，由于“滥用”与“误用”结果，便引出许多问题。从大处言，譬如北伐成功后国内因思想分歧引起的内战，壮丁大规模的死亡，优秀青年大规模的死亡，以及国富国力无可计量破坏耗损，就无一不与工具滥用、误用有关。从小处言，“学术”或“文化”两个名辞，近十年来，在唯利是图的商贾和似通非通的文化人手中，常弄得非驴非马，由于误解曲解，分布了万千印刷物到各方面去，这些东西的流行，即说明真正的学术文化的发展，已受了何等不良影响。

所以纪念五四，最有意义的事，无过于从“工具”的检视入手。借当前事作镜子，如何计划来“庄严慎重”使用这个工具，是一件事。从这种庄严慎重与作家人生态度有关，我们在文运上如何为作家来建设一个较新的坚实健康人生观，又是一件事。

世人常说“五四精神”，五四精神的特点是“天真”和“勇敢”。我们若能保留了这分天真和勇敢精神，再加上这二十年来社会变动文运得失所获的经验，记着“学术自由”的意义，凡执笔有所写作的朋友，写作的动力，都能从市侩的商品与政客的政策推挽中脱出，各抱宏愿和坚信，由人类求生的庄严景象出发，来表示这个民族对于明日光明的向往，以及在向上途径中必然遭遇的挫折，承认目前牺牲俨若命定。相信未来存亡必然将由意志决定，再来个二十年努力，决不是无意义无结果的徒劳。二十年时间在个人生命史上，虽然好像已经很长很久了，在一个民族复兴历史上，却并不算久。我们应当用“未来”来纪念这个“过去”。

二十九年四月末于昆明

本篇以《“五四”二十年》为题，发表于1940年5月4日香港《大公报·文艺》第830期，又以《“五四”二十一年》为题，发表于1940年5月5日昆明《中央日报·五四青年节特刊》，均署名沈从文。

据香港《大公报·文艺》编入，标题按《中央日报》更正。

读英雄崇拜

本刊第四期有一篇文章，题名《论英雄崇拜》，陈铨先生写的。本意给国人打气，对“英雄”有所赞美，用意自然很好。对于“英雄”含义文章中虽曾说过是各式各样的领袖，惟内容所指的还是代表武力与武器的使用者，对面自然就是代表读书人的“士大夫”，于是很感慨的说，中国读书人太不崇拜英雄。既提起读书人，要找出一个原因，所以又说，这是由于“五四”的结果！为什么？为的是“五四”提倡“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养成了士大夫的坏脾气，腐化而且堕落。近代教育教坏了这些读书人，反不如过去受了点通俗小说教育的武装同志表现得动人。我们要崇拜英雄，不然就是个卑鄙小人。有对这种崇拜加以嘲笑的，也是卑鄙之徒。英雄究竟是怎么回事？康德说，英雄有壮美感，使人生神秘敬惧之忱，无条件拜倒；他要你死，你必乐于死去无疑。……断章取义不是本文写作目的，不过那篇文章给个人读后印象，却不免如此。陈先生解释英雄崇拜时是援引康德、尼采意见，论及中国缺少英雄崇拜时是提及近二十年事，死文

字与活事实相互映照，想使它不发生抵触，至少在修辞上还值得细心一些。不然，给人印象或不免失去了执笔本来意思。个人是个不大“崇拜英雄”的人，但想想也还不像“卑鄙小人”，有些与陈先生不同意见，特写出来作为对这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中国旧书中论及英雄时，刘劭《人物志》说的大有意思。他说能控制一切而持其柄，统率文武，使用材器各得其宜，可以谓之“英雄”。这种英雄观很显明，到如今还适用，真英雄换言之就是“真的领袖”，并不是“万能法师”。我们生于二十世纪，对待这么一个英雄，自然也只是大事信托，由信托而生敬重，不必迷信崇拜，尊之若神。正因为明白英雄只是一个“人”，与我们相差处并非“头脑万能”，不过“有权据势”。维持他的权柄，发展他的伟大，并不靠群众单纯的崇拜，靠的倒是中层分子各方面的热诚合作！二十世纪两个近代化的国家领袖，罗斯福和斯太林，所谓作领袖的意义，便是如此。个人权力尽管其大无比，事实上各事有人负责，个人不过居于提纲挈领的地位，总其大成而已。读书人对于他崇拜不崇拜，是无所谓的。

提及英雄崇拜时，陈先生引用百十年前叔本华、尼采一类人对于这个名辞所作的抒情说明，与时代实不大相合。这些人的英雄观多属“超人”，配上拿破仑的性格风度倒刚好合式。这种英雄于战争中必骑一匹高大雄骏的白马，在山头大纛下据鞍顾盼，群众则野战格斗，破阵陷敌，有进无退。可惜时代已过去了。慕索里尼和希特拉两位要人，在群众大会拍摄新闻电影片时，虽尚倾心这种古典英雄风度，装作雄鸡姿式，已不免令人发笑。若在法比战场上最前线，我敢同任

何人赌东道，这两位伟人就决不会比一个二等兵乐意把头多昂起一英寸！这就叫作时代不合，伟大意义也不会相同。英雄崇拜若近于群众宗教情绪与浪漫情绪之归纳集中，近代使用的方式是分散到社会各方面去，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玩球的，跑车的，爬山的，游水的，无不可以引起这种集中的作用。英国封一个戏子作爵士，瑞典给一个电影女演员大勋章，这是国家有意从娱乐群众分子中产生英雄的一例。罗斯福为了表示伟大，有时会为足球比赛发发球，斯太林为了表示伟大，大排场款待从北极探险回来的水手，这又是现代伟大意义不同的另一例子。末后二事值得注意处，便是真的领袖都有意将英雄崇拜情绪转移到娱乐或致用分子方面去，个人却承受了“民治主义”一个对于“人”的原则，“领袖也是一个人，并不是神。”他要人相近，不要人离远。要群众信托爱敬，不要迷信崇拜。

这其实从国内近事也可看出。陈先生很感慨的说“中国读书人太不崇拜英雄”，倒恰恰与够得上他所称为英雄的蒋先生及李白胡陈诸将军，感于切迫需要知识阶级合作帮忙成一对照。陈先生以为抗战建国主要条件是“英雄崇拜”，这些受崇拜者经验多一些，却明白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们已从各种团体左献一面锦旗右拍一通电报清楚崇拜的意义和限制，这是不成的！谈抗战，一个战线上若用十师兵力作战，攻守进退需要的全是知识，并不单凭个人勇敢热忱与不相干的多数崇拜所能济事！上层机构要一个健全的参谋组织供给意见，下级单位要一个完备的交通组织接济弹械和给养，整个胜败都决定于知识在空间时间上运用是否得法。就为了勇敢有余知识不足，才用外国军事顾问，求助于客卿！至于谈建国，

那更非知识不可。说到建国我们会联想到中山先生本人和他的建国大纲。他本人的一生行为，就是要人“相信”，不是要人“迷信”的。这个大著的草成，就有许多意见实抑衷于老同志与许多书本而来。他就是个“人”，不是神秘不可思议的“神”。

个人以为时代到了二十世纪，神的解体是一件自然不过的事情。他虽解体却并不妨碍建国。如有人从一个政治哲学新观点，感觉东方的中国，宗教情绪的散漫十分可惜，神的再造有其必要，这问题大，决不是单纯的英雄崇拜即可见功。在政治设计上想归纳或消解群众宗教情绪与传奇幻想，神的重造方式正好从近三十年世界取法，这种“致用”之神不妨用分散与泛神方法，从群众中造偶像，将各种思想观念手足劳动上有特殊成就的，都赋予一种由尊敬产的神性，不必集中到一个“伟人”身上。若真的以一个人具神性为中心，使群众由惊觉神秘而拜倒，尤其是使士大夫也如陈先生所描写的无条件拜倒，这国家还想现代化，能现代化？稍有常识的人看来，就知道是不可能也不必需的！

陈先生提起英雄崇拜时，又举示当前兵上作战为例，以为全得力于老式通俗文学小说戏剧的英雄崇拜的好处。且赘语说亏的是这些人不受普通教育。这种意见由赛珍珠说来，并不可笑，因为她是个外国人，不明白中国事情。若由现代中国人说来，似乎不大近情合理。因为这完全是两件事，勉强敷会，不啻说明陈先生既不明白旧小说是什么，也不知道现代战争是什么。若说旧小说的影响，张宗昌、韩复榘倒是两个典型英雄崇拜者。其次是近三十年来所有土匪都用“逼上梁山”一辞作借口，合伙吃血酒时且照例引用“桃园结义”

典故。崇拜之中就无不有个“个人本位”意识，与文中所举康德称艺术中的壮美崇拜全不相干，更不曾培养陈先生所理想的由惊觉神秘而来的崇拜情绪。宗教的虔诚由坚信而发宏严，牺牲一切以赴之，在中国唐代的大德高僧玄奘行传，倒有点相仿佛，但这就只有读书人能领略！若一改成说部的场面，群众就只关心到他进蒸笼被妖精蒸吃时，是否能够得救谐谑惶恐了。通俗小说虽有些民族英雄故事，若把当前兵士抗战，认为由这些小说熏陶而来，与事实相去实在太远。

陈先生又说，英雄崇拜在读书人方面表现不好，实由于“五四”以来提倡“民治主义”同“科学精神”，个人主义抬头，士大夫因之更腐化，社会因之更极端紊乱，所以再不会崇拜英雄。在战争中提倡英雄崇拜自然很有意义，不过若涉及知识阶级，且认为他们腐化堕落时，似乎还要分析分析不宜过于笼统。英雄崇拜情绪，在知识阶级中不发扬原因，前面已经说及，加上社会进步分工分业的结果，英雄名分与事实已不能由“骑士”独占，即在战争中依然被各种职业出类拔萃分子分享，是一件明白不过的事情。陈先生却简简单单以为是“五四”的提倡“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结果，这倒是很新的意见。意见虽然新，却很容易像清末民初遗老的口吻。怎么会这样想而且把他写出来？这时虽是战时，要颂扬武人的武德武功方法也很多，实不必如此曲解过去！中国为了适应环境，在这个大战时代，或者会抛弃民主政治形式，变成一个集权的组织，这组织无所谓左无所谓右是可能的，但这与二十年前的读书人作的社会改造运动是无冲突的。二十年前的改造运动，从最小处言，很明显即因工具运动（文体改革）成功，通俗小说中的旧的如《封神演义》，新的

如《玉梨魂》等书，方起新陈代谢作用，代替而来产生冰心，茅盾，丁玲，或陈铨的作品。“团结”“统一”“抗战”“建国”这类名辞，由抽象而具体，与工具的能尽其用也大有关系陈先生说“五四的流弊是更进一步使中国士大夫阶级堕落腐败”，何所见而云然？这士大夫若指晚清遗老，民初议会诸公，人老了，老而不死，体力复竭，手边又还有几个钱，在家纳福，只等待庄子所谓“息我以死”，事极自然。这些人实与“五四”毫不相干。若指因“五四”而起的人物，这些人大多数是当前社会负责者，一部分以书家身分从政，作公务员，一部分或办教育，或作学术研究，工作都相当忙，收人又相当少，守职尽分，近十年来中国见出一点进步成绩，都可说是这种中层分子的贡献。这些人受事实环境限制，能守职不能创业，事或有之，至于腐化堕落，实说不上，因这种人即欲腐化堕落，好吃懒做，亦不可能也。这种人一部分在学校教书，与社会略隔一层，或在大时代中尚只天真烂漫梦想中国政体忽然凭空变成英美方式，虽尽做白日梦，却又不能如何努力来实现梦想。但这与另外一种貌作有思想有眼光的活动分子，在另外一个观点上做白日梦，以为我们中国还必需流血革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即有办法，其天真邻于胡涂，岂不是半斤八两？

陈先生又说“五四造成了士大夫无人格，无信仰，虚伪矫饰阿谀逢迎的风气”，且以为“贪婪爱钱是共通风气”，说的也有点近于笼统含混。若指办教育的，与事实不大以相合。若指“文臣”意即官吏公务员，这一点也得弄个清楚，人格信仰范围指什么而言？至于官场中逢迎阿谀，实是一件老故事，与“帝制”不可分，也可说与历史不可分，古语“远佞

人”正可作到，由“五四”起始倒是新闻，若必把阿谀逢迎归为新的风气，仔细分析，就可知造成这个现象，另外有一个原因。十年来的党政新贵，年在三十五岁上下的，多系北伐时代学生，当时高等教育不良好，一面且忙于革命，学术思想便缺少“五四”提倡的民治主义和科学精神训练，北伐成功后，政体有了新陈代谢，这些各以因缘上了台，不久国共分裂，两方清来杀去。江西多了一个政府，打了近八年的仗。即在中央系统下随即又有桂系分张湖北之役，阎冯扩大会议陇海线之役，福建人民政府事件，两广事件，无一事不与“党”争“政”争有关。既与党政有关，时局变化波澜大，许多人自然把“信仰”看成一个空洞名辞。中央欲集权，从党着手，在党中先废除民主精神，乃由上而下以圈定指派方式产生干部。党政中的中层分子，一因学问少，二因时忌多，于是将信仰对象由“真理”变成“政策”，政局既朝云暮雨，末流这些人当然即不可免各竞技巧表现长处，作人无风格，作事少思想。就中虽不乏洁身自爱者，然欲安于其住，自必唯诺取容。但事情明明白白，这问题系与“党政”有关，与“五四”的“民治主义”和“科学精神”却不相干！至说文臣爱钱，对这种人也还说不上，因办党是发不了财的。这种人除了有机会加入财政税收机关，即爱钱亦不会有多少贪婪机会！若与同等的武将比较，恐怕还是将军们发财的居多！（陈先生是四川人，应当知道四川的房产田地，金融实业，几几乎全是大小军官的产业！）此外四十岁以上文臣因专家资格处理有关财政税收事务，虽可发财，还是十分廉洁不失书生本色的，正不乏人。若说“五四”提倡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这些人倒正可代表承受两种观念产生的人物！至若近十年小

官僚因缘时会，位据要津，或直接舞弊，或间接营私，发百万财，称大富翁，正恰好看出国家只图统治，统治方式只注重集权，因此老式亲亲主义与人情主义抬了头，一种必然现象。救济他靠的还需要社会制度化与专家化，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

大凡谈论问题，能补引“过去”，疏证“当前”，预言“未来”，当然很有意义。不过批判历史，最好要明白历史；攻击科学精神，先还需要具有一点科学精神！我们现在若肯从大处着眼，公公平平来看看这个国家近二十年的发展，以及在变动中的得失，自会承认有形的社会组织与无形的公民观念，都无不在逐渐进步中。这进步实得力于统一，主要表现是国家统一意识的增强，因统一实现国家日趋于合理。这种进步现象非一人头脑万能，实与中级应用人材质与量提高增多有关，也就与高等教育有关。高等教育能有点成绩，实又得力于若干著名大学在教育范围内的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运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不同，这许是个人一种乐观看法。但这种看法也还可从近事得到一点证明。举例言，“七七”战事发生后，在沪杭两路战区铁路服务人员，作站长的或管工程的，认真负责处，是中外一致赞颂的。又如目下各战区业已沦落县分，一经收复，县政工作人员照例即随军事推进而进行各种工作，服务热忱也是为人称道的。这些人差不多就全是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即如就税收言，湘鄂省区地方统税，由一个远在湘西某机关指导征收，沦陷区上居然能进行，征收人员且很少有携款潜逃故事发生。问及负责人改善情形，方知道大部工作人员是税专及其他大学毕业生，仿邮政盐务用考试制度选擢而来。说到英雄崇拜，这些小一

辈的士大夫，恐都不免成为陈先生笔下所谓“卑鄙”之徒。因为这种可爱青年，就决不会单凭英雄崇拜能如此忠诚为国的。其服务精神还只是由于作国民的自尊心而来。正因为每个人所受的训练，刺激，都觉悟了自己是国家一个单位，要生存权制，也就有遵守社会规约的义务。若说国家得重造，士大夫得改造，这些光明进步方面，似乎值得注意注意！明白当前较多，新英雄主义的提倡者，下笔时就知道不仅要慷慨激昂，最重要还是近情合理了。

欧战发展到最近，英法因战争技术比较落后，两个国家标榜的“民主思想”或“自由主义”于是成为一个嘲弄名词。中国处当前情形中，一面得应战，一面得建国，一面得在风云万变国际混乱情形中，选择两个可靠的的朋友，适应当前与未来。“国家集权”因此旧事重提。对国家有一个较新的看法，大家分途并进，来把全民族人力物力粘附集中到国家进步理想上去，自是新战国时代应有的打算。可是我们明白，英法倒霉是一件事，“五四”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提倡又是一件事，中国要建国，“国家集权”与“集权国家”又是一件事；三件事各不相附，若以彼证此，敷会其词，是不会有较好结论的！若从中国人就中国立场说来，据个人意见，恰恰与陈先生意见相反。国家要集权，真正的“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还值得来好好的重新提倡，正因为要“未来”必与“过去”一样，对中国进步实有重要的意义！对外言，“战争人人有分”这句话，想要发生真正普遍作用，是要从民治主义方式教育上方有成效可言的。对内言，在政治上则可以抵抗无知识的垄断主义，以及与迷信不可分的英雄主义。更重要的是抵抗封建化以性关系为中心的外戚人情主义。在教

育上则可以抵抗宗教功利化，思想凝固化，以及装幌子化。在文学艺术运动上则可以抵抗不聪明的统治与限制，在一般文化事业上则可望专家分工，不至为少数妄人引入歧途。至若科学精神的应用，尤不可少。国家要现代化，就无一事不需要条理明确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若说中国当这个新战国时代，既不甘沦亡，必需挣扎，挣扎方式且必需取法德俄，我们也得弄明白，这些国家最高指导统制权力虽大，其所以控制国家的人力物力，而且运用得恰到好处，并不是人人崇拜英雄可以成事。组织和效率，主要的其实还是科学精神！因科学精神而分工分业，方能有组织，见效率！德国人表示崇拜希特拉，不过是每家被强迫挂一面相片而已，希特拉事实上也许更敬重他的一切专家和那群高等军事幕僚！民治主义值得好好的重新提倡，从中国目前宪政运动上可作另外一种证明。这个运动不发生于民间，却由一党专政的国民党领袖同时也是国家领袖来发动。发动这个运动原因，自然相当复杂，但有一点可以看出，即是集纳中国军事政治大权于一身的先生，用近十五年各种人生教育，享受了最多国民的英雄崇拜经验后，已感觉到这么下去不大妥。人到五十岁了，生命中的杂念一经澄滤，真正明白个人之外还有个国家，个人会死去，国家不能亡！想使国家转好，主要条件是把国内更多数优秀分子，用一个比“党”更合理的方式粘合起来，材尽其用。照老方法就不会材尽其用。所以先是政治上独断独行，渐渐的为专家分工，这可从近十年政治看出消息。即便如此，依然事事受形式上掣肘，内有党见的分张，外有专家的不合作，国事运用不够灵活。抗战以后，弱点尤易看出。多数国民虽信赖拥护，少数党员

反从敌寇投降。因此要宪政，要民治，就是觉悟只有如此处理国事方能便于专家分工合作具体化，明朗化。即对于国民党言，也可以因此受点刺激，起点新陈代谢作用，方有新的力量新的生命。把国人带点原始迷信的“权力崇拜”转成为理性抬头的“知识尊重”，正是任何国家安定与进步必由之路，若照陈先生所说，目前的宪政运动，倒是近于最落伍的思想了。再若照陈先生意见，“知识阶级关心的平民教育一发达，国家更不崇拜英雄，更是一盘散沙”，那一切初级教育都近于多事，有害无益，大家只读读老式通俗小说，一面对英雄崇拜便很好了。可是话说回来，真正关心这个国家命运的人，会觉得抗战建国事并不那么简单的。

因为世界在战争中，在变动中，新的历史场面上领导者，容易给人一个“英雄”印象。于是一部分人谈及抗战时，谈及国家问题时，由于情感有余便不免要用英雄气分来解释现象，这种无意识或非意识就联想方便，自会牵涉附会到通俗小说方面去，照例且不免把近年来人民对于国家观念之觉醒估计得太低，对“读书人”感到不满。陈先生文章，在这一点上正可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见。读书人情形，陈先生自己是其中之一，当然明白“英雄崇拜”是不是能作到使他死他就死的地步。且明白“士大夫”含义，以及其他。有些话不能自圆其说，还不碍事，至于对群众教育，以及从“教育”上得到教训，未免太膈膜了。事实上近三年来国内两百万壮丁的征调，应用如何手续，有若干省分，如何由万千青年学生下乡作民训社训，其次又如何用挑选方法选出送到各地师团管区编训，编训期满，再如何转移到各个应当补充部队去训练，送到前线时，至少都得经过一年以上的“教育”，在教育

中与火线上，照例都需要把不必要的懦怯与不必要的英雄思想去尽，只变成集团中一个小小分子，方能作战，就会觉得“教育”二字具有何等意义，对于目前战争又影响多大，不至于说外行话称赞他们不受教育了。三年来的抗战，前方百万壮士的流血，后方数百万妇孺老弱在风雨饥寒中完成的几条国防交通线，支持这个民族作战气概和胜利信心的，决不是英雄崇拜，实完全靠个人做“人”的自尊心的觉醒。这觉醒工作，便整个寄托在各种有形无形广泛教育原则上！

陈先生文章本意很好，惟似有所蔽，词不达意处，实容易被妄人引为张本，增加胡涂。官僚文化人中还不少妄人，妄人活下多以为在国家变动中可作政治投机，且习于用英雄崇拜方式固宠取信。这种人正附于中国官僚外戚政治中作种种活动。所以中国谈改造运动，实离不了制度化和专家化，正因为如此一来这种人方无所售其技。制度化和专家化及新战国时代新公民道德的培养，除依靠一种真正民主政治的逐渐实行，与科学精神的发扬光大，此外更无较简便方式可采。在这种事实下来谈英雄崇拜，如像陈先生那么谈，有点近于“抒情”，不是“说理”了。不知多数读者以为如何。

本篇发表于1940年6月1日《战国策》第5期，署名沈从文。题目之下原有编者按语：

> 我们希望读者看了陈铨先生原文和沈从文先生这篇反辩之后，可以得到相当兴趣，参加讨论本题　　——编者

谈　家　庭

时代也许不同了一点，三十岁左右有教养的绅士，好像都知道“礼貌”代替“热情”，来处理近身事情。尤以与一个女人办交涉时，礼貌多而热情少，大家既“客气”得多，也似乎都“安全”得多。这种对女人的态度，自然可说是社会一种进步。不过因此一来，在某种情形下，也可能产生许多问题。问题之一说来一定为男人不相信，女人不承认，既多多少少增加了一点“妇女问题”的复杂性。

谈及妇女问题时，大家当然都明白问题的出发点是由于男女在生活方面的不平等，为争求平等，所以发生问题。象征平等是女子得到男子所能得到的一切，知识、权力和社会地位。争解放成为一个动人的名词：因为必解放方得到一切。要求大，纠纷多，当然不容易解决。谁也不会把这件事从一个较新观点来解释解释，认为一部分人争解放只是想要一个家而得不到，或有了个家又太不像家，因此有问题。解决它并不十分困难，还是从“家”着手！

女子不承认这件事是很显然的，正因为提起这个问题加

以分析讨论时，她们之中大多数就并不明白自己本性上的真正需要是什么。除非她有了个很好的家以后，在习惯下她照例不会承认和一个男子同组成的家有何意义，有何必要。男子不相信事更显明，因为不相信，所以一讨论到妇女问题时，总以为是女子要违反生物的习惯，社会的习惯，在不可能情形中，一切希望同男子一样。胆小而胡涂的且相信不久天下所有女子当真会同男子一样。这“凡事一样”，对向上言自然还好，若学男子堕落，岂不糟糕。学男子聪明能干，自然还好，若学男子胡涂，岂不可怕？许多男子或由于关心她们的未来，或由于担心自己的未来，所以一谈及这问题时，照例就不大公平，有点偏见和成见。不是用顽固家长神气骂女子，要她们回家，就是用胡涂丈夫神气说女子，要她们回家。（最少是用懂事朋友口吻，劝她们好好的去布置一个家。）父亲不明白女儿离开原有家庭出走是为什么，（说不定正是为需要个年纪青性情投的男子另外成一种家。）丈夫不知道妻子要独立是为什么，（说不定正是目下的家不像个家！）所以问题永远不接头。既疏忽了事实，自然尽在名词上争持，她说“应该”，他说“不许”；她说“偏要”，他说“胡闹”。俨然相互吵架，吵到末了，只是增加男女对立现象，毫无是非可言。

这“不承认”和“不相信”，在女子由于意识蒙眬不自觉，在男子则由于胡涂不更事，使妇女问题转趋复杂，直到国家特意来设一妇女部处理它。妇女部注意的方面，从表面说当然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不过妇女部中将来若在某一厅某一处有个小小位置，让几个通人性有知识的专家，来从男女性心理方面入手，假定男女实需要“合作”，不必“对立”，试作一种研究，所得结果也许可望比整个妇女部所作的活动

还有意义，有价值。

有一件事很有意思，是朋友某夫妇，战事前在北平共同的家庭，被熟人称模范家庭。先是两人各在南北不同大学里念书，一个是抽象妇女解放论者，二十岁左右时，就主张“独身主义”，且写了许多妇女问题文章。一个是抽象反对妇女解放论者，二十四岁时，就以诅骂女子中的伪自由主义为事，以为女子必需在家中，在厨房，不适宜到社会上参加任何工作。两人笔下都很好，因此就为妇女问题在报纸杂志上大作其文章。照习惯名为“妇女问题讨论”，事实上只是吵架而已。吵了一阵，到两人的文章都可以集印成厚厚的一本书时，还是毫无结果。三年以后，各人都从学校毕了业，到了北平，有个好事朋友恰好同双方认识，也在北平，因此介绍他们见了面。见面认识之初，比较客气，自然还是要讨论，有争持，立场不同，观点不同，不免参商。印象上女的以为男的看不起女人，非常难受，心怀不平。男的呢，却认为当前一个同许多受点大学教育女子差不多，知识有限，幻想极多，好虚荣而十分浅薄。总面言之，就是互相都缺少尊敬。可是时间久了点，认识多了点，情形稍稍不同了一点。另外那个好事朋友，平时只写点小说，调动纸上人物，人情有他的必然性，以为这人如此那人即必然如彼，忽然对两人“吵架”发生了兴趣，不知是偶然还是有意，某一次却告给那女子，说男的觉得她长得很美丽，风度温雅，在熟人中实在少见。过不久，那朋友就怂恿男的请女的吃茶，事后又转达女的所得印象于男的，说对于他的美术爱好和文学知识丰富，是件新的发现。不消说，这全是在“妇女问题讨论”范围以外的事！话虽平平常常，当面说来近于应酬客气，一经转述，

情形可就不同得多了。再过一阵，两人见面时有一阵子沉默了。（这沉默的意义两人似乎不大明白，惟有第三者清清楚楚。）再过不久，两人又重新争吵起来，但所争吵的事已由大而小，由抽象而具体，转为女人衣服颜色的配置与男子客厅家具布置，原来他们快要订婚了。虽争吵，女的再不觉得被轻视，男的也再不觉得对方浅薄好虚荣，这一切都好像成为"过去"了。结婚后两人很要好，日子过得十分美满。因为机会方便，男的在某研究机关作事，女的在某银行作事。到那时节女的再不写文章反对家庭，男的也再不怀疑女子服务能力，中国的妇女问题，至少在这一对伴侣方面，便不用反复讨论，似乎不成问题了。一年多后他们有了个小孩，女的竟自动放弃了银行工作，在家中作了一个真正的贤妻良母。当女的决意放弃银行工作时，那男的反而觉得可惜，试想想，这变更有多大！我为什么说起这个故事？就因为我便是当时调解了这无结果的争吵的好事者。我觉得很快乐，为的是如果我在这件事上若弄笔头抄书本来写一本十万字的新书，结果不过是多那么一本书籍，供同调者援引，异己者批判，增加问题的纷乱。我放下了笔，倒很简单在两人生活上完成一件工作，说明这问题解决的另外一种方式。

一件事当然不足以概全体，但这个例子倒很可在当前一部分读书人方面应用。把一切抽象理论引导到事实上来，"讨论"或"运动"，不宜与事实相去太远，方可望得到解决。我以为一个家如果还像个家，凡是身心健康的女子，不会觉得可怕的。一件事如果还像一件事，凡是头脑清楚的男子，也不会觉得反对的。问题之起居多恐怕是受了点现代高等教育的男女，对于一个"家"的抽象知识与具体知识，都不大充

分，所以他们结果只好作作文章，再照文章来把问题扩大，纠纷增多，解决不知从何着手。

我的意思是家庭如果近于一只鸟儿的一个窠，重要用处是伏卵育雏，而伏卵育雏既如自然派定一分庄严重要工作，义务中必然即包含快乐幸福的源泉。一个家如果像个窠，软和温暖之外，还相当清洁美丽，在关系上又不大复杂，（鸟类在这方面远比人聪明，多是小家庭制度！）为女性乐意，实在是件自然不过的事情。说女子对它感到厌恶，不近人情，同时还违反生理基础。其中自然也有少数特别的，即一部分男性十足的女子，在生理上有点变态，在行为上只图摹仿男子，当然不需要家。其次是身心不大健康，体貌上又有缺点的女子，要家而得不到一个家的，她必然会说家是种无意义的组织。这两种人在社会上是个比较少数，并非多数。这两种人必需到社会上去作各种活动发展，方能填补生命的空虚。这事既对于她们本人有意义，对社会当然也有益无害，为的是如此一来，可以减少许多女子由于婚姻不遂而产生的神经病！我们对这种人实不用勉强找寻理由，逼她们回转家庭，正因为这些人即乐意有个家庭，社会是帮不了忙的。三十年后解决这问题也许可望由医生来处置，从药物或营养方面加以补救，使这些女子的女性正常，身体与情绪同样发育正常，而又可以成一个家。不能单凭空洞理论及一群既少热情又无能力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男子作为候补丈夫，就可将所有女人完全送回家中。

就社会多数而言，男子在这问题上若真以为女子应当从家中发展，对家多发生一点兴趣，多负分责任，似乎需要放下名词上纠缠的习惯，莫尽驾空说理，且努力来安排一个家。

这个家若适宜于发展母性本能，又无悖乎作主妇的尊严，问题是简单的。我们不能徒说贤妻良母是男子的理想，应当说男子如何来学作一个模范丈夫，方可望女子乐其家室，达到女子的理想。据我想来，一般男子都还需要更多一点教育，学得对女子多有一分了解，（因为她们自己是永远不能了解自己母性的伟大的！）多有一分体贴，（因为她们最需要的就是体贴！）如此一来，妇女运动者会改变一个方向，从“对立”的形式一变而为“合作”的要求，也未可知。

所以谈起妇女问题时，问题或许在彼而不在此，在两性对于“家”的看法，由义务感与生命稳定安全感而变为享乐感自私成分增多，似进步实退化，从期望说为日益贴近事实，从生活说为日益违反自然。如何变更这个家的观念，应当是关心妇女问题的人一种努力，且应当成为国家设计机关（譬如说民族心理学院）专家一种重要工作。

由“家”而引起个人对于“人”的印象与感想，认为很是一个问题，即无论男女，“热情”的缺乏是种普遍现象。在有教养的绅士中，都以装成炉火纯青不问事不作事四平八稳为理想君子，在年青男女中，则作什么都无精神，不兴奋，即在最切近的男女关系事件上，也毫无热情可言。一面表现少年老成，一面即表现生命力不旺盛。许多人活下来生命都同牛粪差不多，俨然被一种不可抗的命定聚成一堆，燃烧时无热又无光。虽然活下来，意义不过是能延长若干时候而已。因此营养改造和两性手续重新处理，不仅是文学家的事，也应当是科学家的事。科学家可作的事，可能尽的力尤其多。然而我提起这个问题处理方式时，一定将有人当成笑话。因为在政治上或男女关系上，目下似乎都流行一种风气，即用

一个宦寺阴柔风格来活动，从阿谀、驯顺、虚伪、见技巧，为时髦人生观。玩政治的一部分小丑清客，尤多此种现象，生命力的融金铄石，与求真进取心，都成禁忌，被限制，有日趋萎缩情形。凡一问题超越习惯的心与眼，从一较新观点注意的意见，在清客式的论客看来，都无一不将成为笑话。

本篇发表于1940年10月1日《战国策》第13期，署名从文。

男女平等

从最古神话到最近科学家意见，都说男女生来好像是“不平等”的。神话说男子用黄土作成，女子用水作成。科学家说从生理组织方面观察，男女生来就不一样，在适应组织表现到行为活动或情绪发展时，男女更不一样。因此“分工合作”名词在过去，当前，未来，永远都有它的意识。人在原则上虽说应当“平等”，事实上许多方面既不相同，求平等自必相当困难。不平等本无“高下”，无“是非”，只是有一点“差别”。因这点差别，于是产生一种现象，即男性在社会上有凡事独占情形，女子在社会上却近于附庸。渔猎时代生活既简单，男的觅食，女的育雏，分工合作各执其事，还看不出男女间如何特别不公平。到农业时代“财富”有了意义，财产来源既与“能力”不可分，因此男女之间生活地位渐渐见出差别。中国古代政治家，早看出了这种差别，可能发生许多问题，想用人为的方式求其平，礼教由此而起。礼教中谈及男女问题，虽云“男尊女卑”，其实在家的制度中却给了女子一种绝对平等观。可是财富既与能力不可分，能力的另

外一种发展方式，又成为知识，对女子定则能力多用于育雏一事，知识发展亦因之受了限制，男子拥有知识与财富，女子却除孩子外竟似别男女地位上的优劣情形，[①]自然日益显著。到近代，平等观重新被提出，妇女问题也就因此而起。然而差别既是根本上的，妇女问题所要求的又疏忽了这个根本上的“不同”，只争取生活上的机会均等。以目下能得到为满足得不到为受压迫，自然产生对立感觉。所以妇女问题从一个受过点普通教育，读了些小册子，年在二十岁左右的女子看来，也许要求的只是像男子一样得到知识、权力和地位，问题即已解决。但是一个真正认识这个问题的人说来，就一定觉得到这一切实不容易，即得到这一切，不平等事实还依然存在。求“男女平等”，或者还得另想办法。这办法应当将男女关系重新给予一种解释，在分工合作情形上各自产生一种尊严感，这尊严感中实包括了“权利”和“义务”两种成分。义务不能相同，权利也容许有不尽同处。到那时女子“得到一切”的幻想或者自然会承认事实，改为“得到所能得到的”。且明白解决妇女问题，比别的问题还切迫需要从“认识”入手，第一点即认识男女不宜从对立方式作无结果的战争，却必需在合作趋势上建设生活的理想，女性能明白一个家对于母性本能发展的重要性，如何大，如何重要。幻想始终有个生理限制，对少数可望超越，对多数还得服从自然。男性若明白有关男女问题殊不必对立争权，更不必在名词上纠纠缠缠，凭空说理，所努力的是如何来安排一个好好的家，在家的意义上，享乐感与责任感调和得恰到好处，使这个家恰如一个聪明鸟儿温暖的窠，适宜于发展母性鸟类孵卵育雏本能，而又不丧失现代女子所需要的自尊心，因此一来，妇

女问题就简单多了。所以当前妇女问题，也可说实起因于男女两方面知识不够，属于情感处理的抽象知识，与属于生活的具体知识，都不充分，问题因此不易解决。“男女平等”一名词上各执一端，纠缠不清，只增加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毫无有助于任何一方面结论可言。前不久，政府有成立一个妇女部的消息，妇女部作的事自然很多，可是个人却希望妇女部中能容纳几个专家，将当前中国妇女问题，从与男子“对立”趋势上，引导到与男子“合作”趋势上来。至少这种工作值得试验，尤其是就中层阶级男女，必须作种种设计，建设一些新的两性观，对抗封建观实在大有意义。

本篇发表于1940年10月27日昆明《中央日报·中央副刊》第9期，署名从文。

① 此句疑缺字。

变变作风

古诗说，“人事如代谢，往来成古今。”日月转易是个自然现象，感慨话用不着说，空洞乐观也无多大意义。我们既活在炮火中，总得想法活下去，而且必然愿意明天比今天活得更好。怎么样就会好？应当值得思索思索！

我们这个国家为了求发展，求生存，更为了尊重一个象征人类光明进步的原则——民生主义，独立作战快有三年半了。战争虽一时失利，可不气馁，虽被强敌侵占许多土地，大都名城，小县，小镇，或为人血染赤，或成一片瓦砾，不以为意。最能明白体会到这种战争意义的，恐无过于报人和学生！这两种人一定都能知道，我们其所以应忍受，能牺牲，就为的是这战争背后，还有个庄严伟大的理想！这战争表面上总有一天会结束，事实上我们却将终其一生，必需永远保留这个作战的精神，打胜仗后方能建国，打败仗时方可翻身。

但“战争”这个名词是包含多方面的，前面要人后面也同样要人。目下前面我们有两百万武装健儿，与敌人在广大土地上周旋，在后面，可作的事也就不少。可是我们究竟作

了些什么事？我们应当承认，直到如今为止，后方有许多事都近于消极应付，不是积极进行的。即有关国防设计各重要事业，负责人肯作事的固然不少，怕作事，懒作事，不会作事因而误事的，也就到处可见。公务员之不讲效率，对生命无目的，无理想，更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且因生活物价增高，一种可怕的“实际主义”日益流行，腐蚀多数人做人的良心，做人的勇气。既缺少一种高尚感情，当然也就缺少用那个感情去追求一种人类庄严原则的勇气。说抗战，固然有两百万战士在炮火中，说建国，用那么一群人来支持中层阶级，处理国事，从何说起?在这种情形下，个人以为趁这一年起始的今天，很值得检讨一番，看看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多少方面工作，值得修正，还有多少潜伏力量，值得好好发掘。国家忧患那么深，国民责任那么重，如我们不能在普遍国民中（尤其是智识阶级中）造成一种坚韧朴实的人生观，恐怕是不能应付将来的！提起这一点，试从近二十年过去国家社会的变迁看看，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即文学革命。且会承认一件事情，即文学革命后，用文字作工具，用得其法，对社会改造有多大贡献，对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恢复增加，又有多大贡献。

这种贡献在过去，是用如下形式产生作用的，即报上有一栏社论，对社会各方面作广泛的善意的批评，以及明智的建议。又有一栏名叫副刊，民八以后梁任公、胡适之等人的学术论著，罗素、杜威的演讲词，以及男女解放社会改造各问题，鲁迅、冰心新文学作品与读者对面，都是由副刊来负责的。它的作用大意义深，是有目共见的。因为报纸每天出，分配又广，所以自然作用大，意义深。且无形中又有一种公

众裁判，凡报纸知为国家社会福利设想，即受爱护鼓励，若只图一时取巧，或以不正当目的争取读者，不可免要受鄙弃。因此报纸本身也就得到极大进步。抗战以后国内各处报纸有个共通现象，社论多偏重国际问题，或重在国内战事胜利解释与社会进步赞美，副刊则因纸张贵，篇幅缩小，或将篇幅缩减移作广告用，图增加收人，或率性取消，少支出一笔稿费。其实从报纸理论说，这么一来就等于把报纸特点取消，把报纸对国家社会批评建议态度取消，且同时还把报纸在近二十年来习惯已养成的教育人民权利取消。结果新闻以外就是广告，再加上一点极易成为明日黄花的国际预言。报纸的积极作用既已全失，办报人在这种情形下，好像除了“忙”以外也就毫无意义，看报人面对这种报纸，当然也觉无多大意义。

若把眼光放远大一点，我们就会知道如此下去未免可惜。在后方或特殊地方谈建国，卑之无甚高论，何妨从新闻纸上来变变作风。个人以为社论一部分，值得放在青年问题上来讨论，来处理。这事看来小，实在并不小。正因为一年复一年，人事新陈代谢的结果，目下的青年，在十五年后就要成为社会的中坚，要在国家各部门机构上来负责任，必须要给他们重造一坚韧朴实人生观，方能负责。办副刊，文学理论文学作品也值得有一部分向这方面发展。办报本是费力赔钱的事业，既费力赔钱，力和钱的投资，应当放在这个理想上，是毫无问题的。

目下有一种现象放在我们眼前，即凡是在将来社会中有重大作用的大学生，一部分目下还蔽于过去的习气，粘执于名词上的“前进”“落伍”，到实际政治上一混，都只知作小

喽啰争位置，变得油滑而诈伪，另一部分又因此反应，把生命与国家分开，游离起来，变得自私而小气，更有一部分却不知如何是好，日子过得沉闷而诈伪。少生气，志气小，气派小，胆量小是共通情形。一个报纸能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想方法来处理，建设一种健康人生观，对于建国应得的光荣，以及意义的重大，实在是极显然的！

本篇发表于1941年3月15日香港《大公报·文艺》第1051期，以及1941年3月31日重庆《大公报·战线》，均署名沈从文。

据香港《大公报·文艺》编入。

找　出　路

——新烛虚二

战事初起一二年后，许多人为了个人出路都感到惶恐，倒也近于人类求生存的本能，相当庄严，并非儿戏。这种恐怖最近于神经过敏的例子，无过于我相熟的一个年青朋友事情。这人经我介绍到上海一个最有名的机关供职，服务还不上半个月，战事一发生，别的问题不担心，却忧虑他个人住在五百万人口的上海，无米可买，吃饭发生困难。因此抛下工作，早早的就跑到一个出米省分去了。（吃了将近六年的大米饭，照理说，他应当胖多了。）至于最普通常见的例子，自应数神经衰弱的读书人跑银行。一般人所知道的，只是大学生为出路计争人经济系，准备站柜台，使得国家内办大学教育的人，不免有点丧气。即主持法商学院的，在学生注册选课时，虽相当兴奋，也许依然会对他们皱皱眉，想要问问："你们是来做那样的？"真的询问时，有些人将冲口而答："我是来找出路的！"正因为大学习惯，虽侧重在为社会培养应用人材，不尽是每个人都可望成为研究家。可是让学校成为下级职员训练班，负责人心中也不无痛苦。其实这个现象是不

能怪学生的，学生的老师，敏感而长于求生存知去就的即大有其人。作史地社会研究的，习外国文学的，考古的……作了专家教授以后，向“生活保险库”跑的人多哩。

有个某君，算是得国家供养唯一习南欧文学的一位，回国来不想到如何用十年工夫翻译一部《神曲》，或作点别的有益于国家事情，却入银行做了个“秘书”，他最得意处是不必办公，且可用公家便利从越港办点日用货物。通常常充满愉快神情告人说：“家中有最好洋酒，并养了几只洋狗。”他和酒，和狗，竟俨如三位一体，唯入银行方能完备。这个例子说来并不使人为其愚而自私好笑，倒令人为国家前途悲哀。础润知雨，从小可以见大，从这个人生活态度上，即可见一些人若不知自重，不明大体，教育即受得再好，也还是不济事。如空读了一大堆世界上第一等头脑写成的好书，做人方式却只学意大利水兵在上海过日子方式，到他成了上等人后，自然就会如彼如此安排自己！社会上像某君的一定常可以见到，所以我们就不必单独说打出路算盘的青年为失计，来责怪他们把个人生命看得那么小了。

用做生意作譬喻：有些人若只打量就地卖卖烧饼葵花子糊口，除糊口外对生命并无高尚理想或雄心大志，不能冒险去作其他大事业，也想不到脚下还有个丰富的矿床，只要稍稍使力就可挖掘开发，我们从忠恕处说，还应当称赞他们“知足守分”为合理。因为国家的重造，固然需要许多有作为的年青人，抱定宏愿与坚信，好好努力学习理解一切艰深问题，学成后再来担当重大工作，战胜环境，克服困难，在一堆破碎瓦砾中重造一个比过去更完美的国家。但也不可少另外一种人，即一生最高理想，只是有个安定职业混日子，养

家活口，头脑简简单单，衣服干干净净，待人诚诚实实，作事规规矩矩，年终得点例有奖金，即换颗金戒指，买双好鞋子，或储蓄给家中作儿女教育经费，或买张什么储蓄券，一家人就常常做无害于人有益于己的头奖梦。……说真话，社会的稳定性，原本就是要这个中层份子的知足守分，方能得到的！社会的繁荣，也不可缺少这种人的！在建国上我们亦不能把这个“知足守分”的好处去掉，为的是他在一切组织机构里，都有其良好普遍的作用。

至于作秘书消化洋酒一流人物，我们当然不必存什么希望，因为根基已定了，就让他那么下去也不妨。这是一种时代的沉渣，过不久会有方法滤去的。可是对于年青人，却又依然还容许我们保留一点希望。即这些人有了“生活”出路以后，一部分也许能学会反省，或生活暇裕时得到机会反省。到那时，他自会打量到生命的出路。会怀疑生活虽有着落，生命是否即有意义？很可能将感到一点烦闷。这对个人就是一个转机。因为他如果是个身心健全的年青人，还会有勇气从那个安乐窝中跑出，接受变动时代所应有的压力与教育，重新找寻根据，创造他的事业，发展他的生命。他若未离开学校，也许还会有勇气重新起始在别一系院再念几年书。这个重新安排的方式，与我前面说的社会稳定性也并无矛盾处。因为跑银行只是一种风气，当时出于个人出路的关心，风气一成，多数年青人自然便不大思索的一齐跑去。然而事实上就中却有一部分年青朋友并不宜从那个单调而沉闷工作中讨生活。到社会上一般事业发展比较平均，国家设计又见出在鼓励有作为年青人从多方面发展时，银行职业生活的单调，就恰好成为一个自然的大筛，必将把不安于单调的年青人筛

出。这也正是从去年起始，到处听到朋友“从银行跑出”的一个现象最合理解释，年来大学校的学生，习理工文史的，多成绩较好学生的原因。这个转机对个人得失虽不可知，对国家社会大有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这转机据个人私见说来，还可以从一种设计上加强他的作用，并防止在未来一时的社会变动，产生那个回复现象。年青人的做人良心，是容易激发的。正因为生活与社会还隔一层，不大贴近实际，追求抽象原则的勇气，照例即比“为衣食谋”的糊口打算为强。廿年来这个勇气表现于五四思想解放上，表现于五卅群众兴奋上，表现于北伐与军阀争斗牺牲上，无不见出自尊心的觉醒，用得其当，所能产生的作用如何大。再从北伐统一以后的种种政治思想纠纷上，又见出自尊心觉醒以后，若用不得当，亦可能产生多大作用。至于这种做人良心激发的方式，可说完全是新出版物安排成功的。然而到现在，由报纸副刊成为杂志，由杂志成为单行本新书，再由这个关系产生一个新出版业，将出版物当成商品之一种作大量分配，除了它已经能稳定出版业本身，此外“理想”竟好像完全说不上了。即出于政治设计，从用钱方法与数量上看来，也见出认识这问题还不清楚，至多不出于点缀性质。居多从最小处下手，末了甚至于并点缀作用亦有限。即以若干公家新闻纸运用而言，放弃了“教育”理想，惟重在报告一点大体相同的消息，并吸收广告收入，以收入多表示为成功，这比大学生跑银行找出路，情形即完全相同。虽繁荣了一般商业，支持了新闻纸本身，其实也就见出点堕落的倾向。是事势的必要，还不过是风气的会趋？我将说，这也只是出于一种习惯而已。习惯已成，便不免有点积重难反。用广告维持报纸，是上海申新二报产生存在的原因。唯

其是商业报纸，又在租界内有所凭藉，所以即可用社评与论文对于国家大计有所表示，而且将这种文章公诸民众，亦可用副刊娱乐并教育一般读者，增加他们一点常识与兴趣。辛亥革命后多了些政党，"机关报"即由此而来，意即在朝在野都可花钱来办报，各在自办报上发表对于国事主张，并用来批评攻击另一党派。到民八风气一变，国家权势只在一批北洋军阀手中转来转去，一到内战发生时，除了报上有军人相互责难电报外，就是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先生代黎元洪草拟的息争四六文电。各党各派的政客，虽亦常常有文电在报上发表，事实上已将精力直接表现到议会会场上，所以报纸上登载他们打架抛墨盒的消息，还比通电有些作用，为的是引人发笑！然而五四前后报纸上却另外来了个新玩意儿，即名流学者来为副刊写文章。小至于短诗，大至于玄学与科学论战，国外第一流学者的演讲，……无不从报纸上介绍给读者，煽起年青人对于国家重造的幻想和热情。五四学生的表现，五卅工商的表现，北伐军人的表现，无不反映报纸所产生的作用。这作用到北伐成功新出版业兴起时，即已完全失去，为定期刊物或单行本所代替。然而几个著名报纸，社论来论尚保留一点批评国事检讨社会的能力。到战事发生后，一般报纸似乎就只有将可发表的新闻，各列标题发表，以及推测战事说点国际预言的功用了。因此报纸差不多都少个性，少特性，也逐渐失去了本来的作用。商业报纸有时为广告拥挤，竟将社评地位移作广告用，大报纸既只能看看新闻，所以小型报纸有了个试验机会。

从去年冬天起始，昆明市凭空多了好些周报，不到半年中，并且就见出一点选择淘汰作用。销路好的竟能每期到一万份左右，可望作到以报养报的方式。证明在一个较新编排

方式下，还可给读者许多有益的影响，取得读者的爱重。只要认清对象，即可教育对象。近来且听说还有好些同类报纸在准备出版，这自然是个好现象。因如果负责方面各能就一方面长处好好发展，却又有个共同目的，即将报纸和读者关系重造。资本较充实的，还可定期定量为读者印行多种有价值的小册子，属于世界学术或普通常识的性质，一一印出，报纸读者均可用最低廉价格得到。一年后，即以昆明市而言，一切情形会不同多了。所以我想这正好作国内各地方办报的一种试验，即无从引起大报纸的革命，也可以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将小型报纸作用提高。或尽多数找出路的大学生，明白个人出路甚多，从银行跑出还有更宽广的天地可以好好发展，或鼓励公务员与一般从业员，知爱好，肯上进，用一个健康态度去学习一切，就可以将我们个人和国家发展，打成一片，毫无冲突，好好的来接受这场战争所应有的困难与成功！报纸本身的出路也可望除广告收入另外还有一种意义，足使办报的人对于工作重新得到神圣庄严感！这种神圣庄严感本来是固有的，可是却被一个不良习惯差不多毁尽了。代替而来的只是一种无尽期的疲乏，以及受限制说不出的痛苦。谈到这个现象时，我们实值得对一切报业前辈的努力尊敬与同情。因为他们曾经战斗过来，而且个人方面也居多并未放弃将新闻纸重造的理想。可是习惯不容易改正，恰恰如五十岁银行家不能改习地质，这事只好让二十四五岁的年青人来作了。我希望国内各大都市，都有许多小型报出现，每个新出的小报，都能抱有这个新的态度和社会对面！

本篇发表于1943年7月7日《民族文学》第1卷第1期，署名沈从文。

欢迎林语堂先生

林语堂先生到了昆明，正如某先生说的，“在中国当他为外国人，在国外又当他为中国人”，因此近几天本市大小报纸，都有些文章介绍批评林先生，西南联大且特别欢迎林先生作一次公开讲演。综合各方面印象来说，似乎可归纳成为三点；一为“林先生是幽默提倡者”，二为“林先生是个写中国问题中国生活中国故事给美国人民看，用中国事哄美国人的作家”，三为“林先生在国内所标榜的趣味；影响既不大好，在国外所使用的方法，影响也不大好”。这个说明实近于一般人对林先生十年来工作态度和工作效果所具有的真实反应。到联大讲演情形稍稍不同。学校中多少尚有点北方的传统超功利学术空气，对林先生文章实表示相当尊敬，对林先生工作又还保留极大希望，大家都乐意瞻仰瞻仰林先生，并听之谈谈国外观感。所以当天站在空地上听的数千余人中，就可发现不少联大同事。正因为原来对于先生期望相当大，到结果或不免失望。林先生平日以善谑见称于世，从林先生所涉及的问题看来，实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即所说的不必当

作十分认真讨论。社会上一般人对林先生认识固不免模糊，林先生对两个国家人民情感理性，通过长短不同的历史，所形成的文化与文明竟好像更加模糊。

林先生作品过去虽受欢迎，（如《论语》，在中国行销，别的作品在国外行销，）这个意义林先生实明白？近于一种风气所作成，与一个文学家思想家应得的尊敬稍稍不同。林先生机会相当好，但是机会可遇不可求，可一而不可再。若来昆明真如一般传说，是为找文章材料，到处看看，看过后便仍照过去的态度和方式，加以处理，所能得到的效果恐怕只是个人的成功，与国家这时节所需要于一个公民能尽的责任便不大相合。至于近六年来国家在忧患中，社会的巨大变动，与多数有良心的公民，对于接受这个历史教训时所抱的态度，如何从严酷试验中忍受与适应，具体负责方面如一般官吏公务员，抽象负责方面如教育界分子，一面陷溺于事实泥淖中辗转，一面如何对于国家重造问题抱有多大热忱和信心；五百万朴质壮丁与千万优秀青年学生，一面如何为制度积习与本来的弱点困惑，感到痛苦，然而在痛苦中又如何依然忍受下去，慢慢的从牺牲里将民族品德提高……如此或如彼，希望由林先生从文学作品来介绍解释给英美友邦多数人明白，增加两国战时友谊，以及战后进一步的了解与合作基础，这个愿望恐不容易实现了。有人说，林先生的态度与兴趣分不开。林先生的年龄虽已到“知天命”界线上，精神可像年青得多。或因为在美国太久，生命中还充满“游戏”感情，因之所能作的也就是用“中国”作为题材，供给美国普通社会以“杂碎”，这个关系中即贯穿以游戏情感，且从这个关系中树立自己。在这点上就有个小故事可供参考。

林先生既准备来看看盟友美空军，这个故事似乎还有意义。在昆池附近一个小县分，有个某国教堂，还住下几个虽受政府限制不许离开却仍可在当地走动的传教师，另外有个盟邦小小机关，机关中却有两个行动虽极自由，行为实不能和这些传教师发生关系的盟友。由于寂寞或其他原因，他们依然相熟了。有一天，这个盟友正看林先生的《吾国与吾民》，那传教师就说，“看这个能认识中国？你得先看看中国再读它，方知道这是一种精巧的玩笑！中国的进步，中国的腐败，可都不是玩笑！”于是林先生这本书，被这个身分可疑的传教师一说，搁到玩具中去了。这个故事可不是玩笑，完全有根据的。英美新闻处为国际礼貌，空军招待所又为另一原因，都依然会把林先生的著作，继续陈列出来，供给国际友人阅览。可是想起这个关系恰在并非玩笑的时节，美国“大嘴笑匠”也老老实实到国外来为国家服务，林先生的作品却只能产生玩笑印象，是不是十分可惜？友邦事重效果，我们这个国家也在学习明白效果好坏的时候，所以我们欢迎林先生，实希望林先生尚能作一点更有好效果的工作。

凡活在中国当前社会中，稍有做人良心的知识分子，都会觉得活下来实在太痛苦了。这与林先生所说的“穷”关系就并不多。人固然是个动物，需要活得比较“幸福”，可是它比别的动物又稍微不同，还需要活得尊贵而有意义。他们眼看到这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一面是积习所形成的堕落因循，如何保留在若干人的观念行为上，或组织制度上，一面又尚有若干理想与热忱，如何培养在一切具有健康身心的人民生命中。两者到处有冲突，一时既难于调整，所发生消耗现象便万无可避免。社会动力既受习惯缚束，挫折复挫折，因之

一个民族在战争中最需要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便只合听它逐渐消耗于许多不相干问题上，终于使负责方面上常常陷溺到一个无可奈何情况中。某些事竟俨若任何具体法规或抽象原则，均无助于转机的获得。就中弄理工的，对国家重造所抱幻想，或为“衣食足而礼义兴”，努力在争取将来生产技术。弄文学哲学的，自必认识到经典之重造的重要性。然就近二十年教育发展说，习哲学偏重于书本诵读，文学更偏重章句知识，人虽若不离“书本”思索却离了活生生的那个“人”。因之乡愿学究者流，一面生活中尚充满算命圆光鬼神迷信，一面却以思想家身分领导群众，到耐不住生活寂寞，却因缘时会自到自见时，进九锡铸九鼎等等打算，亦无不可从这类新读书人圈子中产生。所谓经典之重造，这些人当然无分。这个时代已非用格言警句建立单纯抽象原则，即可济事，还要些别的条件。从近二十年社会发展上认识，新文学作家与读者所保尽的关系，却可以从文学作品中来作有关人生一切抽象原则重造的工作，工作固相当困难，因与之对面非事物约柔韧性和适应性，都并不容易克服。另外一种习气，即战前十年来文学受商业与政治两种势力的牵制分割，想突破一切障碍，更必需作者对民族忧患所自来各方面具有深刻理解，且抱定宏愿与坚信，如战争一样，临以庄敬，面对问题。岁月积累却坚固不拔，方可望有所成就。国内作家近十年来，见解或有分歧，成就更有浅深，可是目的却大都在同事一点上。林先生年近半百了用中国抒情所得于己者似已不少，金钱收入虽万无限，生命付出实可屈指计数。子在川上有“逝者如斯”之言，林先生宜有同感。

林先生的旅行昆明，为认识中国而来，林先生值得用一

个比较庄敬的态度好好认识认识现代中国，如写作又为介绍美国人认识中国，林先生更值得好好认识认识当前的自己一支笔若能比较庄敬来从事于明日工作有助于两大民族的理解内容有多大。“圣贤”“英雄”的期许，通达如林先生，或以为近乎争名于朝，名分实不足争，我们盼望于林先生的，只是“庄敬”。当前中国做一个真正公民的应有素朴态度而已。

本篇发表于1944年1月1日《昆明周报》第68期，署名上官碧。

田汉到昆明

谈起近二十五年中国话剧运动时，有三点可以引起人特别注意：一、介绍外来的，二、创造新东西，三、工具的重造与工具的应用。

第一是几个书呆子充满新的理想，来向旧戏攻击，以为戏剧必需走新路，从外国取法，让戏剧和社会人生接触，方能够成为社会重造思想解放工具。在介绍外来作品工作上，因潘家洵先生的努力，中国读者知道了易卜生。因杨丙辰先生的努力，中国读者知道了德国许多作家和作品。至于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更重要位置的莎氏比亚的作品，都是田汉先生努力翻译成为中文的。论思想作用，当时易卜生的作品影响大，为的是许多人家中有学娜拉或同情娜拉的女孩子，论分量沉重，以及从一个戏剧所处理的问题上，可发现与当时正流行的“人生”“恋爱”“矛盾”“殉情”等等名词相会通，使读者取得一种传奇抒情诗气氛的浸润，田汉先生的译述工作实在特有时代的意义。

第二是当时文学运动理论既然是“工具重造”与“工具

重用”，如何重造？试从初期戏剧创造成就上看看，会觉得一般成就是每个作者都不免受问题所控制、所束缚，因之写不出什么好东西。若与当时小说成就比，独幕剧在任何一方面不免相形见绌。转机之来是两个作者，从一新的观点下笔，将问题重新处理，不约而同用写短篇小说方式，来写独幕剧。在北方，丁西林先生于作品中注入一点幽默感（北方沉闷专制局面下无可奈何的幽默），因之得到十分成功，剧本同样在南方各级学校游艺节目中，成为重要节目之一。我说的“游艺节目”，实相当重要。因为除艺专的戏剧系外，这是培养近十五年话剧人材一个主要供应来源。当前的知名剧作者和导演，如曹禺、李健吾等等，就是在中学时代那么玩票得到成功，因而从事戏剧的。在这个工作上，田汉先生且更有其重要贡献，即他领带的南国社戏剧活动。不仅培养了许多年青学生对于戏剧的热忱，并因之由玩票而下海，用一个职业剧团方式与多数观众对面。尤其是剧团在一个共有共管制度下，苏州杭州各地的旅行表演，定下了理想职业剧团的基础。（话剧的侵入电影，使国产影片由荒唐武侠变而为人间爱怨，田汉、洪深、欧阳予倩三先生，应分有国产电影领导者的光荣。）

第三是工具重造与工具重用，不仅只是写作，还有个具体运用问题，旧戏价值由受攻击到受注意，有一段历史值得提及。先是无保留的谩骂，得宋春舫先生出而辩护折中，以为戏有新旧亦不妨。新尽可以新到未来派，牵只狗从台前走过而完结。旧也应当容许一切照旧，为的是可以当成歌剧看。这是民十左右事情，待到民十四五，几个从国外回来教戏剧的年青教授于是不再骂旧戏，张彭春、张嘉铸、余上沅……

一面教新戏，一面也间或听听旧戏，或和梅兰芳吃吃茶了。此后梅兰芳两次出国，得到完全成功，就亏的是得到这几个人帮忙合作。然而这成功只能说是旧戏在国外一度试验，即成功与新戏改良无关系。唱改良旧戏的是王伯生先生，然而他只着重在唱，在主角特别能唱，并无旧戏真正重造与新戏混合试验。（广东人在这方面最大胆，白盔白甲的吕布在台上旋转方天画戟时，身旁即有个穿洋服的朋友拉小提琴伴合，然而闭目试想想，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写历史剧从郭沫若先生到最近，作家相当多，也不能说是真正不改良。近闻田汉先生却注重在战时改造旧戏，改造的结果不得而知，改造的企图实需要勇气和耐心。更令人钦佩的是田汉先生的戏剧活动的对象不是在后方有钱多闲观众，使戏剧成为后方都市点缀品，却永远站在第一线上工作。南国社时代，带着一群青年朋友吉卜赛人一般各处去跑去表演，还不太困难。中日战争发生后，田汉先生带领剧团在前线部队中，而且长沙的争夺，衡阳的保卫，部队前进时，间或还比若干部队先到一步；后退时，又照例常常比殿后部队还落后。八年来中国战局的种种变化，田汉先生在每一次变化中，随着部队的转移，自己经验了多少痛苦，又见过了多少使人痛苦的兵士、农民、资源、财富的糊涂牺牲！写文章的人喜用“战士”二字，这才是一个真正充满时代经历的战士！无怪乎有人说田汉先生白了头发。

只要心不灰，头上白了一把头发似乎并未衰老，不过一定也相当累了。最近他来到昆明，昆明的阳光和空气那么好，是能恢复身心疲劳的。虽今年寒冷稍稍失时，每雨必挟雹子，变化不易揣测，然而天空究竟明明朗朗的时候多。一般欢迎

田汉先生不是讲演就是吃饭，讲演时可给多数人瞻仰一下丰采，吃饭时大家可无忌讳的谈谈闲天，可是一定也相当累人。个人觉得最好的欢迎，或者还是让田汉先生在明朗阳光和清新空气中，得到一个短时期的休养。为的是敌人在海上失败了，在大陆的挣扎战争正在发展中。且即如一般希望，二年内战争可望胜利结束，我们为国家重造，为与世界各处其他有组织的优秀民族竞争生存，理想站得住脚，不至于倒下，还得好好努力十年二十年！在当前、在未来，各方面都还需要真正战士！田汉先生将重新站在第一线上为民族国家而工作，是无问题的。

本篇发表于1945年5月9日《贵州日报·新垒》第23期，署名上官碧。

谈　沉　默

近一时期来，书呆子或半书呆子，都必然有个相同的白日梦，梦到自家会从“变”中得到一个转机，明知道情形困难，总以为这依然是解决行将到来的明日更大困难应有的勇气与诚意象征。表示这点愿望或有许多方式。除用笔、用口、用行为外，还有更大多数即用“沉默”来期待。用笔的可以检查受限制，用口的或因疲累得休息，用行为的自更容易处置，或使之软化，无可奈何，或……唯有沉默，在不变中继续生长沉默。

这个多数沉默，从表面上看，也许近于消极。可是很显然，实能酝酿生长一切幻想并作否定行为准备的。它如水，在平衍土地中浸润，在沟渎中涓涓流注，然而流注所及，则粉碎磐石，使山峡刻划成千尺沉沟，它本身则柔濡平静，在风涛激荡中，所掀起的白浪，万斛广舶与坚固堤防到时亦必然失去效用。它受点热，即能融解一切不甚牢固的粘合物并能变成气体，推动机械，使无情钢铁发生有规律的动止。它太冷，将结成冰，正由于体质一变，凝固时，便依然有崩崖

绝岸的作用，或冻死地面草木人畜，以及人力所培养的种种，寄托希望的具体物质和抽象观念。总之，它能生长，也能消耗，能否定，能破坏，善体国经邦者，真不能不注意及此！

在变的动力中，我们当前所见到听到的，照旧把“沉默”一群除外，为的是既非党团，又无表示，且决不曾要求这样那样，当事者总是如何安排调整用笔，用口，用行为的一部分主张愿望，而有种种不同计划。然而同样一名词，同样一口号，且很可能即同样一件事情，一个问题，解释它，运用它时，不可免到某一点，即见出龃龉，见出扞隔，见出分歧。既各有所持，各有所恃，于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才产生出来对付当前局面。问题暂且搁下，且听下回分解，等待下去，大家自然等待下去，这件事若是某茶社请刘宝全唱大鼓书，观众中少数无理取闹说：“不成，老调子得换。”刘老板以为有损大艺术家尊严时，可以说：“这事由我，不能起哄，我有权力和责任安排节目，不能由少数观众随意点戏！”于是怒而退场停演。这很自然，因为□会习惯。既是个第一流的艺术家，应有一点对艺术尊严态度，不如此，即不成其为刘宝全。俗语虽说历史就是戏，国家事究竟和艺术不相同，大政治家也可以有大脾气，这属于“人性”，我们承认，政党中尽管有人间或不免采取不正常活动方式，这出于“现代”，我们也得承认，然而多数不声不响，沉默的一群，凡用爱国作口号的任何方面是不能不注意到的情形。他们在各种难于形容困难中挣扎，从事于各种工作，尽一个战时公民责任，眼看到这个国家近三十年的种种，寄托到这个国家内，又不能为普遍观众，无戏可看时，即抽身走路，即能走，向那里走？还不是从学校、从机关、从工厂……走回那个凄凄惨惨

的家庭？家中太太，儿女，都已饿倒了，他怎么办？他也可以狠心不管家，但不能不想到国，想到社会。为的是他们工作与国家社会荣枯不可分，要国家，爱社会，实并不下于任何集团政党。他识字，固然容易受宣传工作的影响，但也能就耳目接触为“事实”所吸引，换言之，能认识好坏是非。就中为人自尊心较强，对工作信心较深的，或者换于势拘于习，即在更困难痛苦中，也必然还能守住公民的责任防线，沉默忍受。为人不甚自重，又欲从变通中有以自见的，或尚可望在无可不可情形下，成为罗中一雀，跳跃媚悦于主人笼罩中，对年青人他还见得相当“前进”，对实力派他又像个“同志”，涉及国事弱强，则他不必分谤，有什么好处，又多少可以分润到一点剩余，如此一来，不仅无害于局面的继续，且可产生一点支持场面作用。然而还有一辈从帮会组织，社交方式，以及其他玩意儿，求得现代政治以空易空的争夺群众与立场的秘诀，因缘时会，乘时崛起的人物，他们叫喊、活动，而且随时又若都可以与极端前进或相当顽固的势力从某一点上相结合。一切现象都见出社会的分解，由分解中更容易失去拘束力或向心力……如目前情形，负责诸方面，若用意只是在对于统治下的公民容忍限度的测验，沉默的一群国人自不足着急，因为的的确确，容忍的尚能容忍，腐败堕落的也在加紧腐败堕落，还不到那个最大限度。不过一个私人债务可以延宕，一个国家的问题，却无从支吾逃避。说句公平话，中国广大土地勤俭人民实无负于国家，而近来其所以有问题，实由于负责者有些方面能力不大充足，而又缺少勇气，国家待处理的问题，得重新好好处理。假若注意点仅仅从“负隅自固”方面引起了烦恼，可以用各种方法自解。

假若注意点是社会广泛普遍的沉默，从上级公务员到一个普通兵士，从第一流优秀专家，到一个单纯农民，看到他们在沉默中的忍受与挣扎，以及共同的愿望，多少会引起一点悲悯引起一点爱。会学得如此土地，如此人民，忧患所自来，不能不说是近三十年私与愚所占分量过重。且不能不说，这个习气弱点是得由有些方面坦白承认，才能用一个新的作风来代替的。一个伟大政治家之所以伟大，也即在善用这点悲悯与爱，如何图与民更始。以上虽属于个人私见，恐亦可以作为一个历史家和多数正直公民的意见。

本篇发表于 1945 年 5 月 11 日《贵州日报·新垒》第 24 期，署名沈从文。

见微斋杂文

见微斋杂文

JIANWEIZHAI ZAWEN

本集为新编，集名为编者所拟。收作者1943年6月～1947年1月间发表的杂文5篇。

见微斋笔谈

——小说上吃人肉记载

小说既多子虚乌有记载，所以记吃人肉事实不少。《西游记》可说是这类荒唐叙述最完备而有条理的一部书。不仅白胖胖的三世男童三藏法师，常有被丢入蒸笼的危险，即大耳朵猪悟能先生，不再作高家庄员外女婿，随同师傅走入正道后，也不免时常被小妖精刮刮洗洗，几乎上了蒸笼台盘。不过吃人肉的多是妖精，虽夸大吓人，因综合幽默，且吉人天相照例得救，即不使人恐怖。说公案小说有“人肉包子”、“醒酒汤”记载，多山砦中人把戏，也照例是好人得救，记述既成俗套，所以真实性即因之失去。这个问题倒是唐宋以来篇章较简的传奇和笔记，有些写得十分惊人。《开河记》记麻叔谋为炀帝开运河，被下马村陶郎儿把小孩子蒸熟哄当羊肉，吃上瘾后，因此大吃特吃，恰如真有其事。记称——

> 叔谋既至宁陵县，患风痒，起坐不得。帝令太医令巢元方往视之。曰：“风入腠理，病在胸臆，须用嫩羊肥者蒸熟，糁药食之，则瘥。”叔谋取半年羊羔，杀而取

腔，以和药未尽而病已痊。自后每令杀羊羔，日数枚，同杏酪五味蒸之，置其腔盘中，自以手臠擘而食之，谓曰“含酥臠”。乡村献羊羔者日数千人，皆厚酬其值，宁陵下马村民陶郎儿，家中巨富，兄弟皆凶狠，以祖父茔域傍河道二丈余，虑其发掘，乃盗他人孩儿年三四岁者，杀之，去头足，蒸熟，献叔谋。咀嚼香美，稍异于羊羔，爱慕不已，召诘郎儿，郎儿乘醉泄其事。及醒，叔谋乃以金十两与郎儿，又令役夫置一河曲以护其茔域。郎儿兄弟自后每盗以献，所获甚厚。贫民有知者，竞窃人子以献，求赐。襄邑，宁陵，睢阳，所失孩儿数百，冤痛哀声，旦夕不辍。虎贲郎将段达为中门使，掌四方表奏事，叔谋令家奴黄金窟将金一埒赠与。凡有上表及讼食子者，不执其词理，并令笞背四十，押出洛阳。道中死者，十有七八。时令狐达知之，潜令人收孩骨，未及数日，已盈车。于是城市村坊之民有孩儿者，家做木柜，铁裹其缝，每夜置母子于柜中，锁之，全家秉烛围守。至天明，开柜见子，即长幼皆贺。

事本佛经师子国王事。经中后段情事发现时，国王即变一大鸟，飞入深山，发愿要吃和尚一千人。至收捕九百九十九个和尚后，仍为凑足一千个数目，特为说法，方受点化。《西游记》中吃唐三藏某回，就是根据这个故事改编成功的。小说家言近乎事实的，应数张鹭《朝野佥载》，记武则天时薛震吃债主事。因为有点赖债意味，结果挨一百杖打死。

周杭州临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债主及奴诣临安，

止于客舍，饮之醉，并杀之。水银和熨并骨销尽后，又欲食其妇，妇知之，逾墙而遁以告县令。县令诘之，具得其情。申州，录事奏，奉勅杖一百而死。

庄季裕《鸡肋》，却叙述到靖康山东各种吃人时情形，被吃的且有各种美好切题名称，使千载后人犹感觉恐怖，恐怖中见出悲悯。因时移世乱，历史所常在，这类事也难免不发生于不可想象情形中：

唐初，贼朱灿，以人为粮，置碨磨寨，谓啖醉人如食“糟豚”。每览前史，为之惊叹。而自靖康丙午岁，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资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汎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瘦男子庾诃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之“百美羊”，（《说郛》本作百美羊，涵芬楼排印本作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

欢喜吃腊肉和羊肉的人，一定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种腊肉羊肉。然在宣和时尚有许多人吃用人脑炼熬的油，吃过后还不知道的。《鸡肋》称：“宣和中京西大歉，人相食，炼脑为油以食，贩于四方，莫能辨也。”至如读书人被吃事，宋苏耆《闲谈录》曾记载过，事在黄巢寇乱时代，大致因读书人柔弱无能，不能舞刀弄棒，随同造反，所以只好杀来吃。—

时不尽，还用马拖去。就中特指儒生，似黄寇有意对读书人过不去：

> 黄寇之乱，儒生多被擒戮，未暇烹脔者，用一驴拖二人，交缚其手足于鞍上，面相向于腹下。有相识同罹此患，乃谓曰："何不幸相逢此地！"

就记载看来，这类事，多兵乱饥荒年头发生。亦有在承平时代阔人要人具有这种特别变态嗜好的，如赵与时《宾退录》所载唐末五代宋初时事：

> 知钦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削籍，隶海南，天下传以为异，谓载籍以来未之见。予记《卢氏杂说》：唐张茂昭为节镇，频吃人肉，及除统军，到京，班中有人问曰："闻尚书在镇好人肉，虚实？"笑曰："人肉腥而且臊，争堪吃？"《五代史》：长从简家世屠羊，从简仕至左金卫上将军，尝历河阳，忠武，武宁诸镇，好食人肉，所至多潜捕民间小儿以食。《九国志》：吴将高澧，好使酒，嗜杀人而饮其血，日暮必于宅前后掠行人而食之。又本朝王继勋，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时屡以罪贬。后以右监门卫率府府副率，分司西京，残暴愈甚。强市民家子女以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而食之，以楷楔贮其骨，弃之野外。女侩及鬻棺者，出入其门不绝。太宗即位，会有诉者，斩于洛阳中。

就这个记载看来，林千之吃人肉，不过充军海南岛，倒

像是法律上无条款，把他就近放逐了事。张茂昭却一面吃一面升官。长从简屠羊世家，所以知道“和骨烂”最好吃。高澧用人血作醒酒汤，从他公馆门前过身的人，真不免捏一把汗，万一被捞住，就准完事。不过机伶一点绕弯儿走别条路，也许就免了。王继勋倒像是因为大王身分，所以专吃不肯听话的用人，若得信任，就不用担心，普通更无干系了。不过棺木既出人不绝，厨房中大司务之忙碌，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个人家的菜单若留下来，一定是很可观的！

至若《燕丹子》上说的斩美人手用金盘奉上，不过是表示豪爽爱士，与食欲实不相干。间接与饮食有关的，《世说·汰侈》篇称：

>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处斩美人。王丞相（导）与大将军（敦）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虽非直接将人烹煮，却用杀人劝酒，且杀的多是美人，侈而残忍，可见一般。变本加厉，就成下面故事：《朝野佥载》记隋末诸葛昂好侠，与客竞豪，相互请酒，到后主人故意派一女人劝酒，小不如意，就令妓女退席，过不多时，这个妓女就已被蒸熟，锦衣浓妆，端端正正坐在一个大盘中，送上席来。主人把盘中妓女衣裳拨开，用箸挟奶子肉劝客。客不敢下箸，便自己蘸盐沾醋大吃数口。客屈而吐，于是胜负始分。可算用人命赌豪奢最荒唐一个例子。

也有同样吃来吃去，却像是必然如此的《宋人谈选》记柳开事，正如《水浒传》鲁提辖打郑屠户，异曲同工，生动俨然，给人一痛快豪爽印象：

> 柳仲涂开赴举时宿驿中，夜闻妇人私哭，其声婉而哀。晓起询之，乃同驿临淮令之女。令在官恣贪墨，委一仆主献纳。及代还，为仆所持，逼其女为室。令度势难免，因许之，女故哭。柳素负节义，往见令，诘其实，令不能讳，悉告柳。柳忿怒曰："愿借此仆一日，为子除害。"仆至柳室，即令往市酒果盐梅等物。俟夜阑，呼仆入叱问曰："协主人为妇是汝耶？"即奋匕首杀而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饮，云"共食卫肉"。饮散亟行。令往追谢，问"仆安在？"柳曰："适同食者乃其肉也！"

史传上富于小说意味的，当数汉高祖"分我一杯羹"流传最广。正因为不成事实，所以虽违礼犯教，仍为读书人一典故。脍炙人口的，是张巡许远守睢阳，杀爱妾享士情。因一面为其所私爱，一面为保国土，激励士气，因之虽情形残忍，却仿佛有悲剧的庄严性。流通于生死之间，于古今之间，生者死者，具得净化，与其它笔记惟增人恐怖丑恶感者，不同多了。

正史上记载这个事情极凄惨怕人的，无过于宋范祖禹《唐鉴》所称唐昭宗天复元年九月帝被朱全忠困围在凤翔城中情形：

> 是冬大雪，城中食尽，冻馁死者不可胜计。或卧未

死，肉已为人所刮。市中买人肉，斤直五百，犬肉直钱二千五百。茂贞储备亦竭。以犬彘供御膳。帝鬻御衣及小皇子衣于市以充用。

人肉之贱，只及犬彘五分之一。帝王被迫吃狗肉，且把着身龙袍和小皇子衣服卖去，供零用钱。不过比起梁武帝却强一些，因为还不曾饿死！

民国以来，也有一件实事，似在民十三四左右，平汉路孝感附近某小站，站旁有个开店卖肉包子的，包子馅多，味道特别肥美，与别家不同。后来偶然发现，系读小说，学会用药酒醉倒客人后，便即下手宰割。数年中已有四十多条汉子都成了包子馅儿。报纸传述，因之从平汉线上坐车来往的客人，有好些时候不敢吃沿线小贩的馅儿包子。这事说来，也将近有二十年历史了。

然而，普通学生却只知道二十年前鲁迅先生《狂人日记》有人吃人的狂话，和用馒头蘸人血治痨病的故事。为的是小说比新闻影响深，流传久。

然而现在当不会有人还想到吃“和骨烂”可以治病的事情了，不过变相的行为和愿望也许还将继续下去。再过半个世纪，在广泛民族中有个新的人生态度建立起来后，方可望去尽。现代在世界上各个地面大规模进行的战争，岂不就正是“这个要吃那个不甘心被吃”因而产生的！

本篇发表于1943年6月1日《文学创作》第2卷第2期，署名沈从文。

宋人演剧的讽刺性

做戏的“打诨”，是历史上特许的专利，这种专利的获得，实包含一点儿不光荣的传统，即“帝王弄臣”。但枚乘、司马相如词赋之臣，当时也一同待诏金马门，同样有帝王弄臣意味，所以这种不光荣也只是指它当时在帝王身边的抽象地位，并非指它在社会上的抽象价值。若就讽谏而言，在春秋战国时代，它的重要有时即恐怕比读书诵诗的儒者还切于实际，而容易有作用，见效果。“优孟衣冠”这个典的由来，即证明它的作用和效果，针对问题为当时儒者所不及。初期的戏既把讽谏和调笑两种成分相混，戏的本色长处是能机捷取巧，一语破的。短处偏重谐谑时，则易成琐亵，先或尚保留侏儒专事讽谏长处，后乃衍为纯粹调笑取乐，“漆城荡荡，寇来不得上，”成为千古讽谏佳话；到柏梁台联句，郭舍人说的“嚼妃子舌甘如饴”就近于专寻开心了。

唐代是个在佛道二教烘染下充满抒情空气的时代。事事都包含比赛精神，在娱乐方面更擅长花样翻新。文人做诗写小说，多见神见鬼的叙述描绘，等于用怪异抒情，所以不问

真伪，一例都写得极其生动俨然。在戏剧歌舞上，自然更多新玩意儿。旧唐书《曹确传》称：

> 伶官李可及，善音律，尤能啭喉为新声，音辞曲折，听者忘倦，京师屠沽效之，呼为“拍弹”。同昌公主除丧后，帝与淑妃思念不已，可及乃为《叹百年》舞曲，舞人珠翠盛饰者数百人，画鱼龙地衣，用官绡五千匹。曲终乐阕，珠玑覆地。词语凄恻，闻者涕流。

这个记载做出之于《杜阳杂编》。这还可说是追悼公主，逗引帝王开心，不免阔气一点。其实当时要人大出丧，场面也就够得会花费会玩了。《唐语林》说：

> 送葬者或当街设祭，……丧乱以来，此风大扇，祭盘帐幕至九十尺，用床三四百张，雕金饰画，穷极技巧。大历中太原节度使辛云京葬日，诸道节度使人人修祭，范阳祭盘最为高大。刻木为尉迟鄂公与突厥斗将之戏，机关动作，不异于生，祭毕，灵车欲过，使者请曰：“对数未尽！”又停车。设项羽与高祖会鸿门之像，良久乃毕。缠绖者皆手擘布幕，辍哭观戏。事毕，孝子传语与使人：“祭盘大好，赏马两匹。”……昭义节度薛公薨，归绛州，诸方并管内县于阳城南设祭，每半里一祭，至漳河廿余里，连延相次，大者费千余贯，小者三四百贯，互相窥觇，竞为新奇，柩车暂过，皆为弃物矣。盖自开辟至今，奠祭鬼神未有如斯之盛事也。

属于丧葬礼仪，尚可安排得如此豪华热闹，至于其他吉庆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唐代每当帝王诞日，有集儒释道作“三教论衡”故事。吏称徐岱，赵需，许孟容，韦渠牟讲佛老，始三家若矛盾，然卒而同归于善。帝大悦，赍予有差。白氏《长庆集》尚叙及在麟德殿内道场，沙门义林与道士杨宏元对垒情形。不过这事情说若极其庄严，其实却依然近于引帝王开心的杂耍节目一项。故高择《群居解颐》述及那个《叹百年舞曲》的大导演李可及摹仿大德高僧作三教论衡时，结果亦使得上意极欢，赐予颇厚。

> 咸通中优人李可及，滑稽谐戏，独出辈流……尝因延庆节。缁黄讲论毕，次及优伶为戏。可及褒衣博带，摄齑以升坐，称“三教论衡”。偶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妇人。”问者惊曰：“何也?”曰：“《金刚经》云：敷坐而坐，非妇人何烦夫坐而后儿坐也?”上为之启齿。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妇人也!”问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经》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倘非妇人，何患于有身乎?”上大悦。又问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妇人也!”问者曰：“何以知之?”“《论语》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倘非妇人，奚待嫁为?”上意极欢，赐予颇厚。

附会经典作证，不惟不以唐突李家玄元皇帝和孔子为意，及逗得皇帝大笑，赏赐甚厚，这就是我所说的抒情空气！无忌讳寻开心的抒情气分，既普及社会，影响到文学、艺术、

音乐、歌舞，当然都比任何一代还大得多。影响不到的，恐怕只是一些装模作样拘迂别扭的古文家脑子。说迷信，这种人才真真有迷信！一个李贺爸爸讳“晋”就不举进士，一个韩愈又费多大气力作《讳辩》，比起为三教论衡大笑的帝王，岂不是更迷信得多？

宋代是个理知时代，唐代人那点抒情气分，经过五代运用到歌舞男女方面，不幸成为江南西蜀灭亡张本，入宋后，风流宰相再不能用这个玩意儿和大统一帝王厮混，再被几个准备入孔庙配祀吃冷猪肉的读书人“子曰”一扫而光后，代替而来的就是说道理兴趣。因此一来，虽有帝王对于佛道的浪漫情感，加以渲染，也不成功了。真宗时代王清昭应宫的堂皇华丽，六七年经营，日夜加工，集天下名画手来竞奇赌异，末了却为一把天上无名火烧掉，放火的安知不是读书人？徽宗时代寿山艮岳又筑得不是时候，花石纲忙得令天下人不得宁息，神运昭功巨石，抬石头更忙坏了花腿兵士。可是末了金人围城，园囿中万千麋鹿花木，只合供城中兵民当吃的当烧的！读书人喜欢空说道理，表面上为辟谬理惑，去迷信，重事实，实在却仅争是非，辨真伪，立门户，生党见。时代禁忌益多，因之到处有反应。读书人如元祐诸党人，道学诸君子，使用于“人与人之间”时，即通通不肯放下这个武器，用来作反抗，否认，以及消极的攻讦。金人外患与新法内争，两者影响到宋代国运情形虽不相同，然共同却于社会中培养这个讽刺风气，直到宋末，形于诗词，见于小说图画，真可谓无所不至。尤以使用于杂戏方面，更见得大胆而泼辣，巧慧而明智。或就帝王面前讽刺国政得失，或在权贵筵席讥诮当局颟顸。许多国家大问题，幸臣御史说来有杀头充军危险

的，一个普通优伶，却常常于弦歌酒宴接杯举觞欢乐光景中，出之从容不迫，不以触犯禁忌为忧虑。虽说近于打诨，然所得效果，实意想不到。故《铁围山丛谈》记丁仙现事，当时即有“台官不如伶官”谚语。这类故事保留在并世文人笔记中，有些故事且因之即成后世通俗典故。

如以钦徽二宗北狩事作题目，《桯史》记一事。

> 秦桧以绍兴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赐第望仙桥，并银绢万两匹，彩千缣，有诏就第赐宴，假以教坊优伶，宰执咸与席。有参军前褒桧功德，一伶以荷叶交椅从之，诙谐杂至。参军方就椅，忽堕其蒙头，乃总发为髻，如行伍之巾，后有大环为双叠胜。伶指而问曰：“此何环？”曰“二圣环。”伶递以朴击其背曰：“你但坐太师椅，请取钱绢例物，此环掉脑后可也。”一坐失色。桧怒，明日下伶于狱，有死者。

真可谓胆大包天，因此下狱而死，意中事也。然而这种冒险，不仅施于权贵，有时且施于帝王。《贵耳集》称：

> 绍兴中，杨存中在建康，诸军之旗有双胜交环，谓之“二胜环”，取两宫北还之意。因得美玉琢帽环。进高庙。偶有一伶在傍，高宗指环示之，曰：“此杨太尉进来，名二胜环。”伶人接奏云：“可惜二胜环放在脑后！”高宗为之改色。

同一讽刺用之于权臣，弄得一坐失色，虽不免杀身，用

之于帝王，则只使帝王面上失色，并无下文。帝王在身分上得纳谏，所以同样事想来做戏的也不会赐死。这大约就是俗话说的“阎王不怕怕判官”了。

这类事有时若在公共地方表演，过于露骨时，或尚得牵连观众安全，所以《夷坚志》记《收三秦》打诨，点明题目时，即有观众散走情形。

壬戌，秦桧子禧，致昌，时龄，皆奏名，公议籍籍。至乙丑春，优者即戏场设为士子赴两官，相与推论知举官为谁。或指某某优长。曰：“非也。今年必差彭越。”问者曰：“朝庭不闻有此官！”曰：“汉梁王也。”曰：“彼是古人，如何来得？”曰：“前举是楚王韩信，所以知今为彭越。”问者嗤其妄，且叩厥旨。曰：“若不是韩信，如何收得三秦？”四座不敢领略，一哄而去。

正与孔融讽曹操为曹丕纳甄氏，引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异曲同工。

讽刺用之国事，亦有因之成功的，《独醒杂志》记废折十钱事，可作一个好例。和新法推行时郑侠绘《流民图》假驿传上奏，影响新法一样，若用现代人语调，则可谓“艺术救国”，无独有偶。

崇宁二年，蔡元长建议为折十钱，民间不便。优人因为卖浆者。或投一大钱，饮一杯而索其余。卖浆者以“出市未有钱，可使饮浆。”乃连食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钱，奈何？”上为之动，法由是改。

又大农告乏之时，有献廉俸减半之议。优人乃为衣冠之士，自冠带衣裙被身之物，辄除其半。问之。曰："减半！"已而两足共穿半袴，蹩足而来前，复问之，则又曰"减半！"问者叹曰："但知减半，岂料难行！"语闻禁内，亦为罢议。

这与千年后情形，自然大不相同！抗战以来只闻半通不通读书人常有上《万言书》的，内容多拘迂不切事实。虽不切事实，这些闭门造车的纲要计划，有时却又居然在一离奇机会中成为国家功令。行不通，办不动，批评得失虽照例可由报纸社论负责，其实社论也说不了什么。即说出，又等到上面从舆论反映来更改法令时，已到民不聊生程度，欲补救也来不及了。至于做戏的，可不大注意到对于这类问题抗议。即抗议，效果一定更慢，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做戏的不仅大胆，而且头脑实在还聪敏灵活，许多事亏他想得出，做得到。如《齐东野语》记三十六髻事。

宣和，童贯用兵败窜。一日内宴，教坊进伎，为三四婢，首饰皆不同。其一当额为髻，曰"蔡太师家人也。"其二髻偏坠，曰"郑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满头为髻如小儿，曰"童大王家人也。"问其故。蔡氏者曰："太师觐清光，此名朝天髻。"郑氏者曰："吾太宰奉祠就第，此名懒梳髻。"至童氏者则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

用"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讽失败者，黠而趣，恐亦唯宋代杂剧人有这个本领。

当时作大王将军的，大致有好些都是材不当位者，只是因缘时会而成。所以用大王将军为讽刺题目，似乎竟特别多。如《坚瓠集》述张浚贪财治生事，设计之新奇，正不让于宋院画抓题材方法。

南渡诸将俱封王，尊荣安富，而张循王尤善治生。其罢兵而归，岁收租米六十万斛。绍兴间内宴，有优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间贵人必应星象，我悉能现之。”因用浑天仪设玉衡对其人窥之，见星不见人。“玉衡不能猝辨，用钱一文亦可。”今窥光尧，曰“帝星也。”“秦师垣?”曰“相星也。”“韩蕲王?”曰“将星也。”“张循王?”“曰不见其星。”众皆骇。复令窥之。曰：“不见星，只见张郡王在钱眼内坐!”殿上大笑。

不过若遇到另外一种大王，做戏的本只是与民同乐，并非存心讽刺，亦不免倒霉。《事实类苑》记党进事极有趣味。

党进不认文字，过市，见勾栏为戏者，驻马问：“汝所诵何言?”优者曰：“说韩信。”进大怒曰：“汝对我说韩信，见韩信即当说我！此三头两面之人!”即令杖之。

王安石行新法，连带花样多，时禁亦多，因之反映于戏文讽刺上，特别深刻而微妙。如《清波杂志》记蔡卞为相时伶人颂词：

蔡卞妻王夫人，荆公女，颇知书，能诗词。蔡每有国

事，先谋之床第，然后宣之庙堂。时执政相语曰："吾辈每日奉行者，指其咳唾之余也。"蔡拜右相，家宴张乐，伶人扬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带。"中外传以为笑。

后人言"吃裙带饭"即从此出。不过这个名词的褒贬意义，古今似乎不甚相同。凭这个名词得碗饭吃，千年来都若十分可羞，有失丈夫气概，更失读书人气概。近二十年社会风气一变，小至于杀猪卖菜，大至于政治场面，任何职业，任何事业都以连亲带眷比较合手，且有用美人计攀藤缘葛得到富贵荣华，为世所歆羡的。戏文中提到这一点时，当然已失去讥讽意味了。又《桯史》所记一事，也和这个岳婿合作有关。

王荆公封舒王，配享宣圣庙，位居孟子上，与颜子为对。其婿蔡卞实主之。优人尝因对御，戏设孔子正坐，颜孟与安石侍侧。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辞曰："天下达尊，爵居其一。轲仅蒙公爵，相公贵为真王，何必谦光如此。"遂揖颜子。颜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无分毫事业。公为明世真儒，辞之过矣。"安石遂处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惧拱手云"不敢！"往复未决。子路在外，愤愤不能堪，径趋从祀堂，挽公冶长臂而出。公冶长为窘迫状谢曰："长何罪？"乃责数之曰："汝全不救护丈人，看取别人家女婿！"其后朝议亦颇疑窒于礼文，每车驾幸太学，辄以屏障其面。

《豹隐纪谈》称淳祐改元正月十九日，理宗幸太学，以安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说狂话的万世

罪人，削去其从祀孔子，令国子监日下施行。

可见这个讽刺直接影响于朝议，后来便断送了荆公在孔庙的陪祀座位。

又如《南唐近事》记李知训一事，可为后世“刮地皮”一名词作注解。

> 魏王知训为宣州帅，苛政敛下，百姓苦之。因入觐侍宴，伶人戏作绿衣大面胡人，若鬼状。傍一人问曰：“何为者？”绿衣人对曰：“吾宣州土地神，王入觐，和地皮掠来，因至于此！”

可见五代杂剧即如此。当时这类讽刺，虽多行之于内宴，若为帝王一人悦目爽心而设，然而侍宴从臣必相当多，所以讽刺效果，亦不唯使帝王开心变色，或给优伶得到很多赏赐，必尚有其政治意义。《铁围山丛谈》记丁仙现事，可明白那个作用。

> 熙宁初，王介甫当轴，神庙一切委听。号令一出，于人情难有适合，于是故臣名士，往往力陈其不可，多被降黜，后来者皆结舌矣。当时以君相威权而不能贴服者，独一教坊使丁仙现。丁仙现时俗但呼之为“丁使”。丁使遇介甫法制一行，必因燕设于戏场使为嘲，又肆其谑难。介甫不堪，遂发怒欲斩之。神庙密诏二王，取丁仙现匿诸王府，故一时谚语有“台官不如伶官”。

又《倦游杂录》记丁仙现如何讽刺水利事，亦可见出这个大胆丑角讽刺的新而巧处。

熙宁十年太皇生辰，教坊例有杂剧。时判都水监侯叔献新亭，伶人丁仙现（此作见）假为道士，善出神，一僧善入定。或诘其“出神何所见?”道士云：“近曾至大罗，见玉皇殿上一人服金紫，熟视之，本朝韩侍中也，手捧一物。”窃问之。傍立者云：“韩侍中献国家金枝玉叶万世不绝图。”僧又曰：“近入定到地狱，见阎罗殿侧有一人衣绯垂鱼，细视之，乃判都水监侯工部也。”窃问左右。曰：“为奈河水浅，献图请别开水道耳。”时叔献兴水利，以图恩赏，百姓苦之，故伶人有此语。

这正与《涑水纪闻》，《邵氏闻见录》等记王荆公言水利事同。记称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韶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止。

刘贡父的杂谑，就近乎从伶人口吻取法而来。至于无所为而为，纯以笑谑为目的，无其他深意的，《渑水燕谈录》记陈尧佐写字事，另是一种风俗。

陈文惠善八分书，点画肥重，世谓之“堆墨书”。镇郑州日，府宴，伶人戏以大幅纸浓墨涂之，以粉笔点四点。问“何字也?”曰“堆墨书田字。”文惠大哂。

正与《贡父诗话》记石介开陈尧佐玩笑相同：（陈文惠善堆墨书，与石少傅同在政府。石欲戏之，政事堂有黑板床长五六尺，石取白垩横堆其上，可尺者。谓公曰：“吾颇学公堆

墨书。”陈闻之喜甚。顾小吏舁床出。曰：“吾已能写口字。”陈为怅然。）从这类记载上可看出讽刺谐谑的形式，杂剧人用的多与普通读书人所能领会的幽默相通，亦可说对象都是上层社会分子，即反映上层分子的爱憎。若说匕首投枪，这种戏文才真够得上锋利武器称呼。这种讽刺于戏文中存在，于笔记小说中保存尤多。方法上多从《世说》、《朝野佥载》取法，《碧云骢》、《鸡肋》是正宗，前者代表有计划的安排人事，褒贬随之，后者代表随手摭拾，无甚目的。然而这个作风容易得罪人，于是用“托古以射今”的笔法来写，《艾子杂说》就近乎旁门。抒情气分较浓重，不过看来也就若很多转弯抹角处，时代一隔绝，读者即不大容易明白内容隐寓何人何事了。这与党忌文禁自然大有关系，近于《铁围山丛谈》指的不肯结舌的故臣名士一种表示。若稍说得明白，即不免降黜，或在降黜后指为怨望，而将罪责加深。近代中国戏剧作者，虽多从外国取得一个剧本内含的形式，也依然还禀承明清传奇搭配角色方法，例有一二丑角，用中层分子身分在剧本中出现，演出时，这些丑角且照例极能吸引观众。可是目的只是泛指某一种型人物，论效果，或转不如宋代杂戏那种单刀直入揪住问题表现有效果。原因是当前真值得说说的，决不会到戏上去，至于一般现象，又好像不用说，为的是我们原本活在一个“讽刺社会”里，对社会有所讽刺，是不大济事的！且既活在那么一个社会中，不谨慎小心，很可能容易犯规矩，或发生比千年前“说韩信”那个人更严重的问题。或使观众因误会，出麻烦。这事在宋人做戏时就发生过。《容斋三笔》说：

> 俗呼冕为“天子冠”。范纯礼知开封，有旨鞫淳泽村

民谋逆事。审其故，乃村人尝入戏场观戏，归涂见匠者作桶，取桶戴于之首曰："与刘先主何如?"遂为匠擒。明日入对，徽宗问"何以处?"对曰："愚人村黔无所知，以不应为，杖之足矣。"

一场谋逆灭族案，幸亏得一个贤府尹代为奏明，结果方打几下发落完事。万一遇到赵师鼻，岂不要命。

《容斋三笔》和《事实类苑》记的两件事，都与戏中讽刺无关系，不过借此可明白一点当时做戏情形。宋代内宴与官家筵会，优伶做戏，笔记所记多为应景凑趣，带点嘲谑性质。然公共场所如东京大相国寺前瓦市的戏，临安中瓦子的戏，或党太尉所见临时缚木为栏当街表演的戏，则似本讲史，"两汉""三分"必较多，甚或就同时代取材。"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两句诗就正和《唐语林》载辛家大出丧时，孝子擘幕辍哭看《鸿门宴》《尉迟公大战突厥番将》傀儡戏情景相合，可知还是唐代传来的。原因或是幽默过于精细时，普通人不容易懂。历史场面行动多于议论，易为观众理解接受。至于做戏的不幸碰到党太尉，戏迷幸面碰到范府尹，真是各有气运。

现在看戏发迷的人，虽不用担心因为被大街上的箍桶匠告发，捉将宫里去。可是写戏剧的，终究得存点戒心，凡事谨慎些，免得出其他毛病，陷人于不义。因古今人心有一点相通处，即实在容易会从"娱乐"中取得"教育"是也。

本篇曾先后发表于1944年2月3日《新文学》第1卷第3期和1947年6月1日《论语》第130期，均署名沈从文。

因初发本未能得到，据《论语》本编入。

吃　大　饼

战前数年朋友来往通信中，遇到形容生活穷困境况时，照例常说“吃大饼”过日子。凡使用这个形容词的，在他本人生活上，虽未必即到“陷入绝境”，在他本人情绪上，实俨然已有点“招架不住”神气，似乎只要加重一点儿，就到“喝北风”程度了。可是“大饼”是个什么样子？有多大？如何做？如何吃？倘若他是一个南方人，要他老老实实回答时，这个人若够老实，也许自己会瞠然不语，却令人哑然失笑。因为他虽惯会使用这个名词，可未必见过“大饼”，更未必吃过“大饼”。他吃的或者是巴掌大，焦盐，揉糖，再沾上一小撮芝麻，和《二十年目睹怪现状》上面那个装阔旗人掏两文京钱买的东西一样，事实上名叫“烧饼”，或“烤饼”。（橘逾淮而为枳，这东西过长江后就越来越小巧秀气，到后就索性改名为“金钱烧饼”了。论式样，昆明地方所见的倒不少如三尖角的，搭褳式的，银锭式的，偃月形的，……至于中间有个孔，相传为三百年前戚继光征倭寇用作军士干粮，如今说来还带点抗战意味的“戚饼”，反而少见。）也许这人虽吃

过“大饼”，还依然不明白这东西本身有多少大的。因为凡在桌子旁坐定吃大饼，可能是照云南人熟习的炒饵块烩饵块方式，早已切成丝切成片，加上作料，把大饼原来的素朴与壮观全失去了。宋人笔记说，秦桧的儿孙生长城市，不识豆麦所出，量米时桧试询问米粮来源，有人说从簟席上出，有人说从斗斛中出。无一个想得到是从田地里生长。邯郸淳《笑林》说，北人不识笋，吴人为设笋，问从何来，告说是竹子生的。还家煮床簀，预备大吃一顿，久煮不烂，还以为是吴人不诚实，有意捉弄他。可见有些东西即或吃过，还不知道它的本性，也是常有的事。

生长于长江以北的山东河南朋友，必自以为对于大饼是个完全内行，其实所知道的也只是就经验所及而言罢了，大饼过了河过了江向南方跑，沿黄河上游长江上游向西南高原跑，大饼的命运如何，就依然不大容易知道。

民十八我到武昌时，被朋友孙大雨诗人邀到一个小铺子去吃牛肉大饼。大雨那时节正对于许多事都还充满好奇心，认为这小铺子极有诗意，铺子中简单得很，除却几件粗重桌椅，只是当门一个大而厚重的黄铜锅罐焖了一大锅白汁牛肉，另外砧板上搁下一个两尺大三寸厚的大饼。照习惯，限定每天卖完一锅肉，一个饼，即关上铺板休息。小碗盏，大筷子，桌凳复拙重古朴，加上那做买卖人的神气派头，不免令人疑心这原是个有历史背景的职业。问一问，才知道这一家人的先代，原来是随同蒙古达达迈过长江到此落脚的，到太平天国时，又成为长毛贩卖制度之一种，并说那口铜锅，那份铜家业，都是祖先传下来的！试看看那口厚重放光的锅罐，那个二尺大三寸厚素朴壮观的饼而，同

时再注意一下掌柜的伸出生有疏稀黄毛的大手，持着大铜杓从热气蒸腾锅中取肉，舞着大铜刀割饼时情景，真不能不相信，这里有的是“历史。”面前的一位，也许还是匈奴族王子的遗裔。且使人想起荆轲专诸本来的活计，干这种活计的人，当前已不足道，在历史上却很做过几件极不平凡事业的。

民二十八年我在昆明，某一天忽被朋友邀到一个丽江朋友家中去吃西藏式大饼。上桌时，一尺五六寸大，三寸厚，特点是饼面干干净净一片素朴的焦黄，（一看就使人又感觉接触了神农氏后代的传统生活习惯，也接触了另外一个民族的宗教习惯。）把这个东西一片片割切下来，用大雪山下氂牛身上出产的酥油制成酥油茶同吃，原是边地最平常的方式，不值得提。可是当时我们却还用《红楼梦》上史湘云吃过的鹿脯，（而且照孔子旅行时的方式，用刀削吃的。）以及《吕氏春秋·本味》篇（亦即历史上有名大厨子伊尹）所未提及的，来自一万尺高大雪山上的四五种稀奇古怪动植物，一同填入腹中。这两件和大饼有关的事，我相信生长北方每天吃大饼的朋友，是不会想到的。

第三件事是大饼既用“大”为名，最大的饼究竟能有多大？就个人眼目所及，大饼似乎和普通锅面有关，锅面大小又和家庭组织有关。所以如今所见的二尺见方三寸厚的形式，可以说是一般形式。论家庭组织，唐代算得庞大，一家百口是常有的事，可是不分家未必即同炊。《杜阳杂编》述叙杂事最善夸饰，记同昌公主死事，李可及为安排一场叹百年舞，用到八百匹官绌，舞竟珠翠满地。可是轮到赏赐三十匹骆驼的饼送给葬役夫时，还是只说“各径阔二

尺”。从记载上看，且像是已到最大限度。大饼之大超越纪录，实应数一位赵老总的成就。孙大宪《北梦琐言》说：五代王建主蜀时，有一位善吃喝好客人的赵雄武，绰号“赵大饼”，每次用面三斗做饼一枚，做成后，有好几间屋子大。唐人普通房间纵不如宋人费木料，也总得有两丈见方，这个饼很可能就有六丈大小。当时这种大饼的用途，说是值大内宴会，或豪家设广筵时，这位赵宫人即于众宾内奉献一枚，裁剖用之，各人一份，吃得大家饱饱的。至于这个六丈见方的大饼，从赵府转到另外一处筵席，如何抬去，可不说明。若不太厚，或者卷成一束，派那十五位鲜衣花裤大师傅抬去，也未可知。这个大饼的制法，就是一种秘密，据说当时至亲好友，即不肯传授，无由模仿。若不然，别的不说，现在昆明电话局长赵先生，既以善做烧鸭子著名，又好客，只要如法仿造大饼一枚，请客时，就可以把三百客人同时邀集，不至于感到束手了。

“后记”

和孩子们同住桃源乡下，每天早晚，总可听他们嚷嚷“吃不饱”“我要吃”。进城上课时，又必然会和因病失业两年的妹妹在一处，听她争吵几句，说的自然还是“吃不饱”，弄得我头脑乱乱的，因此一来，我自己倒常常反而把街上对过点米线当晚餐的事忘掉了。或正在宿舍中坐下发痴，被一个朋友偶然碰见，邀出门走走，或送一个陌生拜访者，从半霉朽的楼梯盘旋而下，到得空阔处，从朋友的语言神气间，总可看出一句话，“唉，日

子怎么过得那么凄惨?”待用别的方式表示:“不妨事,我能支持下去”时,照例却不大容易使朋友相信。事实上,一家大小不就是那么活下来了吗?这也就是一种“战争”!虽不需要断脰勫流血,也从不闻呼号呻吟,可是要的是勇气和耐心方能支持下来的!这只是为一个做人原则而战,简简单单,我得挣扎。想一家人吃得饱并不困难,想作得好硬让它吃不饱,就得要点儿取舍决心。试追究一下这勇气和耐心来源,即可知二十年前在各种情况下的失业和绝粮,正若已为今日做人试验作准备。其次是共同生活一个伴侣,同记着古人一句话,“穷则观其所取”,于是云南的好阳光,和乡村干净清新空气,居然见出了奇迹,使我们单单纯纯的活下来了。阳光之下万物既并生并育,自甘腐烂者得其实,追求抽象者收其荣,善于从两者之间,从社会变化中,因缘时会,垂时雀起,名实兼得者,……蒙庄齐物,所证即为物之不齐,乃物之性。个人之孤立沉默,亦不过是尽一个战时公民责任而已。假期匆匆过去,家中大小工作重新开始,想起孩子们在嚷叫“吃不饱”,依然能不断大笑。在讨论到大小男丁三口今年雨季来临时,得如何学习赤脚和泥浆奋斗,都十分高兴。主妇在为家事为生活把一个主妇的最高工作效率用尽后,尚永远不失去脸上代表从容与快乐的微笑。以及寄住城中由念佛而神经失常的妹妹,在极端痛苦情形中,亦尚能独自用笑来排遣挣扎。我心想,一家人尚能笑,真不妨事。写点小故事,赠给同样无可吃的正直国民,在他的单纯沉闷工作外,若能有机会笑笑,也不为无意义!一般人常说,战争是要血和泪的。

据个人意思，人生中某一种无形战争，所需要的也许倒是保持那个“虽败北不气馁”的微笑或大笑！

（三月一日桃源）

本篇曾分别发表于 1945 年 4 月 11 日《贵州日报·新垒》第 13 期和 1945 年 6 月 15 日《宇宙风》第 139 期，均署名沈从文。

因《贵州日报》本多处字迹不清，据《宇宙风》本编入。

应　声　虫

范正敏《遯斋闲览》，有一条记应声虫，认为是一种传染性的怪病。医药故事，即尝引用到它。

> 余友刘伯時，尝见淮西士人杨勔，自言中年得异疾，每发言应答，腹中辄有小声效之。数年间，其声浸大。有道士见之，惊曰："此应声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读本草，遇虫所不应者，当取服之。"勔如言，读本草至雷丸，虫忽无声。乃顿饵数粒，遂愈。余始未以为信，其后至长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环而观之者众，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谢曰："某贫无他技，所以求衣食于人者，唯藉此耳。"

这个记载也许有点儿讽刺意味，反映新法党争激烈时，使多少人放弃头脑不用，凡事只是人云亦云，为的是可谋衣食！应声虫自然是一种抽象生物，不至于为昆虫学者收入昆虫谱的。但到近年来，社会各方面却似乎有不少人已害了这

种病。尤其是知识分子，一得这种病后，不仅容易传染及妻儿子女，且能延及过往亲朋，同事，师友。害病的特征为头脑硬化，情感凝固。凡事不论大小，都不大思索，不用理智判断是非。而习于人云亦云，随声附和。对任何强有力者都特别恭顺敬畏，不触忌讳。此种唯诺依违，且若寄托一种高尚理想。雷丸是否能治这种病，还没有人试验过。不过可以猜想而知的，即雷丸或其他药物，纵对于这种时代流行传染病能防止，能治疗，患病者却未必乐意受治疗。事正相反，说不定还希望其有更大传染性，能作迅速而普遍传染，由家人，亲友，慢慢扩大，至于那个多数，便于从多数发生所谓政治影响。患病的大致可分两种：一种是年过四十，受过高等教育学有专长，透熟人情世故，带点虚伪做作情形害下去的。一种是年在二十左右，性情单纯热忱，在心理上属于青春期年龄，结合了求偶情绪与宗教迷信，本来应当十分激进，但因传染此病，而萎靡不振，因之绵缠下去的。二十岁左右受此传染病的又可分两种，一种待找出路分子，一为小有产者子弟。传染最厉害的还是找出路分子。对强权特别拥护崇拜，对财富尤所倾心，传染者既多，且于不知不觉间便形成一种特殊势力，影响到各方面，尤其是有助于巧取豪夺强权的扩大，以及腐败发霉社会的继续。更直接的自然还是影响其本人社会地位以及日常生活。用之于人，虽未必有牛黄马宝治疗之效果，但亦可以使许多人逐渐四平八稳，少年老成，麻木低能，凡神经兴奋之行为决不参加，凡增加纷乱之事决不介入。然或有好事者说，“这是应声虫作怪，得治疗，不治将作普遍传染，使社会上中层分子有集团头脑硬化现象，对国家民族十分危险”。患病的或有知，或无知，必一例觉得这

人好事可恶，且别有用心。尤其是如涉及四十岁以上的病状，以为近于虚伪顽固懦弱自私，二十岁左右将有成为工具可能时，必特别不愉快。这有原因。只因为贫而无他技者，能听这种病延续下去，所有好处即比千年前还多。如劝他想法治疗，等于破他的财门。至于富而无他技者，即正可因之巩固已有权势，或增加左右时局地位，满足更大欲望。然尤其有意义，有作用，或尚为不贫不富那个知识阶级，若知所以附会于这个病状中，在写社论作公开演讲，表明放弃头脑阿谀势力为人类新道德时，实有不可思议之好处。

元碾然子作《拊掌录》，记欧阳修与人行酒令，大有意思。

> 欧阳公与人行酒令，各作诗两句，须犯徒以上罪者。一人云："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船。"一人云："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至欧公，却曰："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或问之，答曰："当此时，徒以上罪亦做了。"

充军虽已成一古典名词，只在旧戏文小说中间或还可见到。至于徒以上罪，则至今似尚好好保留，随时可以使用。事在今日，若有人行这个酒令时，实不必如何苦思，只要口中轻轻地说："人云亦云，是应声虫"，即可罪名成立。因到处都有应声虫，话语顺风吹去，自然即有人觉得是刺中了他。这种人高一级的大多是四十五十而无闻，治学问弄事业一无特别成就，静极思动，忽然若有所悟，向虚空随手一捞，捉住一应声虫咽入腹中，于是从伙儿伴儿中，作点不花本钱的

买卖，大之即可在此脆弱社会中，取得信托与尊重，忽俨然成为社会中要人，或某要人新器重的分子。小之亦可从而润点小油水，比如说，……事实虽如此如彼，却千万说不得，偶尔提及，即不免触犯忌讳。古人说："察渊鱼者不祥"，从这句话使人想起二千年前哲人警告的意味深长。"莫踬于山，而踬于垤"，世界上固尝有愚人所作的小小狡狯，有时会使巨人摔一跤，且即从此不再爬起的。而愚人之行为，通常即反映患应声虫者之病人膏肓，事极显明。

又《拊掌录》记海贼郑广作诗事云：

> 闽地越海贼曰郑广，后就降补官，同官强之作诗。广曰："不问文官与武官，文官武官总一般。众官是做官了做贼，郑广是做贼了做官。"

正和绰号"细腰宫院子"的庄季裕所著《鸡肋编》说的绍兴建炎时事相互映照。当时人云："欲得富，赶著行在[1]卖酒醋。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语气虽鄙俚不文，不仅是当时现实主义者动人的警句，且超越历史，简直有点永久性。用作抗战后方某一些为富不仁的人物，胜利后来收复区办接收的人物，以及带罪立功的某种人物，岂不是恰恰如烧饼歌，不必注解也明明白白？至于在陪都，或首都卖酒醋的，虽不闻发大财，但在某院长时代，穿老棉鞋棉袄坐庄号卖酒醋的同乡，入国家银行的实已不少。更有意义的，或者还应数一些读"子曰"的仲尼弟子，平时道貌俨然，常用"仲尼不死颜回复生"方式于师生间此唱彼和，随时随地作传道统非我其谁的宣示。时移世易，即暂时放下东方圣人不语怪力乱神

之旨，将西方活佛一套秘法魔术，拿来使用，先于夫妇友朋间宣扬赞叹，旋即公开为人画符念咒，看鬼驱魔，且不妨定下规章，酌量收取法施，增加银行存款。有江充马道婆行巫蛊之利，而无造谣惑众灭门焚身之忧。较之卖酒醋少用本钱，杀人放火少担恐惧，亦可谓深明“易”道矣，这种知识阶级和应声虫关系不多，和磕头虫却有点渊源。因红衣大法师所有秘法，必由磕头万千而传也。如有人眼见昆明方面大学教授男女留学生向西藏法师磕头情况，必对“人生”和“教育”引起一极离奇的感印。

历史循环虽若莫须有，历史复演则在一个历史过于绵长的国家，似乎无从避免。无怪乎饱读旧书的吴稚老，总说旧书读不得。其意当不在担心有人迷醉于章句间，食古不化，不知现在为何事。或许倒是恐怕有些人太明白现实；将诸子纵横之术，与巫蛊媚惑之方，同冶一炉时，这个国家明日实不大好办！

本篇发表于1946年8月11日、12日上海《大公报·大公园》，署名上官碧。

① 行在　原指皇帝所在的地方，后专指皇帝行幸所到的地方。南宋称临安为行在，表示不忘旧都汴梁而以临安为行都之意。

宋人谐趣

经史中多讽刺记载，讽刺而且有特为别立一个部门的。惟既多出于载笔立言之士，或草泽下民亡国之臣，形诸歌咏，所以多不外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原则。重在以微见著，言约意远。虽间或也有说得极直接极露骨，可是较高的讽刺，总以蕴藉而不能背乎诗人雅言之旨，被认为正宗，并且作用大，影响深。自战国纵横之士以口舌取卿相，诸子著书立说，各有以自见，这个新的泼剌风气成立后，讽刺因中层分子抬头，使用范围就较宽了一些，也较粗糙了些。即以近于小说故事讽刺而言，如《国策》所引螳螂捕蝉譬喻之繁复而巧，《韩非》《吕览》所称引齐人宋人故事之简单而鄙俚不文，正可见出讽刺到诸子手中时，如何从“雅言”而转为社会通俗故事。雅言体虽尚保留于《说苑》《新序》一类作品中，且形成魏晋人生活一部门（也可说极重要一部门）。《世说新语》这部书，因保留这个时代人物的雅言风度，更成为中国小说一部门。可是它的全盛时代也正是它衰落的起始，从此以后，雅言完事。到唐代，即无可追寻，《朝野佥载》的泼剌，便是

完全反雅言体。讽刺混入人事中较粗俗成分，方式渐多渐宽，印度故事又因佛经说教而大量输入，在繁复与简鄙两方面都有极大影响。繁复如《卢至长者经》，形容悭吝人遇鬼种种，简鄙如《百喻经》《十诵律》所述种种小故事，实同源面异流。虽发展不同，仍异途同归，归于将讽刺中的庄严性去尽，而代以开玩笑的诙谐气氛。我们虽可说这种“开玩笑”是中国固有的，《左传》或《诗经》，《论语》或《孟子》，都能找出这类记载。可是扩大它使用的范围，却应当说起于战国时代，史称《庄子》的滑稽乱俗，当指此点。而盛于魏晋，因印度故事输入，且起大变化。这点变化，从历史各方面都可见出，绘画中更充分表现。在这里我只预备说说它为何形成宋人小说中的浪漫气息，和宋人生活中的不庄重情调。尤其是宋人生活中的喜欢开玩笑习惯，可说是上至帝王名臣，理学大儒下至贩夫走卒，娼妓儿童，无不专精当行。使用方面，大至于处理国家事务，外交战争，小至于普通应对，家庭生活，无不见出为那个气氛所浸润。这个气氛从浅处言，为对于由儒入禅装模作样的理学的反应，亦为对于党禁新法的腹诽另一形式。但只要稍稍注意一下这个开玩笑的风气，是如何普遍存在时，我们就会承认它的形成，还有一个更远的因果了。不能不说它是讽刺的变质，它的存在，一方面表示语言文字的效果，已从“经典”庄严的意味，转为普通生活中的点缀物，一面且说明从这个转变中即孕育《西游》《封神》一类长故事的产生。最有趣味一点，即佛道二教均以浪漫情感形成的，充满东方式幻异抒情故事，为宣传教义工具，到这种抒情故事发展成为一般兴趣后，亦即逐渐失去对于宗教的严肃感情，群众对之就有点“买椟还珠”意味。因之宗教

效果不再关心，仅生活沉浸于那个本来用作说教的幻美故事中，也就结束了“宗教”。这个发展是宗教宣传者所料不到的。

“讽刺”和“开玩笑”不同处，容易明白。讽刺的本来虽居多是以下犯上，或有所顾忌，即身为史官，重在直笔，依然得为保全腰领禄位计，多出于含蓄。不过用笔虽主含蓄，用意还是在直中其心。有所刺必有所伤，夫子所谓礼为尊讳，如周庙见金人三缄其口戒在多言，无不见出古人谨慎自全其身处，以少说有身分有势力的人坏话为安全。即讽刺也乱来不得。司马迁述《史记》，对于武帝发神仙迷的种种，不加可否照实写下，即种下后来割“麻雀”的危险，何况就中还多无言褒贬，当然难免终生屯蹇！至于开玩笑，自然便不同了，讽刺以开玩笑方式出之，最先见于帝王身边的优伶侏儒。史传上保留的记载，还可见出这个以下犯上的特权阶级，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作风与作用。优伶开玩笑的特权，既千年不变，所以直到五代后唐庄宗还扮俳优来开皇后的玩笑。史称：

> 后唐庄宗刘后，生皇子继岌。后父刘叟以医为业，诣邺宫自陈。后方与诸夫人争宠，耻为寒族，答刘叟于宫门。庄宗好俳优，宫中暇日，自负药笈，令继岌负敝盖相随，自称“刘山人来访女”，后大怒，笞继岌。

正因为开玩笑是俳优的特权，所以到极端时，优伶对于帝王在玩笑中打耳光，不特不受处罚，还可望得到赏赐。

> 唐庄宗或自傅粉墨与优人共戏于庭，以悦刘夫人，

名谓之“李天下”。尝因为优，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优人镜新磨遽前批其颊。帝失色，群优亦吓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此一人，岂有两耶?”帝悦，厚赐之。

又记称诚惠和尚事：

后唐僧诚惠，云能役使毒龙，可致风雨，其徒号为“降龙大师”。京师旱，庄宗迎至洛下，亲拜之。六宫参礼，士庶瞻仰，谓朝夕可致甘泽。祝祷数旬，略无徵应。或谓官以“祈雨无验，将加焚燎”。诚惠惧而遁去。及卒，赐号“法雨大师”，塔曰“慈云之塔”。

对于这个大法师所开的玩笑，可谓无以复加，而一直开到死后，还饶不过！若把这三件事并提，我们可说千古帝王喜欢开玩笑的，当无过于这位老总了。

《大唐西域记》卷八，记月支邻陀龙王：

其水清黑，其味甘美。……昔如来初成正觉，于此宴坐，七日入空。时此龙王，警卫如来，即以其身，绕佛七匝，化出多头，俯垂为盖。

度迦叶波兄弟西北窣堵坡[1]，是如来伏迦叶陂所事火龙处。如来将化其人，先伏所宗，乃止梵志火龙之室。夜分已后，龙吐烟焰，佛既入空，亦起火光，其室洞然，猛焰炎炽。诸梵志师，恐火害佛，莫不奔赴，悲号愍惜。……如来乃以火龙盛置钵中，清旦持示外道门人。其侧

窣堵坡，五百独觉同入涅槃处也。

尽管这个记载和较后辑存于《太平广记》中自汉及唐几卷关于龙的记载，文字多么美丽，故事多么恢奇，所培养成的迷信浪漫气氛又如何浓厚，到“法雨大师”一来，自然就完全失去其意义了。所以宋代和尚道士多转为阔人门客，以看相算命为能事，正因为宗教上的庄严、浪漫气氛两失后，这些人的本领也就只有如此如此。中世纪的宗教迷信的破除，即出于前一时用为建设这个迷信的工具之一，比如说《百喻经》，这似乎还不曾经人道及过。

试从人事上略略分析，开玩笑的发展，可知出于帝王身份上自尊自大与不自重，都可作成。因不自重，固不免如庄宗的逢场作戏。若徒然自尊自大，不怕得罪人，也会如梁武帝所为。《续世说》称：

梁武帝尝接刘溉，每与对棋，从夕达旦。或复安寝，加以低睡。帝以诗嘲之曰：“状若丧家狗，又似悬风捶”。

然而两者说来，又都可谓出于人君“洒脱”。这种洒脱性情实起于汉末，到三国时为极盛。魏文帝给夏侯尚诏，称之为“作威作福，杀人活人”，蒋济以为天子无戏言，不宜见诸诏令。后来虽将诏令追回，然而史称其才艺兼该，似乎即包含了他会开玩笑，与走马夺槊弹棋赋诗同为这位花花公子而登大宝的帝王兴趣所在。《三国志注》引《魏略》，称文帝为五官将时，即与其弟曹植都想得到邯郸淳作门下上。后太祖遣淳诣植。《魏略》描写曹植初次会面一场，情景十分精彩。

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禒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如何耶"？于是乃更着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圣贤，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奇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

这个"天人"照植本传称引太祖戒令说来，时当二十三四岁左右。邯郸淳虽以博学多识精文字训诂见称，史志上第一部笑话小说《笑林》却相传是他作的。到《文心雕龙·谐隐篇》论著述时，且有"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这部书还很可能就是文帝作的。是即刘勰所谓"辞浅会俗"，"无益时会"，但于当时弦歌酒筵中，实所不废，这从过去记载却可略见一二。

人君洒脱即成为曹氏兄弟会玩会闹，人臣洒脱便成为孔融、弥衡、嵇康、阮籍，记传上留下种种故事。居多是聪明过人，因才使气，放旷不羁，离世违俗，正如生命中具有游侠兼隐士两种反抗成分，时代既多变乱，除阮籍能逃于酒，其余几位，便不免因为不堪流俗而菲薄汤武，即成为这个时代牺牲者。但竹林七贤作风，终于成为千年来一种否认反抗繁文缛礼的生活方式。在两晋曾摧毁儒法两派的人生观，在唐又增加了些文学上的自由浪漫空气，到宋代即成为士大夫

开玩笑共通性情之一点。说到这个问题时，我们似乎应当把由于开玩笑所产生的悲剧性和属于道德上的成见，暂时保留不提。正因为诙谐即或不是人性中最重要一部分，但至少是本性中固有一部分。宋人道学中有想极力去掉这一部分的，结果本身反而成为一种诙谐型，如《墨客挥犀》《冷斋夜话》记彭渊材行为性情，可说是个代表。

彭渊材初见范文正公画像，惊喜再拜前磬折称："新昌布衣彭几，幸获拜谒。"既罢，熟视曰："有奇德者必有奇形！"乃引镜自照，又捋其须曰："大略似之矣，只无耳毫数茎耳，年大当十相具足也。"又至庐山太平观，见狄梁公像，眉目入鬓，又前再拜赞曰："有宋进士彭几谨拜谒。"又熟视久之，呼刀镊者使剃其眉尾，令作卓枝入鬓之状。家人辈望见惊笑。渊材怒曰："何笑？吾见范文正公，恨无耳毫，（因相书上说年寿，有鼻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项下绦之语。）今见狄梁公，不敢不剃眉，何笑之乎？耳毫未至，天也，剃眉，人也，君子修人事以应天，奈何儿女子以为笑乎？吾每欲行古道而不见知于人，所谓伤古人之不见，嗟吾道之难行也！"

渊材迂阔好怪，尝蓄两鹤，客至，指以夸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而此胎生。"语未卒，园丁报曰："此鹤夜产一卵，大如梨。"渊材面发赤，呵曰："敢谤鹤乎？"卒去，鹤辄两展其胫伏地。渊材讶之，以杖惊使起，忽诞一卵。渊材咨嗟曰："鹤亦败道，吾乃为刘禹锡嘉话所误！自今除佛老孔子之语，予皆勘验。"

《东都事略》记丁谓文与孙何齐名，应举知第四，谓耻居丁下，胪传之际，有不平语。太宗曰："甲乙丙丁，合居第四，尚有何言？"言虽不庄，若与《燕翼贻谋录》记太宗烧和尚事并观，倒可见出一种爽利性情。亦同出于谐趣的基础。

江东有僧诣阙，乞修天台国清寺，且言"如寺成，愿焚身为报。"太宗从之，命内侍卫绍钦督役。戒之曰："了事了来。"绍钦即与俱往。不日告成。绍钦积薪如山，驱使入火，僧哀鸣，乞回阙下面谢皇帝而后自焚。绍钦怒，以叉叉入烈焰，僧宛转悲鸣而绝。归奏太宗曰："臣已了事。"太宗嘉之。

若太宗以下帝王都用这个方式对付和尚道士，此后就不至于有真宗时代的天书出现，徽宗时代的林灵素、张虚白辈诱张为幻兴筑寿山艮岳，为花石纲闹得天怒人怨了。但真宗皇帝和他的臣下，可说是个会开玩笑的人物，天书一出现，灵芝动辄万千，自己未必不明白全是假的。《投辖录》称他引臣下逛海上之山，极有趣味。

祥符间封禅事竣，宰执对于后殿。上曰："治平无事，久欲与卿等一处闲玩，今日可矣。"遂引群公及内侍数人，入一小殿，殿后有假山甚高。山面一洞。上既入，群公从行，初觉甚暗，数十步则天宇豁然，千峰百嶂，杂花流水，极天下之伟观。少焉至一处，重楼复阁，金碧照耀。有二道士貌奇古，来揖上，执礼甚恭。上亦答之良厚。邀上主席，上再三逊谢，然后坐。群臣再拜，

居道士之次。所论皆玄妙之旨。而牢醴之属，又非人间所见也。鸾鹤舞庭际，笙箫振林木，至夕乃罢。道士送上出门而别曰："万几之暇，无惜与诸公频见过也。"复由旧路归。臣下因请于上。上曰："此道家所谓蓬莱三山也。"群臣自失者累日。后亦不再往。

王明清所记虽是一则小说，然就真宗时代空气说来，这个皇帝由丁谓辈设计，那么努力安排个神仙场面请一次客，给其余臣下一个海上三山印象，也许竟是可能的。

至于幸臣为帝王造成一个神奇开心印象，则见于岳珂《桯史》。

艮岳之建，诸臣琱争出新意。念四方所贡珍禽不能尽驯，有市人薛翁，素以豢扰为优场戏，请于童贯，愿役其间。许之。乃日集舆卫，鸣跸张盖以游，至则以巨栅贮肉炙粱米，翁效禽鸣以致其类，乃饱饫翔泳，听其去来。月余，而囿者四集，不假鸣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间不复畏。遂自命局曰"来仪所"。一日徽祖来幸，闻清道声，望而群翔者数万。翁先以牙牌奏道左曰："万岁山瑞禽迎驾！"上顾，罔测所以，大喜，命以官。

这种开玩笑所引起帝王嗜好，从后世说来，虽与亡国不无关系。可是帝王能领会它时，却未尝无好处。《挥尘后录》和《鸡肋》记这个好艺术能幽默帝王逃亡时二事，即见出在忧患中还不致为忧患打倒，这点容忍能力说他实得力幽默感，不无道理。

靖康元年，金人犯浚州，徽庙微服出通津门，御小舟，将次雍丘，阻浅，船不得进。夜御骏骡名鹑鸽青，望睢阳而发。闻鸡啼，滨河小市，民皆酣寝，独一老妪家张灯，竹扉半掩。上排户入。妪问上姓氏，曰："姓赵，居东京，已致仕，举长子自代。"卫士皆笑，上徐顾卫士亦笑。

北人南牧，上皇逊位，乃与蔡攸一二近侍，微服乘花纲小船东下，人皆莫知。至泗上徒步至市，买鱼酬价未谐，估人呼上为"保义"。上皇顾攸笑曰："这汉毒也！"归犹赋诗，就用江鱼羹故事，初不以为戚。

帝王且有因为能够着意安排，在外交场面，还可占点上风的。《坚瓠集》称：

孝宗击球，偶伤一目。金人遣使来庆寿，以千手千眼白玉观音为寿，盖寓相谑之意。孝宗命迎入径山，邀使者同往。及寺门，住持说偈云："一手动时千手动，一眼观时千眼观，幸得太平无一事，何须做得许多般！"使者闻之，大惭。

王安石行新法，不便于民，《紫薇杂记》有徐王与神宗打球赌新苗法故事，就与这件公案有关，且可见间或亦用之于政治。

熙宁初，神宗与二王禁内打球。上问二王欲赌何物。

徐王曰："臣不赌别物，若赢时，只告罢了青苗法。"

开玩笑用于名公大臣的，实多而又多。约略说来有如下各种形式。有同僚用姓名谐音相谑的，《靳史》称：

贾黄中作相，卢多逊作参。一日，府檄有蝗，卢笑曰："某闻所有乃假蝗虫。"贾应声曰："亦不闻伤稼，但芦多损耳。"

有以下犯上的，如《宋稗类钞》记党进事。

党进当大雪，拥炉酌酒，醉饱汗出，扪腹徐行曰："天气不正。"有兵士侍帐外曰："小人此处颇正。"

有故意捣乱以泄忿的，如《五代史补》记陶穀事。

何承裕素与陶穀不叶。世宗问陶曰："承裕可知制诰否？"陶曰："承裕好俳，恐非所宜。"遂已。何知之，及陶判铨，一旦方偃息，何自外抗声唱挽歌而入。陶甚惊骇。承裕曰："尚书岂长生不死者耶？幸当无恙，闻某一两曲又何妨？"陶无以抗。

开陶穀玩笑极著名的，无过于《玉壶清话》记韩熙载使妓女秦弱兰诈为驿卒女与穀恋爱故事，和《十国春秋》记他与钱俶吃螃蟹和葫芦羹一个通俗掌故。

陶尚书使吴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询其族类。王命自蝤蛑至螃蜞，凡十余以进。穀曰："真所谓一蟹不如一蟹，"盖以讥王也。王因命进葫芦羹，曰："此先王时有此品味，庖人依样造者。"穀在朝，或作诗嘲之曰："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故王以此戏焉。

亦有用作无可奈何聊以自解的，《庶斋老学丛谈》：

徐常侍铉入汴，居五龙堂侧，宣徽角牴士遇内宴，必先习艺于此。一日坐道斋诵黄庭，闻外喧甚，使童视之。回白"众常侍习角牴。"铉笑曰："此诸同僚难与接欢也。"盖铉与角抵士皆称"常侍"，可资一笑。

亦有天生诙谐，善于戏人，同时也常自己取笑自己不以为意的，如《归田录》及《涑水纪闻》《挥掌录》关于石熙载故事。

章郇公与石参政相友善，尝戏章曰："昔时名画有戴嵩牛，韩干马，今有章得象也。"

尝堕马，左右惊扶之。石曰："赖尔石参政也，若瓦参政，齑粉矣。"

又尝于杨文公家会葬，坐客多执政及贵游子弟，皆服白襕衫，或罗或绢，有差等。石忽大恸。人问其故。曰："忆吾父。"又问之，曰："父在时，当得罗襕衫也。"

亦有父子戏谑的，如《事实类苑》记苏易简父苏协事。

苏易简父协，性滑稽。初协为汝州司户，易简通判苏州。与易简书曰："吾在汝，汝在吴，吾思汝，汝知之乎？"

也有行于兄弟间，因之为千载佳话的，如《钱氏私志》记宋庠宋祁兄弟两人元夜各自寻乐消遣事。

宋庠在政府，上元夜，在书院读《周易》。闻小宋点华灯拥歌妓醉饮。翌日，谕令所亲诮让云："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斋饭时否？"学士笑曰："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吃斋饭，是为甚底？"

也有夫妇间或有戏谑事，承笑林作风，启徐文长派头，《韦居听闻》与《庶斋老学丛谈》各有一事皆极有趣。

周益公夫人妒，有媵妾，公眄之，夫人縻之庭。公过之，当暑，媵以渴告，公照熟水酌之。夫人窥于屏曰："好个相公，为婢取水！"公笑曰："独不见建义井者乎？"（《韦居听闻》）

安鸿渐有滑稽才。妇翁死，哭之。其孺人诟之曰："汝哭何得无泪？来日早临，定须见泪！"来日以巾湿纸，大叩其额。妻窥之，曰："泪出于眼，何故流额？"对曰："水出高原。"

也有用到政治上的争夺，来在草诰制上褒贬，因而由戏谑结怨，影响一生荣枯的。《涑水闲谈录》记胡旦事，《步里客谈》《石林燕语》记东坡事。

胡秘监学冠一时，而轻躁喜讽人。其在西掖也，尝草江仲甫诰云："归马华山之阳，朕虽无愧；放牛桃林之野，汝实有功。"江小字"芒儿"，俚语以牧童为芒儿。又尝行巨珰诰词云："以尔久淹禁署，克慎行藏。"由是诸竖切齿。范应辰为大理评事，旦画一布袋，内藏一丐者，以遗之，题曰："袋里评事"。

东坡行吕吉甫责词曰："先皇帝求贤如不及，从善若转圜，始以帝尧之聪，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又曰："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视。"既而语人曰："三十年作剑子，今日方剐得一个有肉汉。"（《步里客谈》）

吕丞相微仲，性沉毅刚果，身长大而方，望之伟然。初相，子瞻草麻，云，"果毅而达，兼孔门三子之长，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动。"盖以戏之，微仲终身以为恨。（《石林燕语》）

也有用到科举上，聊以自解的，如《高斋漫录》记徐师川族兄应举作赋事：

徐师川之族兄少赴举场，试《圆坛八陛赋》，终日不能下一字，乃大书试卷云："圆坛八陛，八陛圆坛，即圆坛而八陛，又八陛而圆坛……"至今传以为笑。（《高斋漫录》）

亦有用到官场文件中的，如《避暑录话》所记钱穆父事，《老学庵笔记》记田登事，更为后世通俗典故之一。

钱穆父为如皋令，会岁旱蝗发，而泰兴令独给郡将云："县界无蝗。"已而蝗大起，郡将诘之，令辞穷，乃言"县本无蝗，盖自如皋飞来。"仍檄如皋，请严捕蝗，无使侵邻境。穆父得檄，辄书其纸尾云："蝗虫本是天灾，即非县令不才，既自敝邑飞去，却请贵县押来。"（《避暑录话》）

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老学庵笔记》）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即从之出，但引用的已失本意。也有用到诗上，即成为后世典故的，《梦溪笔谈》记魏野事，从此"生张熟魏"四字即成为后世小说上形容新旧不分的典故。

寇忠愍镇北都，野在门下。北都有妓女，美貌而举止生硬，人谓之"生张八"。因府会，忠愍令乞诗于野。

野赠之诗云："君为北道生张八，我是西川熟魏三，莫怪樽前无笑语，半生半熟未相谙。"

又如《归田录》述陈尧咨射箭为卖油翁所笑故事，因为和"熟能生巧"一句话相合，这故事且又成为这句话后来最好的注解。

陈康肃善射，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一日射于家圃，有卖油翁负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贯八九，但微颔之而已。康肃曰："汝亦知射乎？"翁曰："无他，但手熟耳。"康肃曰："汝安敢轻吾射？"翁曰："以吾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因曰："我亦无他，惟手熟耳。"康肃笑而遣之。

至若炫学与鄙陋相对，自然更多可笑记载，《鹤林玉露》与《齐东野语》所记二事可为一例。

乾道间，林谦之为司业，与正字彭仲举游天竺，小饮论诗，谈到少陵妙处，仲举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杀！"有俗子在邻壁闻之，遍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业与彭正字在天竺谋杀人。"或问其所谋杀者谁？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处人。"闻者绝倒。（《鹤林玉露》）

昔传江西一士求见杨诚斋，颇以赅洽自负。越数日，诚斋简之云："闻公自江西来，配盐幽菽，欲求少许。"

士人茫然，亟往谢之曰："实不知为何物？"诚斋检礼部韵略豉字示之，注云"配盐幽菽"也。（《齐东野语》）

惟讽刺与开玩笑，有时实相去一间，如《默记》记王溥父亲王祚事，由瞽者言，近于因阿谀而开玩笑，对《默记》作者王铚言，便已近于讽刺了。

祚居富贵久，奉养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寿耳。一日居洛阳里第，闻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问老兵云："何人呼我？"曰："王相公父也。贵极富溢，所不知者寿也。今以告汝，俟出，当厚以卦钱相酬！"既见祚，令布卦成，又推命，大惊曰："此命惟有寿也！"祚喜，问曰"能至七十否？"瞽曰："更向上。"问"能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曰"能至百岁否？"又叹息曰："此命至少亦须一百三四十岁。"祚大喜曰："其间莫有疾病否？"其人细数之曰："俱无。只是近一百二十岁之年，春夏间微苦脏腑，寻便安愈矣。"祚回顾子孙在后侍立者曰："孙儿懑切记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汤水。"

又《蒙斋笔谈》记杨朴事，《东轩笔录》记穆修事，多因所记人物性情崛出，见得十分生动。本意即有所讽，亦若无害于事。

杨朴性僻，常骑驴往来郑圃，每欲作诗，即伏草间冥搜，得句则跃而出，遇之者皆惊。

穆修性偏少合……故衣食不能给。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镂版，印数百部，携入京相国寺，设肆鬻之，儒生数辈至其肆，未许值，先展揭披阅。脩就手夺取，瞋目谓曰："汝辈能读一遍，不失句读，当以一部赠汝！"其件物如此，自是经年未售一部。

类似记述，尤以《宋稗类钞》述郭忠恕行为，使人如见其面。这类记载，刻画性格，虽若绘色绘声，似因人物生性如此逼真，无笔者爱憎，兴讽刺亦隔一层。

忠恕先放旷不羁，尤不与俗人伍。宋太宗闻其名，召赴阙，馆于内侍省窦神兴家。先长髯，一夕忽竟去之。神兴惊问其故。曰："聊以效颦！"

聂从义镇岐下，延置山馆。岐有富人子，好画，日给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请，且致匹素。郭为画小童持线车放风筝，引线数丈满之，富人子怒，遂与绝。又尝与小民贩夫入市肆饮食，曰："吾所与游，皆子类也。"

亦有当时社会正把那个问题看得庄严神秘，笔者用意在讽刺而读来反得一诙谐印象的，如宋人谈禅，《邻几杂志》和《却扫篇》《谐史》都为我们记下几则有关禅事的笑话。

王随佞佛，在杭州尝对聋长老诵偈。此僧既聩，离席引首几入其怀。实以不闻也。随叹赏之，以为禅机。

吕中公喜为释氏之学。及为相，务为简静，罕与士

大夫接，惟能谈禅者，多得从游。于是好进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游禅寺，随僧斋粥，讲说性理，觊以自售。时人谓之“禅钻”。

殿中丞丘浚尝在杭州谒珊禅师，见之殊傲。顷之，有州将子弟来谒，珊降阶接之甚恭。丘不能平，俟子弟退，乃问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将子弟乃尔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丘勃然起打珊数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亦有本意对某人不过开玩笑，在缺少幽默感的子弟后人中，却认为讽刺的。钱氏私志摘欧阳修所记关于钱惟演事，绳以恩怨，以为事非美谈，人不忠厚。其实《归田录》所记，如今看来，不过足供读者一噱而已。

钱思公生长富贵，而性俭约，子弟辈非时不得辄取一钱。公有一珊瑚笔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需钱者，辄取而藏之，公即怅然自失。乃榜于家庭，以十千购之。居一二日，子弟佯为求得以献，公欣然以十千与之。他日有欲钱者，又窃去。一岁率五七如此，公终不悟也。

惟开人玩笑的，自然也常有被人开玩笑事，《诗话总龟》记杨大年受窘事，极有趣味。

杨大年不喜杜诗，号为“村夫子”。有乡人曰：“公

试为我续‘江汉思归客’一句，”大年亦为属对。乡人曰：“乾坤一腐儒！”大年似少屈。

孔平仲《谈苑》，记夏竦事，且可知这种开玩笑还用之于两国交兵战阵之间。

夏竦尝统率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元昊头者，赏钱五百万贯，爵平西王。”元昊使人入市卖箔，陕西获箔甚高，倚之食市外，佯为食讫遗去。至晚食市窃喜，以为有所获。徐展之，乃元昊购竦之榜，悬箔之端，云：“有得夏竦头者，赏钱两贯文。”竦闻之，亟令藏掩，而已喧播远近，竦大惭沮。

开玩笑的风气，从《梦粱录》《都城纪胜》诸书所载“说笑话”“说诨经”，即可看出是东京时代在游艺场即已当成一个娱乐部门，还有许多专家擅长此道，《鸡肋》载京师人卖熟食故事，且可知已为当时小商贩兜揽生意方法。

京师凡卖熟食者，必为诡异标表语言，然后所售益广。尝有货环饼者不言何物，但长叹曰：“亏便亏我也！”谓价廉不称也。时昭慈孟后被废，居瑶华宫。其人每至宫前，必置担太息大言。开封府捕之，杖一百。自是改曰：“待我放下歇则个！”（《鸡肋》）

同一方式，也会恼怒京尹的，还有《四朝闻见录》所记：

韩侂胄用事久，人不能平，又所引率多非类。市井有以片纸摹印乌贼出没于潮，一钱一本，以售儿童，且诵言曰："满潮都是贼。"京尹廉而杖之。又有卖浆者，敲其盏而唤人曰："冷底吃一盏"。冷谓韩，盏谓斩也。（《四朝闻见录》）

开玩笑既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因此笔记中保留了许多记载，千年后犹令人读来失笑。如《萍洲可谈》记王安礼做寿送礼，《墨客挥犀》记贵族择婿，《老学庵笔记》谈相礼事，当时社会习俗，恰借重这类记载，得知一二。

近世长吏生日，寮佐画寿星为献，例只受文字，其画却回。王安礼自执政出执舒州，生日属吏为寿，或无寿星者，但以他画轴红绣囊缄，谓必退回。王忽令尽启封，挂于厅事，标所献人名，引客共观。其间无寿星者，或佛像，或神鬼。惟一兵官乃崔白画二猫。或云，时有囊缄墓志铭者，吏不敢展。

今人于榜下择婿，曰"裹婚"，其语盖本诸袁山松，尤无义理。其间或有不愿就而为贵势豪族拥遏而不得辞者。尝有一新先辈，少年有风姿，乃为贵族之有势力者所慕，命十数仆拥致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略不辞避。既至观者如堵。须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亦不至丑陋，愿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谢曰："寒微得托迹高门，固幸，待更归家，试与妻子商量看如何。"众皆大笑而散。

北方民家吉凶，辄有相礼者，谓之"白席"，多鄙俚

可笑。韩魏公自枢密归邺，赴一姻家礼席，偶盘有荔枝，欲啖之，白席者辄唱言曰："资政吃荔枝，请众客同吃荔枝！"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复取。白席者又云："资政恶发也，却请众客放下荔枝！"魏公为一笑。恶发，犹言怒也。

宋代文人善诙谐的，当推苏东坡，刘贡父，石介，庄季裕，且有一部分说神说怪的荒唐小说，即出于玩世而作。惟几个人的作品，留给人的印象，却常常近乎讽刺，毒刻而缺少人情中那点"无是非"的情趣，所以即当成笑话说来，依然有刺有骨，就中尤其《艾子杂说》为最。至若《碧云騢》一类作品，不问真伪，以言开玩笑，自更隔一层了。

王家兄弟性情虽不相同，在史传上常道及。王安石为人刚愎自恃，似乎是个永远不会开玩笑的人，《坚瓠集》却载有他一节故事，先被称为"行货"，到后且自居为"行货"。"行货"这个名词，《金瓶梅》上常常出于小淫妇潘金莲口中，用之于对男子不中用形容。到现代还当作不中用的人或不结实的物品称呼。若《坚瓠集》所记故事可靠，那第一个行货倒应数这位"拗相公"。而且是用作蛇的形容词，也有意思。（编者按：现时黔人称物件之不结实者曰："这太'行'了。"）

王介甫乃进贤饶氏之甥，锐志读书。舅党以介甫肤理如蛇皮，目之曰："行货亦欲售耶？"介甫寻举进士，以诗寄之曰："世人莫笑老蛇皮，已化龙鳞衣锦归，传语进贤饶八舅，如今行货正当时。"

"如今行货正当时"！细想想这句话，真满有意思，因从报上看到南京的大会，用钱据闻已过一百五十亿，花这个钱的人物，就中似乎就有好些是不在饶八舅眼中，也不在你我眼中的。笑话中还有烧饼歌意味，一定不是拗相公所能料想到的事了。

本篇发表于1947年1月1日、1月16日《论语》第120期、121期，署名沈从文。

① 窣堵坡　又写作窣堵波。沈从文在其剧本《三兽窣堵波》篇后所作《关于三兽窣堵波》中解释说："'窣堵波'，大概是梵语音译，即所谓'宝塔'是也。"

雾清轩杂记

寄生杂记

JIQINGXUAN ZAJI

本集为新编，集名用本集一作品名。收作者1946年9月～1948年9月发表的杂文12篇。其中《政治与文学》是据作者手稿编入的未发表稿。

怎样办一份好报纸

——从昆明的报纸谈起

报纸的有机性

在昆明住下稍久，对新闻事业和文学运动有点兴趣有点理想的朋友，必然会觉得昆明市的报纸，一般水准都相当高，在大后方足与重庆报纸相颉颃。惟特别注意社论，而忽略了副刊；两者又似异而实同，同为对于一个报纸有机性的漠视。主持人在求业务稳定一事上，都知道一个报纸对于出钱方面的后台，登广告的商人，以及那些嗜好不一的普通读者，全应当有个交代；然对于报纸本身，编者，和投稿者，在日月积累中还可能作的更大贡献，便疏忽了。也可说，只顾极力谋取本身支持得住，利用了当地廉价的知识能力，即放弃了一种进取的权利——用按日出版的报纸，有计划的来训练少壮有为的记者，或培养本地有希望的新进作家，因此使报纸本身也日益充实扩大的权利。

社论的执笔者

照习惯，昆明公私报纸的社论，多由几个学校较有名望的专家执笔，这就是我说的能与重庆第一流报纸比肩的原因。谈国际，谈一般社会问题，专家意见自然值得尊重。可是谈地方，谈某种实际问题，便不免稍稍隔阂。且所有社论不出二十个人的手笔，分别轮流写去，因之多见不出个性或特性。（去年美国新闻处有一时特别注意昆明各报的社论，照例译成英文后还印作美军读物，且指明某报代表某派，后经说明方不再看重。）而最大损失，还是社论多由社外人担任，社内好些少壮有为的编辑，于是多只编编例常的新闻。新闻来源既大多相同，于是只能在标题上或编排秩序上用点心。编辑不写社论，即容易失去对于每一问题的真正关心及深刻认识，再用笔来推测事件未来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并表示个人见解的机会。

事业雄心与职业兴趣

工作不太紧张费力，很多人便兼了两处或三处的职务。有的性质相同，有的性质不同。可是既一兼差，职务一多，却同样把本身绊住，到必需分别派往外埠工作，或参加国内外重要集会以资观摩时，想走动即不容易。从表面看，一个新闻从业员，当此物价高涨之时，编两处同样新闻，自然相当省事，生活也可望比较从容。若从深处看，则对报纸对个人，损失都未免太大了。许多有希望的干材，待发展的长处，

不牺牲于这个制度下，也可能在习惯中把才能萎缩了，变质了。从事这工作的，不可免渐渐失去创造“事业”的雄心，而只保留下一个“职业”的兴趣。职业兴趣在一个待发展的都市，实不易持久。不甘心如此下去，想有所挣扎的，多走同一道路，即脱离本行转业。机会一来，或入银行作经理，或入省府各厅任科长，或作了县长税局长。转业的结果，个人也许得到了合理的出路，但为新闻事业想想，若保不住优秀从业员十年二十年始终其事，编辑部永远只是一个训练大学生或中学生新手或老手转业预备的机构，其不经济已到什么程度！在这情形下，办报的感到困难，报纸不容易见出特别进步，是意中事。然新的问题且随同战事结束而来，即学校复员，客串社论委员的必走，航运便利，京沪平渝报纸当天可到昆明。昆明的报纸在广告营业方面，虽有个地域制，还不至受竞争影响，至于对国事表示抽象意见的价值，即不免日益低落下来。报纸的地方性越局促，优秀从业员流动性必更大。勉强守住岗位的，也越不容易在职务上发展其长处，于国际国内与同业争一席地位。这无形损失，说真话，比一二报社赔本关门意义还严重得多，严重得多！如果我们对于新闻从业员所抱的希望，原以为优秀分子在工作上积累经验，储蓄知识，即可望进而成为国际间第一流记者，这种记者的一支笔对于广泛人民所具教育影响，又远比什么委员、厅长、参政、代表，还重要十分，我们就会意识到这八年来这方面的损失如何了。

副刊的重要性

其次是昆明报纸对于副刊的忽视。副刊在新闻纸的发展史上说，本不是个了不得的部门，但已是个不可少的部门。从五四起始，近二十五年新闻纸上的副刊，即有个光荣的过去，可以回溯。初期社会重造思想与文学运动的建立，是用副刊作工具，而得到完全成功的。这二十年新作家的初期作品，更无不由副刊介绍于读者。鲁迅的短短杂文，即为适应副刊需要而写成。到民十四五以后，在北方，一个报纸的副刊编辑，且照例比任何版编辑重要。社长对于副刊编辑不当作职员，却有朋友帮忙意味。如孙伏园、徐志摩、刘半农诸人作副刊编辑，即为这种情形。许多报纸存在和发展，副刊好坏即大有关系。这个趋势在北伐成功后有了点变化，为的是单行刊物兴起，副刊有一时就掉落了。但从九一八以后，副刊又成为文学运动最适宜的工具。如以东北言，一切书报不易出关，但关外报纸却大量转载国内副刊上作品，成为沟通国内情绪最重要的读物。七七抗战以后，自由区内迁报纸因经济关系，不能不适应环境，缩小篇幅，将副刊地位移登广告。昆明报纸既没有用副刊教育读者的习惯，地方成为国际交通据点后，广告业务更加拥挤，因此某一时好些报纸索性取销副刊，即有副刊，也只是就剩余篇幅随便凑点东西，有等于无。当然不会想得到如何来设法特别聘一编辑来主持其事，每月花一笔钱作稿费，来增加报纸文化价值，并用它来造就本地作家了。也有意识到副刊的良好意义，且欲排除习惯上的困难，欲有所致力的，或因习惯限制，或因人材不

济，末了照例是来个杂文大会串，聊以解嘲，以为从兴趣着手容易争取读者。办报的既相当实际，不甚对抽象价值发生兴味，所以许多能写作有希望的本地年青作家，还是得不到应得机会，来学习，来创造，把作品水准慢慢提高，得到应有进步。因之本来可用作介绍学术推进新文学运动的工具，结果是炸酱面作法太极拳妙用全上了场，无助于学术也就可想而知了。直到三十四年又才有比较有生气的副刊出现。这个风气最大损失，即年青作家不能作正常发展，不是小趣味就来朗诵诗。把副刊弄到这个样子，还能寄托什么希望，自然不用说了。

青年作家的训练

若昆明几个报纸，一起始即看得远点，在任何情形下都能把报纸一部分篇幅留作副刊，更能有计划来处理它，用作本省青年作家练习写作竞争表现的场所，八年来，充满鲜明地方性的优秀作品，将不仅在本省为一有价值的收获，即在国内也必然可用为近八年优秀成绩的示范。但是，正因为疏忽了这一点，到上海的小报化刊物倾销入昆明后，不仅无从抵抗，且有摹仿学步争取读者的趋势！特别是某种官报对此事具有兴趣。因之有人说，这是有意为之，引入兴趣转入琐细，忘去大处。正如鼓励跳舞而禁止游行；许霉烂，不许进步。以个人看来，这与其说是有计划的行为，不如说是无计划的结果。因为二十五万人口的后方都市，已经有了十个跳舞场后，居然还有人投资一万万，来个第十一。结果是命令一来，同归于尽，可见投资者之无识。至于报纸上小新闻的

趋势，既系从小海报取法，小报一被禁，大报当然也就会重新安排！

好报纸的必要条件

以个人私意，昆明报纸底子不算坏，惟想在一新的时代中求存在，求发展，似乎都得用个较新的作风来试一试了。长处保留而弱点修正，当为这种新的努力的起始。即以本地人办本地报纸而言，新的报纸如能将过去一时的云南日报的长处，和当前正义报长处同冶一炉，以新面目和读者对面，纵不能说近乎理想报纸，至少在内地已可谓一极优秀报纸了。这种报纸的出现是否有望，还在负责人对于一个报纸的看法而定。必须明白：争取读者和培养编辑为一件事的两面，副刊对教育读者，又具有什么功用，投资方面不仅应当稍稍忘掉商业效果，也需要忘掉政治效果，这种报纸才会有希望在明日出现！

本篇发表于1946年9月1日《上海文化》第8期，署名沈从文。

从开发头脑说起

每年逢到中山先生的诞辰，总使我想到这位伟人的识见之远大。他在三十年前即明白中国问题为“穷”和“愚”，社会的腐败与退化，无不由之而生。因此言建国，即针对此两大病根而下手。必去“穷”与“愚”，方能把那个自外而来所形成的“弱”去掉，否则无可望。中山先生不幸于二十二年前即作了古人，使国人失去一思想深刻、眼光远大、性情宽厚的领导者。然而一切国家重造的理想，还保存于他的学说中，待后来者熟读深思，并于文字外理会其用心所在，克服一切困难与挫折，矛盾与两歧，慢慢实现的。

治穷为开发地利，征服自然，好好认识地面所生长，地下所蕴藏，加以运用处理，在分配上复有个制度使之比较平均，或有种政策使之渐趋于平均；国民生活有个转机，整个国家也方有个转机。治愚则为开发头脑，推行个广泛而长久的教育政策，使多数人知识加多和加深，俾人人对于新的时代新的世界，能有个新的态度新的习惯去适应。普通人民既感觉到自己是个主人，同时也就是个公民，对国家关系权利义务分明，因之知自爱

也能爱国。政治家既有政治家丰富广博的知识，且有兼容并包的气度，知道珍重国力，不作无意义浪费，而又尊重制度，能用战争以外方式调整一切社会的矛盾取得平衡。换言之，也可说他得"艺术"，他"懂"艺术！——像这么一个国家，一群人民，把这个国家传统长处好好保持，或想法发扬光大，弱点则努力去掉，如治毒瘤恶疮，国家还会不进步？

然而穷和愚至今似乎尚成为绊住中国进步的两个活结。这活结且若出于一条绳索，彼此牵缠。不论在上，在下，在朝，在野，不论"中国的主人"或"公仆"，凡欲向上挣扎，总不免让这个来自八方看不见摸不着的有历史性的活结套住，越缚越紧。表现这个抽象阻力，不仅是什么"敌人"的对立；自己的普遍而长期的怠工，萎靡不振，且更加强作用。俨若任何高尚理想与合理事实，都无从着手，无从生根。直到如今，我们对日本算是打了个胜仗，把这个强狠自大的国家，用我们的长处也用我们弱点，紧紧拖住，从而崩毁了。但对我们自己这个有历史性的弱点挣扎时，却真是一个惨败！

我们责谁？恨谁？怨谁？都无意义。我们只应当承认这弱点是一种有年分的老病，与全体民族体质多少有点关系，远之与所谓哲学的人生态度有关，近之又与所谓现代政治思想和教育方法有关，我们得弄明白，想办法。这悲剧是民族全体性的，这责任也就不是某某少数人可负的！

这挫折惨败的主要原因，从远一点说，我们的历史太久了。帝国新旧交替大一统局面，就延长了二十来朝，还有个偏霸分崩割据的较短时期不算。改朝换代照例是用武力，支持偏安更需武力，在这历史背景中，读书人就有个"从龙""附骥"的心理状态，延续了二千五百年。这个心理状态，一

直影响到现在，还可反映于某种第三第四组织中。我们说他缺少独立的见解，只依违于两大之间，应付事实，有所取予，还不够。我们得原谅那有个历史的鬼在起作用！至于教育呢？从近一点说，恐为由张香涛起始，即只知道救穷，支支节节来动手。仅记住管子所说的一句话，即“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其他的全不在意。革命轻轻松松推翻了一个帝国，却不料把属于帝国的一切有形制度和抽象原则也全毁了。旧的毁去，新的未能建立，属于历史上另一弱点，自然在另一群人生命中又得到抬头机会，即“中原逐鹿捷者先得”的英雄意识。因之有帝制，有复辟，有军阀割地而治的督军团，竟延长到中华民国十六年。直到大小书呆子将国家重造观念注入多数年青人头脑中，经过八年，与少数武力情绪相结合，革命成功了。然而又分裂，又内战，……凡属于内战，多少人身预其事的“功业”，自己既都不大愿意提起，引起痛苦的回忆，其余人的过失，我们还有什么不原谅处？

在这么一个不定局势下，支持到九一八，东北完了。也幸而东北与热河的完事，真正敌人势力一直侵入平津，我们才有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的警惧与觉醒。福建的人民政府的解体，两广的暗礁和平，以及西安事变良好的结束，都可见出有兵亦未尝必需用兵。大智若愚，其实不愚。

然而我们还得收另外一种“疏忽”的成果，即教育得来的另外困难。我们的家长从办新教育起始，比如说，北大的蔡老先生，和教育部范静生先生吧，本明白教育的理想不止传授知识，还容许有个比具体知识更重要的抽象愿望在内。愿望虽抽象，却能于另一代证实。可是到军阀时代，书呆子弄的教育，即并点缀性也缺少了。一省一县小些地方，学生的用处，还可排队

持旗到郊外欢迎将军镇守使的凯旋，这些伟人也还可就中挑取绅士人家的女学生作第几姨太太，逼得那家长不能不允许。大至于北平，似乎从民五六后，即已与上面政府完全游离。虽照例还有个教育部长，除了做官外，中国有多少国立大学，多少学生，就决不在意。因为只要稍稍在意，就会明白教授有好几年是无从靠公家薪水活下去，关于薪水一定要集团请愿闹了又闹，才于逢年过节时，从什么银行借一笔钱点缀点缀的！大至国家财政小至个人收入，穷既然是种事实，因此革命成功后，到读书人来作部长时，教育政策不知不觉便成了张香涛总督的继承者，解决穷，提倡理工。另一面或且以为可以使英雄人彀，转入笃实，免去文法中的"思想"混乱。一切针对现实，可就决想不到还有另外一种现实，即世界上有好些国家，地面地下都是穷得出奇的，只因为人民不愚，或直接面对贫乏，解决了穷的威胁，或虽穷而不见穷相，社会一切有条有理。人民知爱美，能深思，勤学习，肯振作；即产生不出巨万财富，百层高楼，但精神成就上却支配了这个世界大部分，也丰饶了这个世界人类情感和智慧！只除了现代政治作成的中国，不明白那些成就的价值和意义，不特不知尊重，还常常作成不必要的摧残，其余就决无相同的一国，对属于足以教育人类情感的一切，有这个忽视现象的！我们不知可有教育家能想得到，贪污自私的心理基础，还有个比贫穷更深远的背景？即在那些孩子们在受小学教育时代，由于教育的无知，一面极端缺少图画和音乐，却在文史课只背诵历史上伟人名字，一直到现在时人为止，即作成他们心理上的损害不健全。在中学时代，不知文学和美术，而居然有个吃政治饭的准备，引诱他们开始受催眠，习于不思不想。到大学，资质好发展比较平均的，人理工，和社会隔绝游离，自成一

体。资质中平或上上，只是带有少年时代即种下的羞怯孤僻性情的，拣文史。而中学时代即有个吃政治饭准备的，学经济政治社会教育，企图由一小单位扩大而成为一个大据点，而事实上十年过去后，这些活动朋友却上了台。只想想我们这个中层的组成，我们就接触着这个问题全部了。在这个发展趋势下，我们怎么能希望国家上轨道，有秩序，得进步？何怪乎到处是社交式的小聪明，到处是有传染性的拖混与适应，到处是公文八股，而使一切年青人麻痹瘫痪，弄得个社会国家恹恹无生气？我们可能想到，凡是提起"官僚"时，固然是个如何使人厌烦的名词，而作官僚的，又如何值得同情与恻悯？他们的一切，足从小学教育即起始的。若国家的教育政策，还在那么一个公式中衍进，到我们第三代，才更是悲剧！

且试从一件最容易为人忽略的小事看看，到最近，各国使馆有设"文化参赞"的消息发表了，从这个名分上想想，我们可知所谓文化参赞，至少是包含有对于所在国"文化"和本国"文化"具有广泛深刻的了解的人始能胜任的。这种人我们当前有几个？照日下教育设计上说来，国立大学就很少有个文化史或美术史的共通课程，而近二十年习惯，习文史者不仅难望如五四初期所望从认识传统建设一新的道路，即当时所诋毁的哼哼唧唧人材，亦已十分感觉缺乏。而一般趋势，只不过是从字义章句间着手，从不让学生从欣赏涵咏古人性情人格于历史记载与诗歌表现中，对传统精神情感毫无理会机会，这种学生从什么方面可望接受传统，淘深生命，而作出新的创造？若照这么下去，我们的文化参赞也就会像目前许多特种机构一样，得将援留用技术人员例，借材异邦方能办理。这多可怕，多可耻！

以个人私见说来：我们物质上的穷有办法，易解决。我们精神上的愚似乎还得一些有心人对于教育有崭新观念，从新着手。从小学到大学，每一级教育都注意到如何教育他们的情感，疏理它，启发它，扩大它，淘深它。若这件事得从明日“人之师”入手，大学教育近二十年中所无形培养的“愚”，得稍稍想法节制了。而美术，音乐，文学，哲学，知识与兴趣的普遍提倡，却可以在十年后，使新的中层负责者再不至于想到调整社会矛盾还用得着战争，儿童玩火的情绪，也绝不至于延长到一个人二十岁以后。

从这些问题上看，代表中国的头脑的北平，还有个新的运动待生长，待展开，事极明显！这运动没有罢课或游行，没有呼嚷哭泣或格杀勿论，只是一些不曾硬化僵化的头脑，能从深处思索，能反映，能理解能综合，能不为成见偏见所拘束，在一时一事现象上兴奋或绝望，而对于一些比较长远的事情，却可以作个尝试。嵩公府有个蔡孑民先生的纪念堂，孑民先生的学说，似乎值得从北大起始，由适之先生来从教育上扩大它的时候了。还有个文学运动，我们也还有些事可做，为十年二十年的后来者做点试验。我们这一代本身所经验的悲剧，也许只能用沉静来否定现实忍受下去了。可是生在这片美丽土地上的后来者，应当还可由一种健康希望带到一个稍稍合理的社会中，以及稍稍幸福的生活中！

本篇曾以《穷与愚》为题发表于1946年10月10日《益世报》(出版一·万号、创刊卅一年纪念刊)。经修订，篇名改为《从开发头脑说起》，发表于1946年12月1日《上海文化》第11期，均署名沈从文。

据《上海文化》版编入。

政治与文学

(一)

法西斯老板慕索里尼被民众捉住时，对那个围困他的一群意大利人民说："你放了我，拥护我，我保可以给你们一个崭新的罗马帝国。"话说得很动人，但是大家不相信，他就完了。若相信，他就可以在拥戴中重新爬起。至于那个大帝国，过三年五载能不能实现，那另是一问题。到时他可以说因如此如彼不能实现，照例有话可说。并且事实上也不会有人会去追问这个预言的兑现。这是政治。政治艺术就在这点上，权变第一。世界历史上就有许多政治家伟人，在大群人民中或较小一群的议员中，用各种预约得到个人成功，无害其为伟大。罗斯福和共和党要人竞选总统时，史塔林和人竞争党书记时，都不免要有那么一手。现代社会不仅容许一个政治家对本国人如此说点谎话，若对于另一国家时，似乎还容许说更多的谎话！纵横捭阖之术，是一个政治家的本钱，也是

一个外交家的本钱。

可是说这个话的若是一个作家，比如说，下巴颏生有长长的胡子那一位托尔斯泰吧，在沙皇向人民宣称德惠，大家都信以为真时，他却向俄罗斯人说："列位，拥护我，爱我，投我一票，信托，跟我走，我明年写一部《战争与和平》给你们。"大家却会考虑一会儿，不大相信。也许会有人那么说："托尔斯泰伯爵，你最好还是先写出来，我们再拥护吧。"万一时间已到了二十世纪，俄国政治社会组织已变了，说话的是高尔基，人民客气一点，也许会说："高尔基先生，我很相信你的话，要写可一定要有你上次出版的那本好！"相信也是有条件的，他曾经写过几本书，取得人民信托得到成功。这事到中国也怕差不多。因为这是文学。文学家不能空口说谎，任何伟大文学家，卖了预约的书必得到时出版。而读者又还有权利和自由来批评这个作品好坏，批评得好不好，意见不受作者拘束。一个政治家受无理攻击，他会起诉，会压迫出版者关门歇业，会派军警将人捉去杀头。一个作家呢，他只笑笑，因为一个人的演说，或一千个人的呐喊鼓噪，可以推翻尼罗王的政权，或一个帝国，可不闻有一篇批评或一堆不可靠文坛消息把托尔斯泰葬送。

（二）

若有人认为作家的笔必由政党调遣，那无妨各行其是。我的理由却极简单，这是两种工作。从政治家或伟人看，一千人进军罗马，即可产生一个帝国。从作家看他那个四千字的小说或一首诗，实在只有他的头脑和手才能产生。一个帝

国固然伟大，然而说到经久时，有时又似乎还敌不过一首七言诗。文学作家归入宣传部作职员，这是现代政治的悲剧。引引俄国事例统治管理来驳我的，回过头来看看那个自由一些国家的成就。我们作家不是在争“自由”，争“民主”？文学上的自由和民主，绝不是去掉那边限制让我再来统治。民主在任何一时的解释都包含一个自由竞争的原则，用成就和读者对面，和历史对面的原则。并且政党要领袖，要拥护，而且容许用一切不大合乎真实的手段作宣传，争取或巩固地位。文学的民主却不需要也不容许这些。文学涉于创作，没有什么人在作品以外能控制他人的权利，刚用笔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作品和老牌竞争，面且永远也在竞争中。这种竞争尽管十分不同，正由于不同即带来进步。真的进步是由此而来，不是由竞选……

（三）

这一个月来，因我写了点小文章，被另外一位笔名先生当作题目批判了若干次以后，得到很多的信，信件大致可以分作两类：一是少数熟人的，总说争不了事，这和国家情形一样，还是听命扫荡吧。一是陌生人和读者的，倒奇怪在名分下我有不少副刊，事实上帮手怕也不少，怎不来个笔战？我得谢谢这些朋友的好意，并谢谢给我把批判文章寄来的两位。批判文章做得很好，有立场，站地步，而又观点正确。且于雄赳赳之中还保留点点客气，又会断章取义不求甚解的傅会其词，若配合什么会的举行，可以说绝妙宣传。这一来，沈从文简直被打倒了。但是照某兄所说，又像是沈从文早就

落伍而倒多日了。极奇怪的倒是我什么时候又起来过？因为照我记忆所及，民十五年[1]时刚学习执笔，就被一伙在北平的什么社员倒过，我自己就不曾料到。民十八在上海又被一团体指定一某兄由检讨而扬弃过。且宣布必倒。我也想不出这检讨是什么意义。到二十三年又被一群生力军战战，三十年左右，桂林又有一些远距离扫荡，三十四五年在昆明又有些近距离扫荡。一共约二十年光景，次数不为不多，而且照例是团体性，再加上一堆文坛消息，不可谓不实力雄厚。我这一面呢，照理说，老是居于劣势。真不免让那些好朋友代为担心！不过事情也奇怪，二十年已成过去，好些人都消失了，或作了官，或作了商。更有意义的，是其中有两个还作了我的朋友，都是真有批评能力，且写过批评集的。我倒很希望他们还有兴致，再来批判我新写的一切作品，可是已停笔了。我还是我，原来无从属单人独马用这支笔来写点小说，从学习讨经验，求有以自见，现在还是如此。想起来真不免使人感慨系之！因为在我自己，对工作态度二十年变得似乎极少，但批判的笔却换了四五代了。而且所以受批判，倒又简单，我很恼怒了一些人。我的不入帮态度有时近于拆台，我的意见又近于不喝彩，而我的写作恰恰又“都要不得”。这个批语且可能是从不看我作品的人说的。这也正见出中国文坛的一鳞一爪。什么文坛？不过是现代政治下一个缩影罢了。只见有集团的独霸企图而已。然而和政治稍稍不同处，即有野心文坛独占局面却始终不易实现。为的是二十三十人固然可以产生个委员，或部长，更多些人还可以产生个罗马帝国，可是一首七言绝句呢，却要一个人用脑子来产生的。文坛中不仅有作者，也还有个读者。不仅有读标语而感动十分的人，

也还有拈斤簸两要把作品从文学史上衡量得失的人。有欢喜开会的作家，也有不欢喜出风头的作家。我们不是说要“民主”吗？这里就正有个民主，一面应容许相异，不同，而又能以个人为单位，竞争表现，在运动规则内争表现。不过这种民主制度对某一些人当然就不大顺利，因之扫荡随来。所以分析起来，这雄赳赳中其实也就有懦怯，恰恰和另外那个战争中有懦怯一样，不敢单独接受工作正面所课的责任，于是出以集团攻击。文字既然不过一种工具，那么，涉及批判，什么话不好说？所以话说得险而狠，可以说是必要的。不过既有二十年低头从事不作官的作者，也自然还有不信官的读者。所以文坛到底又还有点民主，虽然这正是另外一些人所不要的！扫荡者的文章，倒要附于被扫荡者集中方能存在，是无可奈何的。记得《益世报·文学周刊》第一期[②]上，编者即有个声明，刊物是对报纸，对读者、对作者要有个交代，不用作个人利益企图和热闹笔战的，所以现在还是要守住这个原则。我只说说批判者文章中串贯不来处和错误原因。

……

（四）

老朋友说：“你是不是有点痛苦？”我说：“唉嗨，有一点儿。那就是没有属于任何一党，也没有什么后台，自己也没有钱，不然倒很想把自己的文章和那些批判汇拢来，印个小本本，留下来有目共赏。”这文章到汇印时，关于我的只须改动一二排字时明明白白的错处。笔名先生的，却不妨由他任意修正，或不妨再看看我那个文章，完全看懂后再下批判。

也不妨把那些自己明知是胡扯处去掉，不能自圆其说处去掉，以及自承笨拙，倒也聪明，实又矛盾处去掉。这说不上什么雅量。这就是我们嚷民主民主的人一个试验，我这么写，你那么写，一起给人看看，免得断章取义，扭曲拉长，失去本来意义，欺骗读者。更重要的还是好让时间来批判批判。免得善忘的人在另一时又从别一点上傅会其词。

正因为文坛观战不多不少也观了二十二年，什么人如何变，还记得相当清楚。用集团方式来检讨扫荡，也见过了很多次。尤其记得深刻清楚的，是民十九左右一件事。民十八指派了一位批评了我一长文，理由简单，即我并不人伙。可是到十九年，朋友胡也频被捉后，他在困难中，不闻××援救，而写信、打电报、借款给我们去南京想办法援救的，却正是当时前进作家用作辱骂对象的胡适之和徐志摩二先生。即第二次丁玲出事找人援救时，照我所知，帮忙的还是胡适之先生。你们用为诬蔑我的文词，在青年中最毒辣动听的，无过于说我和国民党关系。这二十五年中的确也有唯一一次的关系，即当你们之中谁也不肯出面时，为救丁玲夫妇事，因朋友××之介，和陈立夫谈过一次话。随后是如何送他孩子回家，关于这问题，丁玲恐怕比你们知道得多许多。真要做他们的帮手，恐怕这时节正在上海南京支配若干机构，协商中也有一分了。

其次也算是关系，怕就是三十四年，我的三本短篇小说交开明印行，在桂林被党检查机构禁止付印，随后在金城江毁去，也即毁去我重要作品四分之一。另一《长河》被扣，由高植为交涉方收回付印。开明的叶圣陶先生和中大的高植先生还活在世界上，对这件事也知道比你们更清楚。二十五

年的所谓关系就是如此。我不会是如你们所猜想的国民党伙计，也不会是另一党伙计。世界上有的是一生专做伙计的人物。说来也许使你失望，我到如今还不是任何文学团体的会员。我用不着这么做，正如用不着如别的作家那么集团拜生送丧赋诗饮酒。别的人若居然能于社交方式宣传技术中，即可得到伟大的满足，很可以那么继续做下去，这出于个人嗜好。至于我呢，我只觉得一个作家应当如思想家，不会和人碰杯，不会和人唱和，不算落伍。他有权利在一种较客观的立场上认识这个社会，以及作成社会的人民情绪生活的历史，从过去、目前，而推测出个未来。他也有权利和一切党派游离，如大多数专门家一样，把他的工作贡献于人民。他更有权利而且十分需要，与政治家所用的政争手段不一致，来爱这个国家，爱这些人民。比如说，目前情形，凡是拥有武力和武器的政党，用人民作赌注的内战，尽管政治上渲染得如何“无可避免”，以及自己一方面如何“不得已”。但是一个真正有做人良心的作者，他决不会说这战争是必要的。稍有爱和不忍之心，更不会赞成这种大规模集团残杀是国家人民之福！有武力的政党，可以用武力争取胜利，无武力的政党，也容许利用两者矛盾而增加重要性，惟一个无党派爱人生的作家，他当然和真正大多数人愿望一样，认为流血只能耗损国家民族力量。他也会进一步提醒负责方面，一个真正对民主有理想的政党领袖，必明白他虽有“权力”可以糟蹋人民，实无“权利”把整个国家毁于战火中，增加后来者困难。我看了三十五年内战，让我更坚信这个国家的得救，不能从这个战争方式得来。人民实在太累了，要的是休息，慢慢才能够恢复元气。中国目前的第三种组织，若能纯粹从这个观点

出发，来作一切活动，我无条件拥护。我尽管不会加入他们的帮伙，也乐意执鞭追从。我怕争斗吗？是的，我怕我和我们一辈爱这个国家而又沉默工作了四十年的一些专家，毁于混乱中，我更怕这个国家会为国力消耗太大而毁去。你们欢喜说人民人民，我敢说，如果让人民能表示意见，没有人民会说战争是必须的！但是战争还是来了。这是我们的痛苦，凡有做人良心的总会感到痛苦，是国家民族的羞耻，因为直到如今，我们还缺少一种稍进步的观念，能由战争以外找寻调整这个国家的矛盾方式。我愿在此向批判我的某兄所属一党进言，你们不是以和平运动为目标？这时正是更要在真正第三者方面代人民警告呼吁和平时候。正是发宣言引起国人响应时候。

……

这是作者写于1947年2月前后的4篇未完稿。其中第一篇篇名和分段标题“（一）”是原稿所有，并用“向辑三”署名。其余3篇原稿无标题，且未署名，编入本集时，与第一篇合编成一组，序号是编者所加。排列次序不代表内容上的先后。

① 民十五年　此处年代有误，应为1925年，即民国十四年。

② 第一期　1946年10月13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10期发表了作者的《〈文学周刊〉开张》，这是由沈从文主编的第一期《文学周刊》。

性与政治

佛洛依德谈心理分析，把人类活动的基因，都归纳到一个“性”字上去。以为一切愿望与动力都和“性”相会通，相连结。庄子的“道在尿溺”[1]，倒好像被科学为证实了。据翻译过他作品的夏斧心老友说，这位大师用的字眼儿，意义实相当宽泛，虽不离于性欲，也不拘执男女明显色欲意识和短兵相接行为。有时竟和中国老圣人说的性含义相差不多，也即是“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的性，已近于抒情的阐明！（这种抒情的阐明最有问题处，当为佛氏对于梦的解释，作出种种象征联想。）然而“一切与性有关”的前提，却供给了我们一点便利，即由性出发，试检讨别人之所以为人时，对于那个圆颅方踵，具有特殊智慧，充沛热情，无比精力，然而到处理自己问题时，处处又似乎照例显得永远矛盾，而且相当狼狈的生物，生理年龄与活动倾向所受自然限制及其相互关系，作出有会于心的微笑。我们或可敷衍他的意见，对“人是政治动物”加以新的诠释。尤其是对于知识阶级的意识

形态，借用佛氏的观点，来加以检讨，会有些新的发现。发现人虽是政治动物，这种动物因年龄不同，实在类属各异。有些具飞腾意味，有些必奔跃而前，有些只匍匐行动，又有些定于一，不饮不食，不鸣不动，不死不生。这种属不同的动物，取予反应又好像可以归纳成几个公式，若吾人承认这个简单公式中所包含的真理，为这种动物的进步计，会觉得还应当也可能建立一套新的观念，作种种新的设计，我意思当然指政治设计。

在目下一般情形中，对于“读书人”我们似乎容易保留那么一种共同印象：即十六岁到二十四五岁的青年接近政治时，多取的是“恋爱”态度。（现代政治虽充满宗教味，一面是作成增加敬信的种种铺张，有杂耍游艺，一面又同是个大饭团。但和宗教不同处，即宗教信仰年纪越老剩余情绪越容易吸收，现代政治可并不能兴奋多数老年人。）三十以后到四十五岁的壮年接近政治时，多取的是“成家”态度。四十五岁以后中年老年接近政治时，多取的是“攀亲家”态度。虽不可免有例外，一般趋势在生理年龄上所形成的两性求偶观，和那个政治倾向，竟有个奇异的一致性或平衡现象。

年青人对于恋爱的觉醒，有些近于自然，有些出于人为的启发和刺激，却一例充满浓厚浪漫抒情色调。且因为剩余生命，照习惯多消耗到普通文学小说阅读上，更增加他们这方面的自然倾向。对方越新就越容易激发其爱慕心。他有的是生命热忱，倘若社会正常，本可以分散使用到各方面上。但历史夙命和一时风气，却共同集中了这种充沛热忱到男女情分取予上。正由于隔膜，且从而扩大了他的热忱成为牺牲

的渴望。又由于风俗习惯上对于性的特别禁忌，以及有经验家长保守顽固见解的压迫，更增加他一种好奇心，以及突过制约的冲动。于是他追求，寻觅，为争取热忱证实而与年长“理性”取一相反方向，或焦头烂额，或胜利成功，他不在意，总之，出于生命的必然，他向前了。

至于三十岁以上的人呢？他的年龄已到“成家”的年龄。就普通人言，他生命属于身心两方面都已成熟，先一时由于热情所带来的兴奋，由于隔绝所形成的幻念和遐思，到此已稍稍稳定。要成家对手，将不仅是能热情浥注的摩登女郎，因为他已从各方面知道了这种女子的长处和短处。手指甲涂得红红紫紫一举手一投足都见出那个“新”，可是引人过于注目处，也会使同伴感到压迫。这些人若有“准绅士”打算，照例关系发展到某种程度上时，会有点担心。“这种时髦伴侣，是否宜于共同过日子？”在共同生活中，他又还不失去男子原来的身分，原来的生活习惯，与生活计划。倘若他还有个抽象的家长或具体的职业，会更增加同居以后的考虑。他到时会发现她脚上那双高跟皮鞋，未必宜于在中国几个大都市以外不平街道上散步，和老式家屋中上下楼梯，或高门限迈出迈进。此外身上穿的，头上网的，手腕上带的，又未必宜于中国南北各地不同的气候。还有挂在肩上那只大皮篋，难道真比绣花抱兜还适用？袖子衣脚忽长忽短，难道真有什么美学根据？即有说明，岂不还可嗅出点上海绸缎商和成衣匠的宣传空气？总之，他到了职业或事业年龄，求偶成家的愿望不会和廿岁以内的少年方式相同，是很明显的。他也许更肯定要追求“摩登”，由于他明白摩登有助于他的职业或事

业成功，至少在社交上也活动些。居多倒是承认摩登的好处，间或与之卖弄卖弄风情，却不会太和它相近，冒险娶入家中的究竟是少数。这种人若比较顽固或保守，且必觉得摩登的短处，如对于文化传统的忽视轻视，以及优美风俗习惯之否认，为不可忍受。而且时髦处常常是表面的，真正西方所课于共同生活的种种美德，责任与宽容，求知而爱美，全无领会。这么一个壮年人的成家理想和事实，对手当然不是摩登女郎！若社会容许他自己选择，“门当户对”的旧观念会在他崭新头脑中起作用。他的目标将是所谓“闺秀”。三十年来社会分解，代表名门世家的闺秀，已越来越少，代替而起足当这个阶级之将是两种女性：一是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尤以教会大学毕业的重社交礼貌），二是新兴的达官富商子女。凑巧是兼全两种身分的女性，近于理想女性，这女子是个寡妇，又有财有貌有地位，且无其他亲族阻碍，就更容易结合。若寡妇名声不大好，虽可爱，倒不一定去爱。他也许还稍微势利些（这是这种人的性格一部分），要成家时名门闺秀无可望，身边又恰好是两个女子：一个是有热情，无家私，性情身分又还不大十分明白确定的女性，一个是家长名誉虽不大好，子弟已不少在腐化堕落，可是大家庭，亲族多盘据要津，有势有力，当前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都还可靠，个人相貌也还过得去的女子。结果一经选择，就必然会让基于常识的功利主义抬头，寻媒作证做了那有势力人家的女婿。说起这种有势力人家，大家明白，不仅经常派得各人到处在找寻女婿，还需要更多的赘婿：虽说对赘婿历来缺少尊敬，却乐意增加赘婿的数量，形成一个综合家庭的。

至于五十岁以上的人呢？他已到营菟裘娱老，为子孙作计攀亲家的年纪了。一个人到了这分年纪时，虽常常或偶然会有童心再现，照现代心理学所提及的由于衰老的补偿心理，欢喜和一个十五六岁风流波俏的女孩子恋爱，事并不出奇。倘若这恋爱是不受其他限制，而有助于他的社交活动，以及其他权势发展，他必比二十岁青年还爱得热情缠绵，表示得细腻而深致。但这依然是少数，尤其是他倘若是个有事业，且曾经于他所致力半生的事业上有过特别贡献，生命发展得极正常的老年人，他将在选择上证实一种正常的取舍。因为这一切，也证实了孔子所谓“五十而知天命”说的大有道理。在恋爱问题上，或取个最开明的态度，不禁止儿女自由恋爱，自己可不会和儿子同样在床头壁上贴个女明星或棒球选手相片，认为得意有趣的！他有些地方比中年人或更明白摩登的弱点，但自然也就更容易疏忽了摩登的好处。至于攀亲家的情绪抬头，实重在有条件的稳当可靠，也会选豪族巨户，也会选寒素清门，二者似异而实同，同重在传统品德文化理解和尊重。也不免有点私心，由于他老了，休息感觉已在生命中发生意义，这种休息或营菟裘兴趣，都将影响到攀亲家的作计，一切实近于常态而非变态。他有更多机会和中年寡妇结婚，由于相互的吸引，或由于寡妇将来那笔遗产。寡妇的社会地位，如果相当尊贵，寡妇的社会身分，又清洁无疵，不仅得到年长的欢心，还可赢得年青的爱敬，甚至于追求，老绅士与之结合，情形更极自然。即或是因种种理由，不能正式同居，老绅士出于友谊和信托，也必然是会随事随处支持寡妇的行为愿望，骂骂家长的专断而无能，认为

合理。

年青人青春期的觉醒，不问是天然的或人为的，总之，既已觉醒，他便需要恋爱，或为爱人至上主义者，或对于这个动人名词充满激情。他也世故，也纯洁，有一点必需明白，即这点情绪是与生俱来很真切的。指腹为婚的事他受不了，会否认。媒婆串掇也不成功，他已不大相信职业的媒人。这原因不一定是对女方不满，有时倒是怕同学嘲笑。在他自己所选择的恋爱成功后，发现对方不如理想那么完整的事也常有，因此离婚分手时有所闻。亦有在恋爱失败后灰心颓废堕落，不再像个人的。又有一起始就滑头滑脑，只梦想靠岳家升官发财，去作坐码头的一类人家女婿的。

至于壮年人的成家梦，既居多只要个像样主妇共同过日子，得到对象后，当然可望把“家庭”弄得还有条理。自然也有结合以后方发现改造对方无可望，自己这么又不成，感到十分痛苦的。更有人可以不恋爱，不结婚，把求偶热忱和成家愿望一同寄托到事业上，倒反而觉得还清静省事的。亦有壮年想出头，急于事功却不甚讲求手段，乐意由婚姻入手，本人还长得白净漂亮，有些小技能，和洋人社交说英语十分自然，玩桥牌，吃鸡尾酒，样样在行，间或还批评批评管理家庭措施的不合，意见温和而诚恳，被有力者看中，于是忽然成为变相的赘婿。他目的既在远处将来，当前又慢慢的可参加这个特别家庭会议，所以即在作赘婿地位上，凡事必表现得异常循谨可爱，而终于成为极得力的赘婿。也有久而久之，对于自己身分地位感到一点苦闷，熟透了这个家庭的腐败，明白这么混下去，混不出什么意义，良心既不安，因而

常露怨望的。于是一面怨望，一面说不定还有个把女朋友，这女朋友可能是个寡妇，可能是个摩登，总之和这个家外人相当亲密。可是他还是不会轻易离婚，那位岳丈大人也照例不轻易提出解约驱逐命令。到重要关头必须表示态度时，他还会忽然用柔懦忏悔口气说：我已上门了多年，还有什么办法？……

老年人似有个生命益少矛盾益多现象。有攀亲家情绪无从证实，去作新奇恋爱，周旋于摩登间交换恭维，错综日子倒过得很兴奋的。有和寡妇结了婚，得到短期安定的，有宣称行将披发入山，事实上倒只坐在书斋中忍受痛苦。

社会虽是有机的，时时在生长变化中，也有些不大能变的东西存在，即人性。人虽是一种极其活动十分复杂的生物，又似乎可以归纳成为若干组，很少会有新种新机能发现。人之不同不在个体品质的歧异，居多还在通过岁月，或受自然鼓励，或受自然限制所作成的差别为显明。年青人容易成为社会主义追求者或信仰者，壮年人却不免对于英美式民主政治感到倾心，人到老年呢，他的热情已得到了平衡，经验和知识却十分完备，社会若有秩序，那些经验和知识，用在任何一种政治上，都极有意义。社会失去秩序，多数对现实政治，恐都是取个无可奈何态度，情绪既游离无所归，知识经验也难得好好运用，只在糟蹋中等待完事。二十年来许多许多这种有用的人都完事了，剩下的却是另外一种人。这种人照例永远在支配领导这个国家，用的方式却完全如一个小买卖经纪人或羊屠户经营生意的方式。……

到此为止，我们的帆似乎扯得太饱满，驶离海岸越来越

远，得回头了。我谈到的好像是已触着了个“现实”问题，因为摩登女郎和顽固家长，寡妇，绅士，赘婿，和其他种种人物无不俨然呼之欲出，而又随时随处可以碰头，你和我完全有分！倘若又有什么人，因为我文章中不常用某种介词，即看不懂本意，以为被影射讥讽，来作长篇大论抗议，或集团检讨，我想还是盼望他节约精力好些。一切说明只不过是一种抒情的比喻，对某种共通现象的比喻，可无兴趣对某某个人行为活动特作速写。因为事实存在已二三十年，大家都所谓“熟透了”也。但从这个即景抒情小文中，似乎也可以看出些些道理，即佛氏学说一部分的证实，政治动物的问题研究离不了性。或者说，当前读书人的意识形态，以及对于“政治”所抱见解和倾向，除了其他复杂成分，还有个自然因素，自然限制，得明白，得承认。凡经营统一他人头脑的，争民主自由的准备社会重造的，一切有效措施或抽象设计，对于这个“有生不一”现象如果多理解一些，多注意一些，使各得其所，各有所归，这个民族明日悲剧会减少些，进步的理想会容易实现些，而一切发展也会合理些。若过于疏忽了它，或一切依此，只从一个习惯的“现实主义”应付下去，打下去，争夺下去，开会下去，改组下去，我们的悲剧将延长，将扩大，直到政府改组第十回时，国家依然不会有何转机的。

年来常听人有提及黄色刊物影响到年青人性早熟问题，相当严重。却不大注意到普及国内中学大学那个吃政治饭的经营，如只侧重于简化头脑，作成“拥护这个打倒那个”即已足，影响到国家将来，更如何严重！二千年前一个思想家，

即告我们说“道在尿溺”，目下我们却需要有人从这句话上产生一种思想体系，重造政治，重造国家！

本篇分别发表于1947年4月16日《知识与生活》第1期，1947年5月16日《论语》第129期，均署名沈从文。依《知识与生活》本编入。

①“道在尿溺” 出自《庄子·知北游》，其原文为：“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尿溺。’”

五　　四

五四运动二十八年了，每年必有纪念会。到这天，报纸上照例且有些文章，提及过去，也提及由此带来的历史，带来的希望。每到社会矛盾越大，纠纷越多，困难极严重，现实景象严重十分时，到了这一天，将更令人追想“过去”，并期望“未来”。纪念五四的意义也就极深刻。因为“五四”二字实象征一种年青人求国家重造的热烈愿望，和表现这愿望的坦白行为。中年人宜于守成，倘若国家社会发展上轨道，有秩序，任何方面这种有成的中年人，对国家社会进步，当然都有他的贡献。但到国家社会矛盾、分歧、于纠纷中见出极大危机，中年人的经验、知识和比较稳定保守的做人观念，都无助于局部恶化的补救时，青年本身和一般人对于青年的期待，都必然是觉得要进步，必挣扎。个人的挣扎总不济事，还得紧紧去追求。这是个自然现象，也是近三十年来中国重造过程一种现实。从现实学习，学得多一些，深远些，会把问题也看得深远一些。认识过去较多，必明白一切进步改革的挣扎，都有挫折，有迷乱，也不免有错误（小小错误且常

常有极大牺牲），为这个国家带来新的困难和不幸。到自己负责接手一切时，所形成的悲剧，才会明白实近于不必要的。把近三十年来错误一一数去，并无多大意义，只看看至今犹普遍存在于那个内战继续中的种种悲剧，就可知这里还如何需要青年有个更新的看法，悲剧方可望于明日能够结束，能转变而成为进步动力。过去时代，我们把希望寄托到帝王和所控制武力上，不大济事了，虽然变相的帝王和强大武力，还上好存在。但遇到问题来时，这帝王，这武力，都已显得不大中用。其次是把希望寄托到民主初创时的公仆，总统和人民代表的两院议员身上，结果是不大中用的公仆，不免被武人挟制，为所欲为，太过中用的武人，又必然是独断独行，使国家分崩离析，人民无可奈何。总之，越来越糟。越糟的原因虽相当复杂，但大部分却可说是由于武力和武器在手，一种有传染性的自足自恃情绪扩张的结果。这个现实虽带来将军伟人的具体财富和抽象功勋，但是，给国民多数却只会带来灾难；无辜的流血，普遍的穷困，以及一切进步的好梦的破灭。国家一切向上机会，都被这种人轻轻放过了，而持着的却是由于贪得自私招来的悲惨局面。这种种，还一例有个强烈传染性。所谓国族品德的存在或堕落意义，也就在这种情况中可以见出。十年的对外苦撑，到胜利来临，国家重造的当儿，解决矛盾，平衡情感，还得用集团屠杀方式。这个与其说是“自然”的，又不如说是“人为”的。与其说是命中注定，还不如说这只是“人谋不臧”。中国若真有所谓思想家，或大政治家，应当从这问题上提出他对于国家重造的见解。

五四又来了，纪念了快有三十次，这个国家的破产光景

却已差不多了。各种火都还正在燃烧，一直烧到许多人的心上。这种无处不着火的情形，而且仿佛还受万里外许多有势力的集团鼓励。任何方面的热心和巧计，都只会作成一种不可设想的局势，即纷乱，解体。我们要从战争以外想办法，用爱与合作来代替仇恨，才会有个转机。这事若无望于中年壮年在社会上“有成”的一种人时就还得寄托希望于多数青年。

这也是一种战争，即对于战争的完全否定。去掉习惯上处理问题的依赖方法，能另外有所寻觅，有所发现。这需要一种充满宗教虔敬的信仰。这新的信仰，是待人从更新一种文学诗歌运动中来证实，而从年青的心的对流中传染，得到应得收获的！我们盼望有这种更健康坚实的青年作家，在国内各地普遍生长，一支笔贴近土地人民，写出有生气有理想的新时代颂歌。

本篇发表于1947年5月4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39期，署名编者。

欢迎魏德迈

魏德迈先生这么大热天到了中国。到中国后还不曾稍稍休息，又各处来去走动，和公私各方面接头，并正式宣称：此来是搜集情报资料，作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参考。征集资料以外还有什么工作，我们不想检讨，因为一切分析、检讨、和目下存在的事实与明天必有的发展，似乎都不相干。存在的既已存在，要来的一定会来。我们知道，美国有美国一套见解，打算，这一切都基于美国对世界对远东政策需求。虽然时时也在变，变的是小处，大处不会变。换言之，即从美国人观点看来，对中国事务将承认小处会有弄错时，大处可不会错。不过美国对华政策，既已必需要派一特别人物用这个方式搜集资料，可知华盛顿方面，已显明承认从和平来临到马歇尔返国为止，远东司所保有的关于中国一切资料，在当前发展局势中，都已发生问题；或根本不合用，或深感不够用。也似乎意识到积下了一堆小错误，还将有形成大错可能。现在到再认识中国时候了。所以公开表示，各方面的参考资料都有用，更乐意收授与官方相反资料。

魏德迈先生给我们最深刻印象，是在这次大战最后两年，主持中美联合印缅区及湘桂区反攻军事时期。其时凡住在后方几个大都市反攻基地，或随军在前线的中国知识分子，眼见到友邦中万千青年人，离开了家、离开了社会，从空中，从陆地，充满热情和勇气。来到中国服务或共同作战的，一定都十分感动。感动中且不免抱着三分歉意，因为那一面从异邦远远的赶来，帮助我们作战，抵抗敌人，在中国土地上流血拼命。这一面却正是许多许多壮年青年，用种种名分，借故逃亡到美国去考察读书。这件事说来已够可怕了。更可怕的还是社会各阶层中，由于战事延长，做人信心失去以后，普遍堕落如何在发酵情形下作广泛传染。别的不说，则“吃老米”的官吏人民，常常为了个人点点利益，便不知作了多少丢脸失体面事情！这种人一部分，且即是所谓从美国留学归来，美国人又认定为“亲美派”的中坚分子，都能说流畅英语、写通顺英文、廿年前名为“买办”，集中在几个大都市公事房、写字间，现今却多数分散于国内各层官吏或各种新式企业机构中。这种人坏一些的，就是观察上某先生一再主张“杀”的一群，除了寄食于这个豪门大饭团中人，其余多数中国人民对于他们就从无好感。即为人还站得住的，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梦，他们对于这个国家的看法，也都和真正多数中国人民隔离得十分遥远，既不能理解多数人生活遭遇，也就无从明白这个多数心中的愿望。然而两种人却代表了中国，无形中支配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友谊或政策。由于他们在中国各阶层的存在（尤其是最上阶层），即使美国人引起一种错误结论，认为这些亲美派既深懂美国文化与文明，实宜于统治中国人民，并领导这个国家，进而从美国学习，

渐渐作成美国人所希望的民主国家，太平洋南岸的最大主顾和卫星。全想不到这种人在美国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好公民，到中国现实政治下，那点为公服务精神，以及对于国家人民应有的热爱，都已成为一种稀有原素。亚细亚式的残忍贪得和自私，却慢慢彼此浸润流注，填满了这些中年壮年官吏头脑和灵魂。即基于这种认识，美国在中国二十年来便进行了许多工作，本来出于好意，结果还是不免错误。近年来明白官吏和附属于官吏的一群，都不大济事了，才又转而把希望寄托到还未入官场的知识分子。以为这些人公民道德既更可信托，学问人格又足令人民信仰尊敬，且多学有专长，在学校中有群众。这些人若能成为一个组织，得到抬头机会，或与现政府完全合作，或能事事监督政府，中国问题也就化零为整，可以逐渐进入民主政治。即基于这种认识，魏德迈先生到中国来不多久，南北各地中国知识分子，便又有了些英美式的政治活动，有些由受禁止而变为得鼓励的社团出现，有些接洽。这种工作当然可引导国家转入新的形势发展中。但其实，还是不成的！

魏德迈先生北来了，我们想起他在大战期间对中国的友谊，以及此行的辛苦，理应诚诚实实表示一点欢迎意思。但一想起自从马歇尔先生离中国后，中国土地上所发生的流血和焚烧毁坏，麦克阿瑟忘了珍珠港前因后果，近来对日本的种种鼓励，所表现美国对远东的不智措施，我们不由不感到一种痛苦，喉头为悲痛所扼住，什么话也不能说了。我是个在业务上和习文学的青年常保持广泛接触，在学校又教的是如何用笔表现自己愿望或社会理想的教师，因此在一百四十六个大学生学期结业中，作了个测验，即要他们试叙叙十年

生命经验或七七印象，想从这个测验中，看看这一百四十六个，年级由大二到大四年龄由十九到二十六岁的文学青年，身体和灵魂是在什么情形下生长，对国家对社会又具有些什么观念或愿望。一百四十六本卷子内容归纳出来，可得七点意思：

他们是在屈辱和饥饿中长大的。

他们完全明白战争对于他们这一代的损害。

他们很知道爱国二字所包含的痛苦责任，然而有勇气担当。

他们已深切知道没有人民，国家不会进步，不会存在的。空洞的八股，只是官僚政治的点缀物。

他们的生命在长成中，他们的爱和恨、以及对社会的理想，也在生长中。

他们觉得凡有计划扶助日帝国主义武力或经济复兴的，对中国都是极不友谊行为。

他们再不会如上一代在温饱中培养出的知识分子或官吏，以媚悦英美日苏为政术或自见之方。他们可以照自己意思选择朋友或同伴。

魏德迈先生，倘若觉得美国对华政策，还需要从中国人一方面的反应注意，用作参考，这样才真是值得注意的一分资料！年来美国对中国问题渐渐感到棘手，且必然会觉得青年学生对美国不无反感，目前影响虽不甚显著，将来却可能有一天会爆发，会僵固，不可收拾。昔人说，础润知雨，这种事只要稍稍留心也可看出。若愿知道这种反感问题何在，魏德迈先生应当明白中国青年原和美国青年有一点相同，即对外战争过久，精神身体都已十分疲惫，实在不希望在本国

本土还有战争继续，更不希望另一国家来帮助这种无终结的战乱。他们求和平的背景或动机即在此，他们对于邻邦的友敌印象也即在此。美国的对华政策，仅仅注意到买办、官吏、受英美文明熏陶的高级知识分子，还不中用，注意点的确也应当变变了。美国如愿扩大友谊至中国青年一代，中国孔夫子有两句话值得记住："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这个"人"是个万万多数恢恢待毙的人民，以及对美国友谊已感到惑疑的知识青年。

本篇发表于1947年8月1日天津《大公报》，署名沈从文。

一种新希望

秋节过后，气候由阴雨转入晴明，爽朗阳光下池水清澄，草木犹未萎黄，篱落间瓜果壮实成熟，翠菊牵牛盘旋依恋于树石草丛间，景物萧瑟中依增妩媚，社会若是个常态社会，竟名于市的多士，能出郊和土地自然稍稍接触亲近，必将觉得时节易序，人为生物之一，新陈代谢亦不可免。个人工作名分如果恰恰是个教书先生，于一年工作起始时，眼看着一群来自各方，于十年战争风霜雨雪中长大成人的青年，必充满了悲悯和深爱，国家三十年来如何由挫折得到转机以及前一辈克服困难过程，加以检讨分析时，说来必充满感情。对于社会明日，由合理进步带来的幸福繁荣，且会作种种乐观预言。个人生命即或业已由悲剧性的半生挣扎，转入行将退休的暮境，将依旧心无凝滞，湛然虚明，深信进步理想，可望由下一代年轻少壮证实。

至于和土地相依为命的农民，在庄稼丰收蔬果成熟的当前，自然会更加兴奋快乐。先是动员全家长幼，提壶挈瓶，于欢呼欢笑声中，一同下田，将半年来辛苦经营，散布畦町

陇亩间的生产物，成束成筐，捆载回家。随后是换上浆洗干净衣服，把收获物大车小车，陆续搬运入城。换取棉花布匹盐糖杂物，好准备寒冬杀猪过年！城乡物资对流，以及物产转口出国，公私交通机构，必因货运显得工作忙碌而活泼。经常收入增加，服务人员的年终双份奖金梦，过不久即必然见诸事实。各关客运车船工具，因相互竞争而大加改良，更见得安全方便。介于农村和城市，生产和消费，两者间的工商二业，由于原料吸收和生产品转移分配，不待说，都将形成一种季节性的连锁繁荣。社会既逐渐进入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一些人的理性情感，当然也完全恢复了正常作用，把另一时万千人于情绪凝固仇恨传染情形中的战争死亡，看成一回不会重复的噩梦！……这种种本来都十分自然，因为试算算日子，中国已胜利复员二年。战败国家和殖民地解放的区域大都已由混乱解体到恢复常态，更何况一个胜利大国！但是这个秋天景物画如今展开看来却似乎十分荒谬，近于一种童话插图。事实恰恰相反，全民族当前，却正如被魔咒迷惑，成为梦游之大集团，面临一道无底深渊，实不知应当如何方能够把噩梦唤醒。士农工商古之四民，所有理想愿望或事业基础，在现实情况下，都不免瘫痪塌圮，形成一堆不堪收拾的破碎。试到街上对行路人稍稍注意，不是枯槁憔悴，现出一种悲苦相，即是呆钝麻木，现出一种憨子相。即上层组织结构中少数又少数负责者，在地位上或习惯上，还装作对国家社会前途抱个完全乐观态度，勉强支持下去，试从他眼角额际去搜寻，也终可发现那点无从掩饰的沉痛和焦心。前不多久日子，有个记者走到一所大学教授宿舍中，作过一度善意访问，把这些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群，作了些凄惨素

描。这个记者虽谨慎用笔画出了几场动人外景，可不会写到内心。想不到这群有训练的黔娄先生，穷苦生活究竟还担当得住，（若担当不了，必早已改了业！）他们还有个比实生活分量更沉重的担负，即每天摊开报纸时，那一串专电要闻带来的克服，占领，失陷，紧张，修理，破坏，以及国外什么会场上的僵持，舌战，否决，退席，不祥局势的延长与扩大，和显明对峙的剑拔弩张，真不免要想到这个国家咋个了！头脑单纯寄食于“朝”的，以及情感热烈和希望于“野”的，面前虽同样是那么一张报纸，说不定都能于专电要闻上得到点“打得好”“作得对”的自足自信。并用之为根据，作种种快乐推论结论。事实上日子过得虽也十分沉重、单调、空虚、惫懒，却共同由“信”出发，把生命化零为整，见得单纯得多也顽硬得多。至于这个人近中年的书呆子群呢？正由于对近三十年社会全部发展，有个较深刻认识，对一般文化，又有种深湛的爱，对世界将来，人类前途，并且还永远保留了点天真的憧憬，终认为战争是社会变态，是不得已，是人类心智进步失调所形成的一种暂时挫败现象。“越战越勇”虽有人，一国元气都必然为之完全斫丧。目下负责者，十年二十年后，必然恩怨都消，同归于土，下一代可还得收拾破碎，来于焚烧轰炸之余的废墟上，和荒芜千里土地上，重造一个国家。他明白当前的发展，对于国力实包含了多大牺牲。每一种“打得好”“作得痛快”的印象，都必然是在另外一片土地上，用千万善良无辜人民的血和泪堆成。凡是某一地方有过两个以上不同消息的，那地方就必然有更猛烈的火在燃烧，更多的血在泛滥！这民族自杀悲剧的终结，既一时无望于噩梦自然觉醒，话说回来，就还应当承认是“人谋不臧，并非

一夙命必然!”试稍作检讨，即可知一面是士大夫的本来习惯，对一个上层统治组织，不免过分纵容，作成个“官僚万能”的局面。一面是学校教育制度分工过细，尤其是文哲方面弱点更形显著，所学转入枝节琐细，缺少取精用宏得大体深的综合基础，作成个“思想贫困”的局面。一个国家若把“官僚万能”和“思想贫困”局面，不自觉维持到二十年长久时间，社会组织求其不退化，不恶化，不分解，不崩毁，如何可得？人谋不臧既非单纯怨谴可以补救，于是引起了三种新的发展，作为对于当前的否定，以及转机的企图！一是政治上第三方面的尝试，二是学术独立的重呼，三是文化思想运动更新的综合。第一种尝试遭遇挫折，人事粘合不得法，本身脆薄而寄托希望又过大，欲收绥靖时局平衡两大之功，当然不易见功。然“政治”二字若在字典上还有意义，第三方面又能重造，将来自然有其光辉前途。第二种呼声刚刚提出，有于分崩离析中保存人的心智资源意义，很显明将引起多方面重视，不仅拥有这种资源的青年并开发这种资源的学人，必有同感，即正在大规模耗费国力民力作赌注的人，也没有人会说明天不要这个还能像个国家的！可是事情在目前说来，将不免近于“闹市炼丹”，丹成九转难能起死回生，无如民族“发背”业已蛆腐转黑！并且炼丹有个条件，一不闻鸡犬之声，二妇女于月事产中不得接近，三慎防醉人酒徒冒犯，四看守鼎灶小道童必谨慎厥职，四者缺一终不免弄得个灶倒鼎翻！如今四方炮火喊杀正十分激烈，老妇弱女多深染家中怨死者新血，到处又有个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想什么，做什么，更非悟空可比，这种充满青春待并发的活力，原本必须从各方面分散，

可变成各种进步的基本热能，若只想用个老方式降伏下来，引诱他们鼎造边如水扇火，即当真能一时听话，试想想外边声音行动，可能不能影响到他们的猴儿心，所以炼丹虽为美事，环境空气不改良，终恐不易进行，但事势所趋，这个保持心智资源的设计，将成为一个日益明确的目标，而且在有连续性运动下，终可陆续粘有各方面的情感，愿望，能力，形成一种比第三方面的政治更重要的发展，则无可怀疑。第三种是在学校中，普遍社会中，一切机构组织，一切个别工作计划，所寄托所蕴蓄的呼吁和悬望，即“我们需要个更新的粘合，来重造这个国家！”也可说是个“第四组织”的孕育，目前虽犹若缺少具体纲目，明日必逐渐成形，它将在政治学术以外作更广泛的粘合与吸收，且能于更新的世界局势中作有效适应。这个新的综合有个根本不同起点，即重在给予而不重在获得，重在未来而不重在当前，要第一种理想抬头需要培养些优秀政治家，要第二种理想起作用需要培养优秀科学家或哲学家，此外优秀伟大文学、艺术、音乐、戏剧的创造，体育竞技和工业管理技术人材的训练，举凡一切增加上层组织弹性和效率，而又能沟通、中和多方面对立、矛盾，以及病态的集权与残忍的势能，都必然是从这个新的综合所形成的培养液中寄托希望，方能证实，这种粘合重造的起始，看来困难作成容易，近于为长者折枝，从报纸即可着乎，历史如足借镜，“五四”运动的一切发展犹在目前，应当有具远见的报人和学人，来把它重新检讨，重新作计！用报纸副刊把一些真有独立公民资格的灵魂和人格，重新刺激唤醒，恢复他们的勇气和信心，使他们能想，能学，能爱能工作的头脑和双手，和作成噩梦的因子游离，来接受一笔人类

心智辛勤和情感奔放综合作成的丰富遗产。听时间把一切引入历史一个新页，在这个新的历史叙述中，我那个深秋景物画，就必然将成为一幅最合需要的插图了。哲人罗素说："文明人类和兽物不同处为有远虑，而能作种种处置。"我们也正可从这个小小测验，看一看这个民族是否已经真正衰老？还只是一时在新旧交替状态下迷失方向，形成一种心智失调的彷徨和悲剧？……为了下一代，只是为了下一代，为的是我们的季节和生命，都一同已进入深秋！

本篇先后发表于1947年10月21日上海《益世报》，1947年11月9日、10日北平《益世报》，均署名沈从文。

新党中一个湖南乡下人和一个湖南人的朋友

“鸾鸟凤凰，日以远兮”——《楚辞·涉江》

民国初元前后，时人谈“思想”，在读书人头脑中受影响最深刻的，必数饮冰室主人梁任公。谈政治，熊凤凰[1]在政治上的活跃，更容易予人保留一个鲜明而生动印象。近五十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两个人的贡献实各有千秋。

由戊戌变法到辛亥前夕，国民革命武力犹毫无根蒂处，先有个宪政观念的蕴酿，准备，与试行代议制的勇气和决心，普通影响及西南诸省，这运动实发源于湖南的新党。新党分子多数是湖南人，却有几个外省朋友置身其间，支持了组织的活动与发展。如“散原老人”陈三立，当时即以湘抚公子潇洒好客见称于世。《人境庐诗钞》作者黄遵宪，更以头脑开明富有世界知识著闻，……地方既有那么一群对国家怀远景的少壮知识分子及贤明官吏，才作成“饮冰室主人”梁启超年二十余入湘主讲时务书院的事情。新党活动前后受了两次严重打击：第一次是戊戌政变，牺牲了谭嗣同；第二次是武

汉富有票案，牺牲了唐才常。新党虽遭受打击，人民革命政体改造运动并不因而停止。熊凤凰以新党的重要一员，于两次事变中都幸而免，此后西南诸省人民谘议局的成立，即全得力于这个新党奔走其事。所以初期宪政运动及组织经验，在当时即特别丰富。辛亥起义，湘鄂新军首先发难，革命势力由两湖到江南后，南北诸省均起响应。局势澄清，帝制结束，民国成立。然新旧势力之间有冲突，政府上层与区域派系之间有冲突，现实与理想之间有冲突，若一任其发展，则终无法避免分裂与割扰。必有一个抽象势力调和平衡种种矛盾，方能进而言其他。

当时任公先生正年及壮仕，精力弥满，一支笔恰恰能反映多数知识进步分子的愿望和感情，熊凤凰更因富于政治经济经验，且于宪政努力，极得各方面信托，无疑是两个最孚人望的清流领袖。适国民党第二次革命受挫折，损失极大。北政府实力虽是控制一切反对势力，然西南诸省情况实荡动不安，人民情绪尤多危惧。袁世凯想缓靖人心，因此有所谓“人材内阁”应时运而产生。（据林宰平师意，袁以为组阁事最好由任公先生出面，经一再接触，始知任公虽能文笔、有思想、负重望、实一纯粹书生，并无实际从政经验，凤凰则各方面关系均较好，始由熊主阁事，梁长一部。其实这次内阁重要计划决策，仍多出任公手。）其时国人对民主既有所憧憬，政体组织尚具规模，人材复集中，社会又比较单纯，所以这个人材内阁，不仅仅是在国内外得人望，负时誉，即几个书生自己，也认为必能替国家人民作点事；对于沉鸷雄狠的袁世凯，可用两院监督责任内阁制，使其不能逾权干政；对于新经失败元气大伤之国民党，可收保护培育转移目标于

宪政之功。对于各方面矛盾冲突，则希望能用超然态度来平衡中和。盱衡时局，澄清天下，责任虽重大艰巨，机会实千载一时。然而几个书生的单纯民主信念，那玩得过老军务的狡滑世故。所以不及一年，紧要关头来临，测验到几个书生的政治魄力及政治道德时，终不能不辞职下台。这失败不仅仅是几个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理想败北，更重要的还是文人执政的责任内阁制，以及附于这个制度下的民主理想，议会尊严，从此无形结束。以残杀异己愚弄书生自得的袁世凯，过不多久，亦复被筹安会几个迂腐不争气书生所愚，上下不能，终于气死。代替而来的，便是一场连续演出永不闭幕的内战大悲剧。从此伟人拥兵自卫，画境而守，各假名义，割据一方。个人情绪还稳定，彼此之间少纠葛，即如以推牌九，娶小妻增殖田地房产和银行存款自娱。并每年按时为家中人或自己做寿，集中了名厨名角，请客唱堂会，聚敛财礼，耗费金钱，满足自己那点英雄伟人功名梦。个人情绪若不甚稳定，又或地盘税收和另一方有了争持，又或因二三好事无聊政客门客，串掇其间，以为如彼如此，不早下手不免受人暗算，自然便轮到所训练的十万二十万壮丁死士，持刀而前相对而砍一场大战时，必重新得到平衡或一方败北，始能罢手。这种伟人和伟人本来往往是儿女亲家或兰谱兄弟，平时免不了彼此交际，要送礼送信代表，原驻京办事处长，有儿女婚娶还要媒人和亲家，因此也就必然各有一群幕僚政治家，活跃于职务关系间，或安排于国会、政府、新闻界和金融界，经常作种种活动。到内战爆发时，一伙儿自必更加兴奋。战局明朗化后，垮台的于是带了金珠细软，银行存折，及三五得宠妖夫人，三五亲信，向上海、香港或日本一跑，等待下

文。成功的便直向北京或其他省会进军。接着就是政府改组或省长更换，布景略动，新贵上场。或通电下野，或通电就职，又是庆功宴，大堂会，一场热闹。于是北京城廊房头条容丰照相馆，换上了一批文武新贵人三尺大相，相上并照例勋章累累。天桥什么哲学家八字举例，也换上这种伟人生庚。点缀北京前门外一带市景的，却依旧是一个尉官级招募委员，手执一面脏旧白布旗帜，为在朝伟人招兵。白旗移动处，可即发现五七位面容憔悴失业带病的薛平贵，尾随其后，趑趄而前。这些人中说不定半小时前还在“赛孔明”摊子边卜过一课，记忆着戏文中红鬃鬉马故事，乡下茅屋里当真又还有个王三姐在等待他立功发财，回去寒窑相会，因之充满悲愤和决绝之心，一直到成炮灰为止。……总统、内阁、国会、一切既无不依附战胜者暂时稳定局面而存在，上场政治新贵，知识学问即不乏第一流人物，终得用提公文包，办庶务，及逢场作优三种身分情绪而活动；一切举措都不免如提线傀儡，唯伟人意旨是听。此辈进身之方，既多以阴柔便给见忠信，少正直不阿阳刚粹美之德，积因成习，惰性转增，凡想做事敢言事的，因之反如愚戇痴骙，不明政术。聪明现实官僚，自然便不免如王逸叙楚辞所谓——怀道以迷国，佯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这种人在当时虽说也即是“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唯其能如此少骨气，具弹性，有责任而不负，惟唯唯诺诺阿上取容，却轮流占据上层统制组织数十年。虽繁荣了大都市的戏院，酒馆，舞场，妓寮，绸缎商人或百货公司，自然使得全个国家人民，不免憔悴欲尽，政治去“民主”日远，“民主”二字也因之逐渐成为一个空洞不祥名辞：不是虚有其名，即是动

触禁忌。直到北伐前期，广东方面才有一点新气象，然而北伐成功随即又是宁汉分裂，官僚又重新抬头，……这就是我们国家，是我们近三十年民主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反复学习。伟人名宦通过吾人回忆时，其中固也有俊迈不群，人格明朗之士，但多数却如一册平庸而恶劣漫画，然而这一幅幅连续而来的升官图，阅之却不仅使人刺目作痛，实使一切有心人不免为之碎心！因为从这个短短历史追数爬梳，即可知政治上“人材”或“奴才”，有时固如两种生物，各有分定，勉强不来。君子道消而贤人避世，莠草蒺藜即普遍丛生。有时又似乎并非泾渭异流，实出于同一人义利取舍一念之差。大家都明白“民主”曾得而复失，过去失于军阀无知而自大，行为自私而专横，当前失于传统弱点犹未尽除，再加上个政治思想的对峙，殊不知民主之所以失，多数从政者之气度人格及政术中取予之方关系尤深。政治上若只见知进而不能退人物，知聚敛而不能作事人物，知作假宣传而少真信仰人物，持国柄主大器者，即为唐太宗，明太祖，史大林，罗斯福，于此求盛世，求民主，或告人以业已郅治，行将民主，能不能有人相信。……前事若可作鉴，实值得论世经国者特别戒惧警惕！因民主或时局，其所以成这个样子，过去或当前，盘据于政治上层人物，都还有责任待尽未尽。其事虽庞大而无端，固亦可于三五人是否能超越个人成败得失而有所计划，几微之处测其发展也。

人材内阁一解体后，任公先生虽在反帝倒袁之役，犹抱病奔走西南，参预松坡先生戎幕，盾鼻草檄，很写了几篇大文章，影响国人瞻听。此后即不再过问实际政治，且失去用笔领导思想的兴趣，转而治中国文化史。秉三先生则从民五

六后，即已放弃东山再起打算，尽全力于平民教育。变成一个墨氏信徒，推爱及物，无所不至，自奉俭薄，至于终生。死前数年，且把所有私产，全部捐献作为永久基金。个人因再无其他余财，还按月向董事会支领二百元薪津作日用，年近六十，吃九元一月二级职员伙食，不以为苦。一生凡事都若自成一格，无所依傍，综合了瑰伟奇异与平易近情而为一，临之竟落无迹象可寻。因之一个现代史学者，谈到民初元政治转捩点，并疏解及几个政治家和学人关系，和他的前因后果时，一面对于这个清流领袖，经济材识政治气度表示敬意，一面对于他的思想人格发展，就不免相当隔阂。会觉得这个人来得突兀去得上倏忽，恰恰如太史公对项羽印象，有“何兴之暴”感。

照个人意见说来，问题实简单而明白，“因为这是一个楚人底子”。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离骚》

楚人有它的民族气质，不特显著于自沉清流的三闾大夫，还浸透于一切平凡心灵。由于生命力充沛，特点也就恰是弱点：易负气轻生，难媚世屈己。从近百年学人烈士试略加检讨，曾左胡彭[2]之勇于为专制帝王杀人，支持腐败传统，不在本题，拟另作论述。此外经学专精如皮鹿门，文采诙谲如王壬秋，思想活动如谭复生，唐才常，宋钝初，反对专制帝政主持革命军事如黄克强，蔡松坡，四部杂学如叶德辉，纵横霸才如杨度，……性分材具虽各有长短，个人一生取予荣枯亦因之而异，然而有一点还是相同，即那点楚人气质，于

鸣默之际均如可摸可触。凡属于这个底子，都不免受一种夙命拘束；宜于孤立陷阵，不易集团同功。能进取，难守成，胜不为王而败必死。或临阵丧元，或老死牖下；其于胜败之中无协妥又完全相同。时代或有寒暑，本来气质可部分修正。近三十年政治中，即曾出过一谭组庵先生，正如深憭老氏，"舌以柔而久存"之戒，南京陵园前留下一座有风景丘壑的谭墓，于春秋佳日足供游人凭吊，不至如其他乡先辈身后寂寞。及另一方式另一伙儿遍及国内老乡亲，更以别扭而变格……但试想想看，如彼或如此，其为楚人气质，岂不是还分明彰著？熊凤凰实更像个具原始性的楚人，和他生长的小环境有关系。

湖南人提起熊凤凰时，即常不忘记说一句"这是个凤凰三厅的苗子。"其实地方虽属苗区，却为征服统制苗人而设治，县城近于一个军事性大堡垒，戍卒屯丁多外来人。本省人还不甚辨悉苗与非苗，可见地域偏僻隔离到何等程度。

下面是我在几个杂著上，对于这个小地方的叙述。

"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涉江》

一切城市的存在，大都在交通、物产、经济情形下，成为那个城市荣枯的因缘。这地方却以另外一种意义无所依附而独立。试将那个用粗糙坚实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为地方的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了这边疆僻地的孤城，百里内外是上千碉堡和营汛关卡。碉堡各用大石头砌成，位置在山顶头，随了山路脉络蜿蜒走去，营汛关卡各位置在驿路上，布置得极有秩序。这些东西是在一百五十年前按照一种精密的设计，

各保持相当距离，在周围数百方里内，平均分配下来，解决了退守一隅的边民叛乱的。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赤了每一条官路和每一个碉堡营汛。到如今，一切完事了，碉堡多已毁废，营汛多成为民房村落，人民已大半同化了。落日黄昏时节，站到这个巍然独在，万山环绕的孤城高处，眺望那些远近残毁碉堡，还可依稀想见当时角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

这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是天王菩萨，其次是兵备道和总兵提督军门，又其次才是游击、参将、千总、把总、村长、乡绅、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敬鬼信神，守法怕官。每家俱有兵役，可按月各自到营上领取一点银子，一份米粮，且可从官家领取百年前被政府所没收的公田播种。兵籍分战、守、马三种等级：守兵等级较低，除定时上衙门当值，春秋二季校阅武艺，平时并无职务。可农可工，不受拘束。战兵分驻湘西各属县，行有行饷，坐有坐粮，一家三口差可温饱。马兵似从驿站制度演变而来，驿站废除后，马兵分配城乡各属，数额既不多，身分因之较高，从不出征驻防，亦少应差役，人马均有薪饷，马多养在家中。除春秋大阅，得参加刺毬射垛，此外仅仅是迎春、霜降各节日，装备得鞍辔鲜明，排列在军门校场队伍中作仪仗。……兵都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也都朴厚勤俭，敬神守法而乐生。城中人每年各按照家中有无，于节令中杀猪、宰羊、磔狗，献鸡献鱼，求神保佑五谷的蕃殖，六畜的兴旺，儿女的长成，以及作婚丧的和会，疾病的禳解。人人都乐意把家中的储蓄一部分，捐献给庙祝或单独执行巫术的道士。官府却每月派人下省请领十四万七千两雪花银子，存储四乡官仓的

屯谷，定量分发给名册中报兵役的官兵。凡有兵役人家门前，都钉悬一白木小牌，上面用朱墨注明服役人姓名、年岁和身分。地方上各事都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照例有本街老年首事人，携带捐簿向各处人敛钱作社，举办土地会，杀猪分社肉，择本街空旷地方唱木傀儡戏。旱暵祈雨，除牧民县长率领士绅，素服去各庙行香，顽童们也应景凑趣，共同抬了活狗，颈带柳条圈，或扎成草龙，各处走去。（抬狗求雨用意，还似乎有点有意无心亵渎神灵和官府意味。）每年从立春后，即有世袭春官，（多麻阳县高村岩门两地人担任，）著明代黄麻官服，乌纱帽，携小小土牛，到各处人家去，用高亢喉音诵读一年四时节令有关农事歌词。岁暮年末，居民还愿的，多预先看定日子，邀请当地著名苗巫，装饰红衣傩神于家中正屋，杀猪宰羊，捶大鼓如雷鸣，主事苗巫即穿鲜红如血缎子袍服，吹镂银牛角，舞铜刀、法器、锦拂，踊跃鼓舞娱神。每堂法事都含有一点法术表演，且于法事间隔中，进行人神同乐的戏剧，庄严中有诙谐，诙谐处虽粗俚实健康，可以中和社会由于鬼神迷信和生活隔离作成的神经紧张及其他病态。城中的住户，多百年前派遣移来的戍卒屯丁，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虽经过百年的综合，由于会馆制度的存在，各种地方性的语言习惯，还依然各保存一点独立性，然而这些人又和经管地方行政的公门中人一样，都得用苗语作第二种语言，方能应付各事。为的是衙署和商店情形一样，进出的人有大半还是苗人。地方由少数地主和多数军官，在政治上与婚姻上两面的结合，产生一个上层阶级，这阶级一方面用一种保守稳健的政策，长时期支配地方一切，

并保有大部分属于私有的土地，而这阶级的来源，却依然出于当年的戍卒屯丁。县城四乡山坡上多产桐杉漆茶，矿坑中有朱砂水银，松林里生菌子，山洞中多硝。城乡全不缺少勇敢忠诚适于战争的农兵，与勤俭耐劳适于家庭的妇人。在军校阶级厨房中，出家常可口的菜饭，在伐树砍柴人口中，有热情优美的歌声。

地方东南四十里接近辰河（即古辰溪俗名麻阳河），一道河流定期泛滥肥沃了多山的两岸河谷地，多米多橘柚。西北二十里后，即已渐入高峻，近连苗乡，万山重叠，大小重叠的山中，大杉树和老毛竹用长年深翠逼人眼目的颜色，蔓延各处。一道小河从高山绝涧中流出，汇集了万山细流，沿了两岸有杉树林的河沟奔驰喷薄而过，住在山谷中的苗人，就各在河岸编缚竹子作成三丈对径的水车，接引河中流水，灌溉高处的山田和菜园。河水长年清澈，其中多鲫鱼，鳜鱼，鲤鱼，羊角鱼，洞穴溪涧中还有一种大到三五十斤的鲵鱼。（惟广东商人间或来收买，本地人可不吃它。）……小溪水环流东北城下驶，到七十里后，即与泸溪上游的洞河在“所里”相会，泸溪到县治时再与沅水会，即下常德直达洞庭。

从这个叙述上看之，就可知地方虽小而近于偏陬僻壤，当时却比湘西邻近各县较富足。按照傅鼐征苗安边计划，湘西边区最高统制机构，辰沅永靖兵备道和镇箪镇总兵官，两个机构既统制绿营兵勇，每月除耗用各属屯田谷米外，还可请愿十余万花银作协饷。另外一面则离城六十里湘黔边境的猴子坪，大桐汞，是湘西出朱砂水银区域，离城百余里的辰溪县，是湘西煤磺区，离城四百里的柳林岔，且是著名出金砂地方。保护这些矿区生产，照例得有一点军队驻防，自然

归绿营军勇负责。咸同之际打长毛，守云贵，又出过几个提督军门，为乡人带了点功名富贵，……地方人取得财富发展生命的方式，终不脱屯丁戍卒的习惯，所以读书人在这个地方自然成为稀有分子。然而这个社会组织的单纯和孤立，在个人体力和性格上，便保有了更像历史上所说楚人的禀赋，长处和弱点都鲜明凸出，却在综合中常有生物学上所说的突变现象发生。军人中很出过几个充满艺术气质的人物，读书人则多含楚气，于诗文中见驳而不纯之霸才。

"余思旧邦，心依违兮。日暮黄昏，羌幽悲兮"——《九叹》

并且地方有光明的一面，一切人物生活于单纯而离奇背景中，犹如一首有个性有色彩的诗歌，然而也还有极黑暗凄惨的一面，大都用血涂写而成，为任何诗人所不忍重述。因为那地方本为种族征服一个重要据点。五溪蛮千年来如何被消灭同化，年远世易已难得其详。然清代以汉治苗的毒辣统制政策，傅鼐的种种计划的推行，直到长时期安定局面的获得，说是"血染赤了每条官路及碉堡"而来，则并非过言。到我知道事世时，就还有两件事在印象中异常深刻，且影响一生极大：其一即县衙门每天均有案件审讯，不过三五天，又必有苗人因犯小罪被送上站笼缢死。这些性情驯善忠厚的特种人民，常因斗殴一类私事被控强盗，有钱自易取和。若无钱赎罪，即很容易被送上站笼，示众一定时刻，再执行死刑。未抽去脚下底板前，家中妇人泪眼莹莹逼近木笼边来送终时，男的低低的嘱咐后事，女的便低声连呼青天。另外出

了钱的仇家，却与土讼棍苗译员买了些爆竹，等待执刑时在笼边燃放，感谢青天报仇。其次是辛亥革命，四乡苗民集中暴动，乘夜攻城失败后，军队下乡捉人，逢人即捉，一串串绑入城中屠杀，一连整月，直到执行官吏也寒心不敢负责，因此将这些无辜良民死生，完全交给于当地神庙中两片竹筊，作为决定。秉三先生在这么一个小小石头城中，且小小时即随同作军官的熊老太爷各处驻防，既比我早生三十年，所见到边区善良人民被贪官污吏鱼肉事情，自然更加深切更加多。其揽辔中原澄清天下之壮怀大志，一经受挫证实无何希望后，过去或目前，无知人民在残忍贪得统制下长久牺牲的痛苦印象，于其生命中必重新抬头，出于爱与不忍之心，将中年后全部精力理想，转而集中于慈善事业与平民教育，且凡事恭行践履，临以庄敬，转变虽若极突兀，其实也就并不奇异。在新教育设计上，年前去世之陶行知，近犹在美宣传中国平教之晏阳初，二氏工作即全得助于秉三先生支持。这种新教育观，目前虽若已经过时，将来却可望与联合国文教设计，或其他更新机构，取得种种合作，在国内作更广泛试验；尤其是涉于职业工艺教育，这个制度可参证处一定还多……

从这个社会背景的叙述，想把秉三先生民元前后在政治方面的热情活跃表现，作成一种有机说明，还不甚容易，但从这个背景形成的人格方面，看看他民六以后离开了政治，去从事平民教育，且守住一种极端素朴的生活，终其一生，性格上的博大与悲悯，却多少可看出一点消息。这是一个真正的湖南乡下人。唯其为乡下人，才能把伟大与素朴，一同溶接于全人格中，见出明朗温静的光辉。

湖南人朋友梁任公先生，死去快二十年了。这个湖南乡

下人，带着他褪色理想和古典热情，以及因国难来临为救济人民奔走呼吁得来的疲劳和碎心，瞑目死去也已十年了。更多活着的湖南人，抗战八年家乡毁尽之后，犹不能卖刀买犊，回转本籍，从荒园废墟上，将生命馀力，与当地孤儿寡妇同工共事，为下一代幸福与安全有所努力，重新建造一些房屋、工厂、和学校，让后一代明白，团结合作抗敌御侮，一切牺牲，对国家民族具有何等庄严意义，且带来多少可证实的幸福希望。却于中国各处地面，无可奈何，流迁转徙，来参加一个民族自残的流血大悲剧，更充分将楚人的长处和弱点，用于职业上或信仰上，进而作成世界大屠杀一个序幕曲。

政治！政治！这个国家的政治，既只能作成驱人死亡迫人疯狂的行为扩大与延长，政治家或思想家于此情形下，凡已失去做人良心的，尚认为系必然现象，正可于此变中求有以自见，做人良心未泯的，亦大都除束手缄口，等待同归于尽，殆无事可为。不免更令人对于过去或当前，一些人敢于从另外一个观点出发，“令人乐生而各遂其生”的政治运动，思想检讨，教育设计，青年组织，文学美术创作，及其他一切属于个人的善意努力，都感到凄怆的钦迟。为的是所有努力得来的良好效果和现实的摧残毁灭对照时，虽显得薄弱而少功，然而人类若当真还希望得罪，这时代又真有所谓伟大政治家或思想家，明白人类情感褊持之可惧，自残之无益。推爱人如己之心，来对这个连续悲剧知有所否定，且能够从另一种肯定信念有所寻觅时，乐为执鞭负戈者当大有其人。

近日来，寒流重袭河北平原，故都一入夜，室外温度即到零下十五点，空气都如结了冰，半夜中还常可闻远处隐约炮声连续，使人想象得出：每一度钢铁崩裂过程中，必然有

人流血有人死，挣扎于生死之际的呼喊呻吟，亦仿佛有些脆弱亲切悲哀沉痛乡音可闻。

一个去向遥遥远方十八岁年纪的表亲侄女来信说："叔叔，叔叔，我们已到了我想到的地方。虽离开了你已经很远，实盼望你依然是我们的旗帜，在来自四面的严酷寒风吹拂中屹立不动。我们都认为你曾经作过这种旗帜！我们在争取人民愿望的尊严，自由与和平！……"

另一个守住某一孤立据点，年逾五十岁了的老友××也来信说："我们十年来死亡了几千万人民，夺回一片土地上的工矿产业，要二三十年经营建设才具规模，两年中全毁掉了，或毁于接收，或毁于炮火。一切如今还在毁。这么下去给了下一代多大担负，……悲壮牺牲虽然是事实，我们若有伟大政治家或思想家，能够把这点牺牲精神，或同力合心，或分组竞赛，转移到驾驭钢铁征服自然工作上去，三五年以后，每人一天作四小时工，大家也可以吃得饱穿得暖，一到星期天还可换上新衣和家中人去看有味觉新电影！……人民需要的是和平，只要有和平，他们就会照料土地照料自己，在这片土地上活得上好，你们还可以说话，情形已那么严重，为什么不多说点话？"

这也是两个湖南人，一个还把国家一切转机寄托到战争上，却不明白战争为人民带来的是什么。一个透澈厌恶战争，一切理想的实证，却不能不寄托到战争的结果上。两个信件一同搁在我书桌前，耳听寒风中送来的远处隐约炮声，和来自两代生命，两处地域，愿望似异实同的呼声，想起这个国家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不觉眼湿。

死去的大多寂寞死去，生存的却如此痛苦生存，是为什

么？三十年前胡适之先生做文章，劝人每一举措遇事都要问问“为什么”。我们当前的政治家，思想家，优秀活动青年，还有不有人能想想当前是“为什么”没有？敢于从承认以外还知有所否定，从信仰以外保留些怀疑，十分积极的来追究一下这个“为什么”没有？……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离骚》

三十七年一月十三日午夜

本篇发表于1948年2月21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79期，署名沈从文。

① 熊风凰　即熊希龄，字秉三。因籍贯湖南凤凰，故称熊凤凰。

② 曾左胡彭　即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皆为湘军首领。

纪念五四

近三十年中国变化太大了。向这半个世纪短短历史追究变化的原因，我们必承认民八五四实在是中国大转变一个标志。有学术自由，知识分子中的理性方能抬头。理性抬了头，方有对社会一切不良现象怀疑否认重新检讨的精神，以及改进或修正愿望。文学革命把这种精神与愿望加以充分表现，由于真诚，引起了普遍影响，方有五卅，方有三一八，方有北伐，方有统一，方有抗战。可是我们若从另一个观点看看文运本身，就会觉得它虽推动发展了这个社会的变，却同时也不由自主，遭受了这易变社会的摧残，越来越失去原有的意义。

促成堕落的原因虽多种，也可说一为从民十五起始，文学运动势力由北到南，由学校转入商场，与上海商业资本逐渐结合为一，文学作品有了商品意义，成为商品之一种。从表面看，是大大发展，事实说来，它必然受损害。一为民十八以后，这个带商品性得商人推销的新文学事业，被在朝在野的政党同时看中了，它又与政治逐渐结合而为一，本来是

指导思想的工作，一变而成为点缀政策的工具。从表面看，越有前途，事实说来，不免更糟。

文运与上海商场和各地官场有了因缘，作家忽然多起来了，书店多起来了，社团多起来了，争夺也多起来了。一切都好像在发展，在膨胀，只是那点五四单纯虔诚精神灌输，却在慢慢的萎缩；从作者与读者俩方面总结，末后只剩余一个零。或由社会发展而变形变质，变得失去本来意义，名存实亡。

五四精神特点是“天真”和“勇敢”，如就文学言，即生命青春大无畏的精神，用文字当成一个工具来改造社会之外，更用天真和勇敢的热情去尝试。幼稚，无妨，受攻袭，也无妨，失败，更不在乎。大家真有信心，鼓励他们信心的是求真，毫无个人功利思想夹杂其间。要出路，要的是信心中的真理抬头。要解放，要的是将社会上愚与迷丢掉！改革的对象虽抽象，实具体。一切出于自主自发的，不依赖任何势力。对内战则完全取个否定态度。其所仗得到社会信托，这点仁而无私勇面自信态度关系极大。热情事物是具有传染性的，领导的既由大学师生，所以对学生分子影响特别大。这影响直接虽限于学校，间接实普及全中国。文运支持者一离开了学校，便渐渐离开真诚，离开了热情，变成为世故，为阿谀。由于商业性与政治性，举凡能引起商业作用与政治效果的“问题”多，“作品”少。作者的创造力，有一半得迎合商人，另一半得傅会政策，政策既常在变动中，因此三十年来许多作家的变化，多方一言难尽。尤其重要的是一与学校离开，有一个时期，学校也就只能培养一些新式书呆子。有些学校甚至于作国文不许用语体文。这并不出奇，实在十分自然！文

运与大学一脱离，就与教育脱离，萎靡、堕落、无生气，都是应有结果。学校一与文运分离，也不免显得保守、退化、无生气，无朝气。抗战四五年后，著名国内的西南联大，大学校经济系人数忽然加多，大学校竟似乎忽然成为银行办事员的养成所，这种年青人“找出路”的打算，就说明文运与学校离开后，“思想”二字可能成为如何空洞的名词。

文运遭遇商业政治两种势力分割后，作家的“天真”和“勇敢”完全消失了，代替它的是一种功利计较和世故运用。有些人信仰真理爱护真理的五四精神，一变而为发财升官的功利思想；与商人合作或合股，用一个听从调遣的态度来活动，则可以发财，为某种政策帮忙凑趣，用一个阿谀态度来活动，则可以做官。（这种人若做了官，请想想能不能凡事还想到国家人民？）……功利思想既变成一部分职业作家创作活力，求文运不变质，势不可能。从此商人官家不仅成为文运提携者，保护者，同时且是支配者，统治者。作家成名的便成御用物，新起的便求为御用物，照流行语说来，这种情形名为“有思想，有信仰”。不能随波逐流的，具有真正独立自主见解和工作精神的，反而名为“无中心思想的个人主义者”，遭受多方面迫害。更可怕的现象，是商人官家见猎心喜，不甘寂寞，或受小伙计怂恿齐来从事写作，这种作品本不像个东西，但因种种便利，分布推销，得到各方面捧场，作品于是成为一时标准。个人成功恰好糟蹋了整个文运。其中自爱自重的，看看这玩意儿越来越不成事，于是同政治方面有心人具同一情绪，“放手吧，还是随二三子来玩，来热闹活动吧，”不合作，大家搁笔。有希望的作家不肯啃糟啜醨而搁笔，第三流或根本上不是个作家也不能写出什么像样作品

的，倒因缘时会，用一种透底的社交世故，此呼彼应，携手合作，俨然成为文坛中活跃重要人物。

文运与教育离开，反与官场携手，一切不外乎点缀既有政策，所以在抗战六年后，在政府所主持的文学运动集会中，虽多了些与文学工作毫不相干的伟人出席消息，且有了个文学奖金制度，事实上有形无形限制都已加强。许多大学国文系却反而不许作白话文，也从不教白话文。三十一年教部的大一国文会议，且通过一个议案，不用白话文。这个显明矛盾，是一直延长到战争结束，一切复员方有了个小小改善的。

所以纪念五四，我们倒值得知道知道这个过去当前的情形。这么拖下去自然不成，绝对不成的！发扬五四精神，使文运重造与重建，是关心它的前途或从事写作的人一件庄严的义务。我们必须努力的第一件事：是从新建设一个观念，一种态度，使作者从商场与官场拘束中走出，依然由学校培养，学校奠基，学校着手。作品不当作商品与官场的点缀品，所谓真正的时代精神与历史得失，方有机会表现。而且这种作品中所浸透的人生崇高理想，与求真的勇敢的批评精神，方能启发教育读者的心灵。在学校圈里或在社会各方面的作家，若知道五四初期文运的建设性，以及对于中国社会解放改造有过多大贡献，就决不会再自轻自弃，将那点本来可以独立发展的精神，变成商人与政治的附属物！我们要读者，也得明白读者真正的需要什么！我们应当把文运同“教育”“学术”联系在一处，不能分开，争取应有的真正的自由与合理的民主，希望它明日对国家有个更大的贡献！对于这个问题，成名的作家不用说，还有更青年的准备从事这个工作十年二十的，似乎不能多想一想，来决定他的工作。他若只是

预备作一个大时代中“活动分子”，只是在活动中要利用利用文学，那很可以一切从空处作去，越不落实也许还越容易见好，也省事，也方便。他若当真理解五四精神，必承认对于强权所抱有的怀疑否认的精神，修正改进的愿望，在文运上还得好好保留它，使用它。天真和勇敢，尤其是不能缺少。五四已有了三十年的历史，我们还需要重来三十年继续努力！

本篇发表于 1948 年 5 月 4 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 90 期，署名沈从文。

五四和五四人

我到北平已过了二十六个“五四”，虽然不及随同大群学生队伍参加游行烧打，却有机会看到许多因纪念五四的学生大活动，以及相熟许多“五四”人。更发生密切关系的，即北大师生，因五四而将一个群的烧打精神，用文字作工具，而向旧文学旧社会宣战，取了个破藩决堤冲锋陷阵姿式，却能遵守一个民主与自由法则，个别作战，奋勇向前，所领导的文学运动。我有机会由学习而参加，又由参加而将这份经验，这点工作精神，于二十年后再来鼓励及许多工作者。一个人对于一件事一种工作发生关系了二十六年，到社会为它已发生极大影响而向前，所谓“五四人”，还始终守住本来信念，本来岗位，屹立不动，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对于内战与强权，且还有个根本否定态度，永不妥协。但只因为岁月催人老，竟常不免被后来者误解或曲解，或用“孤芳自赏”相嘲笑，或用“游离无归”相讥咒。更有甚者，即有些人并不对这些五四人就近有何认识，却摭拾转述来自远方烂语诽言，一切惟以作成篝火孤鸣政治效果为得计，所欲倾覆的，

却不知道又恰恰只是人人不去口的“民主与科学”，并非那个由武力集团作成的巨无霸时。这些人，还自以为能把握现实，具权谲应变才智自豪，落得另外一种人在远处哈哈大笑，同庆祷张为幻之成功时，五四精神发展成这个样子，不免令人感到一种深刻的警惧和痛心！在此情形下，什么是五四精神，似乎也值得人来重作诠释诠释了。

照我所接触的五四学人印象而言，他们一面思想向前，对于取予都十分谨严，大多数都够得上个“君子”的称呼。即从事政治，也有所为有所不为，永远不失定向，决不用纵横捭阖权谲诡祟自见。这不仅值得称道，实在还值得后来者取法，因为这是人的根本价值。其次是对事对人的客观性与包涵性，对于政见文论，一面不失个人信守，一面复能承认他人存在。尤其是用于同学师友间，得到真诚持久的融契。民主与自由不徒是个名词，还是一个坚定不移作人对事原则。这不可说不是亲炙孑民先生人格光辉的五四人幸运。因为有了这个，才会有学术上的真进步。这是培养创造种子的黑壤，能生发一切不同的苞芽。这不同又由一个较长时间来自然清算，得失即近乎公正本来。也因此，学校能始终作各种进步的尝试与发展。对学校制度，从近处看或为尾大不掉；从远处看，即永远有个新的趋势及变的事实。五四人之存在于北平，服务于清华北大两校的，尽管思想如何不同，却能永远保持个人友好，这一点也值得后来者认识借镜。五四人因所学不尽同，虽同在一学校，所负责任又不一致，也因之在学术成就上未见齐一。然而一种青春不老创造的心，却似乎能始终表现于各自工作上。这一点，实在说，是只有新的北大人从更多方面来学习认识，才会转而为自己一种工作态度指

向的。以五四学人的学而言，不论是日坐讲台作精密析理的冯友兰，或日守办事桌应付杂事之郑天挺，其克服困难守定工作那点忠诚，则完全出自同一源泉。参加扭秧歌的朱自清，和为学校收购古物的杨振声，同学以为是两种人两种事情的，其实还是出自同一那个青春不老的创造心，企图把生命与国家发展连接而为一，贡献自己于后来者那点忠诚心不二，而还带一点天真的稚气，不同的不过所取用方式，由一个十六岁到二十岁同学看来不同而已。

五四又来了，大家为纪念这个五四，为迎接这个五月，都显得十分紧张、兴奋，同时也异常忙碌。一个新的北大人必不少以为一切要更进一步，有个更进步表现，才能发扬光大五四精神。时代变动大，社会一切在分解，也待新生，三千同学中能共同组成个千人大合唱，也自然能在许多必要独自为战工作上，表现出真正战斗持久精神，与进步事实。但广泛与深刻的来认识北大五四人，在当前似乎也十分需要，因为基于这种认识，才会有个反集权的民主与自由作风来发扬光大！

本篇发表于1948年5月4日北平《平明日报·五四史料展览特刊》，署名窄霉斋主。1989年5月25日重新发表于《民国春秋》第3期。同时发表了当年《五四史料展览特刊》编辑宋伯胤的文章：《为重刊沈从文〈五四和五四人〉说几句话》。

据《平明日报》编人。按原稿，五四，有加引号，或不加的。

霁清轩杂记

(一)

那么大热天,除了打仗和赶考,普通在学校里长年和书本相对的人,如果办得到,都实在需要抛下书本,暂时换个方式休息休息!气候既已入伏,学校一放假,每家有孩子的都回了家。住处宽广的或不甚觉得有问题,住处小可就糟了。我家中两个顽童都正是好事喜弄的顽童时代,生命力既十分旺盛,又还不到政治活动的年龄,放假后,终日在宿舍几个小小房间中转来转去,手脚似乎总容易相撞相挨,每天都不免要发生三五回小规模争斗。结果假期一来反而对大人是一种担负。想起国内战事新闻,常常说是"此来彼往,地面既辽阔,始终碰不着。"十万八万人的行动,地面一宽广,存心互相屠杀的还彼此碰不着。何况是两个人在一所大园子里?因此如有所悟,和太太一商量,就依然把孩子们带出城了。

到郊外大园子来,我们住的还是去年那一所房子,属于霁清轩一部分。房屋在低处,门前又临溪,初来时,房中竟

霉得如一块待加作料的豆腐乳，到处都生了毛。但只要稍微习惯，且不担心到自己灵魂也生毛，一到这里，就可说是名副其实的避暑，抽象的或具体的热全不会到头上来了。并且站在门前一望，即会明白霁清轩的主要建筑，原像是拿来看的。最好看处也就是从我住处向上望。不拘早晚，那所主要房子，那长廊一搭，那个亭子，那石头间大松树和小小虎耳草，人工天然，都仿佛配置得有点宋人画意。

顽童们自然不会欢喜宋画，除被迫写字勉勉强强留在书桌边一会会，都只想向园中空阔处跑跑，或去后山掘蚯蚓钓鱼，或去另一个地方看人家比赛游泳。最能引起他们兴趣，并作话题讨论的，还是看守园子的工人，舞着二三丈长钓竿，在长廊前白石栏干边，用小蛤蟆作饵钓取王八。有时终日毫无所获，有时又一举即可将依隐于莲梗水藻间的八大王后代曳之上钩。很奇怪，有一次和孩子们在长廊前石栏边看人钓取这种圆滑水族时，同时却听另外几个游人，正议论到立法委员运烟土事。两件不同事情同时混入印象中，好像无意中触犯了谁的忌讳，竟使我不能不赶即离开那个地方。

园子中既有了这些新奇活动，孩子们不必要的阋墙之争，自然就不会延长扩大到不易收拾，也不需要谣言人事来点缀耳目了。所以这里气候人心都并不怎么热。

（二）

霁清轩大门在谐趣园一角，陌生人却不容易发现。门前石板路倒还有意思，据说是慈禧太后听人说故事地方，按时老婆子必坐在一个石磴子上听故事，每天说一回。照我估想，

可能会说到《红楼梦》中贾母和刘姥姥。相去不过四五十年，可想象不出当时说故事的排场了。现在谐趣园多的倒是刘姥姥和板儿，因为既无贾母也无慈禧，所以现代刘姥姥和板儿，就居多坐在廊上剥南瓜子吃东西。谐趣园外对宫门直上是"乐农轩"，一列东向房子很朗畅，现在住的却像是军官眷属，常有几辆自行车搁在花树下。除了有几只肥母鸡，还配合风景，此外已找不出农家气象。刘姥姥和板儿，即或偶然从那条路上景福阁，也一定不会想起这里原是为模仿他们生活而布置的地方！

霁清轩前虽已无从想象慈禧听故事的光景，现在却尚有三种声音交替，早晚是可以印证唐人诗"鸟鸣山更幽"的黄鹂，白天是代表"多数一致"的知了，夜里是象征衰飒迟暮的鸣蛩。一进门院坪空空的，迎面是霁清轩，廊柱楹楠全髹绿漆画上紫藤，别致得不免有一点儿俗气。如果是老款式，可能是新装璜，在油漆时把颜色配走了样子，所以给人印象是建筑与装饰不大调和。且不像是乾隆俗，很像慈禧时代的俗，如清末广东作风，和慈禧艺术鉴赏程度相近。轩背后是个斜斜坡，利用天然一片大石头作成。石头在半中摺绉了一下，绉摺处就成了一道溪流，从后湖引了一缮活水穿石而过。坡度既相当斜，涧中又有些石头阻塞，活水下漱于是琤琤琮琮仿佛有点琴韵。白天受知了吵杂混耗，水声不觉得怎么大，入晚却十分动听。所以两边高处一所房子，就名清琴峡。

霁清轩和清琴峡都是乾隆题的名，清琴峡房子有两个对面炕，格局小而精致，很可能乾隆慈禧前后都住过，乾隆还在那炕上听泉赋诗，或坐在门前大石磴上赏玩野景。现在这房子却归一个女大才住下，终日盘坐在炕上临摹画卷。房子

虽还是乾隆派，房中却有了点“魏晋”空气和“文艺复兴”意味。

就全个霁清轩说，在颐和园中算是最有丘壑一所房子。一共四栋可以住人，分置在上上下下，用一条能起回声的长廊连接。目前对这种回声发生兴趣的是几个顽童，当年说不定还曾引起帝王太后抚掌莞尔！长廊一面代围墙，一面作甬道，还有格致。走廊设计比谐趣园的有隐显曲折，只是下面还有个小小过廊亭子，似近于蛇足。这亭子前不仅是装饰，还有点实用意思，或者就和我住的一所房子关系深切了。

我住的一所发霉房子没有匾额，曾经作过浴室，从墙边砖砌水塔看，可能是民国以来修整过，本来即装置的。房中还留下有两个水管口，房中有一个大炕，可容八个人同睡。如慈禧曾经这里用过浴，应当有一似通非通一匾额象征重要。既无匾额，倒很像宫女住的一间下房了。所以那个过廊亭子，可能是宫女等待听候使唤的地方。

我门前越水而过，是个石板桥，石头大大的，水流得很活，照乾隆脾气，可能和我家顽童一样，还在上面洗过脚。这些事自然多近于估想。从现实学习，是大炕上曾发现二寸长蜈蚣一条，和几只相貌奇古行动伶俐的灰茸茸小壁虎。蜈蚣夜里不知如何钻入被中，被我胡乱揉死，居然不被这小小毒虫咬叮，可谓幸运。壁虎长日在窗口爬来爬去，用蚊虫作食饵，主客之间倒似乎还相处得来。

（三）

全院中除了可供人住的四栋房子，大石堆高处还有个独

立绿漆方亭子，亭子四围大石间还生长有几株松树，树大已合抱，姿势派头都蛮好看，也许还是乾隆眼看到小太监移植的。亭子下面看稍大一点，在亭中却大小合式。当时如在上面奏细乐，于月白风清之夜，与景物还相称。现在最大用处是从下面看看，为主要建筑霁清轩配个风景。颐和园有许多房子，当时的设计，似乎供人看的意义都重于居住。霁清轩是其中之一。许多房子宜于从外面看，远处看，如排云殿西的画中游，湖中心的龙王庙。许多地方又像是为看别的房子而作，如景福阁，瞩新楼。霁清轩却宜于在院子里看，而且特别宜于从我住的窗口或帘前看去。房屋树石都布置很恰到好处，不拘早晚都有意思。

孩子们到这里来，手足和心灵俨然都得到了解放，不出门也就在院子中流水边玩。这条水既贯穿院子而过，离我住所门前不过一丈五尺。所以大人从实用上说也终日离不开这条水。大顽童本名龙龙，因此每天必去龙王庙前面学跳水，每天泡三两点钟，半月来晒得全身如一条紫豇豆。小的名叫虎虎，因为下水时不甚多，却把全院子当成鲁滨孙的荒岛，各处去寻觅发现，一草一木都清清楚楚。画全院平面图时，一件东西都不曾忘掉。最熟习的还是一条流水，上下游都十分熟习。某个水边树根下有几只蛤蟆螃蟹，石板桥下一共有几只虾子，一共有几种鱼，某一种鱼又在什么地方，都可领带客人参观。不过大人中真有童心热心参观的，可能只有一位哲学教授。这条流水虽只二三尺宽，十来丈长，却容纳了不少水族，即以长及一尺的常住鱼而言，就共有三种，不下十来尾。提到这一点，一定会有人问，“有那么多鱼，怎么不下手？难道鱼不是可以……？”事情奇怪，就真不下手！即好

事的顽童小虎，却也只在水边上下徘徊，睁着一双大眼睛欣赏水中一切活动。即或下水玩，也像是和这些水族相互之间都有种了解，各不相犯。为的是他和鱼都知道，这里和平还是从二百年前就决定下来了的！原来这一道小小溪涧，虽无多少曲折，却有一点丘壑。设计时虽若半就天然石头给摺断折处引水下泄，却已注意到一衣带水的效果，本来只重在引水漱过时作出一点琴韵，石头下有许多处都淘得空空的，结果却成了鱼虾的安全窝。水中的鱼只能作濠上鉴赏，可不宜具染指遐想。更重要的也许还是到了这个地方，吃鱼已不成问题。北平是一片平地，西山山沟地泉引出的水相当清冷，汇集在昆明湖三海和十刹海，面积虽不小，可不会产生什么怪鱼。然而昆明湖却有六七种鱼类。南方江河中生产的鳜鱼，性情本来十分勇猛矫捷，宜于在深潭急浪中活动，在这里却算是昆明湖特产，大的竟到五六斤重，已为本地人取了个文绉绉名字，名叫“花鲫”。据说寄身处多在石舫以西，水比较活又比较暖的荷丛中，可知这种鱼的祖先，还是好事的帝王或贡谀的幸臣派人从江南带来的！我们在这里经常吃的是鲢鱼，有时每尾大到廿斤重，宰割时简直如一头小猪！……因此一来，霁清轩流水中尺来长的鱼类，就十分自然的享受了人间和平，不至于作釜中之泣了。

就全院中丘壑设计说，霁清轩或应数颐和园百十所住宅最具有逸格雅趣的一所。我说这个可不是隐逸自赞可以长住意思，恰恰相反，说明这个地方实在只宜短期居住。我们的住屋似乎稍湿了一点，不到半个月，房中书籍、衣物、肥皂、药品、几几乎都发了霉，长了绿毛。在窗口看景致，听泉声，究竟只宜于较短时期。顽童们八月廿以后即上学，筹备学费

是家长秋天第一课。为了这个问题，坐在窗前站在水边都解决不了。所以万寿山高处看秋月，恐得要放弃了。

(四)

颐和园中百十所单独院落，三十年前原由政府指定作逊位后的清皇室居住。二十年前改租普通人，因为进出不怎么方便，园里十分荒凉，还只是少数人短期过夏，可赁出一部分，居多都上了锁，空在那里。并且来住的多带一点抒情成分，养病避暑意味。普通人或无此从容，或无此兴味。直到去年我们来住时，早晚在山道上散步，还可和一些老绅士样子，或一对对情侣度蜜月样子，能领会湖山景色，也对历史文化还有感兴的寄居者彼此碰头，不交一言而各得其所。今年住的人就已大不相同。若从行动测文化，今年似乎已换了一种文化。后山早晚散步的人已不多，不拘男女，饭后在长廊栏干间歇脚谈天的数目却已大大增加。(正和琉璃厂的春天逛厂甸一样，看字画，买书籍的人已大减，多的却是买冰糖葫芦和麦秆风车的市民。)从小事测时代，时代的确已显明的变了。这件事刺激我们的不甚多，刺激真正老住户的应当还多。园中够得上老住户的人有几位特别值得一提。一是北方画家溥心畬，和宣统为近属兄弟。溥仪在东北作日本人傀儡，"康德"了十多年，北平沦陷又八年，多少有头脑的知识分子，都被拖下了水，与日人亲亲热热，忘记自己本分。心畬王孙却决不为人利用，不染一点污浊，自从把那座老王府卖给辅仁大学后，只住在颐和园里作画，十多年如一日。不提别的，即这点性格就够个艺术家！二十年来画笔似未见特别

变化，作人风度却值得史笔一书。另外一位是洪宪项城称帝，和这事极有关系的袁大公子，也住在园里已多年。平时深居简出，不轻易在园中见到。据闻平常拜访者亦极少见到。生活似相当萧条，却不为穷困低头。一个现代史家，对于这个人所处时代，所有取舍，如何作成一个悲剧性末一幕戏，值得写到的事应当还多。但他本人如肯写一点什么回忆录，对于民初元史实定有更多贡献。两位住宅恰恰在排云殿前左右两院，如颐和园主要建筑的配位，这个偶然事件在历史上又似乎并非完全偶然。如果这是一个制度，倒不失为一种象征，民初元十多年，其实还有几位公子也值得各有一所住宅！日来报纸上常把某某伟人南京的新建的藏娇金屋描画得十分出色，有关平定上海物价，又常与另外一个人名字并提。十年二十年后，这些人会不会来颐和园赁房子居住？历史可以为我们回答。现代革命家不同过去王孙公子处，大致是“政治头脑”和“经济头脑”都不相同。晚清自戊戌后，时务空气侵润于全国人心中，清宗室子弟即多开明头脑，在当时既不能起作用，革命共和后地位更难自处，退而向艺术谋生命发展，就还很有几个人材，秀颖杰出。在性情方面且以笃厚见称。心畬即其中之一。至民初元，项城以笼罩一切势力，置国家于掌握中，且敢作帝王梦。为增加一空洞名号，驱使爪牙用残狠手段排除了多少异己者。在此一段历史中，成为中心人物的是袁大公子，（正如当时在艺术方面寒云公子代表一时风流，）然而帝制解体，不到十年，筹安会诸君子，许多当时风云中人，即闻以典当告贷为生。寒云公子亦即潦倒憔悴而死，只故都妓院伶人及二三饭馆间，尚留下些墨笔供人嗟赏。至于民十五以后现代伟人，则多数已成“不倒翁”。头虽

空空的脚下却有金银作重心，虽在时代风雨中左右摇摆不定，却无一仆不起情形。成功在朝，则士农工商四种身份并具；失败下野，则海外流亡，仍享有四大自由中之“永无匮乏”。也因此，令人觉得“革命事业”真不容易！也因此，更令人对于历史上某些真正失败者，反多尊敬与同情。仿佛觉得穷而鲠直者定比富而谄诈者可以亲近。倘涉及一国家一民族历史得失，从失败者方面考查，且必然还能够得到些比较真实印象也。

（五）

全园子一天中最佳妙处，是清晨和黄昏，整个湖山的寂静，似乎只归三五人享受管领。然而也正象征了这是一个“过去”的场面。没有人，那受得了！“现代”有个特点，即是人。一切为“人”，一切要“人”注意，也即是在心理分析上的人的懦怯性。一个人如能离开人，所需要的勇气实比接近人还大得多。所以关于游逛，我以为一个外来普通陌生人，实应当照顾照顾作向导的，花一点点钱，即可听一听似真非真的掌故，或在铜牛铜狮前照个相，再让他领带到一个什么馆子吃顿便饭，我相信这是间接繁荣颐和园的方法。因此有许多游逛程序，我不想在这个小文章上提及。我待说的是一些三五年前或十多年前到过这园子里的读者，旧地重游如不容易，却想提几件事作为他的印象温习。第一是这个大园子近来托文物整理委员会的福，应修理油漆的地方都花了点钱，收拾一遍。如排云殿前大牌楼，是经改成钢骨水泥建筑，一切保存原来式样，只是油漆时彩绘不太好看，可能是材料不

大合用。山顶上那座琉璃庙宇“智慧海”，业经大加修理，并且已经开放，泥菩萨座前，有了穿洋装的绅士和摩登女郎上香叩头。里面照明是用电灯，像是力求佛堂空气肃穆，电灯还是暗暗的，如许多庙宇长明灯样子。后山那一组毁废了的西藏式庙塔也重新打扫整顿，且开放了一座有铜罗汉的殿堂。工程还在进行，可能有些会被收拾以后，反而失去了游人到此本来应有的颓毁沧桑兴亡感慨，尤其是修补的材料大有问题。较重要的改造是逼近青龙桥的后宫门开放，新作了个大照墙，宫门正在油漆彩绘。这一来对于逛园子兼游西山玉泉的人真方便不少。据闻待修理的，还有“画中游”那座不大美观的楼房，和大庆寿的“德和园”大戏楼。两种工程都相当大，似乎还无款项可拨。照朋友意见，画中游还是听它倒掉好些，因为地面逼窄，楼廊挤得紧紧的，真不美观！德和园大戏楼，是谭鑫培杨小楼奏过技的地方，在戏剧史上即十分重要，还值得保留个样子。建筑高大，重量完全担负在二十来根柱子上，听说从上面漏水，这工程要着手可一定费点心思。全园子管理已有了较大进步，凡有人走的地方，每日都有工人分区负责打扫得干干净净。又多开放了几处陈列室，尤其是乐寿堂前和两厢房子的开放，陈列了些晚清工艺品，似乎是慈禧大寿时各总督，使节，大小宗室官吏的贡品，很可以测验出慈禧太后对于摩登事物的嗜好，以及十九世纪末叶带洋派美术品的标准纪录。有心人一看到这类海上风光和广舶款式，也可知这个大帝国必然快要结束。前两天曾见到一群休假美国官兵，各人提了一具照相机（有的还提大小两具），跟随两个矮矮黑黑的翻译人员到那所陈列室，停留在一些假洋鬼子用的银餐具和镀金餐具旁，说明纸上明明写着银

器，那译员却肯定说是老佛爷自用金器。大家既不认识中国字，也不认识美术品好坏，倒落得东单小市或廊房头条银饰铺多做几笔生意。（这些无知的洋兵正可去铺子里照样购货！）前不多久就闻有个什么美国读书人，花四百美金去买一个假洪宪磁瓶，正和美国政府看中中国官僚一样，看错了货色，他人还说不得！颐和园还有一道门开放，对游人实在方便，即在山头上前后山之间，隔绝了智慧海与排云殿那一道山门。多年来都像是怕走风水，闭得紧严严的。全园子面积既相当宽，因此许多人，游逛时，都得考虑考虑足力，好决定行动。一经开放，足力即不大健全的老太太，不问是刘姥姥或是贾母，也可以多逛几处地方，且爬到灵山顶上到菩萨面前叩头了。照她们生长时代的习惯说来，这真是一种功德！中国还是个需要神的时代，不仅仅是些妇人，许多小孩子，也正从另外一种人造的偶像中学习跪拜。要他们相信自己和科学可以重造这个世界，还要些时间！

（六）

园子虽处理得相当整洁，春夏秋星期天游人也分外多，惟在里边开馆子作生意的，可似乎不怎么景气。那些上了点年纪的掌柜伙计，可能还记得抗战前数年热闹光景，客人座次不敷用，还得排号次招待！现在长廊上逢星期天尽管游人如织，这些人可都十分现实，除了外来乡巴老，和什么特种人物，坐坐馆子，本市住的游人，多知道自备吃喝。所以这些掌柜伙计好像随时都在打哈欠，当冲处尚或有几个座，得勉强打起精神来周旋呼应，厨房中也随时可听到一片面杖锅

铲声响，事实上仍不免令人起寂寞之感。至于背境处，如后山松堂，那么一个幽静林子，茶座却永远是空空的。说深远一点，他们应当反美反内战！因为初初是复员美军用罐头包装食物的廉价销售，大家为省事起见，即多自备所需，选择地方食用。内战一延长，近来游客索兴把馍馍窝头也带进了园子。因此一来，开馆子的自然只能把十年前全盛时代当成一种历史向往了。

（七）

谈人事如今正是个多忌讳时代。并且许多人耳朵眼睛都像是不大关事，--件事一句话只要说出去，就总有人歪歪曲曲的来检讨、傅会、申引。所以不如谈谈园子中的虫鸟，作为我这小文结束。

颐和园鸟类相当多，春天的鸣鸟和秋天的季候水鸟，可惜我不很清楚。至于夏天的山鸟，似乎即有十多种。我欢喜不声不响的戴胜，每逢见它在树枝间蹿跃，就好像见到一个老朋友。因为流寓云南乡间八年，每逢在田坎上散步，即必然可碰到戴胜、鹡鸰和云雀。鹡鸰欢喜两两相伴，一面叫一面飞，并点头起伏于麦田中。云雀却如雪莱所描写，先是在草丛中此唱彼和叫得发欢，随后即扶摇盘旋而上，一面叫一面向上飞，直到眼中看不见时，忽然又急剧下堕，钻入草丛中，混于那个在草丛中鸣食的群里。尤其是阵雨过后，天气放晴，天边尚有断虹如一片彩帛悬垂在山边时，这些快乐小鸟，小嗓子叫得真是全生命的欢欣！戴胜却居多痴痴傻傻的站在大路旁，对面前游人望着，好像痴情又像好奇，有时还

把头顶上有绒穗子冠毛蠢蠢，引人注意，直到逼近时，才一翅飞去。这种情形下多不鸣叫。鸣叫时却有季节性，坐在人家屋脊上，骨骨骨骨很庄严的叫下去。叫过一阵就沉默等待远处应和，轮到它时才又再叫。园中的戴胜多在树枝间闪忽即逝，地方环境不同，似乎也影响到这种鸟类性情。其次是荷池间寄身的翠鸟，一身绿得如一片翠玉，却比翠玉多有一种流动生命。平时静静的斜据荷梗间，一声不响，专心一志注意到水面。机会一来，即如一支绿箭向水面射去，将尖喙插入水中，把目的物刺中，随即又衔目的物向荷花深处消失。行为灵敏而神奇，使人惊讶造物者之巧慧和深思！但这园子中的鸟类，还是鸣声奇美的黄鹂有意思。声音实在有情感，有个性，有生命。常常是早晚于林木深处树杪独奏而远处遥遥应和。歌呼交替可说毫无情欲味，却于清朗圆澈中俨若象征一种永恒的统制与管领，在时空两者间唯我独在。因自信而自尊，高低应和中尤具有乐律中的对比性。仿佛是自然哲学，和高级数学，和热情诗歌三种混和物。这个混合虽已无从再分解，然而却依旧能给这三种不同最高心智以一种深刻的激发和启示。歌声且具有一种希奇效果，即不在绵延不绝的连续，却在由短期歌呼以后带来的静默。静默时比歌呼更动人。或给人“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感觉，或给人“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联想。照例是从这个歌呼中把生命比成自然一部分，如与宇宙相契合。如果人生还可照哲学或音乐字面来解释，实接触了一种更真实的不同的人生。如果人生只能照“政治”字面来解释，那这一群鸟的存在，真无什么用处，倒不如听一个冒昧人一一用猎枪弹去好，因为唱的全是高调，在现实时代中，真太不现实了。其次是占时间空间都分外

多的"知了",多据树枝高处,终日作单调急切的聒噪。声音彼此如一,却汇合成一片宏壮,填满了酷夏空间。本身体积相当小,嘴尖尖的如一枚针,一身分量轻轻的,全身带流线型。视觉官能因不大运用,已不太灵敏。然知寄托高枝,即不至于为顽童所损害。个体生命虽极短促,全部歌唱却可一直延长到深秋。阵雨来时,歌唱不免要停一停,一会儿雨过天霁,又即是吾家天下。这小虫且有一个特点,即一切树枝上都可以栖身,虽各在不同树梢头,早晚鸣声起落却整齐划一,统一性若自天生。昔人对于蝉的词赋,常说居高而饮洁,都不免富有一点自我恋意味。中医喜用蝉蜕作药引,也充满象征意味,许多病药中,都得加入三五只这种空壳,以为即可将药性散发去毒清火!现代人对于这种生物情感,自然已不大相同。一致性的合唱,虽情调激越,大可用来象征什么要求,由于干燥少个性,引用作诗歌比兴的就不多。正相反,所唱的虽是一种求生的本能,因为反复单调,即明白易懂,但其他不同类生物听来,却不免感到神经麻木疲乏,听来会觉得比流水还少感情!情绪模糊而见解沉闷,有时便如读现代诗和现代文学论文把字撒散后重新随意排成的版面一样。所代表的意义,和真正人间语言文字是完全不同的。第二种是鸣蛩,这一属包括有四五种能飞善跃的昆虫。声音多发自草间,也可说是草莱之士的表现。一般言来,这些生物都胆小而善良。个子不大,欲望不奢。同类之中即或也不免有小小战争,却近于小规模短时间发生冲突,极容易解决。所争的且可能是一点意气,为的是这类生物大都早已成熟,声音中即可听出。比如蟋蟀,所争的虽同样是食与性,惟食量既有限,有些且照例拥有两三位太太,得失之争虽激烈,依然近于面子。有些能飞善跃的蟲斯,且仿佛是天生素食主义者,且对

于生存富有幽默感。所以振翅熠熠作声时，居多倒如赞美本身存在，别无意义。有的虫类又鸣声迫促，单调反复恰如私塾中小学生背书，背来背去，大家都睡着了。有的又如老太太念灶王经，只自己求个心安理得，毫无其他损人利己意思。不过这些小虫声调似乎都有个共通性，即迟暮衰飒感。这也许是……上帝意思，这时代既不需要神，就说是"自然"也成。自然在许多许多方面的配备，未必以人为中心。但这种草虫清音的合奏，却可以照诗人的解释，说是为安慰大地的疲劳而有，未尝不合理。对于人，则这种虫类多于衰草颓垣间歌呼，且整夜不息，这就不止是象征衰老，简直是衰老一个部门！

（八）

雾清轩除了三种声音，还有一种虽无生命却仿佛若有生命，虽反复单调却令人起深沉之思的声音，即那一绺穿院而过的流水作成的琤琮。仁智所乐而逝者如斯，本身虽无生命，但那点赴海就壑一往不回的愿力和信心，却比一切生命表示得还深刻永久，且作了历史上重要心智以种种启示。滋育万物而不居其功，伟大处为"无私"，一个人悟无生宜从此始……

八月七日雾清轩中

本文发表于 1948 年 8 月 14 日、8 月 21 日《新路》周刊第 1 卷 14、15 期；又于同年 8 月 30、9 月 6 日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 108、109 期刊载，均署名翰墨。

据《新路》本编入。

“中国往何处去”

前不多天，一个朋友为某报提出几个问题，找寻答案。问题是：中国有没有前途？如何才是它的出路？如何挽救它的危机？

从任何民族历史学习，凡某一国家，统治方式失去重心和弹性后，社会矛盾必逐渐加剧，无法平衡，内战分裂即无从避免。结果照例由于普遍持久的战火，带来一种普遍破坏和疲乏。社会矛盾即幸而从武力压倒方式得到表面平衡，国家元气业已消耗将尽。随即是强邻异邦势力，乘隙而进，纵不亡国灭祀，也不免成为失去自主性的他人附庸。世界上许多事情都有例外，“自残必弱国”则无例外。一个民族用长久内战自残，虽有些复杂因子，然而也正说明这个国家政府上层组织，社会一般结构，以及个人思想人生观，实在都有了问题，到了一个等待重新安排情形下，国家有无前途，不在战事胜败，全看这个重新安排如何而定。

八年抗战，虽说到处焦土。炮火焚灼所及，由北而南，直迫近西南边省。犹幸于国际局势变化中，胜利和平，不费

什么困难，即接收了敌人在华南，华中，华北，保持得完完整整几个工矿动力大单位，使饱经忧患迫近暮年的专家学人，无一个不含泪微笑，相互庆幸。都以为半生学习经验，忍受种种挫折，幸而国运不坠，于千险万难中居然得到转机，正可为这个国家下一代奠下个"现代化"基础。尤其是台湾与东北的国土回复，敌人在南北两面苦心经营留下的一切，引起了国内专家学人作过多少好梦！

然而复员以后，问题随来。经过二十年内战教训，八年被日敌蹂躏残杀，保有武力和武器的特种人，尚缺少真正觉悟，控制这个武力武器的政治家，更缺少远大眼光，一党一派独占的权利，还只想超机会扩大到各方面去，一点信心却寄托于战时人民的屈服和手中实力的保持。但既有了问题，各方面在估计中即已感到相当棘手，因此有政协会议。会议基础本不大健全，首重党派在中央和地方权利分配，人民真正需要却谈不到，顾不及。谈判破裂，势不可免。然而内战究竟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随即又有军调进行，不幸居间调人又恰恰是个对中国军略地位充满兴趣，人民情感社会问题十分膈膜的美国军官，进行空气即已十分尴尬。双方谈判情绪，还依然是有多少实力，占多少地方，一种完全现实的硬性的讨价还价。且都坚强而自信，万一调处不成，即不惜用国家全部资源，剩余壮丁，一例加入作注，赌个胜败。半年调处，弥缝难周，结果是调人退出，战火重启。

两年来虽从收音机中，吾人间或尚可闻权威象征广播时喉音嘹亮稳重，重申全面战信心时，亦若把握十分。其实则伟人伟业，早已将全个国家，作成一滩血污，一片火海。内战未完结，赌国运者牵线人有二：一在太平洋彼岸，一在邻

境；内战即完结，天下定于一，牵线人亦非彼即此。一个元气业已耗尽，国际地位业已打光的残破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及更多方面都失去了自主性以后，说出路，除了成为新世界强权国家的殖民地，附属物，牺牲品，实在毫无什么光荣出路可言！在这个过程中，朝野党团及个人地位声望，尽管越打越大，武力武器也可能越打越多，然而国家人民却将越来越不成样子。延长下去，民族夙命大悲剧即成目前，脱不出国际两强争霸屠杀场，和新型武器试验场。

事实放在眼前如此分明，战争却依然在僵固矛盾中发展延续。在这里，让我想起胡适之先生答复记者两句旧话，即："决定战争固要勇气，进行和平更要真正勇气"，转觉言简而意深。一个现代伟人，或在朝，或在野，由于一种已成习惯的政治逻辑，手中只要保有一点武力，到某一时都不讳言战争。为的是局部或全面战争，进行虽十分激烈，对于他本人说来还是十分安全，无丝毫影响。胜败虽好像置身其中，其实永远置身事外。（或到不得已时向国外一跑，或根本即在国外。）至于言和平呢？可就不那么简单了。和平明白的含义，是把一切问题从武力以外来检讨来寻觅解决方法。这种重新安排要发生效果，不止是某种具体事态的承认，还得就某几种不同抽象原则加以折衷。必首先将人民需安定需休息的真正意见愿望完全肯定，个人与所代表党派都具有绝大牺牲心，来满足人民这种合理愿望，和平方能进行。和平的基本条件为：第一寄托于一切武力下作成的权势必受限制，第二一切政治宣传所作成的不正常空气得加以清除，第三出于专家学人的良好意见，对现社会组织负责方面的有用经验，以及人的共通理性，都得到充分抬头机会。和平与民主不可分，真

正的民主也只有从这种和平空气中方可实现。和平次一步路，是将一个用仇恨感情进行的内战加以结束后，大家用一种爱与合作的新的觉醒态度，从各方面来鼓励中国人民和知识青年，在这个为残酷无情内战所摧毁的国家废墟上，重新建设一个公平合理的民主国家。试稍稍分析当代朝野伟人的心理状态，就可知对于用战争一面倒的胜利来解决一切的信心，虽已慢慢失去，对于从战争以外来寻觅和平的勇气，实在依然缺少。社会其他方面，也都知道人民真正需要是和平，这两个字却由于种种忌讳，不肯言，不敢言。在政治宣传上或如此如彼提出原则，在政客行动中或小作试探，由于一种心理上的惰性，到头来都不免依然被事实缚住，动弹不得。或身当其事，或别有企图，直接间接导演过这种民族自残大悲剧的人，求其如数年前大公报记者所说的全国性的愧、悔、改，实在还时机不到，也可说无可希望。

一个国家政治上多不倒翁式的万能官僚，却少有深远眼光巨大魄力的政治家，学术上多对于强权附会文巧的新式谶纬家，却少有对国家民族具无私热爱的哲学家和诗人。组织如此不健全，却得国际剩余军火的接济，人民即憔悴欲尽，武力尚十分庞大。在另外一方面则政治上推行的是中国人民完全陌生的一套，然而这一套在技术上既能将人民组织成一个庞大武力，各处流动，永不消灭，又能将知识青年热情吸收控制，在任何一处任何事件上，都表示一种逐渐加强的向心力。这个庞大组织且慢慢的从各方面作种种适应与修正，吸收更多方面的新势能，并扩大作战技巧。……这种对峙内战难结束，中国往何处去？往毁灭而已。

所以说，"前途""出路"和"危机挽救"，希望于当前，

实无可希望。希望于明天，还是青年的真正觉醒。我们实需要一个更新的新青年运动，来扭转危机，收拾残破。这运动思想浸润将重于政治学习。正由于一种真正的觉醒和信心的获得，来重新寻觅发现，首先不妨是分路出发，终结却必然异途同归：若新的青年有勇气敢憧憬将国家现实由分裂破碎改造成团结一致，将人民情感由仇恨传染改造成爱与合作，并有勇气将内战视为一种民族共通的挫折，负责者最大的耻辱。国家明日即再困难，终有克服困难，向前发展，得到新生机会的一天。若独立觉醒无可望，而多数青年知识分子定向的抉择，却由于强力的依附，及宣传活动的结果，共同作成一种信仰。不特内战难结束，即结束，我们为下一代准备的，却恐将是一分不折不扣的“集权”！

本篇曾分别发表于 1948 年 9 月 1 日《论语》半月刊第 160 期和 9 月 13 日上海《大公报·文艺》，均署名沈从文。

据《论语》本编入。

北平通信

BEIPING TONGXIN

本集为新编，集名为编者所拟。收作者 1925 年 5 月～1948 年 10 月发表的杂文 17 篇。

通　　讯

惕秋鉴：

来信无从答复。我不姓休，也不是--个能施爱的女神。你若能来我住处谈谈，或可释此误会。

休芸芸

本篇发表于1925年5月12日《京报·民众文艺》第21号，署名休芸芸。

沈从文启事

因为农大四舍十三号年青青的胡子朋友早已走去的原故，特详为其更正曰：二十四日副刊上登载之“雨”一文，末尾“五月十三”日，乃是“一九二五年之五月十三日”。

又，二十五日有“亦文”君的一篇说到慈幼院的文章，做文那个“亦文”，为请人把眼睁开，认清不是我，（我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且示不敢掠美起见，我说：

“亦文”君并非沈从文；

“亦文”君并非从文；

“亦文”是另外一个大脚色，不姓沈。一面用半新闻式的文章攻击人，一面自己在暗中乐著，这是中国人最聪明的地方，因为别人受损而于自己却无伤。但我希望这位“亦文”聪明以外还硬扎，为明示这话是出于自己起见，把他的真名说出来，俾别人把敌人的方向看清，是否值得做一个对手，他方面，也可增加他对人指摘中□的力量。

本篇发表于1926年8月1日《世界日报副刊》第2卷第1号，该期误印为1卷2号。署名沈从文。

征集启事

有朋友愿以去年八月份《晨报副刊》合订本见让者，欲得原价或其他书报为酬，均可照办。报寄太仆寺街七十号陈先生转沈从文收，后寄璧还。

本篇发表于1926年8月4日《晨报副刊》第1426号，原无题，无署名。现题为编者所加。

给一个女人

××：

来信说到你的朋友满有主张的去作姨太太，许多人都同我谈到这件事，各有各的意见，都问我是什么意见。

你是聪明人，为什么也说到这些？一个大学生做姨太太，难道就污辱了你们女子全体吗？别以为十年教育就可以使一个人把一千年的积习除去，你这奢望是不合道理的。现在学校教育告我们女子的，不是去否认那些“特权”，（许多人都承认那是权利！）反常常是暗示我们如何去得到那些特权，享受那些特权。你注意妇女问题，与其去研究太太们的事情，不如注意一下娼妓。南京据说已经没有娼妓了，这问题好像不适于你的研究，但一些“娼妓意识”，如何存在于女子生活里，你的事业一定能给你许多机会去发现它的。

信我的话，莫再为一个人作姨太太而难过吧。若这事真如你所说，是这时代女子的羞辱，那么，你去注意一下那些无数行将卖身或已卖身的人，她们值得你注意的还很多。疏忽了一般现象，只把一二在社会上稍有身分的人的行为，引

来作话柄，这是新闻记者的事。因为庸俗需要这些，一个记者就供给这些材料。至于你，却不应当像一个记者的神气，来谈到这些的。你教了六年书，自己又读了十年书，难道还不知道“教育”是什么意义？做一个完全的公民，从大学校里还不能学到，为什么你期望那么苛，把若干年来女子卖买的习惯，就想从几年学校教育完全废去？

还有，我说，你别生气，你所受的教育，使你对于这点事也感到纠纷，这就证明你学的不甚适合于学校以外的天地。你自己忘了端午节的日子了，可是许多人到了那天，还一整天不作事，大吃大喝，家里有小孩子的，也多数极欢乐的穿了新衣，被强迫在额上用雄黄画一个王字。你不知道许多作父母的人的心事，也不知道许多作儿女的心事，这是你疏忽了你生活以外世界的原故。

莫说这个，拈出另一个题目来谈谈吧。

×××也嫁了又离了吗？这并不出奇！这是属于她自己的，没有旁人的分。她愿意如何处置她自己，别人置喙全近于废话。她觉得那个男子可以使她快乐，就嫁给他，到后发现了那男子不好，又遇到自己以为更好的男子了，就另外重新来改换一下。凡是这一类行为，她有她的权利。她能够这样自己爽爽快快处置自己到她满意的生活里去，比起许多女子无意中被男子欺骗了一次，就依赖这男子一世，可尊敬多了。×××她被女人骂她，这只证明女子都是为了男子的方便才能生存的证据，骂她的女人或者比她实在还更无耻。端静自好是女子的美德，但倘若这个人，在生理一方面，她需要得比平常人更多的热情，正如她的饮食分量一样，她因为

这点理由，选择了两次三次，多同两个人接近，她不能算是不道德的。××吃酒很多，我们都称赞他的量大，没有人说他不道德。×××如今却被她的同学说是不道德的人，试想想那一群骂她的女人，涂满胭脂的嘴唇，说闲话够了，吃东西够了，是不是在另一种机会上，还能断绝过一个她所心爱的男子的接吻没有？

忠于自己，觉得自己生活的尊严，并不是胆小如鼠洁身自好苟延日子了事。一个好女人，在现在一种社会制度的估价上，一定是一个“忠于丈夫”的人。可是你明白，许多男子根本就不配说是“好丈夫”的。即或××的丈夫，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如一桌完美的席面一样，他的女人若不欢喜他，自己走了，赴另外一席，也不是不道德的。×××现在在友人中的孤立情形，我很同情她。我觉得骂她的女子，就正是一群自己不明白应当怎样活下的女子，骂她的男子，则更其见得无聊。因为每一个男子，都愿意在“幸运中”得到一个好女子，凡是同他们幸运有妨碍的事情，当然不同意的。女子的“性的自决”，将使许多男子幸运不能长久，所以男子反对这件事更多，那些骂她的女子，不过是以男子意见为意见的人，你不能不承认我这个话。

××，你也是女人，由于男子自利而成立的道德基础，是许可你感疑，不应当如一般只想嫁一个教授了却终身大事的老同学才对的。

在两性生活上，女子也有拣选的权利。同时她还可以得到一些机会，补救她已成的错误。这些特权素来属于男子，为一个男子使用时，我们在习惯中从不惊讶。女子若并不觉

得自己是一件东西，却以为自己也是一个人时，她的作人的证据，是看她能不能使用她自己这一项权利的。

……

××

（这信给××的一个女人）

本篇曾以《废邮存底（三）》为题，发表于1931年7月15日《文艺月刊》第2卷第7号，是同一标题下所发表两封废邮的第二封。署名申辰。

据《文艺月刊》本编入，所用篇名为编者所拟。

一封公开信

××、××、××诸兄：

寄来信件皆已见到，谢谢。关于我个人一点小小事情，使远近朋友如此气愤，我真抱歉。我们既然皆明白中国这时节是个什么样子的中国，想作个人，各自生气虎虎的活一场，把全部精力用在正当工作上去，无意中间或发现点小小毁谤，说起来实在太小了。被人有意无意糟蹋一下，劳动朋友极无意思。一个人的价值，若不能靠颂扬而增加，也就不会为嘲笑而低落。关于我个人的事，感谢另外几个朋友的好意，说得已很清楚，我认为不必提了。尊文不能登载，还望原谅。

来信说到恶风气的不可容忍。我觉得很可悲的，也正是我们这个社会习气，很像个国家将亡的样子。有些人不问事情是非，易生个人恩怨。我们对于某种事（譬如说摭拾传说毁谤个人这种事情吧），有人很严正的讨论到它的得失时，同时也便有人以为踹了他的脚趾，挺身而出，用笔说明："可以如此，偏要如此，我就把你如此如此，看你怎么样。"恰如某街某里，有一个小孩子，当街脏手脏脚玩着泥浆，已快有一打人被脏污了。有人

说:“这好像不是个好习惯,是不是应当改改?”孩子家长既不注意,那孩子却说:“谬见谬见,你讽刺我,你批评我,你管得着吗?”一举手把脏东西就抛过来。“喔,你说我,我就来你一下。”好的,政策领教,走开些吧。走开倒很容易。可是就事论事,读书的人不是瞎子,且有记忆,综合看看,印象怎么样?目前的法律道德,虽不能对于人在大小刊物上用笔墨开玩笑的行为加以拘束,然而这习气明明白白是个如何要不得的习气!(有时节属于夫妇间的言语,也居然能够代为编排,撒手锏固可观,惟武器那么使用,不是自己在那儿毁自己吗?)目前北平大街上,已常常可以见到北平市的童子军,强迫洋车夫扣颈项下那颗钮扣了,(可怜这些天真小孩子,还不知道拉车的根本用不着那粒钮扣,如同他们童子军不必拉车一样。)可是谁若想——不管用什么名义——来对某一不良现象表示点意见,谁就有机会被那么“来一下”。我们能不能在全北平市洋车夫自动备好下巴底下那颗扣子以前,就可以希望另外一些人,有点觉悟,很勇敢的改正一下自己工作方法上的错误?我们等着看吧,这“整洁与卫生”的意识,看看是不是能够使知识阶级比洋车夫先感觉到。

此颂安佳。

沈从文启

三月二十日

本篇发表于1935年3月24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44期。

复衡阳黄君

衡阳黄君鉴：

某期《废邮存底》并非给你的信。你误会以为特意写给你的信，不合道理。

编者复

本篇发表于原载1935年7月21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101期，署名编者。

致　子　平

子平先生：

谢谢你寄来的信。多数熟人离开北方已十年，初初回来凡事不同自必有些伤感。尤其是眼看到受奴视八年后的新长成的青年，有重新陷入一种人工催眠头脑呆钝趋势中时，且必然相当痛苦！惟国家在对外战事结束后，还有人对内战发生浓厚兴趣，各有种种方法促成集团自杀的现象，置国家人民于水火。痛苦二字，似还不易形容到这些年过四十读书人的本来心情！若说也有欢欣，那不过是十年流转迁徙跋涉告终，既已回到原来工作上，凡事可望从新着手罢了。你说的北方的进步，在这个大城中实看不出。事相反，只要稍稍注意留心，倒可以发现些新式的堕落的腐烂。浸润所至，不独中年人难招架，年青人且有趋之赴之的可能。承认非杨即墨[1]因之不思不想固可惧，游离杨墨之外怕思怕想，亦相当糟，因两者皆于有形无形中支持了残忍与世故作成的现实也。唯一好处，只是北方大庠中，似乎还保持个自由思索自由竞争表现的一点传统。因之在学校中，纵横之士不如朴学之徒

易得人信托尊重。我们希望扩大这点传统好处，能对身心健全的青年，产生一点防止头脑僵化的免疫性，形成明日社会国家一种转机基础。至于能作到什么程度，也就只有明日再看去了。这里写文章出路当然不如上海好，惟读者可比南方认真得多。一般读者从文史学术副刊取得情绪教育意义和南方大不相同。所以文坛消息不能产生空头作家。只有优秀作品能得人敬视。在这个习惯下，一般水准自然也可望慢慢提高。至于你所说的贤哲，贤哲似乎亦可分类：有些人十分活动，与杨墨接近，相互为用，以空易空，离远看比近在身边似乎伟大些。有些又若沉默无闻，穿着寒俭，形容枯槁，走路时还常常靠近墙边，低头缩肩而过，仿佛深怕人注意，（可常常引起巡警另外一种注意）深怕冲撞妇孺，（间或将为军用车撞倒！）这种专门家目前市价虽不值几文一斤，但真正建国实少不了他们。你越接近他们将越觉伟大，一种朴素的伟大。影响目前局势倾向的，能否定武力所作成的现状，或平衡两种武力所作成的现状，扭转这普遍腐烂社会的，当然是文史底子的思想家。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态度，都若十分重要。可是影响到将来意义深长的，或者还是这一城中一些纯粹笃实的专家学者。尤其是弄科学的，更值得吾人寄托希望与敬重。因为他们的工作，比治文史的还寂寞困难。他们的水准是国际的，他们的头脑虽好，他们的环境可真糟！文学运动如当真还可阐扬些问题，对于纯知识重视，便应当是明日目标之一。恰恰如否定纵横政治，重造一清新明朗新的青年人生观，是文学运动另一目标。若对于文运具有那么一种看法，你就不会觉得副刊内容缺少应时活泼性为可惜了。能应时的已够多了，我们还得做些较笨重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一样

笨，也和他们的贡献一样长存永在。

十一月十一日北平

本篇发表于1946年11月16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15期，署名编者。原题《新废邮存底　一〇一》，现题为编者所加。

① 非杨即墨　杨，指杨子，战国初哲学家。墨，指墨子，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政治家。

致昌期先生

昌期先生：

从上海转来一信，谢谢你见嘱好意。你说苦闷，这并非你个人如此。全中国人民都在苦闷中，国家对于这个问题尚无具体办法，强有力政治集团，一触及此问题也显得束手，何况我这么一个平常人！倾全国各方面贤达，加上个来自国外的和事老，商议经年，还得不到任何结果，末了终不免用战事解决。你和其他人却以为我既然是个作家，就应当怎么怎么，若不怎么怎么，即必然又相反的在怎么怎么。这正证明我说的一部分人对于"作家"看法的错误，期许的过实，以为某一政党、一武力集团办不了的事，某一作家的一支笔，倒可旋乾转坤。因为不大分析事实，也就不大明白作家。对作家期望既殷，责备自严。就我所见说来，国家的困难，原因复杂，武力滥用到无从节制，实为主因。你既明白能否定这一点，当然得承认这个国家明日的转机或进步，还要靠知识，正因为面临着的一切问题，全是要知识来解决的。政体可能如彼或如此，至于国家能否真正重造，却在这个国家关于科学和其他方面保有多少知识，以及对

于知识是否尊重，能否好好运用为准。这就是我过去那个小文中，提及社会各方面不宜于对作家过分看重，应将期望与尊重转给在学校研究室与社会各方面工作有成就的专家本意。一个作家或一个平常人，真正对国家重造有热爱和认识，决不会觉得这意见为迂腐的。人生如战争，这是一句老话，可待重新诠释。你既觉得带一支美式冲锋枪上前线去杀本国人民，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可兴奋骄傲处，才脱离了本来职务，新的战争所带来的课题，待你去执行，第一件事自然便是学习来克服面临种种困难。因此到处碰壁，到处不免有挫折，都是必然的。可是看远处！只要能够向远处看，世界上有多少有良心的人努力的方向和采用的态度，就会觉得在任何情况下，不至于失去你活下去做人的勇气与信心了。参加堕落民族消耗国力的战争，你既完全否定了它，且觉悟需要于流血以外去寻觅解决这个民族悲剧的延长，这寻觅工作，自然应当从征服自己一切贪得与自私起始，对于人，对于事，永远需用一个崭新态度去实证的。这正是一种新的人生观的确定问题。你肯定了它时，得"由此出发"，不是"到此为止"。前面还有好一段路，路上已荒芜异常，且多虫蛇当道。你得想法通过，不宜迟疑退却。唐三藏取经的八十一难，虽是个小说故事，却与当代人求人类共同生活合理与公平的努力所遇到的种种试验有个偶然暗合处。得经长期试验，在每一段过程中，还应当记住悟能兄因占小便宜面吃大亏的教训。不学知识分子从世故中贪小便宜，不阿谀谄佞，你才可说当真已经有了个新的生命，新的信仰。

本篇发表于1947年5月10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40期，署名编者。原题《新废邮存底　二五六》，现题为编者所加。

“否定”基于“认识”

××同学：

得你信，说到的种种我很明白，也很同情。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华北万千学生万千青年都面临问题，感到束手，焦急，苦闷，彷徨，不知如何走第二步路。这事影响于明日社会，还必然相当大，相当长远，一切既由战争而来，所以问题的解决，当然也在战争结束上，是很显明的。若承认这个观点的正确，当然便不至于把希望寄托到“那个”出路上了。明白现实并非承认现实。事恰相反，真的明白应当激起你一种否定精神。明知的判断和无比的勇气，都由“明白”而来。凡事有所蔽方浑沌不清。能否定现实的，必不会再以为“理想”只不过是堕落和荒谬结合物。战争不能用战争解决，正如一个勇士陷于淤泥中时，无从自己揪住头发掷出泥淖以外。否定这个人类弱点的，是信仰理性和愿望所具有的长处，对弱点不再存任何丝毫依赖心，方能有个真正的新的明天。否则将永远在“适应”上辗转！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就看得出近三十年知识分子悲剧何在。又如何分担了民

族堕落的一环！政客重适应，事不足奇。可是一个思想家，实在应当看重真理所寄托的原则。这原则尽管空洞而无救于当前一部分人的衣禄，又有损于另一部分社会地位，然而惟有它具有永远否定这个××腐败遗毒的蔓延，理想的世界是天下一家，去掉民族偏见与自大，自私和贪得在某种情形下，每一国家每一民族都能享受其最大自由，各有所呈献而各得所需，相互不同而能调合并驰。这种理想距离我们远了一点暂时可不谈。但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国家，统一而和平，如这时节许多国家一样，应当是作得到的！盼望那么一个国家实现应当不犯忌讳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试稍作检讨，我可见出一种对痛苦丑恶现实之培养，知识分子的绥靖主义如打盹现象，如何有其必然。而一种新的人生观的形成，却必需如何远离这个气氛方能生长。抹杀现实不能算否定现实。真的否定还奠基于认识。更重要处即在认识“理性”之存在与寄托，应当在知识分子身上发现，可不容易发现因为真的理性所表的热忱和信心，都并不曾见于新的文学艺术以及时人政论中。在用笔的一群里，我们只能发现一些聪明小巧的计谋，具新闻性的政见，反复抄袭的学问，有社交作用的活动，可见不出思想。见不出具有充分顽强防腐性而又组织完整的新的历史观，哲学观或文学观。都只想以“多数”代真理，强权代公理。见不出性格，见不出密度和深度。共通只能给人一种印象，即全民族的情感枯窘，世故与疲乏！正由于这种枯窘，世故，与疲乏，失去了调节中和作用，才会让另一种本能抬头到如今的种种，以及明日可能的种种……适之先生在北大国文会上给毕业同学三根救命毫毛，是思索问题，你倘若真能够头脑解放而独立来思索你所思索的是什么、你就会发现

“敢思索”已成为当前人一种高贵的品德。你问我国家转机何在，转机即在此！

本篇发表于 1947 年 7 月 27 日北平《平明日报·星期艺文》第 14 期，署名从文。原题为《新废邮存底　二六〇》，现题为编者所拟。

关于学习

昭明先生：

关于学习问题，你要一点浅俗意见。你说你欢喜文学又太欢喜玩了，就照你说的“玩”文学方法，看看玩的是什么也很好。

提起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玩票”。你说得对可并不透彻。

梅兰芳或谭富英唱戏，大家都承认他唱得满好。我们想在业余意味上学之时，就从事“玩票”。学习上虽标明一个“玩”字，和职业艺员不同，可是玩到后来要拿得出手，在自得其乐以外还想得他人承认，都明白必需自己狠心下苦功夫，好吊嗓子，学身段，以至于……用极长时间兼有极大耐心，以及那个无可比拟的学习热忱，慢慢的来摸索训练，才可望得到一点点成就。然而到结果，这还不过是“玩票”！

另外是溜冰，更近乎业余游戏，比踢球简单方便。不必和他人共同协作，只要你自己会好好控制四肢，短期间即可得到参加的愉快。可是要想作个什么国际选手，就依然必需

深入三昧，造诣独臻。初次上场时，三五步基本动作，可从他人指点提挈得到一点帮助。至于要达到庖丁解牛，心领神会，无往不宜境界，学习情形，将依然回到“虔敬”“专一”“辛勤”三点上；即是古人敬神如在左右那个“虔敬”，古人学琴妍眼薰目那个“专一”，以及老老实实肯定承认勤能补拙那个“辛勤”。溜冰依就不容易，求技近于道得费多少心！

但在“玩”字上也有只要为人秉性小小聪敏，略经学习，即可得到进步，玩来十分省事的，即年来社会较上阶层流行的“扑克牌”和“交际舞”，等而下之自更不用说。这些事从各方面情形看来，都好像可以不学而能。我决不怀疑有些人这方面的天赋。但想想，上层知识分子由于分工而兴趣隔离，又由于苦闷又必需交际，友谊粘合，来往过程，若已到竟只能用这个王爷皇后桃花杏花纸片儿交换猜谜游戏上，把其他国人船上水手或小酒店中小市民层的玩具，搬到中国交际社会，成为唯一沟通彼此有益身心娱乐点缀物，这个上层的明日，也就多么可怕！我们是不是还能希望从这个发展下有伟大的思想，伟大的人格，……哲学或艺术？又看到另外一种伟人在什么舞会中陶陶然样子，以及牌桌边“哈鸡”下注的兴奋神情，总不免有点使人悲从中来，对这个统治层完全绝望。这两个阶层到处有好人，并不缺少真正学问和明朗人格，我们得承认。可是，他们玩的习惯方式，却依稀可观国运，见出民族精力的浪费，以及一点愚昧与堕落的混和。从这个玩的趋势上，还可测验出这愚昧和堕落能生长，能传染，在生长，在传染。你是不是觉得这种玩玩和国家兴亡相去太远，无从连类并及，还有点相反意见？

这里到了一个两歧路上，看你准备向那一个方向走去，

应当问问你自己：你要玩什么？且预备什么样一种态度玩下去？你要写文章，这不用说了。可是打量用作第一流票友学京戏方式玩下去，还是用搭桥哈鸡跳交际舞意识情绪玩下去？你若嗓子本还好，唱京戏玩票，摹仿话匣子自然容易入门。可是想要综合前人优秀成就，由摹拟入神进而自张一军，纪录突破，能上台还不成，必需在台上还站得稳，真有几出拿手杰作听得下去，这必需要如何用心才做得到！虽然玩票的中材下驷，在同乡会或某校某院等等游戏会彩排清唱时，照例都容易博得满场鼓掌。若用“上司”身分出台，必更加容易见好。（有些人即仅仅装作在唱，做个姿式，毫不费力随意丢了两个解手，还是同样有人送花篮，拍掌，末了还写批评恭维一大阵！）可是这么唱戏那会有真正好戏？这那里算是唱戏？一切成功都包含在“打哈哈”意义中，本人毫无希望进步，对于戏的总成绩更不会有什么真贡献，是明明白白的。现代文学的发展，也有个类似情形。

人人说这是个现实时代，能适应为第一义。一个新作者善于适应，似乎即格外容易露面，容易成功；一个成名作家善于适应，则将成为“不倒翁”。不倒翁的制造我们都明白，特点是上面空空而下座落实，重心不在自己头脑上，所以不必思索，亦可省去思索苦痛。造形上虽稍见滑稽，但实具有健全意味。不必思索是他的特点，现代人因思索得的痛苦也可免掉。如果时代趋势又已到不甚宜于人用脑子从思索上提出意见时，这种健全性对于许多人必更加见得重要。（只是在文学史上，这种作家却不能算数。）另外还有一种作家，即守住一种玩票陈旧规矩，把学习从第一步到终点，当成一个沉默艰苦的长途跋涉。憨而且憨的把人生历史一齐摊在眼前，

用头脑加以检讨，分析，条理，排比，选择，组织，处分。这个民族近数十年的爱和恨如何形成，如何分解了这个国家人民的观念和愿望，随后便到处是血与火泛滥焚烧，又如何造成万千的牺牲和毁灭。一切都若不必要，一切都若出于不得已，如此或如彼，他都清清楚楚。正因为认识得格外清楚，他将重新说明，重新诠释，重新为这个民族中真正多数，提出一种呼吁，抗议，并否定，让下代残余活在这个破碎国家土地上，可望稍稍合理些，幸福些！且由此出发，还能产生一些政治家，思想家，艺术家，事业家，敢于接受一种新的观念，头脑完全重造，从各种专家，公共卫生或生物化学……等等专家，用一切近代知识技术来处置支配这个民族的命运，来培养更小一代，发展更优秀品质，将国家并世界带入一个崭新的真正进步和繁荣，……说得明白简单一点，一个作家还能作许多事，只看你打量怎么样去作。你要“玩”，你在这条歧路上向这边或那边走去？这里没有左和右，只是诚实和虚伪，沉重和虚浮，工作和游戏。两条路正在面前。与其向我来问路，还不如先弄明白你要走的是什么路！是学搭桥，哈鸡，跳那个文明交际舞，即以为在努力接受近代文明，日子过得十分愉快？还是玩点别的。并用另外一种心情来学习来从事。

你可敢把学习从最小处起始，每个标点都用得十分准确认真，每个字都去思索他的个别性质和相关意义，以及这些标点文字组织成句成篇以后的分量？你可敢照一个深刻思想家的方式去“想”，照一个谨严宗教徒的方式去“信”，而照一个真正作家的方式慢慢的去“作”？

面对这些问题，你可相信人生极其复杂，学习的发展，

并不建立在一个名词上即可见功，却在面对这个方汇百物交错并织的色彩和声音、气味和形体，……多方人间世，由于人与人的固执的爱和热烈的恨，因而形成迸发与对立，相引与相消，到某一时且不免见出一种秩序平衡统统失去后的现实全盘混乱，在任何弥缝中都无济于事的崩毁。在这个现实过程中，许多人的头脑都已形成一种钝呆和麻木状态，保护了自己的存在以外别无抵触。到一切意义都失去其本来应有意义时，一群有头脑的文学家，还能够用文字粘合破碎，重铸抽象，进而将一个民族的新的憧憬，装入一切后来统治者和多数人民头脑中，形成一种新的信仰，新的势能，重造一个新的时代一种新的历史？

你先得学习“想”，学习向深处远处“想”。这点出自灵台的一线光辉，很明显将带你到一个景物荒芜然而大气郁勃的高处去，对人类前进向上作终生瞻望。

你需要学习，应学习的实在此而不在彼。话说回来这还也是一种“玩”！为的是玩到后来，玩累了，将依然不免为自然收拾，如庄子所谓“大块息我以死”。先得承认它的对于个体处分的合理，才会想得到现代活人自己处分自己为如何不合理，如何乱糟糟，如何有待于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共同来重新组织一个世界。而你的工作，也可从这个方面选取一分相当沉重的什么到肩上，到手上，到灵魂上！

本篇发表于1947年9月20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58期，署名从文。原题为《新废邮存底　二八一　关于学习》，现题为编者所拟。

启　　事

有个未识面的青年作家[1]，家中因丧事情形困难，我想作个“乞醵”[2]之举。凡乐意从友谊上给这个有希望的青年作家解除一点困难，又有余力作这件事的，我可以为这作家卖二十张条幅字，作为对于这种善意的答谢。这种字暂定最少为十万元一张。我的办法是凡要我字的，可以来信告我，我寄字时再告他如何直接寄款给那个穷作家。这个社会太不合理了，让我们各尽所能，打破惯例作点小事，尽尽人的义务，为国家留点生机吧。

你们若觉得我这个办法还合理，有人赞助，此后我还想为几个死去了的作家家属卖半年字。这些人的作品，可能是你们在作学生时代常常接触，影响到你们很大，他们的工作意义极有助于文学进步和社会重造，却死于工作辛勤或时代变乱中。我们值得从这个方式上表示对于人类的爱和文化知识的尊重。扩大我们的爱和尊重，注入于我们工作中、生活

中、信仰中，社会明天就会不同得多！

沈从文敬启

本篇发表于1947年9月20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58期，署名沈从文。

① 青年作家　指诗人柯原。其时柯原丧父，家中负债极重。

② 乞醯　醯即醋。乞醯引申为向人请求援助。

北平通信

——第一

巴鲁爵士之名，不见诸经传及近世名人录。于读者印象似极陌生。惟中国商业俗话有言："一回生，二回熟"，谓余之通信能陆续载出，读者即不至于诧异矣。且余敢保证，此名与塔塔木林[1]均非杜撰，加以岁月，亦可望如大文豪鲁迅之名，老幼咸知也。读者诸君之记忆机构，倘保护相当周密，不至于如迩来之铁路交通，时出毛病，比联合国组织，及中国经济政治制度，又稍健全坚固，并未受维辛斯基[2]演说，及国内战火予以甚大损害者，则必独能忆及数阅月前，大公报特写栏内，曾连载佳文数篇，作者即署名"塔塔木林"。此人名虽奇突古怪，然亦非伪造也。作者身世本贯，究属谁何，具探索兴趣者，实大有其人。据余所知，当时竟有大庠中某教授，悬赏打赌，互猜非某必某。隔山射虎，令人莞尔。余与塔塔有葭莩谊，乃心知而不言。如无忌讳，本可作一索隐小文，用公同好。时局不靖，禁令日多，报上且常载有学人失踪消息，恐因余文影响及塔塔之行动自由，而未著笔。虽明知故都中山公园，水榭旁边，花柳丛中，有一建筑古雅之

花神庙，门前曾悬挂白滚黑字匾牌一块，说明此地系北平市百八十万市民身体言论自由保障委员会办公处，意若示人："凡失去自由之正当公民，均可自由来此控诉，请求保护。"复若明白凡已失去自由之公民，即不常进出公园。大庠师生虽常有集团请愿之举，如入公园，亦需购票。故办公处并不需人办公，大门紧闭，异常清静，与花神庙所需要情调，始终尚能保持调和，亦并未破坏整个公园应有谧静也。然与余宣布塔塔身世检讨思想之情调，则不甚相合矣。塔塔与余虽系一正当公民，且有固定职业，身分证完备，万一因事失踪，希望此会中人仗义奋起，发动市民请愿示威，实不可能。即故都大庠师生，力主保障人权，情形热烈，殊可钦佩，其事似亦限于国子师生，兴趣容易集中。至如中国各省地面，比来正在进行之非常剧烈行动，手脚紧贴土地性情纯良之公民，以万千计，于炮火中辗转死亡，比失去自由情形，更严重万分，诚古语所谓"彼亦人子也"，宜有哀矜不忍之情绪，普遍传染于大庠师生头脑中，形成一种庄严而长久之活动。惟此事似即因相去太远，不易有罢课呼吁之事发生。谓余与塔塔自由失去时，欲太学国子师生表示抗议，自亦无望也。故于他人悬赏亟欲明白之事，经人询问，竟用缄默相对，放弃权利。事犹有难言者，余虽取得北平市公民资格二十年，惟语音不正，至今犹多夷趣，每遇耳有微疾，头多政治，胸怀成见之人，与之谈话，用笔记录，必易走失原意。比如四阅月前，有一学校事件，大庠学生四处征询意见。余当时云，"凡是青年活动，防腐工作，一切表现，余实同意。"一经笔录，竟作"巴鲁先生曾云：范四今年活动，放虎工作，易妾表现，誓难同意。"字大如茶杯，用普通写标语之红绿纸书就，贴于

民主墙上，伫足而仰观者，数逾千人。一经记录，即成定案；欲加声明，其事甚小，欲不过问，错误太多。……次日即有陌生客人拜访，接谈之下，始知其妻欲文明离婚，此人欲援引余语为证，认为离婚非美事。至如壁报作文，且竟有认余为封建反动，压迫女性解放自由者。……如彼如此。作者笔下情感益浓烈，益容易引人入胜，亦益荒谬。殊不知——放虎易妾，与余何干？凡凭空何来一范四。即天下有一范四，又何预学潮？知之者明白玄虚，名为“政治”。余未政治，他人政治，即容易有类似歪歪曲曲之事情发生。大庠诸生实在长期竞选情绪中学习政治，享受自由，自由二字，既包含一极广泛意义，稍稍滥用，亦常事也。知之者不妨付之一笑。惟不知者，不免代为扼腕，以为系祸从口出，余又乱说了话，干涉他人婚姻美事，或刺中人秘密伤处也。世多称写实主义文笔极可贵，此类文章则近于印象主义。印象派绘画，余深知巴黎卢佛宫画室不乏杰作佳构，足为世宗。印象主义访问记及论文，则殊难言。读者诸君，如曾置身于大庠之内，政治之外，于此问题定必有同感也。因是余之私意，遇有公民说话之事，欲余表示意见时，终以用笔写出，此较可靠。余对中国文字，驾驭能力犹多遗憾，胡适之先生提倡之白话文，于虚字中呀啊呢吗，至今犹不善运用。行文欠通，势不可免。今大胆作此通信，实乐意向读者诸君谦虚诚恳，作揖请教。

余今拟首次谈一北平事件。即余阅报纸，见有三事载于同日新闻中，三事各不相关，余想则有一连贯性。

一为故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经行政院核准，请领法币二十亿，修理粉饰北平古建筑。（就中包括有朝阳门箭楼一座。）

二为治安当局某发言人，宣布有关学潮新闻。以为此次

因某某事学运发动，来势汹汹，不易招架，幸各方面安置合法，得免啊呀。就中有一点极富暗示性，即宣称此后各校学生过从，恐多“打架”事件发生。因从×方观点言及此事。已承认学运有动作时，此校学生可用打走方式，将他校惠临之客人加以驱逐也。

一为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之先生，至燕京大学讲演，讲题名为“谈谈做梦”，鼓励听众一同对未来社会或个人事业，有所憧憬，各作好梦。听讲者千人，且有若干校工参加。

保存国粹，系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容或有花钱近于浪费而无结果之事。然用钱于修整故都文物，则政策至佳，无可批评。故都宫庙建筑，素以华贵庄严伟大美丽见称。世界游历团，每来中国，至上海换掉黑市美金，于南京参加官方宴会，过青岛沐浴跳舞喝啤酒后，必至故都畅游各处，至琉璃厂收买假古董，赴便宜坊吃肥烤鸭。若故都文物修理完美，给友邦人士印象必较佳。此事不仅于文化有关，于市面经济政府信用亦相关。然北方局面，欲欢迎大批游历团团员，来此从容观光，似不相宜。又气候干燥，土木建筑于一二年中，若非焚毁，或尚可保持完整，不虞坍圮。且修整中有箭楼一座。箭楼者，乃二百年前明季防止胡人侵略攻击，弓弩手站立于上，用铜簇鸟羽之箭，射杀敌人之城防堡垒大建筑也。今北平真正亟待修理之物，若加研究，必可得一新的结论，并非箭楼一座，必系数以千计之碉堡。北百八十万市民之情绪，实比较近四十年任何时节不安定。此大城中市民，五十分之八生活营养，即有问题。研究心理学专家，虽知市民之苦闷情绪，犹如从压制中使之萎缩，无副作用产生。至于寄处各大库中二万学生，在成熟中之灵魂，及各中学近十万在

发育中之灵魂，于穷困，苦闷中，亢奋消沉交替，蹂躏挫折，逐渐变质，发展下去，其坍圮之可忧，实值得有心有脑人加倍注意。属于物质缺乏事，犹可由行总联总，分别救济，或收效一时，或度过难关。至于精神亢进萎悴，试分析其来源，一面是千里土地上千万人正在进行之焚杀活动，所作成一种大旋风，一面是二万国学生于校中，正在进行之检讨辩论，所作成一种小旋风，两相会合，直攻本心，扫荡一切，无坚不摧，此种问题，实不为不严重！×局长之希望，学校事一例化为私斗，似不可能也。

余意以为在政治中无妥协，在战争中又无结果，均属事实，吾人似宜于“求明日转机”一语中略作好梦。“救抢人心”已成一烂熟名词，名词一到烂熟，即失去其应有严肃反应。吾人对故都死文物，既常用“修整”字句，对此活文物，亦无妨说需趁早修整。余意政府若对此事稍有认识者，必需即刻拨付三五十亿款项，交由北平市一特种专门委员会，（此委员会当包含二三大学校长，艺专校长，北平图书馆长，故宫博物院长，艺师两院音乐美术主任教授，及二三心理学，神经病专家，市长只占一票，）计划购置大型收音机三百座，分配于各级学校，机关，及监狱，党部，餐厅，……并同时加强管制广播机构，实行动员法，一般播音台靡靡之乐与商业广播，均应严格管制，如不服取缔，即控以妨害多数市民健康之罪，加重其处罚。广播法重新订正，主要事为每日必于一定时期，作世界名曲名乐章之介绍与演奏，时间宜在午饭后，至少宜有二小时。届时除学生外，军警宪及各机构中级以上职员，均宜就地就近听取音乐，洗刷灵魂，使此高尚古典音乐，给予以一种新的教育。至星期日，则更宜有一重

要乐章介绍。并附以介绍说明。

此虽余之私见，实宜于由劝人做梦之胡适之博士，即刻提出计划，亲自飞往南京向政府索钱，并无妨用辞职，绝食，及更吓人之表示，要求圆满结果。一月之内，即可将第一回特别广播节目见于报纸。此特别广播，系由委员会筹拟，经由市长出名，邀约世界第一流乐队，第一流指挥，定时于所在地就近进行，指明为纪念此文化城伟大试验，对北平市百八十万市民义务演奏。市民即再顽固保守，学生即再激烈，亦必承认此宏壮优美之音乐，终比于郊外用其他乐器作成之不祥音乐宜于听觉享受也。

余敢用余之爵位担保，此事如能见诸实行，三五月内，学校秩序，市内治安，以及法院，税局，……必均有截然不同之惊人现象发生。此现象用“进步”二字形容，似犹未甚妥当，必用“奇迹”始合。因比文学运动之实证速度或尤早。事之显而易见者，即大群民主墙上或其他地方，标语纸张，当可节约至最小限度，市上竟有囤积此种纸张商人，因销路呆滞，宣告破产者。一般日用品价值，均降落甚多，因大户囤积之物，已被其小姐少爷报告公家，加以处分。一般商业社会，诚实品质纪录，亦见出上升迹象。就医之病人，必可减少等待，苛索，及马虎诊治之痛苦甚多。国际救济品，亦必有较多入于平民手中。此外如贪污，失职，渎职，专制，等等纷乱社会人心减低政府信用之纪录，亦显著在降落。地方军警宪进出人家检查，已极和平，不带杀气。娱乐场所守门之宪警，及不美观之电影标语，已由医生抗议而撤销。（报上并有消息，警察局拟用重薪征求园艺学专家，因已通过一议案：北平市警察必兼受园艺学训练，便于参加建设此文化

学术城。）至于身穿便衣负有特别职务人物，如监视、偷窥、殴打，经常出勤于大庠之机会，亦必日益减少。原来工作者多已辞职改业，即有需要，亦必重新雇请训练。

世或有以余言为荒谬而加检讨者，余将预作声明：不准于笔墨间辩论。因此事并非政治主张，故无笔战。世不乏解人，当有知余意之诚，且具有科学真理哲学深思者。胡适之先生之学术独立主张，学习行宪兴趣，如系彼年近六旬之第二梦，欲证实其梦，能如第一梦之容易实现，余意即宜趁早作此一着实验工作。现任北平市长，亦宜极力赞同此伟大计划，因其事远比市长与垃圾奋斗，为轻而易举，比参加救火表演爬绳打拳，复易得通人首肯，想市长亦必乐意为此百八十万市民一努力也。

此事如能于明春见诸实行，可能在城防工事修筑上，亦略可延缓时日至半年左右。余且敢预言，如此事能实现，五年以后，北平市尚完好存在，建筑文物未毁去，人民未饿倒，必有公民过半数，请求市议会通过两位人物为北平荣誉市民，以纪念此有远见之改造盛举。除力助其成之胡校长外，巴鲁爵士之大名，亦必赫然在上。余于彼时则拟照庄子《南华真经》所述尊贤让王故事，将此高贵荣誉，转让于一年纪仅足三十二岁之专科医生，因彼首先从科学方而证明音乐对于情绪卫生与民族品质调整改造关系重要性。除临床实验报告，可资凭信。且于一论文中，曾道及历史上许多伟人如拿破仑，……等等，常以人民国运作赌，下注极猛，输赢数目极大，胜败之际，面不失色，神经坚硬，超越常人，凡此种种，多为内分泌错乱失调所致。设用完美爱情和高尚音乐，当可逐渐治疗，恢复常性。（惟常性一经恢复，其伟大处或亦同时消

失。不可不注意。）若社会保健设计进步，欲预防此事，或对较轻微之病欲作普遍防止，工作实相当简单，只需要于各级教育中减去其他不必要之强迫训练，加重美术音乐课程，至某种比例，即可于十年后收效见功。彼且正提出一新论文于中央研究院，以为照宪法进行之公职当选人，均应经由一特种委员会，检查其神经组织是否健全，对于音乐美术感受力分数，是否及格。即国家最高机构负责人，其设施虽不违宪如对当前人民或下一代人民精神上有发生损害可疑情形时，经过人民某种程序之请求，亦可由此专家组成委员会，检验其神经，加以判断。凡公务员对伟大音乐高尚美术缺少良好反应，只知玩牌喝酒……者，均得入医院休养治疗，久未治愈，即应离职。此种论文，因观点过于革新，且影响及社会组织甚大，一时未获通过。然所有原则，则已为新国际联合组织，试用于各级职员考选升黜上，得到满意成绩。此种特别成绩，且经国际科学艺术联合保健学会七名专家，加以严格审核，签字认可云。

读者诸君，此少年医生，不仅宜为北平市荣誉公民，犹可为行宪后某一届民选市长候补人。余目前宣布此事，虽未免略早，惟较他种政治预言，则易实现。因人类心智之进步，如系一种事实，社会改良计划，又复为具有真正进步之人士所支持，则用音乐来融解百八十万市民之苦闷情绪，作为文化城一种文化设计，其事极平常自然。正如竖立鸡蛋于桌上，诸君亦深知其事，只在轻轻一敲，惟吝于言耳。或亦将为明达之士所嗤笑，以为作梦荒唐不经，不明现实为何事。余宜承认，余之所梦，与迩来朝野保守进步人士流他人血而得安全之梦，意识形态，均不相侔，无可讳言。

余曾刻有一象牙图章，作小篆字十个，“美育代宗教③之真实信徒”。为人瞥见，即曾相质，“美育代宗教之学说，系蔡孑民先生名论。北京大学乃一国内著名之学府，蔡孑民先生首长斯校，即以此说见称于世，已三十年矣。今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近年六十，劝人作梦，情绪亦复异常真挚。惟校中似太缺乏美术空气，三千学子，于校中所进行之连续交响乐，乐器配合，乐章选择，是否与蔡先生之美学原则相和？与胡先生之梦境发展相调和？”欲余作答，余因默思：二哲人均有意欲引国家进入一新时代，将悲剧作成一歌剧排演。且均乐观深信此事为可能。然未能为学生设计，于学校预施以较多音乐与诗训练，实一大问题！设三十年前，学校即有意对于蔡先生之哲学，略作实验工作，社会国家发展，或稍柔和而具弹性，即迩来之当政者，亦必对于余之建议容易有会于心也。

本篇发表于 1947 年 12 月 1 日《论语》第 142 期，署名巴鲁爵士。

① 塔塔木林　系萧乾自 1946 年 9 月开始在上海《大公报》发表专栏文章时使用的笔名。

② 维辛斯基　前苏联国务活动家。1946 年以后曾先后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部长，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等职。

③ 美育代宗教　参见蔡元培（孑民）《以美育代宗教说——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说词》（载 1917 年 8 月 1 日《新青年》第 3 卷第 6 号）。文中有“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等语。

怀塔塔木林

——北平通信二

读者诸君，余之通信与读者见面此为第二回。余亟欲作一声明，即第一次通信于×刊发表时，编者曾略作介绍，向读者暗示余系一“作家”，意图吸引读者。因彼一注，刊物读者未增多，然余于半月中即接由本刊转至信件约十封，半误认余即执教大庠之某教授，以为人在故都，因何不为官办刊物写庄严时论，乃作此等哈哈文章？半误认余即忧心国事半年前于《大公报》发表《红毛长谈》[1]之塔塔木林，盼余续写红毛长谈，且告余中国业已行宪，民主自由，可摸可触，担保定无笔祸。三者相混，实令人麻烦而不怡。张冠李戴，真是笑话！余不欲世人对塔塔木林之好印象，误移于巴鲁爵士之名分下，故大胆将余与塔塔之过去，略作叙述，投寄刊物发表。一经说明，诸君误会应即冰释矣。余运用中国文字，犹多缺憾，然所言之事均非幽默，实极庄重。设《大公报》南方版总编辑王芸生先生，能有机会寓目，将余通信转载，余亦同意。因信中谈及北方时事，或为他人笔下所未及，为《大公报》南方读者所欲知者。余且亦盼《大公报》仍有塔塔

木林之长谈刊载，与余之通信意义相同，或可将近来外国援华军火供应中国鼓励杀人之新闻，刺激中国人民神经处，略略冲淡，此事司徒大使亦宜有同感也。

塔塔木林与余为表兄弟，年稍次于余。以彼之教育材具，本可在欧洲作一标准绅士，努力于文化商业，发展得手，二十年中当可晋封一小小爵位。惟当顽童时代，与余同爬至一四层楼屋顶，读《马可勃罗②游记》《天方夜谭》二书，未免着迷。于华夏文明，尤感倾心。数年后，因与余同时冒险至中国。中国古语说："同船过渡，五百年前所修。"意思是今日之事，实结缘于先世，亦影响及将来。此语用于吾二人之友谊，自更增加一种保证，且影响及其他。因即此海上飘泊，虽未能证实五百年前事如何，然余辈此后三十年生活，则均与四十日海船上见闻有关也。

余在船中认识一广东翰林遗老，力言寄居香港之方便，中国文化各部门，国境内行将失传者，均赖香港总督热心保存，而前进激烈异常分子，在此寄寓，亦可平安无事，十分保险。余因即落脚于香港。塔塔木林表兄，则与一久经上海卖药之洋胞相熟，力言欧人文明，实赖上海当局（当时为工部局各管事，近统属市长）热心维护，且面对现实，常使人良心糊涂，眼目兴奋，极富教育意义。彼即留寓上海。分别十年，二人复相遇于故都，各述经历，方知冒险家乐园，实限于对金钞特有情感之西人，方宜久住。老犹太制造补药，新犹太生产玻璃用品，凡知所以满足中国有身份无头脑士女，知发财门径又复手腕灵通不错过机会者，亦即为乐园上等人物。此外间或有海关服务，船上引水，……寄寓中国一久，由买假洪宪瓷作灯座人手，用手堆积进修成一"中国通"之

洋人，则兴趣与身份常作比例消长，兴趣益高身分便益低。塔塔木林既不甚明白现实人生，故十年寄寓，无从发财，终且厌恶此犹太气氛所培植之大都市，逃至故都。余则初服务于香港一教育文化机构内，因得从中国古道君子，学习四书五经，先秦诸子。又曾与新派政学各界人士往还，十年训练，经常出席各种集会，任主席时有条不紊，送丧做寿，能写新体应酬文字，措词得体，本人头脑思想，虽并不真正有深刻独到之见解，惟性情随和，与道相邻，汎汎若水中之鸥，从不逆风触浪。且主持一小机构，贱名间可用作酒家市招，久而久之，本人亦即因之俨然一贤达闻人矣。其实本人头脑，固依然空空洞洞如旧日也。私心揣计，此地系一洋码头，去马可孛罗所记东方文明实相去尚远。余之旅行，似仍以至故都作止点为宜。因决心辞职，向故都出发。

两人既不约而同来至此伟大美丽之故都，深感中国文化或在文字上与事实上有脱节处，欲作深刻研究，必重新作一种准备。一面用眼目观察现实，一面涵泳古贤经典，始能有会于心。余二人因同往华语学校补习中文，旋应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新生考试，塔塔木林录取，余则落选。此次之事，且留一点教育掌故，即因余不通国学，冒昧投考，落选以后，主事者竟将余之报名费亦见还，可见此校考试之认真。然该校国文系，二十年来似不甚景气，欲发展，以余私计，恐唯趁早聘余与塔塔木林作一荣誉教授，庶几示人以一新作风，或可望耳。（此言自是笑话，因余得闻该校女生人数约三分之一，溜冰时极热闹美观，固仍乐意作此校一荣誉学生，殊无意作教授也）。塔塔木林全部履历，虽至今犹不宜完全公开，惟曾肄业燕大，为司徒大使之及门弟子，余亦为一不得其门

而入之学生，已无庸讳言。岁月如流，此过去事细细说来，实已如一历史故事矣。

诸君想象中之塔塔，或为一常见不中不西之洋人模样。其实此种臆测印象，殊不可靠。塔塔自从毕业国学专修科后，即读儒书，信儒道，明文王易卦，玩太极拳……应世之时，常用所学，解除困难不少，家居常穿长袍马褂，着双鼻梁老式厚棉鞋，（且必须北平前门外门框胡同某店加料出品。）坐太师椅，品雨前茶，吸水烟袋，遇友好应酬兴会佳时，和同席五魁八马打一通关，喝老黄酒一斤二两，犹未失仪，进退应对有节。平时与友好议论时事，对方如为余友现任外交次长叶公超氏，或为诗人梁宗岱氏，同属广东精神，以语言奋斗为乐趣，各守立场，到僵持对立无可挽救严重关头，塔塔即用老中国农民应急方式，当天赌咒，意若所言不实，神天可鉴，将来嘴边必生一碗大疔疮。于是和解成立，辩论方告结束。此种咒誓，塔塔固知系与政治上要人预约相等，决无实现可能，故常小施狡狯，收排难解纷之效也。塔塔虽为一无神论者，惟生平乃极怕鬼，听人说鬼故事，终夜竟难安枕，亦一奇事。因怕鬼而信神，乃成一诚实基督教徒。记得在燕京大学读书时，作弥撒即掌持大白烛于神父前代表荣光，仪制庄严，予人甚深印象也。惟此事或系冰心女士，余误记为塔塔。

塔塔曾寓居于后门内鸦儿胡同，家中蓄养小狮子狗二只，欢喜迎客人汪汪而吠，且向客人肉多处作咬势，其物虽渺小，奋勇直前时，客人不免惊愕狼狈。塔塔必当客人面前向洋太太温柔而言："达铃，毋使龙也吠！"塔塔夫人则于厨房中遥遥应和："夫君良人，余知之余知之。"应和之际，温文中见

情爱，深有雅歌意味。然客人彼时则不知欣赏，与狗对立必益见紧张。塔塔因复向小狗作势而言："你个小东西，乱叫什么?"且握拳举足，作打踢姿式。塔塔夫人于此时始急忙走出，将二小狗抱起，略示亲爱。小狗会意，明白此事虽对来客失敬，行为实仍受主人尊重，即不再有捣乱之举，欢跃而去。

塔塔于文章中虽常自谦，对中国文学理会不深，其实新旧无不在行。即以读书而言，昭明太子《文选》中名作，有若干篇章，均可成诵，余曾亲聆。对现代中国文学，则老舍所著之《骆驼祥子》原文，亦能批评得失；且发表《红毛长谈》之前，即尝用另一笔名，写作语体文小说，批评，游记，并曾仿效《尝试集》作过新体情诗，投赠一知名闺秀诗人，备受称许！因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游中国，将见闻经验，写作《红毛长谈》，分别发表。塔塔对中国本位文化，既理解透澈，文章写来，自然亦庄亦趣，不古不今，驳杂如诸子，精悍有稷下辩士风，引喻设义，奇突幻异，又兼有墨学家宋荣子，法国学人服尔太翁风味。时军调部工作正于挫折中勉强进行，接收大员于南北各都市所作成之不雅印象，正起始有人从文学艺术加以表扬，大小书呆子对现实苦闷绝望感，日益深刻化，塔塔文章初现，爬梳透剔，谈言微中，抚掌称快者因之大有其人。

然塔塔木林者究系何人？不免使人纳闷。国立清华大学老教授张奚若先生，或亦于阳光下偏头揣想，频搔头上稀疏之白发。潘光旦先生，终年向人常作和蔼咪咪笑，其中之某一次，特别亲切真实，或即为阅读塔塔文章而来。有因其笔调文气，面生心熟，以为或系清华大学之温特教授者。然彼

时年长有德之温特先生，据余所知，则正驾驶美制吉普车，携带足用干粮法币，旅行于云南丽江府，在雪山下对五色琉璃之雪峰发呆。并巡视大小庙宇，如四十年前司坦因在敦煌与王道士办交涉方式，向对法币具有好感之和尚平民，收集古宗族艺术品，及日常生活用具。便于返还故都时，招待欢迎朋友，披深紫色大普鲁，穿长统毡靴，制酥油茶，准备表演藏人献茶一幕，以娱嘉宾。且彼时所得实物，正被壮士抢劫，壮士拟用“枪毙”相恐吓，温特先生则急中生巧，大声报言“我看你这狗×××的不敢。”适忙于用中国式野话应对，得免绑票。虽幸而免，心有余悸，情绪状态，实不宜从容谈中国时事。亦有疑系寓居纽约之假洋人林语堂博士者，林博士旅美日久，于中国问题已稍隔膜。且文章气势，即不相类。

惟现任某部某长，头脑灵活，心计透明，掐指略筹，即数出塔塔本贯住处，旋即轻车简从，亲赴某地，访晤塔塔，畅谈而归。所言谁何？事秘不得其详。或谓曾对塔塔略作暗示，表明官家立场，有关内政问题，除美国当政大员，友谊批评意见，可以斟酌接受，其余言论，宜知限度，免伤和气。又谓某公之访，实有意邀约塔塔担任塔塔所热习之某项国外要职，一般言来，此职实大为有出息。塔塔则不加思索，拒绝其事。如传说可信，以余私意，彼时塔塔必正阅读古本《南华真经》，对书中让王辞封故事，心领神会，“宁作泥涂曳尾之乌龟？抑为庙堂锦绣之文牺？”蒙庄设谕，似俚实巧。此语虽并非为彼时诸党派领袖社会贤达而言，实与塔塔之出处之大节有关。塔塔面对此可触可抚之现实，需用头脑判断有所抉择时，闭目思维约三分钟，所得结论，必然是，“不事王

侯，高尚其志。不受羁绊，乐得自由。”如于此等关头，除摇头外，宜尚有小小行动配合，可能系用手作一圆圈，比作曳尾公之身体，并将身后肉多处略作摆动，于贵客前以喻不屈本志，且连声致辞：“仁兄再见！”外交礼貌至此为止，于是与小狗同送贵客上车，鞠躬如礼而别。其事系得诸传闻，加以余之意想，当然与真实情形略有出入。惟自是以后，塔塔先生之文章，即不再见于报纸，或犯时忌，受警告，不得而知也。虽陆续有何永佶费孝通二博士长篇时论刊载，才辩词藻，见称于时，然以中国人观点谈外国事，似终不如用外国人观点讨论中国问题，深刻活泼动人也。塔塔文笔思想之奇异美妙，实由于透澈理解本位文化而来，二博士容或能称引拉丁古记，复述英美名言，于国学基础，则似不如塔塔深厚落实。冀北空群，使人惆怅，塔塔何适，终为一谜矣。（且即此以后，塔塔与余通信亦疏，彼或以为余忘却其友谊之真实，殊不知并未如此，彼之前途出处，固余所关心也。）

本篇曾分别发表于1948年1月1日《知识与生活》第17、18期合刊本和1948年2月1日《论语》第146期，均署名巴鲁爵士。

因《知识与生活》本多处误排，据《论语》本编入。

①《红毛长谈》　原为萧乾1946年9月起以“塔塔木林”为笔名在上海《大公报》连续发表时事特写时开辟的专栏名；1948年8月上海“观察”社将这组特写（共9篇）结集出版，书名《红毛长谈》，书后曾附有沈从文的这篇《怀塔塔木林》。

② 马可勃罗　即下文的马可孛罗，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今通译马可·波罗。

故都新样

——北平通信三

余读外埠某报，见有一托名“苏格拉底”大贤谈话录，文笔格致，别扭处与余表兄塔塔木林殊近似，然署名则为一王先生。其文庄谐融会，粗心读者或难尽其意旨，惟有心人与余则一目了然，知为何事而作也。中国古人论《易经》时，多以为易之作者必有深忧，故其文旨隐约而难求涯际。又论阮籍咏怀诗，亦有同样批评。作者既于国事有深忧，文章难为有信而不忧之士所懂，彰彰明甚。

上次余之通信，承蒙编者载出，错字稍多，致得读者三位来信，谓“目前中国学人，均以能使用不甚通顺英文自豪，若干学报，且必英文刊载，决不用中文，此事甚不美，甚不美！阁下岂欲对此等学人报复，故有意作此不通中文耶？”然又有一糊涂读者，则致函称余文体别致。正如对初到中国之一洋人说，“懂京话很好”，奖饰中有客气。信欲余作复，均未照办。不意编者附白，竟云本刊每期将有余之通信与读者相见，不免狼狈。思之再三，因将此文转介于读者，并为校正错字数处。如排印时，能

得校对先生稍稍细心，大意当不至于尽失也。

世设有人质余，谓王某即巴鲁爵士，巴鲁复为××者，此乃考据家事，余不欲代之作肯定答复。“吉人之词寡”，余之夫人平日即深虑余言多致忌，喜引此语提示，欲余作一“吉人”也。然余有不能已于言者，即作者对于“美育重造政治”见解似甚特别，而具大智深悲。（此见解一时尚未能成另一种哲学，三五年后则必尚可逐渐发展，并取证于科学，而形成一新系统。）即以对此大城保护而言，亦可称为一故都未来最佳打样师。北平明日能否如此设计发展，期于目前中央政府，自如一荒谬绝伦有悖现实之梦，决无实现可能。因试搜罗政府组织，纲要，计划，条例，章程，法规，以及任何秘密手册，均重应付目前事实，决不容许有“理想”，自更不需有此不切实际过于伟大理想也。期于各方面负责人，亦无可望，因习惯不鼓励彼等如此热心作事也。余意从大库当前学生运动中，能预先注入较多一点真正“文化”理想，则此事于明日，或比较有机会容易实现。因彼等若各方面知识较丰富，至作统治者时，即必然有不同表现。余非宗教家，不欲作伟大预言以眩世，然余敢深信，行年虽将知命，必将参加此伟大都市之复兴，得与王君所悬想之副市长及余所悬想之哲学家握手也。

本篇与作者所撰《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一同发表于1948年2月16日《知识与生活》第21期，署名巴鲁爵士。《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一文曾以王运通为笔名单独发表于1948年1月10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本篇实为将《苏》文“转介于读者”时所写的“引言”，因此，文中所说“托名‘苏格拉底’大贤谈话录”即指《苏》文，而“王先生”、“王某”、“王君”即指《苏》文的作者署名“王运通”。

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

此文大意，约取自二千年前服毒自杀之哲学家苏格拉底氏。缘余北游故都，眼见此间诸事，均失旧样，烧饼馒头，多越来越秀气，与十年前大不相侔。人情温厚，亦日益消失，不可追寻。内战益猛烈，西郊区拟修城防工事，竟闻需村民担负工料费用约二百二十亿，此事不由国库开支，不由城中豪富阔商担负，乃责之当地人民。十年出国，不意世事至于如此。心之忧惧，宁可仿佛！凡事恢复旧观既不可能，如何保存此名都大城犹馀三五之好事物，好风光，好因子，宜为有心人所同感焉。适阅读商务印书馆最近出版之文学什志第六期，内有朱光潜教授一文[①]，知哲人苏格拉底氏时游故都，并曾与余所钦佩之林褚二贤，商讨中国文化思想各问题。余知此耶稣圣诞日，凡习西俗之中外人士，均保留一邀约客人共度佳节之习惯，司徒大使虽能循例返校，然恐无一人注意及此一生正直之古贤，正孤单寂寞于北平旅寓中，即以乐观好客之胡适博士，似亦无意请此佳宾往一夕清谭也。因余去一长缄，诚恳邀约相过，乃与此哲人同度一离奇而愉快之圣

诞佳节。此文即就当夜长谭，贯串苏氏之意而成者。海内学人，或致疑文中有非苏氏思想见解，并余之存在亦为一谜者，余在此拟预作声明，保留一代转通信答复问题之责任，实甚乐意得各方指教也。

凡寓居此美丽伟大然而荒凉穷困之故都者，必均留一异常深刻之印象，且深为此有历史性之名都大城，将毁于“无知”而忧虑。人无知本不必代为忧虑，世界上无知之愚人，与无知之智人，数目恰相等，过去固甚多，未来亦难绝迹也。此无知之智人，亦非指执教大庠之学人专家而言，余固深信至今为止，北平地方有犹任何一城市，保留有知识有良心之学人专家为多也。此无知乃综合“人”与“事”与“时间”三者而言。设想有一极富美术价值之建筑，归一无知之人负责保管，其人对此建筑于美术史上具何意义，茫然不知，又不明此建筑于新时代有何价值。然彼系管事，即想作事，贴贴剪剪，如彼如此；又剪剪贴贴，如此如彼；延长时间至十年二十年，谓此建筑犹能保存本来完全，不可信也。一小小建筑犹难于典守，更何况国之名器，事之复杂有比建筑物万千倍者，如何谨慎将护保存，自是一庄严异常课题也。

中国大事余不欲谈。俗话说，丈八金身摸不着头脑，故余于此等事，实保留一等待态度。余所言者乃小事，即保护北平问题。余有一荒谬之建议，即时至如今，诸君犹欲于大庠中一切镇定，谈保护文化，保护北平，保护人权，首宜注意者，似当为如何作梦。此事似易而实难，因诸君默尔而思，必疑心本身即常如在梦中，固不必北大校长来演说提倡也。然诸君之梦，似均限于同一不美景物环境中，感觉恐怖与悲观。“应去者不去，不宜来者偏偏来”，此梦难醒，诸君恐怖

与悲观不免亦益深。余阅世较多，殊同意司徒大使前日说话末后二语："凡希望什么，终可慢慢证实。"正如诸君希望自为和平，和平安得凭空而至？然如有诚意欲其实现，从作梦着手，有许多事固犹待作亦复可作也。余意吾人凡言保护北平者，实不在城防工事之坚固与否，此乃总司令行营主任之责。吾人所知，事有不易保护者，非城池古物，乃人心趋向。余意北平首宜有一治哲学，习历史，懂美术，爱音乐之全能市长。此全能市长如不易得，退而求其次，亦宜将市政机构全部重造，且辅助以若干专门委员会，始能称职。余读报纸，见国际新闻上载称，联合国办事处大厦，建筑设计委员中，有一中国古建筑专家，名梁思成氏，此人久寓北平。余至中国，首曾询及北来巡抚之某要人，梁氏何在？是否即此美丽都城保护机构之最高主持人？此中国某要人，竟始则瞠目，终则莞尔。余之私意，将来若得梁氏任一副市长，实中国一大光荣事，（因巴鲁爵士曾主张市长宜为一青年文化心理学专家。即此表示，国际通人亦知中国必得救，比招待国外记者省事多多矣。）然要人竟不知梁思成之名。见予询及，旋允予同游天坛时至附近一观光，意以为此人当系一天桥卖艺蹉跌者。此要人诚一大幽默家，中国要人益多，国事自亦益难说矣。

西人游故都者，多以北平实如一大花园。余来此将及二年，四季景物，领略殆遍，除人民过于穷困，垃圾脏水，地方人民官吏处理方法，不甚合理，还待商讨外，余可具结保证"花园"称呼之确实。故余意此大城市市政管理技术亦宜从管理有条理之小花园借镜。如西郊外之颐和园管理方式，即大足取法。北平市警察数目与待遇，均宜与花匠相等。警

察局长最好为一戏剧导演或音乐指挥。其次则为一第一流园艺专家，不必属于党系人物。警察受训，所学宜以社会服务，公共卫生，及园艺学为主课。凡在公务上发生贪污渎职或干预选政等等，均应入医院诊断医疗；因既非政治上人物，知法犯法，除头脑有病，必不为也。凡派出所屋外，均宜栽满绿色爬墙虎或孟夏开花之紫藤及攀枝蔷薇，周围并有一广大草地。屋内除电话可供市民公共使用并备有报章杂志，如一有艺术性之小型图书室。派出所附近草地，既可供四百至八百市民游息，派出所之收音机，即可定期在草地间放送悲多汶②等幽雅宏伟乐曲，柔和市民情绪。保甲则多兼公共卫生之医生，服务热忱如传教士，且常作本区公证人，以正直廉洁著闻。谈及借兵役选举敛财舞弊故事时，真如一百年前故事。户籍警经常检查人家户口，多带欣赏情绪，毫无杀气。其进出人家，系看看人家庭院是否整洁，并具顾问性，指导人家栽种瓜豆花卉，是否合法。派出所门前公告牌上，常常有某某人家，委托警察将草果，西红柿，勿忘我，含羞草等新品种奉送，不取分文。工务局长宜为一美术设计家，因对公共工程过于求好，竟常常赔出私财，改造路灯。教育局长则为一工艺美术家，因之于市教育预算上，特别有一项支出，即鼓励学生从事工艺品制造奖金，曾受市议会议员弹劾，幸经说明，始告无事，又因更换五位中学校长，均因无籍籍名，引起风潮，经人告发。至教育部派专员来考核，始知新校长于党政方面虽非知名之士，实纯粹君子学人，且对教育具有远见，风潮始息。……市政府招待所，宜有一部分住处，专为国内外美术家学人观光住宿而设。招待所附设之北平文物陈列室，工艺美术品陈列室，边疆美术陈列品室，在世界亦

极著名。因此种陈列，实供给世界各地设计家以最丰富参考资料也。（至于普通官僚，则另有一招待所，地点宜与市场及娱乐场所相近。酬酢往来，比较方便。）市政府所主持之周会，每次均有名人讲演，多关于世界美术文化各问题，同时并常举行本问题有关展览会。此外救火会爬绳，国术八段锦等比赛，足球游泳发球剪彩，市长虽间或参加，惟最适合身分兴趣之事，则系于新落成之大礼堂钢琴边弹奏《月光曲》，与民同乐，或国内国际各种学术集会，市长作东道主。各大学定期于此可容万人之大会堂，举行音乐戏剧竞赛会，参加人比赴运动会还热烈还多，市长当时为争持此会堂建筑费及特别费，曾以去就力争，向行政院一再辞职。各私人经营娱乐场所，已少见不美观不得体之标语，及收票处荷枪实弹之兵士。此事已经一专家鉴定，谓必然引起观众不愉快印象，实违反公共卫生，因之一律取销。然少数电影院经理室及市长办公室，则犹保留此标语一二则于墙上镜框中，用作纪念。标语如“市长和北平灰土垃圾奋斗”，此事到后来只是卫生局一科员责任应尽之职，然当时则奋斗结果，市长竟宣告失败。故此标语，不仅可作进步纪念，亦兼寄幽默意味也。

为促进辅助此文化城各部门工作进行，美术专科学校已改变制度，作两院制，分纯艺术和应用美术两部门。主校事者一哲学家兼著名诗人，平时不甚问校事，然其人格光辉，实不仅照耀及此学校，其于艺术与诗崭新见解，对东方美学新发展热烈讨论，且影响及世界。至如学校教学问题，则一改过去习惯，早已不用争吵方式。中外各有所主，正如普通大学之中外文系，从不闻有笑话发生。训练手纯粹恢复学徒制，训练心和眼纯粹使用导师制。加强两者综合，在一般课

目中，属于知识范围，如文学，哲学，鉴古学，民俗学，均比普通大学同类课程尤认真。（此种教授讲座，多为公私艺术机构和工业美术联合会捐赠。）属于情绪范围，各系学生均得受高级音乐训练，凡对古典伟大音乐无反应，欢喜叽叽呢呢流行曲子，写不美观美术字，取洋名，过分阿谀师长，以及私领政治津贴之学生，均认为神经有病，病在脑系，得就专科医生治疗，治疗不愈，即行开除。凡缺少对美术欣赏鉴别力，欢喜胡说并作不通文章的，无论师生均视为材分不宜艺术，由辅导处劝其转业，入政治学校宣传班或新闻广告兜揽科。不仅为学生而存在，更重要为教授导师亦有所准备，为培育艺术家之素朴单纯伟大人格和气度，每系均有收藏丰富之陈列室三所至五所。应用工艺美术院，更必然拥有实习工场若干所。学生肄业不限年数。但至早得五六年，经过极严格考验评判——对于学生之欣赏力与吸收力，尤特别注意，及格始能作美术教师。此学生就聘至任何中学教书时，属于技术与品性两方面，都必然可成为该地省市县政府一当然美术顾问。于二三年内，即可扩大其教书领域，至于市政设计各问题，并为该市县成立小而完备之博物馆。此学校经改造后，校长则已坚决辞去本职，自请改任为素描组导师，俾竟其志，因新校章规定，校长职务，在综揽全局，除于美育代宗教并改造政治问题上作各种哲学性讲演外，属于教学技术问题，均非校长所过问也。此学校新校训为——

“美术系属于全人类心智与热情之产物，为连接人类苦乐沟通人类情感一种公共遗产。对于此种珍贵遗产之谨慎保持，并发扬光大，进而贡献于人民共同享受，丰饶人民情感，或加深其生命深度，实艺术家之责任。凡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

由于过去宗教情感的隔阂，和现代政治偏见的存在，所作成不必要之矛盾对立，以及由此种种而至于‘战争’，此种驱人死亡迫人疯狂之行为，和一个有人类良心的艺术家天下一家理想，实近于悖道而驰。基于此，一个新的艺术国际组合，将进而致力于一种新世界观之形成，对人类关系重作修正。吾人实深信人类明日之新信仰建立，将于美术与科学两者综合作成之情绪理性基础上，可得到合理发展及永久稳定，吾人学校之师生，即将为此种高尚信仰之先驱与证人。”

校训字句或犹有待增减，然大旨不外此也。

为衬配此新市政，北平图书馆附近，宜有一新建文化宿舍落成，此建设不甚高矗，深得平面调和之美，而临北海。有单人房间约三百，双套房间约二百，开间大，阳光空气均极佳，设备尤完全，可供国内各学校图书馆员及休假进修教授寄住，建筑物前面宽阔之草地上有一极美丽铜像，系纪念北平图书馆长，用酬其对此公共建筑完成费神劳心者。至于此建筑物与雕刻之产生，则附有一段近于童话之神奇故事。起因似由于馆长某年于自己家中大客厅中，偶而阅《论语》至“推己及人”一语，有感于心，因发一推己及人之愿，于国内外奔走努力，募集款项，三年方能完成。因过于热心此事体重减轻约二十磅，但血压亦因之同时减下。正所谓利人者因兼利己也。完成之后，适有一知名雕刻家，长年受雇于人，为善于杀人之英雄伟人雕塑铜像，各省各市，无不有其杰作。虽发财不少，对工作实已十分厌倦，且因此成神经衰弱症，遵医生嘱北来休养，偶尔于此乳白色建筑物前草地散步，享受春冰解冻后之水面风光，适与一在此休假之学者，偶尔谈天，得知此建筑故事，因亦有感于心，自动捐献铜像

一座，配衬景物。其事既出于无报偿之热忱，故作品亦生命洋溢，为一生杰作。此建筑五百步外，复另有格局较小之房屋数所，各在兴工。试一询学生模样之青年监工，始知其一系中国博物美术协会公寓，一系故宫博物院六十位专家助手宿舍，照蓝图指示前面濒临北海大草地上，将有六组白石青铜像群，及一高约十米之石华表柱。像雕群系纪念文学，艺术，戏剧，音乐，建筑，电影六部门半世纪以来之新发展新贡献。石华表柱乃由一名诗人设计，下部环刻火焰和由火焰中进行之战争，如一种民族集团在歇司迭里亚③之痉挛中挣扎，人人面作悍恶困顿之像，虽痛苦异常，实无意义，少结果，此伏彼起，如连环之无端。末后始由六像群中诸人，努力作各种设计，将此环捶断。人民情绪观念得真正解放，亦得重新粘合。上部则刻现代史由于心智积累在文化各部门中之发展，及努力过程，象征此部门之不朽性和独立性。

假设本文作者适于砖石间晤及故宫博物院主持人，于短短对话中必即可得下述消息，内部已完全改组，不如先前机关制度，但置若干课长，职员，巡警以保管典守为事。新组织全如学校，院中收藏古器物均美术品，每部门均有四位至八位专家并助理，研究整理。各种图录报告，一年来出版者已及百三十五种，在付印者尚有七十余种。此种出版物重在真正“发扬”文化，并非“发卖”文化，远非普通拼凑之工作可比，谨严认真，亦复少见。因之所印专著图录，及照原样大特别复印之美术品，与附属工厂仿制之古代工艺美术品，分售于世界公私著名博物院，美术馆，及好事私人，均得极好评赞。且此事于故宫经济上亦得到极大鼓励。正拟商洽北平图书馆长，扩大印刷出品范围，承印北平图书木刻组一百

集，作为改组周年纪念品。又设工艺研究指导机构，有关铜玉，竹木，漆，牙，陶瓷，锦绣，地毯……各部门，自从上年与北平市新手工业协会保持触接后，仿效古典工艺出品，于国际市场上印象已一改旧观，旋因此价廉物美工艺品输出，影响其他国家经济过大，致欧洲与南美若干国家，竟起始用关税保护政策作抵制。幸得世界美术手工业协会联合抗议，始能陆续外运。出品虽丰富，惟国外美术鉴赏家，好事者，则终以能亲自来北平订货，并领略此美丽都城古典空气，方能满足需要也。报纸上刊载消息，表示欢迎，亦犹如对马歇尔魏德迈来时之诚挚动人。

或谓此美丽园中之诸大学，宜如何设计，使之与全部发展相趁？余意关于此事，当作一专论检讨，始能尽意。今则无妨试一参观实行美育代宗教学说之北京大学。

至此学校时，吾人必适如由一大花园中转人一较小而精之花圃。所有建筑四周均有广阔整齐之草地与花木，一片草地接连一片草地，课室宿舍，办公室，均分别位置于花草间。草地上有无数适合身体舒适之新靠椅，学生多于温暖阳光下读书谈诗。新式课室均经专家作各种检定，足适合于某种课程，签字认可，始能开放。课室外空气佳美阳光充足之长廊下，及课室中某一处，均有本校师生风景画及美术品悬挂陈列。此等作品，均经于世界美展全国美展得极佳评价。全学校约有五十所楼房，每所均有三五为学生专用房间及小会堂，供小团体作学术讨论，或文学图画音乐欣赏使用。彼时政治已经更新方式中转人“专家执政”制度下，其中如医生，诗人，哲学家，于此新政制体系下，均得到应得位置。党派虚伪宣传，在学校已毫无意义。宣传标语通告，均被限制缩小，

且只能于浣洗间饭堂相类地方张贴，免破坏学校整洁。（张贴者亦知于此等表现上爱护母校，不落参观人以不良印象也。）

彼时各党派在学校，恰恰如佛道二教在学校情形，遇某某事件举行活动宣传时定期讲演会必一再附带说明，备有音乐美术名茶佳点助兴，到时方有较多人数参加。即参加，依然不大把职业政治家所作预言放在心上。因人人已明白治理一个国家，必各部门工作协调，决不是三五政治家意见可收效。因此凡属空洞政治宣传常常会被听众用热烈掌声欢送下台，必至其他节目开始，或胃口消化与手足活动得其本分时，方容易恢复集会应有之空气。校长为安排“孑民先生纪念堂”在美术设计上效果，曾摆脱普通应酬及校务行政会议，邀集两建筑专家，一室内设计专家，一研究色彩情绪反应心理学专家，商讨其事。约共商讨三天，直至最后，列席诸人均感觉神经必需好好休息时，方得决定。但为了几件家具和美术品之位置，老校长还独自在大厅中走来走去，忘与另外一要人约会，忘出席某处为人证婚，只闭着一只眼睛，去反复端详此会堂模型。至纪念馆第三礼堂落成后（此学校共有七个大礼堂，各不相同），举行开幕典礼时，主讲者为一年纪二十七岁之哲学教授，讲演题目系《现代史的悲剧性及新美学的发展》，本为一论文，因为见解特别，基于前北大校长美育代宗教及乐观人生哲学，将悲剧作成一歌剧排导理想，解释社会分解并重建过程与历史发展，竟完全吻合。所作结论预言，亦经一一证实。学校为纪念此有哲思之二校长，所以特别请此青年教授来宣读此有历史贡献之论文。

凡涉及二十世纪前一半悲剧时代精神时，一般思想家均把握不住大处，只从一群统治者和反统治集团寄托希望，也

就把一切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从无人敢承认此实一文化失调教育失败之显明象征。一面系哲学贫困，一面是政治万能，悲剧因之延长扩大至于不可收拾。惟事出于人，转机在人，自小学教育中音乐，图画，游戏诸课目作比例增加，至高等考试，亦已废除党义，必考试诗学，并作美术鉴赏力测验后，上层统治者首即下一手令，“废除手令制”。由此而下，国家即逐渐进入一新的进步趋势中。如此时尚有一中国友人，怀念及余，欲邀余至中国重度一圣诞节，并允余自由选择地点者，余当应允于云南中甸与绥远伊克昭盟二地，考虑选择其一。因此时二地之大喇嘛庙或大教堂，必正举行一开明而有历史性之讲演辩论，题目或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同异》，集合国内专家约百人，听众各约万人，检讨过去此二名词之影响及得失，一为胡适之校长主席，一为梅贻琦校长主席。地属高原，气候景物均佳美明朗，于辩论时可忘却过去党政军事时代之褊狭禁忌，有助于理性爬梳者实甚多也。余殊乐意列席傍听诸专家学人高论，及实验家如……之报告，并一瞻主席之丰采云。因就传闻所悉，主持北大清华校事时之胡适之梅贻琦二博士，每遇教授会一年两度开会时，必有二三教授，作各种疲劳神经之别扭支节检讨，使得主席失去从容，列席者亦深感困顿，此种大集会，则决不至于有过去麻烦情形也。若此会于北平举行，余自以能来北平为愉快。此会本宜于一九四八举行，可测验宪法中之性能，然当时则因忌讳未能进行也。

世或有从当前社会学习过多，以余言为胡言谵语者，亦殊自然近理。因当前诸君所处之时代，与余被迫服毒耶稣被钉……及马克思写资本论，孙中山博士流亡海外时之社会状

况实大同而小异。社会状况实极恶劣，全局多从敷衍拖混中勉强支持下去，凡表示理论意见者，必异常谨慎，于专门学问知识中加入常识与世故以策安全，……做梦则为哲学家，诗人，与疯汉三者所专利。然哲学家，诗人，疯汉复越来越少，不易找寻。社会现实既如此，余于诸君自亦深表同情。惟余于北大前后二校长以美育代宗教学说及动人做梦主张，则不免更多向往之心，因二人气质中，始终犹保留哲学者之睿思，与诗人之热情。对未来能有所憧憬，此另一种人常识与世故，于此故都中，究容易培育进步种子也。

本篇最初连载于1948年1月3日、10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72、73期，署名王运通。1948年2月16日曾与作者所撰《故都新样（北平通信三）》一同发表于《知识与生活》第21期，《故》文实为将本篇“转介于读者”时所写的“引言”；但《故》文署名巴鲁爵士，本篇仍署名王运通。因此既可将本篇看作是“北平通信三”的一个组成部分，又可看作是跟《故》文并列的单篇。

1948年2月16日、3月1日，本篇又以《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北平通信之三》为题连载于《论语》第147、148期，署名改为巴鲁爵士。

据《知识与生活》本编人。

① 朱光潜教授一文　指朱光潜发表于1947年11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6期上的《苏格腊底在中国（对话）——谈中国民族性和中国文化的弱点》一文。

② 悲多汶　18世纪德国作曲家，今通译贝多芬。

③ 歇司迭里亚　英文hysteria的音译，今通译歇斯底里。

试谈艺术与文化

——北平通讯之四

余之通信此为第四次。日前曾得一陌生读者来信赐教，以为“文学革命已三十年，有种种进步事实取证。截至目前为止，伟人死丧庆吊，以及例行就职下野文电，犹藉助于空空洞洞文言，点缀空空洞洞之事功，然故都二万大学生，入学考试，作文必用语体，方能录取。入境问俗，宜加注意。阁下文体，或得改造，方能接近现代，不至于落伍也。”复得另一读者来信，则一口咬定余与塔塔木林，似二而一；且以为从文体即可了然。并敢与予作赌，真理在彼一方，决少错误。即余前所发表《怀塔塔木林》一文，亦系故作玄虚，驾空拟一西洋人塔塔画像，不可尽信。甚矣，疑他人之不老实也，至于如此，其自信之坚也，又复如彼，中国人呀！中国人呀！个人小事，犹多纠缠不清，若用此等专断唯己作风，以言治国平天下，宁不糟糕？推两位读者盛意，因作通信四。

余系于世界厌战归于和平，而“中国焦士”犹待事实作证之时，重游北平。至故都后，于诸大贤之间游处，兼作社会各方面接触交际，学习认识现实。一年以来，对世事认识，似已略有进

步。心中有一印象，即某种上层组织，多有权而无能，知应变而少信用，会捞钱而不做事，……分解圮坍，蛆腐溃烂，自心起始。三五书呆子欲作补救，如于一破袜上缝缝补补，用力虽勤，终感束手。适本刊编者，访知余与塔塔关系，救国度世，实有同心，乃邀约余写北京通信。因用塔塔文体，试为执笔。固早知文笔平板，远非塔塔表兄之隽迈幽默可比。且平时作文，即用桐城古体，间喜使用古代草字，积习既深，革除不易。排印谬误，在所不免。家中荆妇，亦常引为笑乐，认为似通非通。私意语体文自宜勤加学习，且必稍读物观简编，略作向前姿势，以应社会潮流。惟此事亦非容易，容当慢慢努力，免如其他人之"画虎"工作，具猫猫像，贻笑于大方也。故本文仍沿用半通不通之古文，或能得大庠以外真正多数读者原谅也。又巴鲁爵士与塔塔木林决为二人，读者有心有脑，略作检讨，即可知之。至如文体相似，则目前犹为一秘密，不宜完全公开。然读者试一回想余与塔塔来处，如何同受华语训练，古籍薰淘，且合作同工已若干次，被誉被毁被诬害已若干回，则亦必哑然失笑，万一将来有一机会，二人之文同印一书时，亦将承认非复一人手笔也。

余与塔塔虽同为东方迷，同受中国文化熏陶至深，性情嗜好，实略有偏差。记得塔塔去年携其美丽年青之新婚洋太太同游古都时，因钦慕北京文化空气，竟欲太太一坐八人同抬之大花轿，并雇仪仗执事一堂，锣鼓齐鸣，以作前驱。太太亦复同意。惟因开销过大，未成事实。余与拙荆，则对此等古典庄严而糜费之仪制，殊少兴趣。塔塔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国际局势，心得较多。余则对于中国文史，古典文物艺术，特别倾心，亦若具有高度兴趣，及文艺复兴梦想。若干年前，余即刻一象牙图章，作小篆字十个，文曰"美育代宗教之真实信徒"，以示对此中

国具有儒家传统精神西洋进步见解哲人之向往。

然当时此哲人及门弟子甚多，均以爱护长者自见，方以为彼等必有表现，此图章因之亦未敢示人。今始知此学说因伟大而转荒谬，实少有人研究阐发。然余则欲进而言“美育重造政治”，以补充此伟大荒谬学说。因余实深信中国问题得在内战以外求进步，求解决。问题实多端，任何进步政治新兴宗教亦难化零为整而统一其事。解决实在“政治”，易收提纲挈领之效，然决非当前办党作官人标语口号工作之所谓政治，亦非当前伟人情绪凝固，动作激烈，杀人如刈草管之所谓政治，实为用“美育”与“诗教”重造政治头脑之真正进步理想政治。此事说来话长，拟暂且保留，当另作专论检讨。

今所欲言者，余虽一美育重造政治信仰者，然洋人之种族自尊自大偏见，及中国新艺术家之艺术自卑与自高错综意识，均感缺乏。因此对于故宫博物院所宝重之朗士宁绘画，决不胡乱称许。对于十八九世纪各国传教士与公使，为逗中国皇帝开心进贡善作鸟鸣之各种自鸣钟，虽时至今日，犹能于中国伟人游览故宫时，使伟人老呆傻候至十余分钟，余亦缺少赏玩兴趣。既不甚理解中国艺术教育之彻底西化，具何进步意义；亦不甚同意用完全现实商业精神，发扬中国文化工作。因办艺术教育者，如不知艺术广泛含义，及一民族手与心与所用工具器材结合学习过程，惟侈言艺术“革命”，殊无谓也。二千年前以装备精良士气充足之三千武士，进军罗马，或可于一日间产生一大罗马帝国。此为世人所承认之史实。至于当前时代，欲以草率态度，辅以薄弱宣传，对千年优秀巨制宣战，而言所画猫猫狗狗即足代替一切，欲世人承认艺术革命成功，天下归我，不容易也。谈绘画若不知白描象生粉本摹习为何事，不知水势石录草

木人树专谱具何意义，不知种种器材性能及其使用方法，惟知用素描写生代替。谈雕刻若不知中国雕刻有何物，在雕刻项目下除金，铜，石，玉，土，竹，木，牙，漆之外，犹有多少部类可供参证取法，惟备少许外国廉价石膏复制模型充数。谈美术史缺少对中国一般艺术，具广泛认识，深湛理解，及高度鉴赏兴趣，并于学校中参考陈列室有充分准备，便于举例，惟仅仅能够用一本美术史教美术史，……此种艺术教育，业已误人子弟近三十年，不特无显著成绩，且难免有传染“无知”倾向。此无知不必取证于多方面，只看看知名之士工作表现及作风即可知之。新教育主持人，实不宜葫芦依样，必需另有计划，始能言“美育”二字也。

此事如容余贡献意见，余首先即对通信第三所引述《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一文中艺教见解，完全表示同意。即主持艺术教育者，宜为一个有哲思并具诗人气质之大师，从所假定之艺术学校新校训观点，进行一切工作，始能克当其任。因彼必透彻明白其工作之庄严性，建设性，不仅仅教人会涂抹色彩于画布上或纸张上，处分木石金玉，多一平平无奇之画家或雕刻家，实在由美育培养下一代领袖，下一代标准公民。且必用哲学或历史，以及美术史各部门成就，先来教育为人师者之“气度”，“眼光”，更重要事还是那个“灵魂”，正如得重新拂拭，洗刷，琢磨，除去由于艺教错误得来之腐败积习，和本质上之翳阴与霉斑，使其莹洁透明，如美玉纯金。（美术教育之是否有望，即全在此种人之师重造设计是否有望。）此种人材既集中，复能于设备充足环境适宜之背景中，训练学生之手与心，始足言美育，言艺教。否则将不免只是一片白话也。无艺教，尚可于祖传工艺中，保留若干优

技巧与摹仿品，有艺教，则此部门堕落破坏，尤不堪设想！记得去年参观一艺展，对陶磁图案二部门成就，真使人痛苦欲哭。此种丑恶物品尚能于故都公开展览耶？故都之大，公私收藏之富，即以明清二代青花敷彩磁器而言，随地随物可师法者无虑万千。即不中用无出息退而学东洋鬼子，亦可就小摊上检拾千百不同式样，百十种精印图录，摹仿取法，找寻无言师傅。学图案则有千种丝毛织物，无数有个性之工艺品，设计配色，可以取用。有孙行者之头脑灵活，即可千变万化，应用无穷。然此二部成绩表现，竟能对传统若无睹。主事者于另一时复公开宣称“有十个叶浅予，即为文艺复兴”。浅予仁兄，谦虚为怀，一至故都，只要稍稍浏览公私所蓄积，宁敢自信已负十分之一复兴工作？主事者之见解随便，诚可忧惧也。

又有关“发扬文化工作”，似与“发卖”工作不同，宜为通人所知。然目下则有一事，将此名词已混淆。余本欲无言，复不能已于言。

缘余于二阅月前某日，时金风振衣，木叶微脱，中国古籍月令食经所言“宜入温补”之季。因与好友四人，邀约赴故都后门外烟袋斜街附近十刹海边，鱼贯而入一小小铺子，同吃古典之烤肉。四人均系个中老手，熟习吃喝规矩。彼时各人从容不迫，搓手挽袖，并各将一脚跷起，踏于简朴结实之板凳上，作成中国民间英雄黄天霸窦尔墩入酒店姿式，连声呼唤“小二”，温酒切肉。旋各举长约一尺八寸之竹筷，挟定来自塞外之肥羊身上薄肉片，于面前圆盆熊熊炭火中，辗转翻动，尽兴而饮，尽量而吃。余亦于咪咪笑中，用同一姿式情绪，与诸友温习此鞑靼文明。（世人常言此为北平风味，

余则以为此系鞑靼文明，言非无因。曾偷瞧掌刀批割司务，与图画中之成吉思汗面貌，犹相仿佛也。）时酒肉内逼，炉火外烁，于吃喝之余，不免天上地下，谈论见闻。

友人中有治史学，正如大学近三十年习惯，平时阅看《九通表志》，能熟诵大事年月，条理清楚，对于《四部》中之子集二部，及工艺美术部门，复能狠心加以拒绝，完全不生兴趣者，忽函称老友某某近年来之文化艺术工作，贡献伟大无匹。且朗朗称引国内若干学人对此工作不同之颂词，以为佐证。此等颂词曾反复著录于广告上，早即寓目。余虽不甚相信近世学人对于本国艺术之鉴赏力，（因艺术家即甚多缺少此基本鉴赏力者，）然因老友文化工作，余实最先即感同意，其用力之勤，及放手作事处，亦备致敬意。且因面前余友平日为人之诚悫，兼已各有三分酒意，明知事经争论，必对立至盟神发誓，无从和解。因默然微笑，不作他语。（读者诸君，一生中想亦必有此经验若干次，即听一外行作行语，虽胡说八道，无从自休，终能忍受下去，不仅不以为悔，反若一种享受也。余则已成习惯多日，如此作来，毫不勉强。）

不意隔墙有耳，于时忽闻邻座一佝偻老人，面目枯瘦如一深秋之栝蒌，操纯粹北京官语，与彼同桌边人，亦提及此事。同一事件，印象则大不相侔。彼意"日本侵占华北八年，军人专横残忍，奴役人民，罪无可逭。然少数学人，则谦虚诚笃，埋头努力，编印整理有关中国文物艺术图录，多至二千余种，有目可稽。各有专述，门类谨严。商讨得失，发现新玩意儿尤多。即同是一书，前后数版，内容订正便不少。虽随处有错误，但普及功劳，有助于学人研究处，可以目睹？和平之后，有人用重价收购这类图籍，重行编印。此本美事，未可厚非。惟题解谬误，鲜

有更正，艺术识鉴，稍稍可疑。京市书估传述，引为笑话。学人无语，只能皱眉。以'发卖'之事而云'发扬'，置中研院，故宫博物院，北平图书馆，中国营造学社，以收藏丰富工作态度谨严著闻于世之专家通人工作于何地？不意有关此一部分工作，中国亦居然有人接收，毁去本来完整，改作新兴生产事业，且有学人从而赞和也。中国学人之于文化艺术，识见态度如此，甚可惋惜。欲真正发扬，恐还得经若干年，用一较佳较庄重态度方可望！……"

余闻此语，深为不平。因趁酒兴，如一待斗公鸡，直逼邻座。并盛气峻颜，与之互通姓名，连声请教。聆教结果，始知此佝偻老人，乃是岛上本籍教授，此道权威，经特许留用于平中某大库者。另一人，则为中央某××专家。余因获友热忱之盛气，至此不免为之而夺。趁彼二人讨论华北战事发展，怀念及大同云冈，洛阳龙门，山西五台赵城，热河行宫，诸古迹毁残于无知武士操纵无情炮火之种种情景，叹息默想之际，抽空极极逃出小店铺，始不为此二人反质所窘倒。至其他四友，其一历史家，犹强词宣称"此事系一待考据问题。材料既为中国所自有，岛夷就地取材研究楚弓楚得，重作处分，何预他人事，更何容战败者置喙？"其三系理工学人，与吾友复未识面，既不必为此事分谤，亦不用为他人护短，故犹能从容结账而出。然四人与余遇于烟袋斜街口行人道前时，终不免颜有余作！窦尔墩之姿式，亦一变而为跑龙套马前败卒。余心知此事已成若干有知识学人一种良心担负，又无从与老友商讨，故附于本文之末。余之言此真实故事，实具深意，措词虽不软和，用心实比随和凑趣帮场者严正。世不乏解人，宜有会于心，有关此等工作，值得谨慎从事，各方咨询，尽可能求教于各方面专家通人，并处处不

忘前人努力开路之功，表示谢意，免落人笑话。若世无解人，则为完全费词矣。

综计余一生三十年来种种，费词之事亦多矣。中国许多事均若预见洞烛，然言及时则殊少为人正视。即以对“艺术重造政治”而言，亦均早于二十年前反复道及，以为“当世伟人若于童齿时图工唱游得分较多，当前杀人如刈草菅之痛苦局面亦大不同”。粗心看来，或以为滑稽幽默。惜世无好事者，当作《推背图》《烧饼歌》[①]研究，另有发明；治艺术者对艺术之无知，既不下于治史学人，一般年青人，又惟用“信仰”代替“思想”与“学习”，落得省事。中国问题，后来便自然只能交给三五伟人，用战争推进一切创造一切矣。然所能创造，除中国人民之悲惨命运，并将此不美事实转责于战败者一方，一时实亦无其他奇迹可望也。越觉得中国可爱者，亦必越觉得中国可哀。因任何民族，决无将人民用饥饿与杀戮两种方式加以收拾，剩下一群有钱有势伟人，而能立足于世界也。

本篇曾分别发表于 1948 年 3 月 1 日《知识与生活》第 22 期，4 月 1 日《论语》半月刊第 150 期，5 月 9 日北平《平明日报·星期艺文》，均署名巴鲁爵士。

据《论语》本编人。

①《推背图》《烧饼歌》　《推背图》是一种妄诞迷信的图册，《宋史·艺人志》列为五行家所著，未题撰者，岳珂《桯史》以为唐代李淳风撰。《烧饼歌》相传为明代刘基（伯温）所撰，旧时常附刊于《推背图》书后，因此常被看成《推背图》的一部分。

迎接秋天

——北平通信

读者诸君，余之通信与诸君疏阔，约计时日，已及半年。中国有古话说，“人生上寿百年”，比较下虽仅仅不过二百分之一，然而近半年来世界变化实在甚大。即说中国事情，在被动和自动中，内战继续进行，已作到杀人千万纪录。爱和平之中华民族，各地中山纪念堂，犹保留开国伟人孙中山博士“和平奋斗救中国”格言。不悉何故，竟若命定不可避免，将和平完全放弃。比如博弈争道，主事人均取决绝果敢英勇无匹之态度，奔赴而前。神经紧韧，实为历史所仅见。而知识充足性情柔和之学人，于是不能不喑哑沉默，无话好说。而仅仅守住上课办事责任，于等待战事自然完结，与政府尊重学术，两种人天境界中徘徊游移。岁月如流，时序代谢，夏去秋来，抢秋之战火又复燃遍各地。圣人不仁，百姓刍狗。吾深知若干学人，虽勉强心硬，作为事不干己，不便过问状态，然心中终必郁郁不舒，特具深忧也。

孔夫子云，“登高望远，使人心悲”。屈原则谓“登大坟抒吾忧心”。或增悲，或散愁，贤哲情形本不尽相同。惟登高

所见必甚广大，目睹原隰莽莽，禾黍油油，乱坟荒冢与村落篱树点缀其间，将憬然深悟生灭之理，生命个体至微小短促，历史则绵延不尽。帝王蝼蚁，生存时各有界限，不能混淆，到末了却同归于尽，成尘成土。而土地一片，复永远宜有青春生命，耕耘生聚其间。前一代若领导得人，高明博大，远见深思，心公而慈，则下一代人民必健康活泼，幸福乐生；前一代若治理无方权谲用术，……则下一代人民必萎悴穷困，堕落不振。中国尚有一句旧话说，“三十年为一世”，看看当前，即可知中国此一世，统治方式实大有毛病，作官作吏者对不起国家民族处，未免多多。用当前推测未来，又可知目前战火焚灼，戡乱益乱，留给下一代实一分如何沉重担负也。

余今夏诚幸运，有一机会，早晚均可至一巍巍高处，放眼临眺故都市郊景物。每闻西山背后远处炮声断续，与近在脚下之昆明池大群青年学生，兵士于水嬉中欢呼戏笑，两种声音交错，感慨良深。同为中国人，在彼则仇恨流血，若不共戴天，在此则无逆无忤，各尽其兴。谁近本性？谁为安排？老子生于春秋战国之际，即曾慨乎言之，“圣人不死”，“大盗窃国”，以古例今，若合符契。个人生命融接于此东方历史过去，当前，未来感兴中，不免茫然若失，亦不禁作圣哲临水之伤叹；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窃意中国有光辉之文化思想，能延续至三千年，必有理由，目下火与血之悲剧，亦有理由，或尚待有心人重作检讨布置也。

昨阅报纸，载称有著名学者若干人，集会于藏有玉佛之北海团城，商讨为孔夫子做二千五百年大寿。为古人祝寿，余与长年沉默之玉佛，将完全采取同一态度，闭口无言，然

余实欲向诸学者一提，孔夫子一生栖栖惶惶，或在陈绝粮，或人匡被困，直至于悲获麟为止，只有几件事记罣在心，即道之不行，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喜，不善不能改。吾人对于此圣哲若具诚实尊敬，与其作文章祝寿，开会讲演，反不如将其六艺教学原则，略作实验印证，或较有裨益于后来。孔夫子是一切实际之人，纪念方法，能切实际方有意义也。

目下大庠中“礼”似不甚发达，值得注意。“乐”则几几乎完全缺如，或奏时亦不甚好听。若干学校，师生即不会唱校歌，且亦从不闻有一真正动人情感引起崇高印象之校歌产生。“射”则只间或可闻政治暗箭流注，中立者转易受伤，大违原来寓教于戏乐之本意。“御”则除无补实际之×训外，有时转为收买，以人为马，亦失古训。“书”若指写字作画而言，师生水准均不甚高。若指书本，图书室并无人看亦无多价值之古板书，堆积太多，编目工作即仿佛永不完毕，需要看之现代问题书，又嫌太少。日前某大学国学系学人集会，尚争誉传统成功。其实二十年来，试屈指一计，即可知维持传统，如何大不经济！且新近千里边远来学者，殊非对传统有何倾心。学人若尚缺少自知之明，不亟加真正改造，三五年内实有无学生注册趋势。“数”非吾所知，好在凡此一切，人人心中当自有数也。虽时移代易，事不尽同，然大庠新空气如何改造，方能与孔夫子真精神衔接，诚为学者费思考之问题。如徒然办寿，将为通人批评佞古而忽今，舍近以求远。即在学校，亦不易成功也。

又“民主与科学”一名辞，近年来在学校中广泛使用，明朗有力。民主之来，吾不知必由何种方式，始云十全十美。惟争取比指派终近于真实，则可断言。科学余因性之所近，

略能将名辞含义诠释。科学者，理性与明知之学问也。私意科学教育已提倡三十年，目下实在亦有问题。科学重分工而合作，余固知之，然虽分工至细，中国公民道德则宜为人所同具。今习科学者常有避至外国教大学一年级普通课为荣幸，不知此种打算，洋人实亦看不起也。

此等事多忌讳，易误会，余不拟多谈。且以一近事作话题，亦可知吾国科学教育尚多缺憾。读者诸君如记忆力不太坏，必记忆及月前随飞碟谣传之后，有一四川杨妹绝食新闻，盛传远近，浪费国家新闻纸张甚多。当国内若干医师不加思考，一股正经，集议研究办法时，竟另有一女性专门医师，宣言“不食之事，系靠日光化合作用，可以办到”。余于专家素极崇拜，至此不无迷惑。觉得近三十年医事教育，课程上殊有问题。或有数种专门课程，未能开讲，一是“女子性心里之补偿作用与社会关系”，一是“社会神经病之传染及预防”。如曾上过前一课，教授又足当其任，则杨妹不食之故事，正如清水碗中看螺丝一枚，入目了然。杨妹事与生理关系不多，实一心理学上情绪补偿问题。杨妹必一贫血内向型女子，发育不良，具丫头像，平时生活被人疏忽；用绝食引人注意，亦事理之常。其监护人，则拟师河伯娶妇故智，求小有好处。病人与其监护人，宜同入神经病院受休养治疗，给以饮食，善言安抚，参以潘光旦、萧孝荣二教授之分析报告，结果即可完全明白。（孔夫子见萍实羭羊，均能照平常态度处之，见怪不怪，博闻多识故也[1]。）如曾上后一课，则宜有人提议请政府通过一新法案，凡公私报纸，对此事有煊染过甚之记载，引起“世人相惊以伯有”作用者，发行人宜罚

洋一分，记者宜罚正楷抄录古诗十次，作为业务过失荣誉惩罚。有关罚款，且必责以缴纳现货，使之明白一分洋钱一分货，乃是一个现实问题。因物价变动过剧，官吏豪门中容有藏金万万永不没收者，至于平民，此一分钱即登报悬赏征求，尚不易得。又中国二千年前古诗，早已说过，服药求仙，实无可望，世安有人比神仙还高一着棋，天然不吃不喝能活下去之理？加以处罚，处罚中即兼寓教育意味。惟如因顾全报纸信誉，不服判决，报方亦可依法上诉，将责任委诸政府首脑或行踪不定之毛泽东氏。引述理由，则为“诸事均由内战而起。若无战事，各地交通无阻，物资对流，将有生产过剩现象，报纸亦必天天刊载某某食品公司主办消化竞赛纪事，且满载消食方广告，那有空余篇幅为此神经不健全之杨妹作义务宣传，让世界学人耻笑医师不学？”因有关者大，不是儿戏，为求处分公平，此种事始需要组织特种法庭审判。以余私意，中国如真行宪进步，政府必败诉无疑。世有解人，将承认余之见解，世无解人，则余言不免竟成无趣幽默矣。

解人不多，余深知之。即在号称学者渊薮之故都，恐亦无人敢对余之意见表示同意。然余则深信余之见解，必为三十年后人所追忆，所重视。因彼时社会对于“人”的知识，或较丰富，政府大半事务，均已有各种科学家参加，凡有措施，必用理性裁制感情，引导国家民族渐渐走上轨道。个人或党派自私，已公认为一种有害民族健康严重病症。且从政人员，均早已经施用一种预防注射，从此贪污、无能、及其他恶劣品质，恰如热带传染病，即偶然发现，仍不至于具传染性如目下之普遍也。

世如有人，此时庄言质余以未来进步所经过程。其庄重

程度，似目下行宪宣言认真，余亦将庄重十分，提供以一二线索。余意以研究“人”出发之“人性科学”，在最近将来必成为一种世界所关心学问，其重要发现引人注意处，必不下于原子能。而一切发现与发明，则将完全公开，只闻甘心落后国家统治者拒绝接受，决无新兴国家间谍盗取之事。甘心落后国家，彼时为拒绝此有关人类进步原则及事实，可能亦将用尽种种心思，制定许多不正当法律，对青年人此种新信仰加以打击、陷害、并造制各式谣言诋毁曲解。惟进步事实，则终必将一无知而自私，残忍而腐败之统治权推翻！余特别欲点醒读者，即今之所言，乃另一时另一种事件，设有人欲陷以当前特种刑庭法律，传讯巴鲁爵士，余必拒绝出席。

读者诸君，或有与余抱同一见解信仰，对人类进步事实始终未绝望，且相信中国为一真正优秀民族者，余将与之拍掌立约，此后必共同不许灰心，永远乐观，对于一切进步改革理想，加以拥护赞助。对国内和平希望，更无条件支持。世界上任何一种民族，任何一种历史，固无不用文字写得明明白白：内争过久耗损国家元气，而无效率统制迟早必圮坍……余尚有一种见解，即战争若如此进行下去，损失者终为人民，战争若能于相当情势下，改在会场进行，则人民稍稍保全，而不进步之统治始能转换。……余之爵位可以放弃，此信念雅不拟放弃。

迩来金风始振，木叶微脱，华北秋意，已日益加深。故都学人于苦闷之余，到时上西山玩赏红叶者，必大有其人。余以为宜有深心学人，对秋风逼来涂染红紫之草木以外，别有会心，知所玩味，知所警惧。上寿百年不易得，中寿七十

名古稀，即不为一己设想，亦宜为儿女孙曾稍稍留意；如何放弃旁观习惯，与青年学生合作，挣扎努力，促成一新局面，使下一代人活于此河山壮丽美好肥沃之土地上，稍稍合理幸福，终必比较如今不声不响，萎悴惨愁，坐待国家成为一片火血之海，见得更像一个具发展性，有生命力，头脑清明知识分子也。

顷者表兄塔塔木林之《红毛长谈》，已由观察社集印出版，远道寄余，读之如对故人。若干预言，幸而不中，若干预言，又不幸而中。正言若反，语支蔓而心纯直，唯余知之。因书末并节录余一通信，令余觉悟，犹有一支秃笔在握。此通信赖得继续。

余爱中国不下于人，虽不能作支那通，亦略知中国近事。余友之一曾言，中国问题固甚多，近二十年病症，则用“官僚万能而哲学贫困”数语概括之。“万能”有作“无能”解者。凡事涉及官僚，余不欲妄肆讥评。哲学贫困则余殊难同意。大庠中哲学家殊不少。所贫困者，恐为一种明朗煌煌单纯有力而又具有否定强权之健康进步思想。有关社会进步理想之追求，哲学家多如有意袖手，不敢过问；且常常表示此事与哲学家无关。因之一切行进指标，自不免由其他方面代替。有关思想运动，二十年前本来均为大小书生同赴并趋，殊少违忤，步法有快慢，恰恰如一乐队，各有所司，亦各有所事。然近五年来，大小乐器在合奏中总若不甚合拍。似各为一政治性名辞所淆乱，即有关学习，必一反旧例，“老宜学少”。此云名辞正确，必携带方能前进；彼云或系错觉，到困难时可莫要人支援。此名辞流行所作成结果，好处未见，毛

病先来，老少分化，因之授人以隙，便于作各个击破计也。学人中略有性格者，不左不右，自然即如水上之油，或敛聚各成一小点，不相粘附，独具圆明。或扩散成薄膜，放幻美光彩，少真实性。余意此事影响实非轻细。因此一代或尚可在游离自足光景中，将生命贡献于学术，至下一代，为之奈何？此时诚需要一种崭新人生哲学，来好好使此多数得重新分工合作，各就地位，各执乐器，各按曲谱，合奏一新中国进行曲。此乐曲在时间中慢慢发展，既能把握大处，又不忽略细节，初初奏来，总不会如何引人注意。或难免如在先农坛附近荒地演奏悲多汶大乐，不可望将天桥有棚座之摄跤场中观众兴趣完全转移。惟交响乐好处全在“发展”，冬去春来，层冰解冻，溪流潺湲，各处均有鸟语花香，即战火焚灼之土地，亦将有青草生长，掩盖去人类残忍与不知所作成之种种，见出盎然生意。乐曲设于此际进行到移情忘我地步，余敢言惯于使用硬功夫之人，彼时容当承认中国历史实不宜全用战争点缀。有关民族真正解放，由和平繁荣追求，比强迫限制为易。由通力合作追求，比独立探讨为易。惟音乐虽能使人类情感谐和，必乐曲、乐队、乐人、三者齐备而又合作方可期望见出效果。余私意诚深深盼望此乐队之组织，能包罗广大。读者须知，余言如滑稽，殊沉痛。余非乐队中人，音乐知识本不甚高，且对作曲兴趣特少，惟实具一种热忱，使中国悲剧场面略换，专以为中国进步作种种服务也。

至于余之个人愿望，亦可一言。中国和平时，除将此种通信陆续投寄国内报刊与读者对面，实乐意常至故宫陈列室，欣赏名陶佳瓷，且从容不迫，向年青专家请教，不至如日昨一次经验之狼狈。缘余日昨与诸学者参加博物馆协会，饱聆

通人专家讨论国宝问题，会后受招待至武英殿观赏，竟被忙于关门之警士，用逗小孩口气连声催促："赶快去前面看西洋钟！"彼时与余同在一处计五人，均为对西洋钟毫无兴趣者。旋闻前面叮叮冬冬响声不绝，见一洋装绅士，一鬈发士女，二中山装同志，奔赴而前。欢喜赞叹，如往法会。余因之觉悟伟人参观故宫时，于西洋钟面前呆候廿分钟不以为苦事，必有原由。乃益深信中国宜有一种新思想于时代中产生。否则再过二十年，故宫博物院可能还只有巡警作此等事，别无改进事实。且参观故宫者，除看西洋钟外，对其他亦别无兴趣。读者诸君，余意如此中国实相当可怕，相当可怕。

世有解人，宜与余具同感；世无解人，余之通信为废话矣。

九月廿一日故都

本篇发表于1948年10月16日《论语》第163期，署名巴鲁爵士。

① 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夫子因为博闻多识，所以即便看见"萍实"、"羵羊"这类看似怪异的事物，也能保持冷静的态度，不大惊小怪。萍实，即萍蓬草的果实。相传为楚昭王渡江得之，其大如斗，怪而使聘问孔子，孔子令剖而食之，甘如饴蜜。事见《说苑·辨物》。"羵羊"，土中怪羊。孔子曾听当时人说：木石水土均各有怪，土怪曰羵羊。相传鲁季桓子打井得缶，缶中有一怪物，以为是狗，使问于孔子，孔子告之非狗，而为羵羊，其不分雌雄。羵羊，亦写作坟羊、贲羊。事见《国语》、《说苑》、《史记·孔子世家》。

跑龙套

跑龙套

PAOLONGTAO

本集为新编，集名取自其中一篇名。收杂文7篇，其中6篇曾于1950年6月～1983年春发表，另一篇《一个长会的发言稿》为作者生前未发表稿首次入编1992年12月岳麓书社出版的《沈从文别集·贵生集》。

参加北京市文代会筹备会以后

我的感想——我的检讨

在北京市文代会发起人大会上，听到许多报告，大家对于首都文艺工作者团结与合作，扩大五四文学运动的优秀传统，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学习为人民服务，表示的希望、意见都极恳切。工人作家代表林士良同志，致辞简单直率，更有深刻印象。

从国家全面发展看问题，人民文化的普及，旧的改造，新的创造，需要实在特别迫切。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把文学极素朴的引归本色，使文艺面向人民，面向工农兵，由普及而提高，这个伟大文件不仅影响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便对共同纲领的执行，也打下了文化的基础。因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基础，如不建立于全中国广大人民思想观念情绪精力的解放上，是不会坚固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如不建立于领导阶级中的劳动人民政治意识的高度觉醒，促进国家生产达到工业化程度，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希望实现的。国内文艺工作者，能结束了一切过去宗派主义作成的不健全的隔离，和自由主义反人民的倾向，共同守住这个新原则，

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用工作推进国家建设和进步，是势所当然。首都文艺工作者，更应当站在第一线上，严肃的把握工作，担当起这个新任务。

至于检讨个人工作，二十年来用笔，实和人民的要求与社会发展日益游离，越来越远，笔下越写也就越零乱空疏，失去本来的健康。小说文字由明朗转成晦涩，体裁格局虽作过些不同试验，内容和现实社会既脱离，自然无助无益于时代。且由负气自大而孤立，在好些问题上，如对土改问题，对民族形式问题，都有过些似是而非的抽象意见，或见小失大，或持一概全，错误是显然的。因倍觉有重新学习必要，目前在革大[1]，凡事就完全如一个小学生。过些日子还希望能够到生产工厂去，好好向劳动工人同志学习。

也可能因体力限制，学习虽不落后，进步究竟不多。因头脑和身体，多年来在工作上的孤立消耗现象，已见出不大济事。一场大病之后更难回复本来。不过想想近三十年万千革命者反帝反封建，为国家争自由，为人民争民主，通过了多少困难，不辞任何牺牲，才把一个新国家基础奠定。个人即再不中用，也应当来重新锻炼自己，好好的学做一个人民的勤务员。

如有人问我，到革大学了些什么？我应当说，由于本人政治水平不高，进步实看不出。但学明白人在群体生活中方能健康。从人和人的新的关系上，和学习马恩列斯及毛泽东思想有发展性的学习方式上，也从各级干部同志生活严肃工作刻苦表现上，已稍稍认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重要性，用一个单纯老实的态度，来检讨自己，认为过去工作脱离人民，有错误，持从学习中改正，方宜重新用笔，十分自

然。国家真正的新生，是由万万千千劳动人民，沉默无言的工作着，充满虔敬的信仰，无私忘我、不断学习、不断修正错误，各在分工合作意义上，克服迎面而来的种种困难，完成工作任务的。这个推动人类历史的工作行列，其中有工农兵，也有科学家和技术家，和一切企业中在岗位上尽职的无名英雄。学习靠拢人民，我首先得把工作态度向他们看齐，学会沉默归队。

五月廿六日北京西苑

本篇发表于1950年6月12日《光明日报》，署名沈从文。

① 革大　即当时设在北京西苑的中央（华北）革命大学。写此文时作者正在中央革命大学研究班学习。

沈从文的发言

这几天，在大会中我听过了各部门负责首长的报告，我学习了一生没有学习到的许多事情。内中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报告，和郭沫若院长关于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都特别提到祖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结成一体的光荣责任，和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迫切问题。我理会到这个责任的光荣，同时也明白责任的重大。从我自己说起，就是必需更好的自我改造，才够得上做个人民时代的知识分子。照我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六年以来，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社会面貌日新月异，一切事业能够飞跃的向社会主义迈进，完全是由于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正确的领导得到的。是由于党和毛主席的教育、鼓舞，动员了全国六亿双勤劳的手，和一切能够深思力学的头脑，在各种不同工作岗位上，抱着一种崭新的态度，指向一个共同远大的目标，日以继夜热情忘我劳动的结果。贡献特别大的，应当数工人、农民和战士，以及各个生产建设战线上的组织领导者

和工作者。知识分子，虽然也尽了一分力量，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完全发挥出他们的长处，同时也还不容易完全去掉本来的弱点，正如周总理报告中所分析的情形。社会新形势要求知识分子明天能够更好的配合国家建设需要，把个人工作纳入国家总计划中，和工人农民结成坚固的联盟，把祖国历史推向前进。在这个新的庄严课题下，旧知识分子如何进一步改造，变成一个新知识分子，实在是一个迫切问题。

我是个旧知识分子，过去许多年来曾经从事小说写作，本来来自人民队伍中，由于工作小有收获，就自高自大，正和农民中的单干户一样，什么都不加人，远离人民群众的斗争，思想意识因此逐渐被半殖民地化的资产阶级观点腐蚀俘虏，写作态度和倾向，越来越要不得，使得许多年青读者，发生逃避现实安于现状的坏影响。我却空守着一种虚伪的自由主义，以为绝不受蒋介石利用。事实上缺少阶级立场，不能分清敌我的写作态度和作品倾向，就最适宜于点缀蒋介石回光返照的政权，对人民事业没有丝毫好处。北京解放，才把我从空头作家的错误发展中挽救过来。

解放后，我的工作转到文物研究方面。虽然在党的长期教育帮助和鼓励下，学习用新的工作来为人民服务，但是由于搞的是物质文化发展史中的工艺部门，牵涉问题格外多，我的政治思想水平既低，史部学根柢又浅，单干户的老毛病也还未去尽，因此工作总是周折多，问题多，经不住检验。能完成的工作远远落后于社会要求。听过周总理对于知识分子情况数字分析后，我虽然主观愿望要在前边一点，客观事实可能还会落在百分之十几那个数字内。引起我警惕和惭愧。

过去三十年来，我是不相信有个什么政党能够把中国一下搞好的。我和许多人一样，又极其幼稚胡涂的认为中国如有个英美式的议会民主制度，一大群科学家专家分布在各项工作中，就可望慢慢的把中国纳入正轨。对于蒋介石独裁腐败透顶的政权，虽预料它必然要倒坍，但是用什么政权来代替，从没认真分析考虑过。提到“人民解放”和“个人思想改造”，我都难于理解。直到全国真的解放，六年以来，从一件一件事情看去，并参加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我才日益明白过去认识上的错误。正因为解放，才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百余年的恶势力连根拔去，才加快结束了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全体农民才从封建地主压迫下翻过身来，才有今天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和全国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来临。从此以后，一切对国家建设有用的聪明才智，才有机会和人民劳动紧密结合起来，为全体人民长远利益发挥出最大的效率。这就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权，才能够把蕴藏在中国人民内部无限丰富的智慧和创造热情，全部解放出来，纳入国家计划中，运用到科学研究和工业建设上去，实现国家发展的远景，对世界和平、人类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今天的社会，每一种工作都和人民全体的努力发生密切联系，每一方面的新成就都鼓励并帮助推动其他工作的前进，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就这样领导中国人民把中国历史带入到一个光耀辉煌的道路上去。我相信了共产党。我一定要好好的向优秀党员看齐，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联系业务实践，并且用郭沫若院长报告中提起的三省吾

身的方法，经常检查自己，努力作一个毛泽东时代的新知识分子，把学到的一切有用知识，全部贡献给国家。如果体力许可，还要努力恢复我荒废已久的笔，来讴歌赞美新的时代、新的国家和新的人民。

本篇发表于1956年2月8日《光明日报》，是作者在全国政协第二届会议上的发言。

从龙谈起

来我国访问的国际朋友，在游览了我国的名胜古迹之后，常常会好奇地发问："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龙？龙代表神秘，还是象征权威？"这个问题真不好回答，事实上龙只代表了一个死去了的封建，并没有丝毫神秘。但是为什么在新的绸缎上、彩绘上、雕刻上还不断地出现龙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如何学习民族遗产的问题。

目前我国纺织品中的印染图案，对于民族遗产的运用，在实践中有一定的成绩，但部分设计工作还是走了弯路，制出的印花布费料费工，还不好看。由于设计思想不够明确，向传统学习也就成了问题。譬如因为齐白石老人螃蟹画得好看，印花布也用螃蟹作花纹。因为故宫陈列了许多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于是十四五岁的女学生的新裙子边沿也发现了三千年前的夔龙纹。还有被面图案设计，把许多条张牙舞爪的龙安排上去，触目惊心，还不如圈圈点点的图案看来比较舒服。这就是直到今天圈圈点点的印花布，还占有广大市场的原因。

其实，也难怪花布设计人员，他们走进故宫去，到处所见都是龙，再走到有大屋顶的新建筑物中去，也会在梁栋上发现龙；他们转到一个戏院里去看京戏或是地方戏，不管是文臣武将，身上穿的，头上戴的，肩上背的，和小兵小将手里拿的，又都是大龙小龙，因此我们怎么能责备丝绸花布设计者不受影响，不把龙当作民族形式中最好最美的东西呢？如果问一问设计工作者们，为什么要画龙，龙有什么美，他们一定回答不出来，然而依旧还是要画下去，只为的是“习惯”，不用它倒像是有意拒绝民族遗产似的。

我国艺术部门的遗产的确是丰富多彩的，但如果无所选择地接受，或只追求表面形式，把握不住本质，就会走弯路，浪费人力物力。因此，在学习接受民族遗产之前，必须首先了解什么是人民真正喜欢的东西，所以对花布设计人员来说，深入生活是最重要不过的。

本篇发表于1956年4月14日《大公报》，署名沈从文。

跑　龙　套

近年来，社会上各处都把“专家”名称特别提出，表示尊重。知识多，责任多，值得尊重。我为避免滥竽充数的误会，常自称是个“跑龙套”脚色。我欢喜这个名分，除略带自嘲，还感到它庄严的一面。因为循名求实，新的国家有许多部门许多事情，属于特殊技术性的，固然要靠专家才能解决。可是此外还有更多近于杂务的事情，还待跑龙套的人去热心参预才可望把工作推进或改善。一个跑龙套角色，他的待遇远不如专家，他的工作却可能比专家还麻烦些、沉重些。

跑龙套在戏台上像是个无固定任务角色，姓名通常不上海报，虽然每一出戏文中大将或砦主出场，他都得前台露面打几个转，而且要严肃认真，不言不笑，凡事照规矩行动，随后才笔直恭敬的分站两旁，等待主角出场。看戏的常不把这种角色放在眼里，记在心上，他自己一举一动可不儿戏。到作战时，他虽然也可持刀弄棒，在台上砍杀一阵，腰腿劲实本领好的，还可在前台连翻几个旋风跟斗，或来个鲤鱼打

挺，鹞子翻身，赢得台下观众连串掌声。不过戏剧照规矩安排，到头来终究得让元帅砦主一个一个当场放翻！跑龙套另外还得有一份本事，即永远是配角的配角，却各样都得懂，一切看前台需要，可以备数补缺，才不至于使得本戏提调临时手脚忙乱。一般要求一个戏剧主角，固然必需声容并茂，才能吸引观众，而对于配角唱做失格走板，也不轻易放过。一个好的跑龙套角色，从全局看，作用值得重估。就目前戏剧情况说，虽有了改进，还不大够。

我对于京戏，简直是个外行，解放前一年难得看上三五次，解放后机会多了些，还是并不懂戏。虽然极小时就欢喜站在有牵牛花式大喇叭的留声机前边，饱听过谭叫天、陈德林、孙菊仙、小达子、杨小楼……等流行唱片，似乎预先已有过一些训练。顽童时代也净逃学去看野台戏。到北京来资格还是极差。全国人都说是“看戏”，唯有北京说“听戏”，二十年前你说去“看戏”，还将当作笑谈，肯定你是外行。京戏必用耳听，有个半世纪前故事可以作例：清末民初有那么一个真懂艺术的戏迷，上“三庆”听谭老板[1]的戏时，不问寒暑，每戏必到，但座位远近却因戏而不同。到老谭戏一落腔，就把预先藏在袖子里两个小小棉花球，谨谨慎慎取出来，塞住耳朵，屏声静气，躬身退席。用意是把老谭那点味儿好好保留在大脑中，免得被下场锣鼓人声冲淡！这才真正是老谭难得的知音，演员听众各有千秋！故事虽极生动，我还是觉得这对当前今后京戏的提高和改进，并无什么好影响。因为老谭不出世，这种观众也不易培养。至于一般观众，居多是在近八年内由全国四面八方而来，不论是学生还是工农兵，

到戏园子来，大致还是准备眼耳并用，不能如老内行有修养。对于个人在台边一唱半天的某种剧目，即或唱工再好，也不免令人起疲乏感。何况有时还腔调平凡陈腐。最不上劲的，是某种名角的新腔。通常是一个人摇着头满得意的唱下去，曼声长引，转腔换调时，逼得喉咙紧紧的，上气不接下气，好像孩子比赛似的，看谁气长谁就算本事高明。他本人除了唱也似乎无戏可作，手足身段都是静止的，台上一大群跑龙套，更是无戏可作，多站在那里睡意朦胧的打盹，只让主角一人拚命。这种单调唱辞的延长，和沉闷的空气的感染，使得观众中不可免也有逐渐同梦周公势。这种感染催眠情形，是观众对艺术的无知，还是台上的表演过于沉闷单调，似乎值得商讨。有朋友说，旧戏主角占特别地位，在这一点上，是“主角突出”。我以为如突出到主角声嘶力竭，而台上下到催眠程度，是否反而形成一种脱离群众的典型，还是值得商讨。

京戏中有很多好戏，其中一部分过于重视主角唱做，忽略助手作用，观众有意见虽保留不言，但是却从另外一种反应测验得知。即近年来地方戏到京演出，几几乎得到普遍的成功。川戏自不待言。此外湘、粤、徽、赣、闽、晋、豫，几几乎都能给观众一种好印象。地方戏不同于京戏，主要就是凡上台的生旦净丑，身分虽不相同，都有戏可做。这是中国戏剧真正老规矩，从元明杂剧本子上也可看得出来。虽属纯粹配角，也要让他适当发挥作用，共同形成一个总体印象。地方古典戏的编导者，都懂得这一点。比较起来，京戏倒并不是保守，而略有冒进。至于京戏打乱了旧规矩，特别重视

名角制，可能受两种影响：前一段和晚清宫廷贵族爱好要求相关，次一段和辛亥以来姚茫父、罗瘿公[2]诸名流为编改脚本有关。这么一来，对诸名艺员而言，为主角突出，可得到充分发挥长处的机会。但是对全个京戏而言，就显然失去了整体调协作用。和地方戏比较，人材锻炼培养也大不相同：地方戏安排角色，从不抹杀一切演员的长处，演员各得其所，新陈代谢之际，生旦净丑不愁接班无人。京戏安排角色，只成就三五名人，其他比较忽略，名人一经凋谢，不免全班解体，难以为继。京戏有危机在此，需要正视。二十年谈京戏改良，我还听到一个京戏正宗大专家说过：京戏有京戏老规矩，不能随便更动（曾举例许多）。我们说京戏并不老，唱法服装都不老，他不承认。事实上随同戏台条件不同，什么都在变。出将入相的二门，当时认为绝不能取消的，一般都不能不取消，只有傀儡戏不变动。检场的今昔也大不相同，二十年前我们还可见到梅兰芳先生演戏，半当中转过面去还有人奉茶。池子里茶房彼此从空中飞掷滚热手巾，从外州县初来的人，一面觉得惊奇，一面不免老担心会落到自己头上。有好些戏园子当时还男女分座，说是免得“有伤风化”。改动旧规矩最多的或者还数梅程二名演员，因为戏本就多是新编的，照老一辈说来，也是“不古不今”。证明京戏改进并非不可能，因为环境条件通通在变。京戏在改进工作中曾经起过带头作用，也发生过麻烦。目前问题就还待有心人从深一层注注意，向真正的古典戏取法，地方戏取法，肯虚心客观有极大好处。例如把凡是上台出场的角色，都给以活动表演的机会，不要再照近五十年办法，不是傻站就是翻斤斗，京戏

将面目一新。即以梅先生著名的《贵妃醉酒》一戏为例，几个宫女健康活泼，年青貌美，（我指的是在长沙演出，江苏省京剧团配演的几位，）听她们如傻了头一个个站在台上许久，作为陪衬，多不经济。如试试让几个人出场不久，在沉香亭畔丝竹筝琶的来按按乐。乐不合拍，杨贵妃还不妨趁醉把琵琶夺过手中，弹一曲“得至宝”或“紫云回”，借此表演表演她作梨园弟子师傅的绝艺。在琵琶声中诸宫女同时献舞，舞玄宗梦里所见“紫云回”曲子本事！如此一来，三十年贵妃醉酒的旧场面，的确是被打破了，可是《贵妃醉酒》一剧，却将由于诸宫女活动的穿插，有了新的充实，新的生命，也免得梅先生一个人在台上唱独脚戏，累得个够狼狈。更重要自然还是因此一来台上年青人有长处可以发挥。京戏改良从这些地方改起，实有意义。还有服装部分，也值得从美术和历史两方面试作些新的考虑。社会总在进展，任何事情停留凝固不得。历史戏似乎也到了对历史空气多作些考虑负点责任时期了。无论洛神、梁红玉、杨贵妃，其实都值得进一步研究，穿什么衣更好看些，更符合历史情感及历史本来。目下杨贵妃的一身穿戴，相当累赘拖沓，有些里衬还颜色失调，从整体说且有落后于越剧趋势。不承认这个现实不成的。过去搞戏剧服装，对开元天宝时代衣冠制度起居诸物把握不住，不妨仅凭主观创造设计。观众要求也并不苛刻，只要花花绿绿好看就成；外人不明白，还说极合符历史真实，这种赞美还在继续说下去，容易形成自我陶醉。目下情形已大不相同，能让历史戏多有些历史气氛，并不怎么困难麻烦，而且也应当是戏剧改良一个正确方向。我们不能迁就观众欣赏水平，

值得从这方面作提高打算，娱乐中还多些教育意义。这事情事实上是容易解决的，所缺少的是有心人多用一点心，又能够不以过去成就自限。

本篇发表于1957年7月8日《人民文学》第7期，署名沈从文。

①“三庆” 即“三庆班”，最早活跃于北京剧坛的四个著名戏曲班社（四大徽班）之一。

谭老板即谭鑫培，亦即上文的“谭叫天”；“老板”是旧时对京剧演员的尊称。

②姚茫父、罗瘿公 民国初年著名的戏曲理论家、京剧作家。

姚茫父（1876～1930），名华，字重光，号茫父，贵州息烽人。戏曲论著有《曲海一勺》、《元刊杂剧三十种校正》、《景漪宝曲话》、《说戏剧》等。

罗瘿公，名淳融，字掞东，晚号瘿公，广东顺德人，生于北京。曾为程艳秋等京剧名角创作、改编众多京剧剧本。

人民时代人民艺术的成就

——庆贺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大会

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大会，是解放八年来中国工艺美术界一件大事情，也是历史上一件空前大事情，唯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新中国，才会在首都举行这个大会。我这次能用个服务员资格出席，也是我一生中最兴奋可纪念的事情。

我是个文物工作者，现在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两机关搞研究工作。几年来初步探索，让我明白，毛主席向我们所说过的祖国有伟大、悠久、优美的文化，是完全事实，而有深一层切实体会：这一切文化创造者，全部就出于我们古代的老工人。远在三千年前、照历史上说的商代，工人铸铜作工具、武器、礼器、乐器和日用器，刻象牙、雕玉、烧造白色陶器和有釉陶器，用朱砂在木器上画花，用松绿石、蚌壳和玉石在器物上镶嵌，……就已经做得非常精美。这些作品不仅可以表示祖国工人的伟大发明和艺术巧思，还丰富了古代世界文化史的内容。到二千四五百年前后，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我们工艺随同生产发展，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而且分业分工极细。金银镶嵌工艺已广泛应用，花纹多细如发丝。彩绘漆器更加普遍流行，图案壮美秀丽，变化丰富惊人。这时期并且已发明了烧造各种彩色玻璃，作为装饰品。雕玉艺术花纹设计，更显得秀美而活泼。手巧心灵的艺术家，到这时简直像是不论用什么材料，作什么式样，一上手都可办得好。至晚到二千年前后，历史上的汉代，工人用复杂提花木机织成的彩色锦缎，除大量向当时西域各国运输，还远运海外，送到古印度、罗马、波斯、日本各国去，这些国家也有了各种纺织品来到当时首都长安。我们说，古代中西文化的交流，原来最先就是这些劳动艺术的成就。而且特别值得注意，是各种锦绣的生产，从养蚕到织绣完成，绝大部分都是劳动妇女集体的创作。即中国古代所谓“妇工”。（历来写美术史的人，很少有特别提起妇女在美术上的成就。事实上人类生活中艺术创造，那里有比养蚕织丝的发明和创造，对世界上贡献还大、还多！）从此以后，祖国这部门成就，就不再限于中国本土，而是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了。

古代艺术品是这样情形，近两百年有许多部门生产，还依旧是这样。从文化艺术说影响这么大，从经济说也值得我们注意。我试举北京过去一个例子说说，七七事变前，北京市每年出口特种工艺美术品外汇价值，就可换回当时全市粮食三个月，其他大生产省区，经济上显然就更加重要。照昨天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管理局白局长的报告，解放以来，全国特种工艺美术品出口、约可换回百万吨钢材，如作铁路钢轨，可铺好一条由东北到广东长的两条铁路，另外又还可铺一条由上海到广州的铁路。这一切对国家的贡献，都是全国工艺美术从业艺人共同的贡献。解放前数年，各行业艺人多难以

为生，不是饿死就被迫改业。解放后，国家政权由工人阶级掌握，对工艺美术发展的前途，因此格外重视，艺人的生活有了保障，待遇日在改善中。工艺美术在本国、在世界，享有的光荣和爱敬，都达到空前程度。

这次代表大会的举行，实在意义深长。照我个人的体会，一面是庆贺人民时代人民艺术的成就，并借此交流工作经验。另一面也可了解一下手工艺全面合作化后，目下生产水平，和共同或个别碰到的问题。总结工作得失，好在专业小组会上共同进行商讨，今后如何准备整齐队伍，改进工作，提高产品艺术质量。好在全国走向社会主义时，把万千种新作品来丰富广大人民的生活，并满足世界对中国工艺美术的希望。为祖国、为世界作出更多更好的新贡献。

要达到这个希望理想，客观上是具备了种种良好条件的。重要是如何密切配合，促进主观力量的施展，及各部门潜力的应用。我们知道，工艺美术和其他许多生产相同，近百年曾遭受过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内腐败透顶的封建统治政权的摧残，无所不至，有些部门生产技术已经消失，难以为继。有些部门又受过不良影响，脱离了祖国工艺美术原有的健康明朗壮美的风格和经济实用美观的效果，变得琐碎庸俗而不切实用。直到解放后，还不容易一下回复本来方向。补救它，首先就是重视艺术优秀传统，不宜割断传统。

我国工艺原有的无比优秀传统，实保存于两个方面：一是生产操作技术和部分设计艺术，还掌握在老艺人、老师傅手中，另一方面是历史上留下的丰富民族美术遗产，还多收藏在全国各博物馆中。几年来，政府和社会对于老艺人的尊重，已经发挥了老艺人对于工作的积极性。如何进一步扩大师徒传习制，

和一般性艺徒学校的举办，不妨同时并进。加紧进行，以便接班人的培养，今后能配合得上社会需要。这是一方面。任何新的工艺品创造，总不能离开设计造形和花花朵朵的运用。想要去掉近百年我国工艺美术不健全影响，充分发挥出固有民族艺术中的大方气魄和高度精美特色，必需扎根于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基础上，好好进行学习，才能广泛吸收民族遗产中营养，来丰富新作品的内容。人民新中国的工艺美术，才会给世界一种崭新的深刻印象。而对于祖国工业建设和六亿人民的生活，贡献也格外大！这方面，有关参考研究资料问题，我相信文化部所属博物馆，必然能考虑到如何尽最大努力，来协助解决，并给以极多便利。至于像我这样一个知识浅薄文物工作者，本于“一切研究都是为了有助于更新的创造”原则出发，也希望能尽绵薄之力，把个人一点常识贡献出来，永远为祖国新的工艺美术繁荣面服务。这次大会是一个新的开始，在这新的工作配合中，敬祝每一位老师傅健康长寿，不断有充满新生命的新作品产生，每一个年青工艺美术工作者，也都能得到新的百花齐放的成功！

1957 年 7 月 24 日

本篇发表于 1957 年 7 月 27 日《光明日报》，署名沈从文。

一点回忆、一点感想

前几天，忽然有个青年来找我，中等身材，面目朴野，不待开口，我就估想他是来自我的家乡。接谈之下，果然是苗族自治州泸溪县人。来作什么？不让家中知道，考音乐学院！年纪才十九进二十，走出东车站时，情形可能恰恰和三十四五年前的我一样，抬头第一眼望望前门，“北京好大！”

北京真大。我初来时，北京还不到七十万人，现在已增加过四百万人。北京的发展象征中国的发展。真的发展应从解放算起。八年来政府不仅在市郊修了几万幢大房子，还正在把全个紫禁城内故宫几千所旧房子，作有计划翻修，油漆彩绘，要做到焕然一新。北京每一所机关、学校、工厂、研究所，新房子里每一种会议，每一张蓝图完成，每一台车床出厂，都意味着新中国在飞跃进展中。正如几年前北京市长提起过的，“新中国面貌的改变，不宜用十天半月计算，应当是一分一秒计算。”同时也让世界上人都知道，真正重视民族

文化遗产，保卫民族文化遗产，只有工人阶级的共产党领导国家时，才能认真作到。北京是六亿人民祖国的心脏，脉搏跳动得正常，显示祖国整体的健康。目下全国人民，是在一个共同信仰目的下，进行生产劳作的："建设祖国，稳步走向社会主义。"面前一切困难，都必然能够克服，任何障碍，都必需加以扫除。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作得到这样步调整齐严肃，有条不紊。

我离开家乡凤凰县已经四十年，前后曾两次回到那个小县城里去：前一次是一九三四年的冬天，这一次在去年冬天。最初离开湘西时，保留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军阀残杀人民，芷江县属东乡，一个村镇上，就被土著军队用清乡名义，前后屠杀过约五千老百姓。其次是各县曾普遍栽种鸦片烟，外运时多三五百担一次。本地吸烟毒化情况，更加惊人，我住过的一个部队机关里，就有四十八盏烟灯日夜燃着。好可怕的存在！现在向小孩子说来，他们也难想象是小说童话，还是真有其事！一九三四年我初次回去时，看到的地方变化，是烟土外运已改成吗啡输出，就在桃源县上边一点某地设厂，大量生产这种毒化中国的东西。这种生财有道的经营，本地军阀不能独占，因此股东中还有提倡八德的省主席何键，远在南京的孔祥熙，和上海坐码头的流氓头子。这个毒化组织，正是旧中国统治阶级的象征。做好事毫无能力，做坏事都共同有分。

我初到北京时，正是旧军阀割据时期。军阀彼此利益矛

盾，随时都可在国内某一地区火并，作成万千人民的死亡，财富的毁灭。督办大帅此伏彼起，失败后就带起二三十个姨太太和保镖马弁，向租界一跑，万事大吉。住在北京城里的统治上层，生活腐败程度也不易设想。曹锟张作霖出门时，车过处必预洒黄土。当时还有八百“议员”，报纸上常讽为“猪仔”，自己倒乐意叫“罗汉”。都各有武力靠山，各有派系。由于个人或集团利害易起冲突，在议会中动武时，就用墨盒等物当成法宝，相互抛来打去。或扭打成伤，就先去医院再上法院。政府许多机关，都积年不发薪水，各自靠典押公产应付。高等学校并且多年不睬理，听之自生自灭。但是北京城内外各大饭庄、和八大胡同中的妓院，却生意兴隆，经常有无数官僚、议员、阔老，在那里交际应酬，挥金如土。帝国主义者驻京使节和领事，都气焰逼人，拥有极大特权，乐意中国长处半殖民地化状态中，好巩固他们的既得特别权益，并且向军阀推销军火，挑拨内战。租界上罪恶更多。社会上因之又还有一种随处可遇见的人物，或是什么洋行、公司的经理、买办、科长、秘书，又或在教会作事，或在教会办的学校作事，租界使馆里当洋差……身分教育虽各不相同，基本心理情况，却或多或少有点惧外媚外。恰像是旧社会一个特别阶层，即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训练培养出的“伙计”！他们的职业，大都和帝国主义者发生一定联系，对外人极谄，对于本国老百姓却瞧不上眼。很多人名分上受过高等教育，其实只增长了些奴性，浅薄到以能够说话如洋人而自豪，俨然比普通人身分就高一层。有些教会大学的女生，竟以能拜寄洋干妈为得意。即以大学生而言，当时寄住各公寓

的穷苦好学生，有每月应缴三五元伙食宿杂费用，还不易措置的，另外一些官僚、军阀、地主、买办子弟大学高材生，却打扮得油头粉脸，和文明戏中的拆白党小生一样，终日游荡戏院妓院，读书成绩极劣，打麻将、泡土娼，却事事高明在行，日子过得逍遥自在如城市神仙。我同乡中就有这种大学生，读书数年，回去只会唱“定军山”。社会上自然也有的是好人，好教授、专家、或好学生，在那么一个社会中，却不能发挥专长，起好作用。……总之，不论“大帅”或“大少”，对人民无情都完全相同。实在说来，当时统治上层，外强中干，已在腐烂解体状态中。又似乎一切都安排错了，等待人从头作起。凡受过五四运动影响，以及对苏俄十月革命成功有些认识的人，都肯定这个旧社会得重造，凡事要重新安排，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国家也才像个国家。

一切的确是在重新安排中。

时间过了四十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亿万人民革命火热斗争中，社会完全改变过来了。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地主、买办……大帅或大少，一堆肮脏垃圾，都在革命大火中烧毁了。我看到北京面目的改变，也看到中国的新生。饮水思源，让我们明白保护人民革命的成果，十分重要。中国决不能退回到过去那种黑暗、野蛮、腐败、肮脏旧式样中去。

去年冬天，因全国政协视察工作，我又有机会回到离开二十三年的家乡去看看。社会变化真大！首先即让我体会得出，凡是有一定职业的人，在他日常平凡工作中，无不感觉到工作庄严的意义，是在促进国家的工业建设，好共同完成

社会主义革命。越到乡下越加容易发现这种情形。他们的工作艰苦又麻烦，信心却十分坚强。我留下的时间极短，得到的印象却深刻十分。自治州首府吉首，有一条美丽小河，连接新旧两区，巴渡船的一天到晚守在船中，把万千下乡入市的人来回渡过，自己却不声不响。我曾在河岸高处看了许久，只觉得景象动人。近来才知道弄渡船的原来是个双目失明的人。苗族自治州目下管辖十县，经常都可发现一个白发满头老年人，腰腿壮健，衣服沾满泥土，带领一群年青小伙子，长年在荒山野地里跋涉，把个小铁锤这里敲敲，那里敲敲，像是自己青春生命已完全恢复过来了，还预备把十县荒山旷野石头中的蕴藏，也一一敲醒转来，好共同为社会主义服务！仅仅以凤凰县而言，南城外新发现的一个磷矿，露天开采，一年挖两万吨，挖个五十年也不会完！含量过百分之八十的好磷肥，除供给自治州各县农业合作社，将来还可大量支援洞庭湖边中国谷仓的需要。这个荒山已沉睡了千百万年，近来却被丘振老工程师手中小锤子唤醒！不论是双目失明的渡船夫，还是七十八岁的老工程师，活得那么扎实，工作得那么起劲，是为什么？究竟是有一种什么力量在鼓舞他们，兴奋他们？可不是和亿万人民一样，已经明白自己是在当家作主，各有责任待尽，相信照着毛主席提出的方向，路一定走得对，事情一定办得好！人人都明白，“前一代的流血牺牲，是为这一代青年学习和工作，开辟了无限广阔平坦的道路，这一代的勤劳辛苦，又正是为下一代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全中国的人民——老年、中年、壮年、青年和儿童，都活在这么一个崭新的社会中，都在努力把自己劳动，投到国

家建设需要上，而对之寄托无限希望。试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把它和旧的种种对照对照，就知道我们想要赞美它，也只会感觉得文字不够用，认识不够深刻。那能容许人有意来诽谤它，破坏它。

就在这么社会面貌基本变化情况下，住在北京城里和几个大都市中，却居然还有些白日做梦的妄人，想使用点“政术”，把人民成就抹杀，把领导人民的共产党的威信搞垮。利用党整风的机会，不好好建议帮忙，却到处趁势放火，并且利用所把持的报纸夸大报道。大火起后，这些“马路政客”，更从这个基础上，扩大幻想和野心，利用机会，布置阵容，以为下一步棋必然是要靠他们来收拾大局。在所有学校里，机关中，以及一切文化教育部门，把共产党的领导取消，党员赶走，让他们好来从从容容搞“民主办校”，……走英美路线，投降美帝，军阀、地主、资本家复辟，再让全国好人普遍流血。这些人却从人的血泊里庆祝胜利成功！这些阴险狂妄的企图，重要部分的暴露，虽只是这个六月里的事情，其实另外一种勘探，早也见出了些苗头，为党所预见。照我的记忆，六月以前党的一位负责人在谈话中，就曾经向这些马路政客，敲过警钟。并举匈牙利事件作例，说是破坏情况，搁在眼前，可作教训。问要“大民主”还是“小民主”。因之警告过野心家，不必空谈“大民主”，最好还是“小民主”，凡事在一堂商量比较好办。如偏要叫嚷“大民主”，到工农老百姓手拿扁担一齐打上门来时，恐怕招架不住的。另外一次又说过：“五百万知识分子经济基础，完全寄托到千二百万工

人和亿万农民身上，经济基础已变了，自己如果还不明白，将来不好办。”当时话都有所指，温和中如有幽默，其实异常严肃。可是做白日梦成癖的人，照例有它自己一套逻辑，不但不体会到话中的庄严意义，应当老实处偏不老实，还以为指使他人放火，自己隔岸袖手旁观，到后来再从从容容作“谢安”，为苍生霖雨！这些打算真是阴险也够糊涂，自己却以为聪明到家，可说是唯心主义的典型！

右派分子鸣放呼应唱和到十分热闹时，曾有个青年学生，拿了个介绍信来找我，信上署有小翠花、张恨水和我三个人名字。说上海一家报纸，要消息，以为我多年不露面，对鸣放有什么意见，尽管说，必代为写出上报鸣不平。人既来得突然，话又说得离奇，并且一个介绍信上，把这么三个毫不相干的人名放在一起，处处证明这位年青“好心人”根本不知道我是谁，现在又正在干什么。我告他，“你们恐怕弄错了人”，就说“不错不错”。又告他，“我和信上另外两位都不相熟”，就说“那是随便填上的”。一个介绍信怎么能随便填？后来告他我年来正在作丝绸研究工作，只担心工作进行得慢，怕配不上社会要求。如要写文章，也有刊物登载，自己会写，不用别人代劳。请不用记载什么吧。这一来，连身边那个照相盒子也不好打开，磨了一阵，才算走去了。当时还只觉得这个青年过分热心，不问对象，有些好笑，以为我几年来不写文章，就是受了委屈，憋在心里待放。料想不到我目下搞的研究，过去是不可能有人搞的，因为简直无从下手，唯有新中国才有机会来这么作，为新的中国丝绸博物馆打个基础。目下作的事情，也远比过去我写点那种不三不四小说，对国家人民有实用。现在想想，来的人本意也许

出于一点热情，却实在容易被右派分子所利用，找寻火种得不到，失望而去时，说不定还要批评我一句，“落后不中用”。值得引起我自己警惕处，即过去旧业，一定还要重理，不放弃它，免得让人钻空子造谣。

我拥护人民的反右派，因为六亿人民都在辛辛苦苦的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决不容许说空话的随意破坏。如有人问我是什么派时，倒乐意当个新的“歌德派”，好来赞美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成就。

我几年来在博物馆搞研究工作，事事都得到党和人民的支持和鼓励，因为工作正是新中国人民共同事业一部分，而决不是和社会主义相违反的。右派分子的算盘，打在我这样一个人身上，就弄错了，何况想反对伟大的党，来走回头路，怎么不失败？历史只向前进不会倒回。右派分子的暴露和倾复，象征帝国主义者的伙计们，在中国残余势力的进一步被扫除。新中国在建设中，需要的是扎扎实实、诚诚恳恳、为人民共同利益做事的专家知识分子，不要玩空头弄权术的政客。帝国主义者的鸮鸟不吉鸣声消失了，人民胜利的欢呼，将在明朗朗阳光下响遍祖国各处。

我为一切年青人前途庆贺，因为不论是远来北京求学的青年，或是行将离开学校和家庭，准备到边远地区或工厂和乡下，从事各种生产建设的青年，你们活到今天这个崭新社会里，实在是万分幸运。我们那一代所有的痛苦，你们都不会遭遇。你们如今跟着伟大的党旗帜，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和希望向前，来学习驾驭钢铁，征服自然，努力的成果，不仅

仅是完成建设祖国的壮丽辉煌的历史任务，同时还是保卫世界和平一种巨大力量，另外也将鼓舞着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争解放，各民族友好团结力量日益壮大。打量作新中国接班人的青年朋友，你们常说学习不知从何学起，照我想，七十八岁邝振老工程师的工作态度和热情，正是我们共同的榜样！

一九五七年七月，北京

本篇发表于 1957 年 8 月《人民文学》第 8 期，署名沈从文。

一个长会的发言稿

从五零年起，我即参加革大、作协、文联和以后政协的学习，没有间断。到目前为止还是不会把学到的体会，比较有条理的说出来。如果学习是用说话来测验进展和思想改造程度，我恐怕是最落后的一个，在同志考验下，只能得个零分。这一方面是思想落后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从小就不善于在不同业务的人面前说话，习惯真是不容易改正，和思想差不多的。再鼓励我，也是不成功的。不过我有另一种理会，就是思想改造如果主要是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生产建设科学实验而服务，能结合我业务学习及工作范围，来检查工作和思想，倒似乎比较有边，也能作出稍微有条理的分析。学得比较好，做得比较对是某几方面，不好不对处，又还有些什么，都容易谈。

如像这么坐下来，离开具体业务，单独谈思想问题，虽能接触到思想问题，可并不能解决思想问题。说“思想改造”，对他人说，情形我不大明白，对我说，作用也许不怎么大。

因为这十多年我是在博物馆做研究工作的，和“人”接

触的机会比较少，和坛子罐子绸子缎子打交道却特别多。甚至于可以说一天想到的全是这些事情。照文化部对研究员的要求，是对内为陈列提供各种材料以外，并对外为生产、教学和研究而服务。因此学的真像个杂货铺，什么料想不到的问题多少也得有点常识。这里也有政治，也有科学，还有艺术。在工作方法上更必需学习用辨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才搞得通。材料常是十万八万，问题且多而又多，很多过去还是空白点，解放后才有条件来着手摸索的，都需要把史部中的文献和出土的东东西西，和留在图画上的形形色色，三者结合起来看问题，分析判断，才能提得出较新的结论。大家都知道我过去又算不得是个读书人，只能写点不三不四小说的半知识分子。先是当了几年兵油子，后来却在文化界混了好一阵，真正认真切实的学，还是从到博物馆才起始。十多年大部分时间是消耗到图书馆和库房里边，出去参观也经常是钻人别的库房，和坟里挖出的东西打交道。和外而人接触，也不外三部分人：一、偶尔来些国外搞文物的专家，组织上派我出出面，谈问题，供咨询。二、国内编书教书的年青教师，和烧瓷织绸缎生产上的同志，要具体谈毛主席说的把学习优秀传统来古为今用，要明白具体一些，我来提材料，并指明出处。大致不会有太大错误。三、是演历史故事戏，作历史人物画和雕刻，什么样子才比较对，穿衣、骑马、打仗、吃喝，不同时代有什么不同，有什么材料可参考，我懂得多些也详细些。

绝大部分心力都是使用到这上而了，除此以外也几乎没有生活可言。虽然也相当羡慕老朋友如巴金、冰心、老舍这些人，经常到世界各处走动，见闻广博，心胸畅朗，但是我

从不唉声叹气，有什么埋怨。我的工作岗位既在博物馆，一切是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服务。这种文化仗既然也得人打，我就打下去。正因为搞这种杂学的人国内并不多，我还只想一个人揽五个人事做。说拥护党，热爱国家，思想改造程度如何，只有从这些工作学习上求了解，作检查，才能够明白得失。什么方面打得比较好，什么打的不好，什么方面且走错了路，再来改正，思想改造也就比较容易落实。一离开工作实践，我就不知道怎么说好了。

这也就是党给荣誉参加了政协，十年来我只发言一次，而提案积起来却有廿多件的原因。因为提的案，多涉及我工作范围，为了全国一盘棋共同提高的问题，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能协助其他教学战线、生产战线尽一点力的部分。可以从实践去证明的。我认为学的本来就是为了用，在这些方面多出点力，也是应该的。也有可能会犯有“厚古薄今”的错误，求改正，依然还是得从实践作去，才能见效果。

近些日子因血压高，心脏供血不良，经常隐痛，坐到桌子边读书二三小时，即眼睛发肿，视觉短期失明。有时头沉重得可怕，不免有些急躁，觉得生命受自然严酷限制，可有效使用时间已不多。学习重在思想改造，本为更好建设社会主义，与其尽我坐下来谈“学习心得”，不如给我以机会，趁我精力还得用时，让我去全国走走，就各大博物馆陈列和库藏到处学学，也到处提出些意见，解决他们的问题。并去各个美术学校，各个烧造瓷器生产地区，特别是江西景德镇陶瓷研究所，陶瓷博物馆，陶瓷学校，参观一二月，他们生产上的花纹和造型，陈列上的说明，以及教学上的有关教材应用诸问题，我提供的意见，大体上是可望有较好效果的。此

外，我搞古代丝绸花纹，常识比较丰富，苏、杭、申、宁、成都等绸缎生产地区，新的生产固然早已突过前人，有万千好花样出现。但过去明清六百年生产，也还有千百种配色构图十分精美，值得参考取法的，可以充实丰富以新内容的，如今多冻结在库房里，不能发生应有作用，学校方面不知道，生产方面也不知道。因此，如苏州仿织宋锦，多似是而非，颜色暗淡，花纹别扭。成都则生产蜀锦有两千年历史，新产品却花纹失调，并近二百年有什么产品可供参考取法也不明白。有个研究所，拟出图录，竟把乾隆时织物当成唐代的。南京云锦丝绸研究情形也相差不多。杭州都锦生产在国际上负有盛名，也由于不明传统配色法，技术高而艺术未过关，不够令人满意。我想即用我所学，去成都、南京、苏州、杭州用二个月走一转，了解一下生产上目前的问题，回来后根据情形，就历博、故宫收藏，调二三百种可供生产参考的材料，再分别去各地美术学校或工厂，作短期展出，共用四个月时间，将可以为国家作许多有用事情！

我懂得生产情形较多些，我今后的工作，也就更容易配合需要，作得更有效果。能和老师傅年青工人打成一片，对个人思想改造，更显明比这么坐下来谈个三几月完全不同。

据作者 1966 年 2 月中旬致程应镠信，本篇约作于 1966 年春，生前未发表过。1992 年 12 月曾作为“从文史料选”首次编入岳麓书社出版的《沈从文别集·贵生集》。原无题，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据岳麓书社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文本编入。

艺文题识录

艺文题识录

YIWEN TISHILU

本集为新编，集名为编者所拟。分“题自己的著作”、“题他人的著作”、“题书法绘画摄影及其他”等三辑，编入作者1934年～1983年所书艺文题识40篇。均为据手稿编入的未发表稿。

题自己的著作

题《雨后及其他》

这文章好像是在一种时行风气下写成的。写成后很不高兴，因为本来并不想如此写。但直到后来（一年半以后）写成了《夫妇》（在《小说月报》发表），我自己才明白为了某一种病的情感，写这类故事，在我手下较顺，但同时我一切文章，就毁到这个方向上了。

〔题于《雨后》文末〕

这文章大家都说还好。

在北平汉园公寓作成，时为民国十六年。写成后同《雨后》先后寄交上海《小说月报》，编者叶绍钧，即为用甲辰署名发表。两篇似乎皆为一下午写成，写时非常顺利。写成后拿到另一个房间里去，对到正吐过一口血，想把血用什么东西去遮掩的母亲行为，十分难受，就装成快乐的神气说："今天不坏，我做了一篇文章，他们至少应送我十块钱！"到后当真就得了十块钱。

〔题于《柏子》文末〕

我自己倒很希奇为什么我会写出这种文章。显然的，为了同一最坏的情感，在我生活上煽动不止，某一时节我的想象是活动到这一切抽象境界中，过了一些日子的。

还有更坏的，是那些可怜的批评者，将来会从我这些想象文字上，胡说八道，以为我第一次同那么一个女人发生关系。

〔题于《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文后〕

这文章当时写来只花三点钟。在上海萨坡赛路二〇四号房子所写的。最先登载于《红黑》[1]周刊。时间当为十七年或十八年三月左右。但也许是七月。

这里也应感谢一个人，因为想起那么一个人，这文章才写好的。

〔题于《有学问的人》文后〕

在北京写成，在《小说月报》发表。这些莫须有的故事现在隔四年后看来是极以为可笑的。

〔题于《诱——拒》文后〕

在上海萨坡赛路写成，发表于《中央日报》之《红与黑》周刊，得七块钱稿费。

这文章似乎是两点钟内写成的，大致正看了什么人论到契诃夫小说的文章，有说到就报纸一点点新闻而写作一故事的方便，就不知不觉也抓起报纸来看了一下，动手就写成此篇。这文章稿费得到后，我还记到是用来买得一个方形墨水瓶的。

这故事隔了三年重来看看，自己还笑着，那墨水瓶早已不见了，那急急忙忙把稿子拿去的胡编辑②也成了尘土了。

〔题于《某夫妇》文后〕

这书为春潮最先印出的一本书。

廿三年九月廿八晚上大雨。重校此书中《柏子》、《有学问的人》、《某夫妇》三篇一次。

从文

廿四年四月廿九校改《雨后》、《柏子》、《有学问的人》、《某夫妇》等四篇③。

〔三则均题于卷末〕

《雨后及其他》，短篇小说集，上海春潮书局 1928 年 10 月初版。以上题识均题于“自存本”中。

①《红黑》　为《中央日报·红与黑》之误。《有学问的人》实发表于 1928 年 9 月 12 日该刊第 24 号。

② 胡编辑　指《红与黑》当时的编辑胡也频。1931 年 2 月 7 日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

③ 四篇作品这次有较多修改，修改后的文本收入 1935 年 12 月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八骏图》中。

《边城》题识五种

题1936年校注初印本[①]

这书用《边城》或《山城》、《小城》才能同军人有关系，同屯戍军相关照，正因为翠翠父亲是戍军，顺顺是军人，照料翠翠的是马兵。兵士同城池是不可分离的。[②]

渡头为公家所有　为公众所有性质，为义渡，不是官渡。[③]

这地方城中只驻扎一营由昔年绿营屯丁改编而成的戍兵屯垦兵兼耕田，戍兵只守地防匪。

官青布　官青布应作标准青布意。省大铺子出的货也。青是黑，不是绿蓝。

好酱油　酱油出湘潭、长沙，故湘西人多托下行人带酱油送礼，如别地方送酒一样。

坐镇不动的理发馆　小乡城常常只有剃头担子，无固定理发店。

掌水码头的　统治水上的在官家为水上公安局长一类人物。在半官半私为水保。在帮口上作头目就叫船总，必具有排难解纷能力，重义轻利性情。这种人通称“掌码头的”。作船总的不一定掌水码头，因为船总还得作事，掌码头有的一事不作是个资格，不是真正的事务。不过这里的船总却掌水码头。

买了一条六桨白木船　说船大小有的用舱计算，所以有三舱子五舱子名目。有的用桨，六桨自是六个水手的船。

在粮子里混过日子　军营。

龙船水刚刚涨过　五月初二三涨的水叫龙船水。

卖皮纸的　与白色棉纸稍稍不同，似出洪江，用作包东西的。

副爷　军官称老爷，大兵称副爷。客气的称呼。

唱三年六个月的歌　这句话本是一个典故。湘西人山歌有那么首歌：你歌莫有我歌多，我歌共有三只牛毛多；唱了三年六个月，刚刚唱完一只牛耳朵。

这里却只是指唱得久而言。三年六月等于平常言“千军万马”，是虚数，不是实数。

请保山来提亲　媒人。

牵了一匹骡马预备出城　湘西人把骡子看得比马宝重。

十来把大招子　即大桡子，与桨不同。用大木作成。如大刀，船上的多直出船头，用作转弯。木筏上四面都有。

为祖父煎了一罐大发药　出汗的一种草药。叶如麻叶。灌木类。

扣花褡裢　两头有口袋，有用青布作成的。搭在肩上，那东西常用白线扣花，作吉祥意。

念经起水　丧事人家必到井边河边通告，名为起水。

一九三六年三月七号看过这书后半部，无聊。我应当写得还好一些。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早上看过一遍，心中很凄凉。

三月十六改正六处。

三月二十一看此书一遍。觉得很难受，真像自己在那里守灵。人事就是这样子，自己造囚笼，关着自己；自己也做上帝，自己来崇拜。生存真是一种可怜的事情。

一个人记得事情太多真不幸。知道事情太多也不幸。体会到太多事情也不幸。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校注此书完事

从文④

题 1948 年所购初印本封面、扉页和卷内

第一版留样本。

全集付印时宜用开明印本，将此本新题记⑤附人。

从文

三十七年五月，从市场买回此第一版旧本。前面题识⑥似为此书初到北平时三日中购此书者所记。

从文记于北大宿舍，时刚由云南返京。

金隄译本在英今年⑦出版。日译本廿八年出版。廿四年邵洵美与项美丽即同译作英文，在《天下》杂志发表。战时开明在江西、四川、桂林、上海各印有战时本。土纸印。本拟写十城记，应当回去完成另外九个。现在看来，这事恐得交给下一代人去了。

上官碧

此本写成整四十年。日英译计四种：一、项美丽在《天下》月刊；二、金隄译在英出版；三、日译二种在日出版；四、六二年英译在《中国文学》出。

那首歌声音既极柔和，快乐中又微带忧郁，歌调末尾说：

“福禄绵绵是恩神，
和风和雨神好心……”

新印本有全诗⑧，此为节下末尾几句。用这个好。

题松枝茂夫日译本扉页

译者为东京帝大教授（中文教授），三十七年一月廿五冰心托李书华先生由日本捎来此书。

从文

选择[9]的还有道理，不尽恰当。

六五、六年来一信，拟译全集，不便作复。

七五年复来一信，或将译《湘行散记》，未即作复。并寄所译《红楼梦》三册，及笔记小说一厚册。已七十二岁，任早稻田中文教授。信中说每与二三友好谈及，不写小说极可惋惜。

题开明改订本 1957 年留样校改本内

文字简极而波俏，如一幅精美白描，笔准确到无以复加，充满生命。[10]

到那临溪高崖上去，望天上的星辰，听河边纺织娘和一切虫类如雨的声音

北方长大的人那能看得懂这种逼真的描写。

题桂晓风所存样书扉页[11]

此小书系一九三二年十月着笔，时住于北京西安门内达子营廿八号一小小单独院落中，有槐树枣树各一株。每早阳光初上时，即坐一小竹几，据一小红木方桌边着手。每星期只完成一章。中间因事返湘暂停约四十多天，因此直到三四年二月始完成。

沈从文　八二年四月

《边城》单行本由上海生活书店于 1934 年 10 月初版。1936 年 3 月作者对初版进行了校改，1940 年 10 月在昆明再次校改，1943 年 9 月开明

书店出版了改订本。1981年8月作者重校《边城》，于同年11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现按题写时间先后汇集作者在《边城》不同版本中的题识编入本集。

① 此初印本原为作者藏书，于文革初期流入社会。1983年6月，香港《大公报》分2次发表了署名余时的文章《写在〈边城〉的书边上》，文中摘录了沈从文1936年写在此校注本中的题识和旁注。据香港《大公报》发表的摘录文字编入。

② 题于扉页。

③ 仿体文字引自《边城》1936年校改本正文，宋体字是作者对此引文写的旁注。下同。

④ 以上五则均题于文后。

⑤ 新题记　指作者1948年在此初印本《题记》旁增写的题记。已编入全集第8卷《边城》集内。

⑥ 前面题识　指此书第一位买主写在扉页上的："十一，十二，廿三。曾富　购于佩文斋"。

⑦ 今年　指1948年，英译本实为1947年在伦敦初版；松枝茂夫日译本出版时间，实为1938年11月；英译本在《天下》月刊发表的时间，实为1936年1～4月。

⑧ 新印本有全诗　新印本指开明改订本；全诗指翠翠轻轻哼的巫师迎神的歌。歌词共分6节，24行。初版中只用了全诗后3节，12行。

⑨ 选择　松枝茂夫日译本《边城》，另外还选译了《丈夫》、《夫妇》、《灯》、《会明》、《柏子》、《龙朱》、《月下小景》7篇小说。

⑩ 题于第十章结束处，写爷爷跟翠翠对话，谈到陪嫁碾坊和二老称赞翠翠，二老来了。

此书两处题识时间在1957年以前。

⑪ 此样书即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的《边城》，桂晓风当时任该社编辑。

题《一个天才的通信》

卅三年十月十八，从子仁兄处取回这本书。重看一遍，将生命带回到过去里。这是民十七、十八年间的生活。死的死去了十年，疯的过了一年又转好了。这就是生命。

书上所提及的一个客人是张采真，廿年在武汉江海关前光光的石坪上杀头。一个借钱一元七毛的胡姓友人，廿年在上海枪毙，即胡也频。代为介绍这个小书出版的徐志摩，也死去了十三年。因这个文件，使我有机会到中国公学教书的胡适之，如今正若在半放逐中不能归国。这就是时间。

以党治国的党，正在民怨沸腾中不知何以为计。战争已到七年，有转及西南趋势，市面上反应此种惶恐，为大减价广告，充满报纸。知识阶级反应此种惶恐，为信仰转到作家方面，一为贫病作家募捐，即到二百万。然而这有什么结果？为三流政客上台造机会而已。这就是时代。

从文　昆明青云路六十二号宿舍中

《一个天才的通信》作于1929年，反映作者穷困潦倒的生活。本题识书于1930年2月光华书局初版的单行本后扉页上。

题《长河》校注本后

十二月十五校毕，去《边城》完成刚满十年。时阳光满室。长荣、子和、老三等战死已二年。陈敬摔车死去已一年。得余离开军职已三年。季韬、君健两师部队在湘中被击溃亦已四个月。重读本文序言：

> 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高尚的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

这热忱与虔敬态度，唯一希望除了我用这支笔来写他，谁相信，谁明白？然而我这支笔到当前环境中，能写些什么？纵写出来又有什么意义？逝者如斯，人生可悯。

从文　桃源新村第八栋茅屋中
卅四年一月四日注

《长河》校注本为作者保存的《长河》初版校样。

题《都市一妇人》

书由巴金交书店付印。时在申住一品香饭店中，天极热，由武汉下行。

〔题于扉页〕

这个值得重写，需要重写，方可收入新集。

从文

应从厨子的口述中，看到听到的有分寸一一写下来。是一种新的控诉，方法上也可取。

〔题于《厨子》文前〕

十一年[①]至平，大姐正生产，不久即返湘。北伐时，家中人与之同住常德，生活情况极劣，大小均期望过北方，未能成行，孩子因病逝去。九[②]在青岛述及，因写成。

〔题于《静》文前〕

海珊[3]时丧偶，在协和读书。廿七年由美回，三十二年返至开滦矿山工作，被盟军轰炸，与老母孩子同死去。

〔题于《春》文后〕

西林至青（彼时尚未与袁太太结婚，袁先生尚生存），每日常在一处吃酒，曾因醉说了些空话。一多时任文学院长，实秋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蓝苹则在馆中任一书记），太侔任教务主任，今甫作校长，梦家作助教。

〔题于封底〕

《都市一妇人》1932年11月由新中国书局初版，收作者1931年夏秋到青岛后写的6篇短篇小说。本题识书于作者自存校改本。

① 十一年　为十二年之误。作者于1923年离湘西到北京。

② 九　即九妹，作者的小妹妹沈岳萌，又名美真、芷岭。

③ 海珊　作者的朋友，医科学生樊海珊。《都市一妇人》书中的《春》文后，有“为海老而存”。据此书修改后的《春》，1936年编入《从文小说习作选》时，文后有“给樊海珊写”字样。

题《烛虚》留样本

这部分[①]多从日记摘出。三十三年因心脏病，计焚毁日记本七册，另稿十五件，多未发表故事。

《烛虚》是作者抗战时期创作的散文—文论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41 年 8 月初版。识题书于作者留样本正文前。

① 这部分　指书中第一篇《烛虚》内容。

题《断虹引言》旁

朋友夏明所叙丽江故事引子。

三十四年彼由维西回昆明，因谈及晨岚、霖灿及一鹤庆女子和另一教师恋爱故事，十分悲惨。一共谈三天，极动人。因允为写一中篇，计十一节。已写成三节，为复原而搁置。

此文本为叙述他人历史，使之重现于文字上，不意被时代却弄毁了。不仅毁了这个故事，也毁了写故事的人。

这就是人生，人生多可哀。

这个重要很好。①

《断虹引言》1945年4月1日发表于《春秋》第3卷第1期。作者所题文字，写在1946年1月16日《文艺新报》转载此文的报纸边上。

① 此句为另一时所写。指以上题识。

题《小砦》篇头

共九页，残。

本文是继《边城》而作的，只发表了一小部分，芦沟桥事变发生，即不再继续下去。八月十二首次平津车通车那天，即离开了北京，直到一九四七年六月①始返回京。

《小砦》，作者未完成的中篇小说，第一部分于1937年7月5日《国闻周报》第14卷第26期开始连载，至8月9日载完。

① 实为1946年8月回京。

题《新烛虚》校样

此文有用，得注明，加二千字。

〔题于页眉〕

时刚回北大教书。不是三天即是四天。

〔题于文旁〕

《新烛虚》1946年9月22日发表于《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第6期。同年10月1日在《上海文化》第9期发表时，更名为《北平的印象和感想》。

题《虎雏》自存本

此文人开明待印之《衣冠中人》集，稿经重改重写，毁于柳州一火。

〔题于目录《中年》文旁〕

在青岛山东大学时为学生示范叙平凡事而写，与《八骏图》相对照，见两种格式。

刘西渭以为《边城》系放大此事而成，意见对。

〔题于《三三》文后〕

《虎雏》，短篇小说集，1932年1月由新中国书局初版。

题《入伍后》扉页

内中多带点谐谑味，或许受二周译文影响相当多。

这是从一九二二[①]到北京，由标点符号学起，到一九二五开始“写作”第一个[②]集子。到现在看来似乎还值得纪念的一个小册子。

同时出集子二本：如新月书店出的《蜜柑》稍前，此书将是第三个集子。因为第二[③]是《老实人》，也是北新在大革命以前先出的。

《入伍后》，短篇小说和剧本合集，北新书局 1928 年 2 月出版。

① 一九二二　实为 1923 年。

② 第一个　此处记错。目前查到的作者早期作品集有：一、《鸭子》，北新书局 1926 年 11 月出版。二、《蜜柑》，新月书店 1927 年 9 月出版。《入伍后》是第三个作品集。

③ 第二　此处记错。1928 年 7 月现代书局出版《老实人》，同月新月书店还出版了《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一卷和《好管闲事的人》两书。故《老实人》至少应算第四个作品集。

题《阿丽思中国游记》存底本

三十六年九月得于北平小书摊上，去出版已二十年。

本书里封面是一多[1]为新月丛书所画，丁玲为题字[2]。时与小胡[3]夫妇同住上海萨坡赛路二〇四号，因此丛书名二〇四[4]，共出过五本书。

本书到今恰恰出版二十年。

还得改正，当时实草草付印。

这书万一还有付印机会，可用这个作根据。

从　三十七年十一月北平

这本子留着，可用另外一本由兆[5]照改，再用它付印。

痛苦中校本书三章。

从文　三十七年十一月十日

十二月六日。越看越难受，这有些什么用？

一面是千万人在为争取一点原则而死亡，一面是万万人为这个变而彷徨忧惧，这些文章存在有什么意义？

一切得重新学习，慢慢才会进步，这是我另外一种学习的起始。

这书可交开明圣陶先生，印得出来再印行。

从文　三十八年三月二日校毕北平城中

《阿丽思中国游记》初版于1928年7月，同年12月第2卷出版。这是作者试写的第一个长篇。1948～1949年，作者对存底本作了大量修改。花城出版社1982年1月出版的《沈从文文集》第1卷，曾将此长篇全文编入，但使用的是1981年另一修改较少的文本。

作者不同时间在存底本中的题识，集中于卷首和书后。编入时按题写先后排序。

① 一多　即现代诗人闻一多。他为“里封面”所画是一只开屏的孔雀。

② 丁玲为题字　《阿丽思中国游记》的封面题字后，署名“芷嶙制字”。芷嶙是作者九妹岳萌的别名。作者1982年2月19日对张兆和谈话，也证实此题识记错了。

③ 小胡　指现代作家，作者的朋友胡也频。

④ 丛书名二〇四　《阿丽思中国游记》列为“二百零四号丛书之四”。

⑤ 兆　即张兆和。

题《绿魇》文旁

这个应低排二格，是当偈与赞，总拢全文而作结用的。读者不明白，所以说古怪不通。

〔题于第一节末段上方〕

这也是偈式总题用的。由于形式新，大家不懂。这是感想总括。

〔题于第二节末段上方〕

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题于文末〕

这三段文字，题于作者自存的《绿魇》校正文本中。1949 年 1 月 2 日作者为《七色魇集》所拟篇目中，选有《绿魇》等散文作品。上述文字题写时间估计与《七色魇集》拟目时间相近。此时作者已陷入精神失常。

题《沈从文子集》书内

幻念结集，即成这种体制，能善用当然可结佳果，不能善用，即只作成一个真正悲剧结束，混乱而失章次，如一虹桥被新的阵雨击毁，只留下幻光反映于荷珠间。雨后到处有蛙声可闻。杜鹃正为翠翠而悲。

从

〔题于《龙朱》文后〕

我应当和这些人生命在一处，移植人人事复杂之大都市，当然毁碎于一种病的发展中。

〔题于《丈夫》题下〕

这应当是举例用最合长处一例。可惜不知善用所长，转成下坠，终沉覆于世故围困中。阴阳兵技儒法，同击毁一别墨，即真正历史也。

从

〔题于《丈夫》文后〕

这是十八年作，恰廿足年，也正是当时主人岁数。

灯息了，罡风吹着，出自本身内部的旋风也吹着，于是息了。一切如自然也如夙命。

三月 从

〔题于《灯》文后〕

当时最熟习的本是这些事，一入学校，即失方向，从另一方式发展，越走越离本，终于迷途，陷入泥淖。待返本，只能见彼岸遥遥灯火，船已慢慢沉了，无可停顿，在行进中逐渐下沉。

〔题于《建设》文后〕

《沈从文子集》，短篇小说集，新月书店 1931 年 5 月出版。

这些题识估计均写于 1949 年 3 月。

题《老实人》卷首

文多发表于《晨副》[①]、《现代评论》等刊物。可作初期习作代表。只第一篇“记满叔远”[②]可留在全集中。卅七年所写《雪晴》、《巧秀》[③]等连续短篇，即用彼昆仲家中事直叙本事。

从文

《老实人》，短篇小说集，上海现代书局1928年7月出版。

①《晨副》　指《晨报副刊》。

② 记满叔远　指短篇小说《船上岸上》。

③《雪晴》、《巧秀》　指《雪晴》写于1946年，发表于1946年10月20日《经世日报·文艺周刊》；《巧秀》即《巧秀与冬生》，写于1947年，发表于1947年6月1日《文学杂志》2卷1期。

题《阿黑小史》单行本

习题　　不外借的习作自留底本　　有三章未收入[1]。

后来《雪晴》第二[2]，各篇章均从抒情为起点，将来宜两者合而为一。

〔题于封面〕

本书用乡村“牧歌”体裁，用离城四十里的高岘满家油房作背景写成。约民七前后，曾住此村子里约卅天。另写有《雪晴》六章，叙述较好。十七年已刊过的散失。

住叔远家，约十天。院中有一大胡桃树。叔远哥哥当家，后于病床上被仇家拖到院下砍碎，将肢体五脏挂于树上，呼啸散去。其子时二岁，改住城中，八岁时上坟，又复为仇家杀死。叔远则于十二年同至北京，因为恋家，回即结婚死去。

〔题于扉页〕

题《阿黑小史》单行本

中篇小说《阿黑小史》共历时五年多分章发表，单行本于1933年3月由新时代书局初版。

① 有三章未收入　现仅发现有：《采蕨》篇末注明“阿黑小史第五”，1928年10月9日《中央日报·红与黑》第39号发表；《阿黑小史序》作于1928年10月末，收入1934年3月出版的《沫沫集》中。

② 这里所说的《雪晴》当是《雪晴》、《巧秀与冬生》和《传奇不奇》三个连续性短篇小说的总称，因此“《雪晴》第二”实指《巧秀与冬生》和《传奇不奇》。

题《八骏图》自存本

书为特别订本，战前留于北平。①

〔题于《题记》前〕

离平九年，回从灰尘堆集破箱中捡出此书，如隔世熟人。遇一读者，亦称道此书，此读者当时只八岁。

从文　一九四七

〔题于《题记》后〕

这文章在《文学》刊载时，上海文坛消息喜傅会，以为可以作索引，一个一个人都可呼之欲出，似为山大学生传述的。且说有那么一个女人。事实上，真是白话。文章系为示范而作的，正讨论设计，一个短篇宜于如何来设计，将眼下事真真假假综合，即可以保留一印象动人而又真且美，重要点在设计。这作品由之产生。惟写成后，几个同事似乎也以为真是说他们了。也似乎有一二女人，以为是影射到。其实

这个未婚妻当时却正在青岛！文章是回到北平完成的。①

当时为学生举例作的。发表后使得教授们大不高兴。本来不是为他们高兴写作的，所以只有让他们不高兴。事实上倒是把几位绅士画出来了。完全正确而生动的画出到纸上了。但是家中人就说看不懂。先用什么文学概论上的主题、什么什么去套，自然不会懂。②

〔题于《八骏图》文后〕

新的阿Q和赵妈。②

〔题于《有学问的人》题下〕

像是一部长写影。神气像。事实自然更像。②

〔题于《有学问的人》文后〕

这是熊斌臣画相。熟他的人方明白十分准确生动。正如《湘行散记》中第一文作曾芹轩画相一样，宜永生。①

〔题于《顾问官》题下〕

当时湘西一样，不种烟的也抽税，名“懒捐”。这些事现在年青人即或富于想象，也想不出是什么理由了。②

〔《顾问官》中“懒捐”的眉批〕

指萧选青军法长，在怀化只鼓励我烧狗肉吃的老先生。①

〔《顾问官》中“军法长”的旁注〕

在汉园公寓三小时写成，时正流鼻血，捂着鼻子写，寄过圣陶编的《小说月报》，得稿费十三元。母亲在吐血，买药一瓶。②

这才是我最熟的人事，《习作选集》系改动过字句。我应当回到江边去，回到这些人身边去。这才是生命！城市所见除骗子，什么都没有。③

〔题于《柏子》文末〕

在北京写。时流行风气正在写性故事，因之当抒情诗来试笔。假绅士讨了二三姨太太，行动不以为奇，军阀讨三五十姨太太，还正成为小报佳话，这种小说在《小说月报》刊载后，却不许再刊登，认为“有伤风化”。提出意见的恰是假绅士。当时编者为叶绍钧。②

〔题于《雨后》文末〕

时读一报纸记事写下的。②

〔题于《过岭者》文末〕

为教习题而作。不用对话也可。①

当时是为学生习作举例写成的，说明不必要故事，不必用对白，不必有首尾和什么高潮，还是可完成一个短篇。只是当成眼前例子而写成的。是一种〔习〕题。只是习题。②

〔题于《腐烂》文末〕

从这个集子所涉及的问题、社会、人事，以及其他方面看来，应当得到比《呐喊》成就高的评语。事实上也如此。这个小书必永生。可是在宣传中过日子的读者可不要这个的。

从文[1]

毫无疑义。[2]

一九五六三月，又写自传，来翻翻这些完全过时的旧作。时喉痛心烦，眼肿头重。我什么时候才能稍稍休息一阵，把身体弄好一点？

读报，报上正说及全国作家在开会，巴金老舍发言都刊载出来。很奇怪，我是谁？身体那么痛苦，还得限十号写成，我怎么来反省我的错误，向谁请求一下，让我能睡两天，什么都不想，休息休息？

我难道又在起始疯狂，他人却□分正常健康？我是在为什么？都说人是可知道，为什么我那么困难倒没有人知道，就是家中人也不知道？存在实在可悯。

〔题于卷末〕

《八骏图》，短篇小说集，文化生活出版社 1935 年 12 月出版。

① 诸条写于 1947 年左右。

② 诸条写于 1956～1957 年间。

③ 估计写于 1948～1949 年间。

题《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校样

辛亥五十年前夕，校正此文给《光明日报》。正值大哥大嫂从家乡来，回忆五十年前这一天，家中大姊、二姊、大哥、六弟等随同苗阿妤[1]下乡逃至齐梁洞避难，只我和父母四叔五叔留在家，二叔磨刀擦枪筒，准备晚上苗兵入城即作为内应。诸凡景象一一犹在目前，事实上半世纪来小县城中革命旧事，恐亦只保留在我一人印象中矣。

未收入新集[2]。以后似乎还可以收入，还有内容，不是空谈。

刊载此文，其实应附形象廿卅种才有意义。必图文互证，才有较强说服力。

一、商玉人头；二、商奴隶俑；三、商白石雕人像；四、侯马人形泥范；五、洛阳出土西汉壁画《二桃杀三士图》；六、《烈女仁智图》部分；七、长沙楚俑（文官的用蒋玄佁复原那个，武官用历博照相）；八、沂南石刻孟

贵像；九、洛阳画砖；十、辽阳汉画；十一、汉墓寺门卒像；十二、望都伍伯像；十三、邓县画像砖墓文康伎和彩绘墓门前武官；十四、晋青瓷醉拂菻水注（故宫）；十五、敦煌二二〇窟壁画；十六、韩干《双马图》；十七、《萧翼赚兰亭图》火头工；十八、底张湾壁画执拍板司乐人；十九、《校书图》之马夫；廿、龙门石刻《帝王礼佛图》；廿一、景县墓俑；廿二、北齐张肃俗墓俑；廿三、《洛阳耆英绘图》；廿四、《西园雅集图》部分；廿五……（蒋兆和和李斛二位的曹操和项羽）

《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1961年10月21日和24日分两次发表于《光明日报·东风》。

① 苗阿妍　指沈家的苗族女佣。

② 新集　指作家出版社1960年出版的《龙凤艺术》。

题《月下小景》

这个习作实近于《抒情故事》。多结婚以前写的。因小五哥[1]还在初中一，内中不少打趣处。料想不到过了约卅年，却有大学毕业生，以为中多讽刺彼等或彼等之首长。真是"天方夜谭"！但是也由此明白一件事，写文章说到人的共通弱点时，总易成为"异端"，而受歪曲批评，以至于"毁灭性打击"。这倒是一个永远不变的公式。致毁原因明白后，就不必继续，或为此存丝毫芥蒂了。抒情性诗的生长，也得有一定土壤空气，不是"开绿灯"就能丰收的。

〔题于自存开明书店改订本卷首〕

一九三〇年到武汉大学教习作，图书馆条件好，一般多在二书架间窗口看书，事后不附字条的书，到时馆中人自会把书归架。取书则随意就两架上取用。教书时间既不多，因此有四分之一时读书，有机会把碛砂藏内诸故事经卷大致看过一或二次。对写作得益，对中古小说发展史也有较多理解。当时试写成本书，甚得好评。七四年六月过苏州重买《法苑

珠林》一部，作为纪念。四十年人事变迁极大，童心未失，和所读诸佛经有相当关系。

从文

〔题于抗战时期某盗印本〕

《月下小景》，短篇小说集，上海现代书局 1933 年 11 月初版，1943 年 12 月开明书店出版了改订本。

① 小五哥　指作者的妻弟张寰和。

题《从文小说习作选》扉页

一九七三年十月节日前夕，查良铮[①]兄托人为捎此书来，距出版已卅七年。

从文

这是到京学习用笔，由标点符号的应用开始，十年后的一个结果。是从四十个左右单行本选出的。因为在试探中，曾采用不同方法处理问题，各方面在当时似都略有突破，得到各方面赞许，因此选它时，也就不同各部分各选一些，作为纪念。书已出版四十年，大部分都“过了时”，成为过时而有毒的什么，只足供自己参考，最好不外借，免害人出事故。

从文　七六年四月

一九七八年闻良铮因自行车相撞折腿，在医院开刀故去。

《从文小说习作选》，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6 年 5 月初版。

① 查良铮　现代诗人，笔名穆旦。

题《黑魇》校样

一

这个写得很好，都近于自传中一部分内部生命的活动形式。

另有白、赤、青、橙等等。拟作七篇，即在抗战完结前后五年中，在昆明到北京，从生活中发现社会的分解变化的恶梦意思。每一章均不相同，文字主题乍一看或有些蒙蒙不易解，总的一看即可知实明明白白。

二

四十年前在昆明乡居琐事和无章次感想。

在云南用这个方法写的约计七篇。总名《七色魇》，还另

有三篇拟共成一集，出个小集。叙中有议，一般人读不懂。其实易懂。重在从各个角度写近在身边琐事，却涉及那个明天。

《黑魇》发表于1944年5月重庆《时与潮文艺》第3卷第3期。本题识题于1947年8月再次发表此文的《知识与生活》第8期校样上。

题《从文自传》扉页

抗战时在后方印的土纸本。胜利复原回到上海时，原拟印三十个选本的开明书店老板十分聪敏，只请吃了一顿饭，送已出版书十种各五十册作为纪念。

〔题于1938年开明书店重庆版扉页〕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曹禺为把此书送来，据此书完成已整整半个世纪。照相三种已极难得。较大一张系卅三年[1]十月初照于达子营廿八号北京新居卧室中，最小一张可能是十岁左右在凤凰家中所照，另一张或在保靖时军中所照。

从文

〔题于第一出版社初版扉页〕

【附录】

曹禺题《从文自传》封面

久望得《从文自传》，竟托京中国书店觅到，喜可知也。

曹禺

一九八二、七、廿三、沪

《从文自传》1934年7月15日由第一出版社初版，此后开明书店等出版过多种版本。

① 卅三年　指1933年。

题他人的著作

题《爱眉小札》

卅年四月十四夜，烧去文章约一万四千字。只觉人生可悯。桌上有小小蓝花一撮，象征此生命在表面上的静，和内部的燃烧。一切都将成为过去，生命亦复相同。即以志摩言，死去即已十年了。

上官碧

孤城中清理旧稿，忽得此书。约计时日，死者已成尘成土十八年。历史正在用火与血重写，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

从文

三十八年一月十八北平

《爱眉小札》，徐志摩、陆小曼合著。所题为上海良友图书公司限定印100部的真迹手写本，封面贴有沈从文手书的书名“徐志摩爱眉小札 ——碧”。

题《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论文集》

这一章好。

〔题于《百年前人民的武装组织——太平军》篇名下〕

不大透，因材料片段，不能处理此大题目。太平天国十多年军事进行，经济政策和他的商业政策极有关系，用到材料似不大够。

〔题于《太平天国底商业政策》篇名下〕

这一章很好。

〔题于《天地会领袖洪大全》篇名下〕

这一章似不大透。

〔题于《捻军——太平天国时期北方的农民运动》篇名下〕

也不大够。岑毓英在昆明之祠堂特大，即说明当时为满

清政府屠杀人民必极残酷。杜之失〔败〕过程有关于此甚明。

〔题于《杜文秀革命军底团结问题》篇名下〕

一九五〇年．十二．十八．从西苑[1]迁行李回，坚冰冻指，寒气逼人，于淡薄阳光下，寒风中，来回西郊道上将此书读一过。有些很好。在大灶边和司火老同志谈半小时。

〔题于全文后〕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论文集》，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0 年 11 月初版。

题于作者之一、史学家王忠 4 天前所赠书内。

① 西苑　此指设在北京西苑的华北革命大学。作者此时正在该校的政治研究班学习。

从文用书题识选

卅四年十月五日从枪声盈耳中购来。

昆明　从文

书过于简率不合用。多错误，材料少。

〔题中华书局1936年初版《漆器考》卷首〕

如得就这地方[①]住一年，当可捡分出上千品不同单片，作参考研究用。

就花纹考捡，亦可知粉定来源。花纹单片极可贵，因尚可知唐代纹饰繁复到何等程度。

我如住一年，得上万不同单位，一定有许多新发现，足供美术史、陶瓷工艺史作重要参考资料。但这一生那有希望？

这些事始终就无一个人肯来作。我想作也能作，可来不及自由使用生命，生命即萎谢了。

〔1949年4～5月题小山富士夫《支那青磁史稿》用越州青瓷片筑墙的农舍插图旁〕

此书具创始性，引用史料也极丰富，万里先生之作实多抄自此书，但极多中国文献反而遗落不称引。

〔题小山富士夫《支那青磁史稿》封面〕

三十八年九月廿六，天地忽清朗异常，已入深秋。②

从文　北平

〔1949年题寂园叟《匋雅》日译注本《支那陶器精鉴》卷首〕

一九五二十月一日补注此书③于北京。

〔题寂园叟《匋雅》日译注本《支那陶器精鉴》扉页〕

一九五五年七月廿日读文艺座谈，天热如焚，生命存在于离奇环境中，惟历史知道。

〔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初版康士坦丁诺夫主编《历史唯物主义》〕扉页〕

书为大家买的，最好看后即见还，莫冻结在个人手中，失去充分利用意义。

〔题三联书店出版普列汉诺夫著《论艺术》〕

作者在所用书中写过许多杂感、笔记和评语。现仅摘取少数书中非专业性题识编入本集。

① 这地方　指浙江余姚上林湖畔古越州窑址所在地。

② 作者当时久病略有好转，刚写了 19490920 致张兆和信及长诗《黄昏和午夜》。见全集第 18 卷和第 15 卷。

③ 补注此书　清江浦寂园叟撰《匋雅》一书，原著以随笔形式分为 910 节，日译者盐田力藏对每节均附加了注解文字，书名为《匋雅新注　支那陶器精鉴》。沈从文以自己的见解，据新实物材料对此书近 600 节又作了上千条评注，有数万字。

《战争与和平》阅读札记

第四卷　第一章

〔尼古拉从军队告假回家，捷尼索夫同行〕　尼古拉回家一场，用字不多，写得不错。纳塔莎起始成作者着意描画对象。

一阵浆过的衬裙沙沙声和少女的低语声和笑声从邻室传过来。门开了一道缝，闪露出一种蓝东西，蝴蝶结，黑头发和愉快的脸。这是来看他们是否在起床的纳塔莎，桑妮亚，和别佳。　写得亲切，真实。草草数笔，即明朗活跃纸上。

门放进别佳以后，就又关起来了。一阵笑声从门后传来。写得亲切自然

〔捷尼索夫和桑尼亚相处时，态度的微妙变化〕　写得极细，分析得有分寸。

第十四章

一、写赌博这一章好。也要有相似经验才明白赌徒心情。

二、矮四爷[①]事相似而不同。

第十五章

纳塔莎的歌形容得极好，不成熟，稚气，然而充满青春的生命欢悦。

第五卷 第一章

好像维系他生活的主要螺丝钉的螺旋纹被磨光了，因此那个螺丝钉既不能进，也不能出，只在同一的地方无结果的转下去。 托善于以物象寓人心情。 写彼尔心情好，用字不多，中肯。

第三章

〔彼尔参加共济会的神秘程序〕 世界上许多秘密社团，都用种烦琐可笑恐怖惑人方法作为教律。中国的……也差不多，都有不同近似戒律来麻痹善男信女。阎锡山的什么铁军，以及蒋介石的新生活，多大同而小异。主要是以此种种增加作首脑人的权威，以及保持表面庄严事实私心的企图。

这种主持其事的人，照例都十分狡猾，又相当愚蠢，一种矛盾的性格，却常常具有传染力，而能使之得到发展。是一种巫术的基础。

第十章

〔彼尔视察他的田庄〕 写彼尔厚实，易为管家愚惑。

第十一章

〔彼尔和安德列王爵争论〕 时八日下三时，收音机中闻笛声极美。感情充沛，音调协畅。可是接下去，两个提琴曲却极坏。

〔彼尔匆匆忙忙含含糊糊地阐述对农奴做好事见解〕 亦即托氏改良主义见解。在当时有进步意义。也只能如此。受

了西欧自由民主影响后，旧俄知分的正常反映。

托在琉森短篇小说中尽管极力嘲笑欧洲伪文明，说的充满感情，十分尖锐，可是正如评传说的，还是受当时民主影响，反映到对农奴处理问题上。无所归宿的希望，采取最方便方式转化，因之共济会信用流行一时。

第十三章

〔彼尔和安德列王爵在旅途中渡口继续争论〕　这一章近于写安德列思想上新的转变，不大够。因为谈的并不透。

第六卷　　第十七章

〔纳塔莎在宫廷舞会上〕　这写得好。

〔彼尔闷闷不乐，使纳塔莎诧异〕　善意写纳塔莎。

第十八章

吃饭时谈话没有一刻停止，似乎具有一部笑话书的内容了。　写围绕新贵得宠的大臣，一群阿谀逢迎的人物，字不多，写得好。

他一离开，那全体一致的欢笑就停止了，客人们开始精明而平静地彼此交谈。　写客人虚伪奉迎，好。

第二十章

〔柏喜夫妇准备招待彼尔—别竺豪夫伯爵〕　写无赖柏喜虽极力向上爬，还是小家子气，十分可笑，为人卑鄙而愚蠢，势利之至。

第二十三章

〔预期安德列王爵要求婚，纳塔莎心神不定〕　未成年情绪。

她恢复了她那得意的心情——怜爱自己，也喜欢自己

…… 这一类写得都很好。未成年，然而早熟，多情善感，又自得其乐。

〔安德列向纳塔莎求婚时的描写〕 写得很好，自然，亲切，用字不多，中肯。 写安德列也对。

第二十五章

〔玛丽王爵小姐的长信，谈到她哥哥安德列〕 凡是译"仁慈"处，似乎都指的是宽厚温和。

第二十六章

〔玛丽王爵小姐的宗教生活〕 正和《红楼梦》中一姑娘出家相近。缺少爱，缺少正常的感情排泄和挹注一种必然的皈依。所以说宗教是剩余情绪的尾闾。

第七卷 第三章

尼古拉……被那不可抗拒的好猎心弄得心神恍惚，正如一个情人，在他的情妇面前，忘记他先前所有的决心了。托欢喜用比拟法写人状物，刻划感情，简而有趣。有时且十分生动。

第四章

〔劳斯托夫家出发打猎〕 这一节是极著名的散文，可和屠氏《猎人日记》同传。

〔丹尼尔指挥猎狗追踪狼的叙述〕 写丹尼尔，用充满了爱的感情的笔，十分生色。

第七章

〔纳塔莎和尼古拉受"叔叔"款待后坐车回家〕 写猎事到此数章，是本书中著名文章。读托老文及《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多提这数章。认为是十分精彩笔墨。

第八卷　第五章

〔包力斯看上朱丽叶的财产，但求婚还拿不定主意〕　写向上爬的包力斯笔极刻。写富而丑的朱丽叶也极刻。

〔包力斯求婚时两人的对话〕　写两人的丑态，字不多，深刻近史笔。相互虚伪，同样明白钱是主宰。

第十卷　第十七章

莫斯科陷落前心情，几句话即事交代。分析叙述好。

第三十章

〔彼尔走上小山，所看到的波罗狄诺战场景象〕　着笔不多，极有神彩。

第三十一章

兵士们……那种敌对的不信任的感情就逐渐开始变成一种和蔼的嘲笑的同情，正如兵士们对他们的狗、火鸡、山羊……的同情。那些人很快把彼尔收进他们的家庭，过继了他，给他起了一个绰号……这类形容比拟描写都极有意思。本书到处可见。

第三十二章

〔彼尔本能地和冲进方堡的法国军官格斗〕　文字并不多，极有力生动。

第三十三章

〔拿波仑接到的报告、所发布的命令，和战场实际情况的对照描写〕　战场实际写得好。　非常好。

第三十四章

拿波仑坐在折凳上，陷入了冥想。　马扎子。

他发现他把赌局考虑得越多，他就越一定得输了。　形

容妙。托氏最擅长用一般谐趣和严重事件结合描写。短短叙述有极多内容

一个人梦见一个暴徒来打他，于是举起胳膊来，给那个暴徒可怕的一击，他知道这一击一定会消灭他，但是后来觉出他的胳膊无力地垂下来，软得像一块破布，于是那不可避免的灭亡的恐怖在他无可奈何中支配了他。形容极妙。

“在离法国八百法里的地方，我一定不让我的近卫军毁掉！”写拿波仑对战事已感到在一种无可奈何胶缠时的失败预感。好。文字不多，却深刻。

第十一卷 第十四章

〔劳斯托夫一家作离开莫斯科准备，纳塔莎指挥包装〕对纳塔莎总是特别用力描写。

第二十五章

〔莫斯科撤退最后阶段，总督劳斯托普钦的感觉〕凡是这种形容，都极生动而形象。

第二十七章

法国人在莫斯科的吸收下像星光一般辐射开去，直到九月二日傍晚才达到彼尔正住着的地方。这几章最难写。

第二十九章

上尉用闪光的眼睛看着彼尔谈起爱情和他的恋爱事件来。笑法国人对爱情的看法。

第十二卷 第三章

皇帝开始沉重而急促地呼吸，他的下嘴唇颤抖了，眼泪立刻在他那俊秀的蓝眼里出现了。

不过这只是一会儿的事……　这一章写俄皇得到莫斯科大火消息情形极好。真是大手笔。用那么简单明朗的方法，刻划出俄皇在这个历史大事件中的情感式样！

第六章

〔尼古拉来访，玛丽王爵小姐的表现〕　用力写她的变化，正如所谓爱的觉醒。惟似乎和过去所写丑陋太矛盾。

尼古拉……他知道，在他应许了桑妮亚以后，对玛丽王爵小姐宣布他的爱情是他认为卑劣的事。意思指财产。

第十二章

写同在囚中农民极好。素朴、准确、生动。

第十四卷　第十三章

用极少文字即写出法兵毁灭于退走的过程中情形。

第十六章

〔对拿波仑和他周围那些人溃退中举止和内心的评述〕这里短短批评特别有力。

第十七章

写奔溃，文字不多，极好。士气已尽，正和淝水之战相似。

第十八章

然而不然！堆积如山的关于这一战役的书籍已经由历史家们写出来，拿波仑的部署的每一部分，他的战略，他那指导军队的高深的计划，以及他的元帅们所表现的军事天才，都被叙述到了。　嘲笑那些历史家的虚伪，嘲笑那些将军以及拿波仑。真正的历史，是毁灭。

第十九章

所有关于切断和俘虏拿波仑及其军队的高深计划，正如一个种菜园子的人的计划一样，那个种菜园子的人把践踏过他所种的菜畦的一头牛赶出菜园子去，还要跑去大门前打那头牛的头。 托氏最有风趣处，是引俗事例历史上大事件。

切断拿波仑及其军队那种目的，除了在十来个人的想象中以外，从来是不存在的…… 批评空谈家和虚伪的将军回忆，以及根据这些不可信、不合当时事实材料写的历史。

第一个总结 第十六章

〔写纳塔莎和彼尔夫妇间日常谈话〕 夫妇间说话常不连贯，少一贯逻辑性，解释得极好。

第二个总结 第一章

〔写拿波仑的兴衰一段〕 概括拿波仑活动，有史笔。

1961年初作者因高血压心脏病入北京阜外医院就医，这是他住院期间阅读《战争与和平》时写下的札记。据手迹整理编入。

作者所读为董秋斯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整理时依此译本的卷、章和译名。引文用仿体表示。

① 矮四爷 作者的亲戚。

题某传抄件

近传一个小小文件　　上试为本文作浅释
　　下试为和咏作浅释①

白玉一方，
　　晶莹无疵，圆润生光。
星陨朔方，
　　天地变色，山河减光。

岂怡红公子，命根难系，
　　梁山好汉，天道所行？
叹人生盖棺，丹心一片，
　　英毫绝笔，青史千行。

狂风不移，烈日难纪，
　　石中迸出美猴王。
黎明前后，大江南北，

以石自拟，且引申诸有关种种。
真是涉笔成趣，而又十分庄严！

（和咏即以吊之）将星沉坠于北方，一切失去光彩。

贾宝玉一顽石也，
梁山诸好汉亦名著于石。

是非好恶，死后才分明。人虽死去，将名著青史。

孙大圣亦从石出。石压再重，终于迸出。

降服多少恶魔王。

追忆革命中艰苦斗争的胜利。

传千古，掘几多宝库，
龙门云岗。
燃星火，共铁军奋战，
罗霄井冈。

龙门云岗，均为石头琢成，千载之后，犹能感人。
从井冈山星星之火作为起点，即一心为党。

莫云铁石心肠，
有热血沸腾涌满腔。
于今一吐衷肠，
使天下健儿泪满腔。

任悲欢离合，不动声色，
喜笑怒骂，皆成文章。

一切不公平挫折，处之泰然。

或叱咤风云，义形于色，
沉吟诗草，老赋华章。

艰苦种种及反对林贼阴谋，总是所无忌讳，不为自己安全设想。作诗作文，到晚年越大无畏。

上补青天，下填沧海，
粉身碎骨自刚强。

随事引申，用以自喻。女娲炼石补天，精卫衔石填海，明知无补现实，仍将继续作去。

烈士暮年，肝火益旺，
雄心胜它万夫强。

了此愿，亦不枉平生，
　　非梦一场。
到地府，犹穷追奸贼，
　　决战一场。

即旧说人生如梦，并不是梦。

勇敢处无人可比，即死去还不会忘穷追猛打。

这或许是个历史文件，又或许只是好事者一种传说造作，终不失为一个“历史故事”。活到现代的知分，凡稍稍关心国家社会近十年发展变故的，不用一字注释，也必能有所领会。领会虽有深浅，或多或少能得到启发与教育，并因之深一层理解作人固难，知人犹不易也。

七三年十月，北京，笔钝如椽

本篇为作者抄录1973年流传的一份文字材料时所加的注和跋。楷体和宋体，分别为传抄本文及传抄的和咏之作，仿宋体文字为作者所加。作者生前未发表过。

① 手稿原为竖排，浅释“本文”的文字题于上方，浅释“和咏”的题于下方。

写在《红都女皇》摘录文字下

这个摘录如是从译稿取下的，内中倒似乎还怀了些好感，想我会像古代俗话，以为我这个“石码头”会靠近这只“破贼船”的。甚至于在过去四十多年前，曾经就赏识过这个“天才”，不仅要她每天写一篇小说，还要九妹[1]送她编毛线的钱。她还拒绝了。后来得知九妹曾去一法国教会学校读书，每学期学费就需五六百元。根据这一段内容看来，可能是记者事先读过斯诺前夫人作的《续西行漫记》，因为据看过这本书的人说，内中曾有对我的称许，以为是党外为党作事的作家。记者既在山东住过，且据近人在美出版谈及我的专著中说及我曾在青岛大学教过书，江又曾在那里作过小职员，所以问及关系，这妖婆因之真真假假胡说一通。

写在《红都女皇》摘录文字下

《红都女皇》摘录文字，是1976年12月17日作者之外甥田纪伦来信抄寄给作者的，田信写道："……我把这段话的记录另页转抄寄上。江青因知道二舅在国内外有名望，所以向威克特自吹时，说她跟二舅学过文学等。而实际我们知悉二舅是根本看不上这个'大弟子'〔的〕。去年和前几年我来北京时，我已听得二舅说起看不上这个'大弟子'，说此话时还做了她穿着那个大裙子'国服'的势态，和指出过江青有野心，想当总理、主席等。当时我还不太相信。"在摘录文字后田又附注："此件看后烧去，不必寄回。我妈妈看了此段后，说她不知悉九姨还有个名字叫沈楚之。"

这篇题识估计1976年底写于苏州。据手迹编入。

① 九妹　作者的九妹沈岳萌，又名美真、芷嶙。《红都女皇》摘录文字中称她为沈楚之，不确。

《沈从文研究资料汇编》草目旁注

……

三、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

2. 创作十年（1925～1935年）的总结　应是良友习作选[①]《题记》，香港盗印本却改称《习题》，不伦不类。

5. 沈从文谈《八骏图》　似乎并未作过解释。

7. 沈从文谈《阿丽思中国游记》　作计二卷未完毕，内中排印错字极多，可以不列入。

四、沈从文谈自己的文艺观

1. 一周间给五个人的信摘录　大多是编《大公报·星期文艺》[②]时，改稿还稿时针对别人的来信及友好的信，不甚经意而写的。

3. 给一个写诗的　这倒可和《昆明冬景》中的《谈朗诵

诗》相关，宜与之同在一处。似不如《谈朗诵诗》有条理。

五、沈从文对新文学运动史的看法

4.“京派”与“海派” 此文并未涉及他，他却在某些人挑拨下，大大骂我一回。其实我明明说到的，是他也反复批评到，一些“反复无常，买空卖空的文化市侩”。他根本不明白事实上并无什么“京派”。以我本人为例，除了在《新月》、《现代》投稿，和谈政治的罗隆基即不甚相熟。一面是对政治少理解。另一面是无资格，无足利用。

六、沈从文论新文学史上的诸作家

1. 沈从文论鲁迅

2. 沈从文论郭沫若 这都可以去掉。谈谈熟人作品印象，熟人从不认真对待此等印象式抒情小文章。至于涉及大人物的，自有专门家严肃的赞美，我毫无说话资格。也根本不想谈我不懂的，随意加以褒贬。

7. 沈从文论刘半农 此外似还有谈李金发、孙大雨、刘梦苇、汪静之等作品，多近于抒情方式欣赏，并未较深刻分析过作〔品〕成就得失。算不得“论”。刘诗《扬鞭集》我赞过他的吴歌体试验，但预言说怕行不通。因为方言局限性极大，我会用，却有意不多用。

七、沈从文的社会政治观

2. 致唯刚先生　是见林宰平先生〔文章〕[3]后回答他的信。这人是梁启超先生的好友，《饮冰室全集》即为一手整理。在清华、北大教哲学，影响我一生极大，良师中最亲近的一人。

7. 读《英雄崇拜》　驳陈铨文，时陈在《战国策》正捧蒋，且接近军统。我写此文后，即不再为《战国策》写别的什么[4]。陈随后写《野玫瑰》，大得军统称许。

8. 北平的印象和感想　可能是复员后初回北京作的，当次日是教师节，叙及在天安门前见二坦克，且被宪警搜身。

八、对沈从文的评论

2. 唯刚论沈从文早期创作的倾向　此文似和第七节中2有关。原不相识，他文中提及感伤气氛不好，我曾去见他，一谈四小时，此后即日益亲近，直到于死。在为人素朴上，正直上，是一生影响最大良师。北大林庚教授是其幼子。

8. 王瑶论沈从文的创作　这是他的教材，直到最近九大院校合编教材，还多依据。是有代表性的“一面倒”作品。且影响到许多人。如正统派有文学批评奖，这人应当得到第一等金质奖章，才是事！等等凡是“一面倒”以左翼文学成就照官定安排的，都应当得同样金质奖章，因为对“正统”宣传有功。

……

《沈从文研究资料汇编》草目旁注——

《沈从文研究资料汇编》草目，由邵华强1980年3月初拟出，沈从文审阅时作了一些旁注。此《汇编》经邵华强修改补充后，于1991年由花城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书名改为《沈从文研究资料》。

汇集草目旁注编入，原草目文字用仿体，旁注文字用宋体。

① 习作选　指《从文小说习作选》，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5月初版。《题记》实际篇名是《习作选集代序》。见全集第9卷。

②《大公报·星期文艺》　实际是《文艺副刊》。

③ 指林宰平以唯刚为笔名发表在1925年5月3日《晨报副刊》上的评论作者早期散文《遥夜——五》的文章《大学与学生》。林文除指出“《遥夜》全文俱佳——实在能够感动人”外，还表现了“凄清，无聊，失望，烦恼”的消极情绪。

④ 此处记忆有误，作者其后还有《烛虚》（之四）等作品发表在《战国策》上。

题书法、绘画、摄影及其他

题《出师颂》条幅

三十七年除日封笔试纸

这是作者赠周定一临史孝山《出师颂》条幅的题识。

周定一在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均为作者的同事。1946年后，沈从文任《平明日报·星期艺文》主编，实际由周定一主持编辑。1988年他在《沈从文先生琐记》一文中推测："民国三十七年除日是1949年初，即北平解放的时刻。我想，这里的'封笔'也许意义双关：岁末年终，官府封印，戏班封箱，文人封笔，这是社会习俗；另一面也暗含要封笔不写小说了。"

1949年1月28日为农历除夕，作者此时正因病住到清华园金岳霖家，不可能为周定一写字。故上述题识日期，应为1948年12月31日。

题中国公学女子篮球队合影

十八年兆和在吴淞学校球队（执球）

从文　三十八年北平

三十八年

三月廿六[①]在北平重阅仿佛有杜鹃在耳边鸣唤[②]。

从文

---

① 三月廿六　作者题字日期。两天后，作者在病中寻求解脱，获救后，被送入精神病院。这是目前所存那次自杀前最后的文字。

② 作者在 1938 年 4 月 13 日致张兆和信中，对杜鹃的鸣唤有以下描述：

杜鹃各处叫得很急促，很悲，清而悲……声音清远悲酸。

参见全集第 18 卷。

Post Card

王開照相

上海南京路

Photo by C. H. WONG

NANKING ROAD SHANGHAI

CORRESPONDENCE

ADDRESS

十八年北和
在美松学校
球隊(棋球)
汪文三十八
年北平

三十八年
三月廿六在北平
重阅佑佛全社
照在再也
汪文

写于赔书单上

五二年土改回来，发现办公室所有书均被没收，从此即〔无〕可追究，也不知向何处申请发还，不了了之。对照之下，可见生于十分幽默□□。

已赔偿后，有些残书因有图章未注明，又被收回。

办事人十分认真，七五年又赔十元，因借一聚珍活字则例，不搞这一行，只是为改陈提出，签了个名，即得赔偿。

此赔书单为第一份，似还有第二份[1]，值二百多些些。

五二年从土改回来，发现办公室中所有存书均被没收，无可追究。承好意，能记书名或可为查查。但自己用书成天收购，那能记得书名。只一知不足斋原刻本[2]被没收时，幸亏老史见到为说说，在乱盖图章后又归还一部分，不及三分之一，余仍失踪。

六四年工作室中书虽未毁，到时发〔还〕（已经整整十

年），其中重要大型图录，仍多失踪，无可追问。因“爱好者”各取所需，名为“雅事”，自然不会主动退还。且工作室曾经一再换人作卧室，更无从追问下落。至于住处三间房中所有图书，则在相当“巧智”或高明设计中，为让房与人，先被迫迁至前院，后又有人来住，复迁后院，书〔无〕空间可放，只能搁在院中受点风雨考验。风雨中自然相当使人不可解，因为公家不要也不许暂存，只好由梅溪为雇大板车分别搬运五大车至灯市口旧书店，以七分一公斤折价作废纸勉强收购。

一切工具书和近四十年所有新作或友好相赠译著，既加以清除，“四旧”离身，真应感谢一些“好心人”，为我作了一件大好事！但到图书室因新定条规清理借书时，负责人十分认真负责，又十分公平合理的照签有个人名字的书名，开具估价单照赔。当即如数照赔。至于本人被无理由没收的以千卷各书，却应由早已离职或故去人负责。公事公办，十分合理。所以直到最近，还有一本肯定不是个人所需要、所使用的聚珍版则例，还照章赔偿十元。认真处很值得个人受点教育，引以为诫，不再为公家事或同事需要而向图书室借何图书。必须牢牢记住，且尽可能不读“四旧”书，免得中毒，任一回倏然而来风雨中重作代为消毒，麻烦别人！

此一纸似应当并以前捐二大馆院旧纸过千种的收据，及最近捐的《阿房宫图》长卷（前后因此图已耗费约六百五十元）馆中收据留下并存，或足为其他好事热心人作参考，增加一点常识，免得在同类事情上作傻瓜。最好还可以把改业以后给若干大学和生产单位捐送的陶瓷、漆、画写个简明数

目，同搁一处，必可给别人一种新教育。一切过分主观做好事，在另一时可能反而会成为一种“神经病”患者。因为许多许多做人新办法得学明白，总之许多事是崭新的，由于社会新。要认真学习，牢牢记，才不至于出差错。应向“现实”学“现实”，绝不容许用主观热忱处理人和人以及公和私的关系。最聪明懂事的人，或许是最会把“所学”和“所作”分别对待的人，才能有真正出路，才经久，才能与要求合拍。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傻子”或“混蛋”。

赔书单系 1959 年 11 月 11 日所开，列 1952～1956 年欠书 17 种 51 册又 15 页，折价 104.18 元。作者所注文字，部分写于当年，大部分写于 1975 年。

① 第二份　作者 1972 年回京后，曾收过另一份赔书通知，为文革前所借图书，其中包括为摹绘图像代借的若干图录，经数年动乱已散失。

② 知不足斋原刻本　指《知不足斋丛书》，大型丛书之一，凡 30 集，207 种。

告　示　选

凡是过去外借的书刊和唱片，都请不要自外，退还给我，便于清理，十分感谢。

〔1972年从干校回京后贴于住处兼工作室〕

如下各书，同志们借去的，望能赐还，十分感谢。近因视力衰退，拟把各书清理清理，此后各书若有需要，可以再借。

《中国古代石刻》　王子云编

《唐宋名迹》　谢稚柳编

影印《燕寝怡情》

《秦会要》

《图书集成》中有关泽运部分一册

及其他廿年来所借各图书

近因个人眼病，视力衰退。记忆力也同在迅速衰退中。希望取得同志们大力协助，把多年来从从文手中借去，及在

研究室里借去诸书，能一一归还，便于清理一次，十分感谢！

沈从文　敬启　八月廿三

〔1974 年夏贴于住处兼工作室〕

遵医生嘱咐，体力不大好，不宜谈话。凡是外来客人有事相商、相询的，请从通信中商讨。必须面谈的，望约个日子和时间并所询问题，便于事先准备材料，用较短时间即可解决。

凡在京友好，借用过我一切图书、资料，务请即早一律见还，便于清理一下，万万不要再冻结在任何个人手中，失去原来好意，使我工作无法进行。俟清理以后，再商量借用办法后，还可再借。

医生警告，视力衰退，不宜再为人看文稿，不宜写字。心脏不大好，也不宜谈话过多。

〔1974 年秋、冬贴于住处兼工作室〕

工作时间中，不便接待客人，望能相谅。陌生客人，若有事相商，最好从通信中相告，十分感谢。

〔1981 年左右贴于住处门外〕

作者从五七干校回京后，不得不多次用贴告示办法，寻求散失的资料或谢客长谈，以便抓紧有限时间工作。现选部分编入。

评沈红绘画习作

唐代诗人李白

小红八岁大，据刘姑父[1]塑的李白像摹出，神气极好。比一般专家作的还生动有个性。

从文

〔写于1973年底〕

是唐初壁画拿扇子的宫女，这还是去年秋天为摹的。不问大小，摹出来在神气间，总还能把握住要点和神气。而且画成后，自己看来也十分自得其乐。不给她画点什么时，还得提："爷爷，我帮你忙，画点什么吧。"

这次下乡劳动三天，有一天抬粪，回来即画了张二人抬粪的图，箩筐画得十分精细准确，人物神气也很好，一一具体，后来还加了色。焕章见到时就说："小家伙真有两下！"我还来不及看，就贴到学校去了。

〔写于1974年〕

1976年8月14日于苏州　　沈小红画 [1]

作者手迹

涂涂抹抹改了又画，共四个下午才完成。两次是在太阳下。

正门上窗格有遗漏处，门前还有些应用器物未及添上。月拱门转角处有一株齐檐桂花树未及画，二窗之间还有株大无花果树未及画。月拱门里还有些破烂东西未画。二门之间通道不是直的，稍有弯曲处未及改。正中二扇门半开，下部应略斜才符合透视未及改。右角下斜方砖路可画得明确些，因重在保存行将拆除楼房②，如上。

沈小红　十一岁

〔1976年9月题乐益女中主楼图〕

为鼓励孙女沈红绘画练习，作者常喜欢在她的习作上写评语。现选录部分编入。

① 刘姑父　即雕塑家刘焕章。

② 楼房　作者岳父张冀牖受五四运动影响，举家从安徽迁到苏州，1921年独资创办了苏州乐益女中，1923年新校舍建成。张冀牖接受女权运动及蔡元培开明的教育思想影响，曾聘请侯绍裘、张闻天、匡亚明等任教职，把乐益办成当时极具开明特色的一所女子中学。中共在苏州的第一个党支部，就建立于乐益女中。抗战时，校舍被日本宪兵队盘踞，成为残害抗日志士的地方。1946年后复校。1976年，原乐益女中主楼行将被拆除，改作他用。为保留这有纪念意义旧址形象，原乐益女中老校长张寰和命沈红作写生以志纪念。

题旧书元稹《赠双文》诗

艳极翻含怨，　怜多转自娇。
有时还暂笑，　闲坐更无聊。
晓月行看堕，　春酥见欲销。
无[1]因肯《垂手》?不敢望《回腰》。

廿八年元旦为某某兄嘱书元稹此诗，并说将于未来有用，亦一奇谜也。

此小幅旧书，于近卅年内风风雨雨中，使得所有旧藏毁尽后，居然还在新近送还旧日来往信稿中发现，从回忆中，才将“来龙去脉”一一弄清楚。原来此清初旧纸，是从某府由某人送来，为记其一生重要遭遇，指明为写一和莺莺有关诗文，留个印象。本人已故去卅年，不意还居然搁在我近五十年一大堆信稿中。更巧不可言，为意料所不及，即于半月前，在一亲戚家中，见到一照相，上面有二成年女孩子，长得特别出奇清秀。神情面目，似极其相熟，又复真正陌生。

亲戚为叙述一约半小时后，才联想起此残余旧书，原来是为二女孩子母亲先一爱人托书，我和这二女孩子在六七年前因肝病故去之母亲，原来也熟到够受其情人委托，能值得信任，为书元稹此诗，作为异日一个凭证时。因此听到亲戚为叙述近卅年这一家过去种种，和当前二女孩子父母均已于不同情形下死去后，得知生活情况还过得去，高中行将毕业，夏天或将于假中来京，和这个八十岁老亲戚同住住，并看看有关亲友。大致那个故去母亲，活着时，提到我时，或许留在二女孩印象中，有些不同于别人处，来京时，肯定将来特别看看我，叙叙旧事，也问问旧事。或许还留得一点什么给我，将由二女儿亲手交我，又或从我留的什么，给一点给二女儿，作为纪念品。还听老亲戚说，曾告过二孤女，有些事情，在世界上或许只有从我处可以明白得更清楚，更多，也更对女孩子有用。便是“奇谜”一部分的过程。

孩子能多知道些，也很好，会使在长成中的生命，更有分量些。也是一份极有意义的教育。比读上百本别人写的小说，还更加内容丰富而深刻。因为不仅是母亲的历史最重要一部分，同时还是女孩子本身的历史一部分，和她们自己如何就活到这世界上密切相关。还说：“最好是能从某伯伯处，得到一篇小说，卅年前发表过，可不曾在集子里找得到。去北京也未必还有希望能得到，但这是唯一的希望。估计到将是唯一的，还相信必然留得有在手边。”

回到家里，我试从没收已十年新近始退还的，特别经过整理，另纸列有目录一大包已发表未曾集印的稿件中，发现了几页用绿色土纸某年某文学刊物上，果然发现了个题名《摘星录》的故事。

我回念死去了的好友留下种种印象，充满了十分严肃的感情，在深夜里去重新翻阅这个旧作品，许许多多卅四年前的离奇不经的情绪历史，以及同时存在前后已因种种不同际遇而先后死去了的至亲好友的声音笑貌，一一从我这颗行将报废的心子跳动中滤过，悲喜得失，一切都复明明朗朗的重现出来。事实上这一切除了唯一还保存在我生命中，继续影响到我许多方面，本身则早已毁灭无余，不再〔在〕这个新奇多变风雨倏忽的世界存在。可是，我却还经常被这个支配到我的生命，产生有力的作用。一支长过一寸的中锋笔，能写这么一大片绿豆大行书，便是最好而明确证据。一切支配和影响，都使人永远积极、乐观而向上，使“消极”“丧气”等等名辞不起任何作用。我乐意这么受支配，因为七十四岁童心未失，生命里长若有一种闪光，童心永在而生命力特别顽强，大都由之而来。把孔老二“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所谓名言，用另外一些不着以语言文字，只反映在过去不同情形下留下的微笑和轻颦，以至于长期沉默和某一种短期激荡的情感教育中留下的印象，却鼓励我、教育我对生存的无比庄严感。我从这个世界人的关系中、友谊中，以及由于给人的良好印象得到的一种无私的爱与给予，已够多了，早已超过同时同行的许多人所得的总和。我特别感到生命的丰富。童心永远的强烈持久药物，就是和青春不可分的，无私而纯粹忘我的爱，用各种不同方式而得来的给予，不论是极端含蓄和热烈放纵到不可设想，其中就无不充满了一种诗情画意，给人以神圣庄严感。经时越久，且越具有教育作用，一种作人向上的教育。从不使人堕落，正相反，永远引人上升，达到任何其他知识书本所达不到的超越感！其中自然也不少庸

俗凡鄙的混杂，但是，一经时间的澄滤，便总汇成满池一汪清碧。

即从这个永远成为文学艺术的基本动力，同时又受社会旧意识制约的限制，永远不许可更真实的反映的两性关系而言，我们所处的时代，即大大不同于新社会。在种种制约中的不同意义的开明解放，即容许或包含了引人生命向上升举的抒情气氛，浸透到生命中，以至于于行动中，把财物权势放在一个不足道的位置上。我生命动力大部分，可说〔是在〕这种热忱、敏感、智慧、知识在社会中的位置，大大超过了权势、财富的风气中形成、生长，得到应有发展的。这既是文学艺术的动力，同时也是革命动力的基础。这种超越现实的抒情，恰恰是取得目下社会现实的源泉。年青一代是无从理解的。

因此，这种生命的抒情的消失，影响到人的懒惰以至于虚伪、堕落，使文学艺术公式化，是主要原因之一。他即或是个过来人，一到了“长”的地位后，即永远陷于无知。这悲剧是千百种原因形成的，不能以为是他个人的无知。

一个真正“无神论”者，在情绪上或许正恰是个“泛神论”者，因为从新的生命存在与发展，将感到“无处不神”。但一个虚伪的“唯物主义者”或“专家权威”，却最容易成为唯心主义的推销员或实行家。这是一种必然，将在各方面占领一切可占有权利，进而形成更大唯心主义的复辟。

这篇文字估计题于 1975 年，呈不规则分布，写满了书法原作的字间空隙。

① 无　《全唐诗》作“何”字。

題工作室留影

1975年，东堂子51号工作室，潘洁兹儿子为照。时年七十进四，“老而不衰”，因之童心幻想，亦复保留不至丧失。风雨倏忽中人事沧桑变动极大，新窄而霉斋中犹一切如半世纪以前情形。某一时或将如荣启期①，尚有机会与二三深明儒术之新儒家相对，得知孔老×之巧佞躁进，及在新风雨中被扫荡过程，形容枯槁，转问“道”于鄙□，亦复一新故事也。

这段文字题于1975年左右。

① 荣启期　相传春秋时的贫穷高士。《列子·天瑞篇》称孔子见其老而贫，披裘而带索，美其乐天安命。

书赠张香还条幅跋

香还先生念念不忘仅于三十年前曾一通信之故旧，事隔三十年后，犹远道来信，借致殷勤关注之意，并附寄一纸，嘱书留个纪念，盛情厚意，极可感谢。我本不懂旧诗，记得还是六十年前十五六岁时，跟随家乡一个小小土军阀离乡作一“司书生”时，经常为一萧姓军法长焖狗肉，才有机会从此公手中借阅过一石印本《千家诗》，哼哼唧唧约二三月，北来后即从不写旧诗。不意六一年上井冈山时，同行六位当代名作家①，大都会写旧诗，而且手快心灵，诗多写得极好。在形势所迫情形下，我才重新温温半世纪前所学，跟随同行诸作家后，学写了廿来首不合体裁之“诗”，不意发表后，倒反而得几个相熟内行相许，以为“还蛮有感情”！虽承奖励，还是对于写作毫无信心，更不想用之骗人欺世，再冒充“空头诗人”。依然回到博物馆作说明员，工作比较切实。至于书法，本来是在作司书生时，由写公文求简便快速，学学行书，到北京以后，还欢喜涂涂抹抹，自得其乐而已。因为拿笔即如“拿筷子”，不合规矩，内行一看，即微笑走开。所以解放

后，即搁笔，不再胡乱为别人写字。因为新社会凡事重实事求是，不含糊，滥竽充数可走不通。空头作家名分还不敢再冒充，说懂书法就未免太可笑！重以盛情厚意，始一破例试为用薄纸写拙作数章，其实手中所用之羊毫笔，还是新近上市为小学习字用的，只值七分钱一支，提提这一点，即可知还是老老实实自承外行为得计也。写来只是留个纪念而已，实在不宜公开给人见到，因为诗不成诗，字不成字，上海行家多，免得行家齿冷。因为一为真正行家所见，将不仅作者成为笑料，即先生恐亦将为人所笑，以为在鼓励“假里手”，不是好事！

沈从文

乙卯仲夏时年七十进四　于北京

此条幅和跋写于 1975 年夏。据作者所存草稿编入。

① 六位当代名作家，指戈壁舟、阮章竞、蔡天心、江帆、周钢鸣，华山。

重摹义卖条幅跋

此四十年前在云南昆明习字日课。似为西南联大募集学生特别救济金时“义卖书展”廿小条幅之一，也是一生中唯一把习字和经济发生联系之一次[①]。半世纪以来，社会变化剧烈，属于个人工作积累，早已荡然无余，无可追究。不意湜华[②]同志忽捎此劣书来，并谈及此小条幅来去经过，始知在同时在昆明工作之汉华同志手边箱匣中，南北各处转徙十多年，于图书与生计百物散尽后，犹不忍舍去。解放十年后，始转入伯祥先生书房中，又十余年。于人事风雨倏忽不同“运动”中，始终未被扫荡。湜华于中学时，即已与此小小条幅相熟，今复归湜华保存。初初看到，不免有“此身虽在堪惊”感。特别是回忆及四十年前亲友故旧同经忧患，相助相扶良好友谊难忘印象。大多数熟人，均先后已成古人，复归于土。个人则年已七十进五，犹复多童心幻念，不切实际，过日子方式与工作理想，和半世纪前比，变化似尚不太多。回溯旧事，更不免使人怀旧眼湿！因试重摹廿纸，分赠友好。并略述经过，简繁不一，祇是就余纸而定，别无其他意思。

用秃笔蘸宿墨于糊窗劣纸上书之，难称及格，见意而已，想不以为意也。

弟 沈从文

于北京 时丙辰盛夏

此条幅内容为抄录前人谈草书的文字。1976年重摹时的跋，各条幅有所不同。据作者保存的手迹编入。

① 作者义卖书法作品不止这一次，但他自己早已忘记了。

② 湜华 即王湜华。古典文化艺术编辑工作者。

书赠蹇先艾条幅跋

一别数年，幸各健在，因回忆卅八年春赴昆明时，过贵阳，曾过访，彼此似均在壮年，上阳明洞，犹能脚步不停，一气到顶，不知觉间，忽四十余年矣。人事倏忽变化，在人为风风雨雨中，故旧多作古人，彼此犹能生存，且能于二三年间一相见，可谓天大幸运也。

七〇年下放湖北双溪《喜新晴》先艾兄存

弟　从文　习字时年七十九

作者书赠蹇先艾的条幅写于 1981 年。蹇先艾在《回忆老友沈从文》一文中谈到此条幅内容，蹇文收入 1989 年 4 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河不尽流》一书中。

据蹇先艾文中抄录的跋语编入。

题刘焕章《鱼鹰图》

三十年前草上飞，　铁衣着旧着衲衣，
天津桥上人不识，　独倚栏杆看落晖。

此诗旧传为黄巢所作，以为失败后投入一僧院作了和尚，年八十余返还长安有感而作。诗意虽佳，实不足信。但赠此鹰，或尚相宜。迨经仔细一看，始知所画为渔人所畜养之鱼鹰，并非独立悬崖之灵鹫也。一张长而钩曲之利嘴，但能效忠于渔人，并非直飞凌空之鹞鸟也。

焕章作鱼鹰孤立于一悬崖上，虽失真，而甚有气势，见性情。鱼鹰捕鱼具特长，但属于人豢养已如奴隶，嘴必作钩状，或在奴隶社会以前即已为人所驯服，因之奴性甚深。闲居无事，惟知据船舷或船篷上扇翅膀，瑟瑟缩缩，呈可怜状。必待主人用细绳将其颈项缚住，用篙迫其下水取鱼时，明白有任务待尽，始三三五五陆续下水。一改其平时可怜相。于水中迅速如其同类之鹰鹞。得长达尺余之鲢鲤后，上浮水面，待其主人用篙援之，始能登船，将鱼吐出于舱中，渔人又复

迫之下水，必得鱼三数尾后，始能解去颈束，饲以小鱼一尾。既表示对主人之无限忠诚，亦深感主人恩惠。因之佳种中特佳者，价值千金。鱼鹰但知赖主人以为生，殊若远不知主人实赖鱼鹰以活也。

鱼鹰之嘴直者，则为弃物，任其自由飞翔于微茫烟波中，不值钱。在渔翁心目中，非不知其捕鱼之技，即加以驯服，亦难比钩嘴之易利用耳。焕章作此鱼鹰孤立于悬崖间，迨示人以此鹰年老而力衰，置于船上只能起……①有意纵之，实则弃之，免成船上一种负担耶？故宜称之为“愚鹰”，不必究其雄雌也。其状如在“反省”中，不免使人增悲悯心。古谚谣虽有“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此指人事而言，至于此等禽鸟类，则不能援例而封，彰彰明甚也。

今世亦有人嘴曲如钩，善于为主人逐捕水中游鱼，虽一时深得宠幸，而未如此鹰衰老，即在倏忽风雨中致陨灭，转不若此鹰之得终天年。可见世事之无常。

此文不知出处，或疑为汉代东方朔遗文，难得其解，实意中事。

沈从文　时年八十

此文题写于 1982 年。据手迹编入。

刘焕章　现代雕塑家。

① 此处原文缺字，省略号为编者所加。